

# 现代文字狱

李建彤

## 目录

“引子”

第一部：

- 一 一九六八年元月八日
- 二 关押在地下室
- 三 “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干将
- 四 疯狂的文化大革命
- 五 第一次三堂会审
- 六 是谁篡改历史？
- 七 思念景范
- 八 白坚之死
- 九 哪个人物是高岗
- 十 造反派联合斗争会——到底谁要复辟？
- 十一 康生的指示
- 十二 “造反派”中的好人
- 十三 挨打
- 十四 解答十个问题
- 十五 潘自力案
- 十六 李志舟案
- 十七 一九六二年我给中央的信
- 十八 一顿陕北饭引起的后患
- 十九 审查创作经费
- 二十 高锦纯、王兆相、朱理治、王恩惠案

- 二十一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引起的深思
- 二十二 刘景范被逮捕
- 二十三 高朗亭专案 赵连璧之死
- 二十四 华北局斗争张邦英、朱理治
- 二十五 朋友为我受难
- 二十六 株连陕西的朋友
- 二十七 第一次“思想汇报”
- 二十八 赵耀先 方仲儒 秦川专案
- 二十九 两面派
- 三十 “左”倾路线的说客
- 三十一 孩子们去插队
- 三十二 政治混子
- 三十三 请求给景范带用品
- 三十四 给专案组的答卷
- 三十五 吴台亮专案

第二部：

- 一 难友
- 二 门外有狗
- 三 关押的非无产阶级分子
- 四 马文瑞专案
- 五 搜查铁器
- 六 为囚徒画像
- 七 赌棍
- 八 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 九 张鹏图专案
- 十 中央专案组又来了
- 十一 贾拓夫之死
- 十二 马明方专案
- 十三 王世泰专案
- 十四 杨明轩老人
- 十五 书稿形成
- 十六 习仲勋专案组的人
- 十七 周扬专案
- 十八 苏一平、闻捷
- 十九 专案组人员
- 二十 牺牲前的战友
- 二十一 难友钱凝
- 二十二 收缴存款单
- 二十三 饺子
- 二十四 感谢临时工梁大爷
- 二十五 为少年同学作证

- 二十六 千秋功罪由谁评说
- 二十七 为刘志丹申诉
- 二十八 驳阎红彦
- 二十九 钱瑛专案
- 三十 张秀山专案
- 三十一 张策专案
- 三十二 追思想，查关系
- 三十三 内心独白
- 三十四 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是黑窝吗
- 三十五 什么是剽窃
- 三十六 谁剽窃了谁？
- 三十七 我是“基督教徒”
- 三十八 抛出最后稿
- 三十九 工人出版社的朋友们
- 四十 拒绝“解放”

第三部：

- 一 火车上的思考
- 二 在上海的回忆
- 三 寻找小女儿
- 四 “五七干校”
- 五 善意的人们
- 六 养猪班长
- 七 阿姨挨整
- 八 养猪遭陷害
- 九 中央项目组追来了
- 十 遭雷击
- 十一 患疟疾病
- 十二 何长工
- 十三 小女儿回京了
- 十四 书的乐趣与悲哀
- 十五 我的两个樟木箱
- 十六 又出了个“五一六”反动组织
- 十七 张舫其人
- 十八 两次去南昌
- 十九 捡西瓜皮
- 二十 在农家做客
- 二十一 副统帅的悲剧
- 二十二 群众批判会
- 二十三 我的反驳与申诉
- 二十四 孩子来信
- 二十五 中国还是好人多

- 二十六 女儿们来了
- 二十七 孩子们的苦与乐
- 二十八 我摔伤了
- 二十九 总算回到了北京
- 三十 把群众训练成特务
- 三十一 中央项目组找上门
- 三十二 我们的新邻居
- 三十三 治病与探监
- 三十四 继母探监
- 三十五 刘嫂子探监
- 三十六 刘景范出狱
- 三十七 招待所中遇故人
- 三十八 招待所里的怪事
- 三十九 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 四十 劫后余生的人们
- 四十一 刘景范的狱中生活
- 四十二 遭劫的根据地乡亲们
- 四十三 周总理逝世
- 四十四 悼念周恩来
- 四十五 四人帮倒台了
- 四十六 冤案彻底得昭雪

## “引子”

这桩公案是由一部小说《刘志丹》引起的，折腾了十七年，株连约六万人，致死上千人。一本的小说所造成的冤狱，可称是中国之最，世界少见。

刘志丹是本世纪初，二十年代的革命者。他一生坎坷，意志坚强，生命短暂，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以他为主要领导者，创建了陕甘宁边界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在三十年代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1936年刘志丹参加了红军东征，牺牲在山西。周恩来题颂他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小说《刘志丹》，是写他的一生经历，从他的经历中带出陕甘宁边界根据地的发展，本应是无可非议的，谁知却遭灭顶之灾，实是一件憾事。

文革结束，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反党小说”《刘志丹》的这桩公案，想弄清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如此惊天动地，为什么能牵连那么多人？还有些人关心我的状况，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也有人想知道，这个案子的来势那么大，劲头那么猛，我是怎样争取平反的；有不少了解此案的朋友也曾劝我：“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吧！留给后人，作为他们的一面镜子，以此为鉴，免得这类悲剧再次发生！”

我的朋友认真地说：“要写快点写，年龄越来越大，怕要忘记了。”

朋友说：“这个案子的经历，还是你自己写出来为好，以后让别人写，就差劲了。”

这都促使我提笔写这个事件。给社会留下这本历史记录。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历史，而是社会历史，是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历史。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公案，是中外古今稀有的奇案。

用什么题目呢？想了很久，什么都不合适，还是用一九七九年为

《刘志丹》小说平反的中共中央 53 号文件所说的“现代文字狱”最切题。不就是一本小说么，竟使许多人被关押，监禁，数万人被抄家，挨斗，为此案丧失生命者究竟有多少？还不曾统计。

“现代文字狱”这个题目，一九七九年新华社的《情况反映》上用过，后来《工人日报》写此案时，也沿用此题。

这个案子，我不能写成小说，只能写记实，把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把我当时的思想情绪记录下来。

从哪里开始呢？再三考虑，不能从头儿写，如从头儿写，怕又说是攻击了哪位伟人。我只能从中间开始，让镜头折射，尽量避免正面。把一九六二年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先撇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写。

我开始翻阅数据。资料像汪洋大海。自己收藏的，平反后退还的，有报纸、传单、小报，我被迫写的“检讨”、“交代”、“思想汇报”、“证明”、几百次提审的“供词”、“记录”，合起来究竟有几百万字？没有计算。这个案子经历了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九年的十七年。这十七年中，除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外，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和朋友的记忆中的东西。

我一定按事实的本来面目写。对于应该写的人物，哪怕是他以后起了变化，或者犯了严重错误，我也要把他们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而且以后也不准备修改。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他们受过我的株连，被康生派的项目人员提审过，被造反派围攻过，甚至挨过打，坐过牢，发配过……有的险些丧生。

要搞历史唯物主义，不搞“事件”主义，“运动”主义，“个人好恶”主义。

下边就先从一九六八年元月说起：



## 第一部

### 一 一九六八年元月八日

从一九六二年秋，我写的小说《刘志丹》，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定为“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我写的是三十年代的事，怎能为五十年代的高岗事件翻案呢？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家大门口就贴上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我的这本小说，能推翻一个若大的政权？当时我很震惊：这是御批呀！使我悲愤，寒心。也够我“光荣”一辈子了。

康生居然还说：“那本小说，是篡党的纲领。”

在1968年元月八日之前，我家住在北京西城丰盛胡同二号那个大红门院内，生活是正常的。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这院里就起了风波。康生领导的项目委员会经常把我的老伴儿刘景范叫去审问，有时也把我叫去审问。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到处说：“要清算《刘志丹》小说这笔账。”他觉得北京的造反派不够用，又特地调来《天津南开大学》的“八一八造反兵团”，一到我们机关，就亮出招牌：“我们是奉康老之命来的！”

他们在北京组织了各大学的造反派成立个“六二项目兵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因为我这个案子是六二年发生的。用这个头衔在我家大门口贴了个“勒令”，说明：这院子里住的“反党分子”一一刘、李是我们掌握，谁也别来抢。

康生把从我家里收走的采访记录交给了造反兵团，让他们照记录

上的名字通知各地造反派揪人。使全国各地造反派都跑到我家来批斗，进进出出不断人。

1968年的元月八日上午，把我和景范分别拉到地质部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分成两摊批斗。围着我的有五、六个人。问的话，和中央项目委员会问的内容类似。无非是：“为什么写小说？”之类的话。他们都是年轻人，都是些上当受骗的，我不想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只是平心静气地对答。磨蹭到中午，有个女干部给我端来一碗大米饭，一碗白菜豆腐汤。我吃过后，他们就押上我，直奔在西四羊肉胡同的地质部礼堂。再次开我们的斗争会。

会场布置得可真隆重。从大门口到礼堂，都贴着大标语，大字报，红绿黄白全有。礼堂内舞台上挂着横幅大标语：“斗争反党分子刘景范、李建彤大会！”

仰头一看，真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都有，我顾不得看人脸，就被拉上了午台。我们两个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我们已成了老演员。上这样的舞台，已经多少次了。不但在这里，在工人出版社、在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所都上演过多次主角。我真的以演员的心情在台上环视一切。台上坐的主审人，有地质部的造反派，有中央组织部的造反派，还有穿军衣的。

景范讲过，把他一个人拉到地质部斗时，每次都有穿军衣的，不知是些“支左”人员，还是康生派的什么人。“支左”的意思是。谁“左”得出奇，他们就支持谁。不过，在我们这出戏里，他们是主张“大联合”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联合起来斗争刘景范。斗争会就是“火线”，在火在线练兵，谁斗得最凶谁最革命。他们现在比1935年王明“左”倾路线斗人的花样并不少。他们每次斗争刘景范时，都是无情的斗争。拉过来，推过去，拧膀子，坐“喷气式”，站几个小时也不让休息，不许靠墙，不许扶桌子，不许伸腰，

不许上厕所，也不管他病体如何。所以，每次被斗争回来，景范总是满身汗透，躺下半天不能动。真是落在了“法西斯”手中。看到他这样，我就想：你们知道吗？他在陕北的土地革命中，也曾是费尽心血的人。他当过陕甘宁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当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代主席。就落了这么个下场？你们就这样对待他？陕北人拿小米饭喂出些仇人来，既有今天何必当初呢？

今天，我们俩并排站着，要弯下腰，不许抬头。我一抬眼，看见了许多照相机，还有闪光灯呢。明白了，他们要拍“记录片”呀！我一闪念：“哼！没门儿！我俩不给你们弯腰低头！”我突然把腰直了起来，仰起头，眼角一扫，景范早把腰直了起来。押解人就按我们的头。按下去，我们再起来。再按，再起来，咱们就好好演这场戏吧！

主席台上的人发言了。无非是揭发，批判。给我的小说《刘志丹》捏造些极可笑的罪名，再把陕北的干部诬蔑一番。我听腻了，他们要我开口：“小说是谁让你写的？”

“我自己喜欢写，不要诬赖别人”我给碰了回去。引起一片口号声，打倒声。我深知，这时候越说实话越有罪。

穿军衣的人站出来大声说：“我们要把这些反党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又拿出一张纸摇了摇“看这是什么？上级已经批准，要把你们带走！”

我恨得直咬牙，谁批谁就欠下一笔债，不是欠我们的债，是欠社会的债，欠中国人民的债！

又是一片打倒声。在打倒声中，景范被他们带走了。另一些人把我从后台架出来，一直把我押回家。

进门一看，原来他们又在抄我的家，已经抄得乱七八糟。穿军衣的人命令我：“给刘景范拿被褥，洗漱用具！”原来他们把景范送到了卫戍区。就是因为我写了一本小说，就足以造成丈夫被捕？我沉着心，

给景范拿东西，同时在观察着他们。突然，我叫着要吃饭。他们无理由禁止，因为已是下午五点多。光线渐暗，我家的老阿姨还守在家里。她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馒头，一碗土豆、白菜、肉片汤。我理直气壮地坐在桌前吃着。有个造反派“哼”了一声。

我眼皮不抬地吃着，管他们围着多少人呢！这些人中有三、四个穿军衣的。

我心里说：“我要吃饱，今天你们不知把我往哪里送，我得贮备点儿力气，不吃饭哪行？”

我吃了半个馒头，再吃半个。他们正抄家，一些人抄着，一些人监视着我。

我吃着，他们坐着。

我馒头吃完了，菜也吃光了。

我被他们拉出大门，上了吉普车。往哪里开？我不管，只是望着车前的玻璃，却什么也没看见。脑子里在放电影。

隆冬季节，狂风怪吼，群魔乱舞。人的外形被扭曲了，心灵搞歪了，眼睛吹邪了，头脑震昏了，已是六亲不认，互相用仇视的眼光审视对方。

我心想，把我送到哪里都无所谓，早准备好了。1962年冬中央项目委员会曾把我叫到中央组织部会审时，问我：“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坐牢！你们看，我的旧大衣已修好，把从延安带来的黄绒毯缝在呢大衣里，随时去坐牢，再冷的地方也不怕！”

他们真坏，没有把我和景范送到一个地方，把我送到西城区三里河百万庄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所”，关在地下室，锁了起来。

## 二 关押在地下室

多么惨人的地下室！进去一望，两端看不到头儿，黑咕隆冬，像

煤矿的坑道。中间的一个小房间，已为我放了张木板床。两个女人押我进去，开了灯，我往床上一坐，她们便把门落上锁，走了。

我被锁进了坑道。已经很疲倦，该躺下睡一觉了。躺下仰着脸，望着房顶和墙上吊着的暖气包，像要往我身上砸下来。它们还发着砰砰的响声。这个又长又大的地下室，只有我一个人。这一年来，各机关在地下室关押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死在这种瘆人的地下室里。

虽然已被审了六年，我从未失过眠，不管是“三堂会审”，还是“群众”斗争。地质学院的学生把我抓去审了两三个月，我也不曾失眠，从未吃过安眠药。我的神经，也许是天生的健全。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该吵时就痛痛快地吵一架，该骂时就痛痛快地骂一顿。谁想制服我。那是难上难！

可是这天晚上，我失眠了。那两个女人，每隔一小时就来开一次锁，看看我。我睁着眼，也看看他们，彼此无言，又走了。一夜来了多少次，我们都是对着眼看看。她们悄声退出去，噉噉喳喳在黑暗中不知说了些什么。

管他呢，我还是想我的，今天在斗争会上他们提出了十大罪状：

“《刘志丹》小说，是习、贾、刘和李建彤合伙写的。”岂有此理！你们审查了六年，难道不曾见到最初的草稿？可发现过他们几人的一个字？

“刘景范的家庭是大地主！”凡是看过政务院制定的《划分阶级成分决定》的人，就应该知道，不出租土地就不是地主。这个论调和一九三五年王明“左”倾路线的人逮捕刘志丹时唱的是一个调子。那时也是说：刘志丹是大地主的儿子。现在又老调重弹。这是明批刘景范，暗批刘志丹。

“刘景范包庇彭德怀！”彭德怀用得着刘景范包庇吗？“大跃进”谎报产量，百姓挨饿，死了那么多人，彭老总为百姓说话，就被罢官

了，到处批斗。

“刘景范和“高岗反党集团”有关系”。从前没有听说过有个“高岗反党集团”只听见中央传达说：有个“高、饶联盟”。中央还公布过一个《善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那时对刘少奇有意见就是反党，现在公开叫着：“打倒刘少奇！”这和那个“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有没有矛盾？

“刘景范是假党员！”刘景范的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的来信还在我手里，我有证据。你们不认真调查研究，就下这种结论。

这些罪状，就是一九三五年王明“左”倾路线在陕北搞“肃反”的腔调。为此，刘志丹他们坐了牢。今日又旧戏新演，老调重弹。

我要反驳！一切证据都在我手里，在我脑子里。那十条罪状全是假的。你们这些人在数千人的大会上宣布，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这是政治上的堕落！

看着军人也上台大吼大叫，听从坏人牵着鼻子走，真使人痛心！刘景范是自己组织过红军的人。刘志丹是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如今，只是因为我以刘志丹的历史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穿军衣的竟然也大叫着，要把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世事颠倒，如此荒唐！

中央组织部造反派，也在大会上胡说八道。当然，原来的部长安子文也曾是我们这个项目委员会的秘书长。六二年后，他听从康生的指挥，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进行审问。可是在去年，满街敲锣打鼓，拉着老干部，老将军、老元帅游街时，安子文部长也被游了街，而且在“中直礼堂”开了批斗大会，说他是“叛徒”。还在他脖子上戴了个几十斤重的大铁环，很让人吃惊和同情。如今上台发言的，当然不是他指挥的，而是新的部长指挥的了。新部长是“夺权”上来的。

地下室无处吃饭。第二天，还是那两个女人，押着我去吃饭。食

堂里的人，都像看怪物一样望着我。也有个别熟悉的脸，不敢打招呼，都排着长队买饭，轮到我买饭时，我挑最好的菜“烧牛肉”买了两份，一个馒头，拿回地下室，一顿吃了下去。他们背后议论说：“她倒能吃。”我想：“平常我不爱吃肉，可是现在，我一夜不睡觉，不吃这些怎么行？只要你们允许买，我就吃。”

到半夜里，我觉得头晕，心想千万可别病了，我现在决不能生病。

我被锁在地下室的第二个白天，另一个女人，把我带到地下室的小会议室，要我打扫这里的卫生。这是给我安排工作了。她指点着：这样扫，那样扫，怎样摆桌凳。我扫着地，她叹了口气：“唉！既然犯了罪，只有这样干吧！”我抬头看看，这姑娘不过二十五、六岁，脸上有块黑痣，听口音，是个老北京。我不答话，她也不声响，给我提来个暖水瓶，拿来两个大白碗，一双筷子，“这是你吃饭用的，以后你要开水，告诉我一声。”

又把我送进小屋，锁上门走了，我断定这是个只管执行任务的人，她没有恶意。

### 三 “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干将

白天去吃饭时，看见大院里满是大字报。两边的砖墙上、新扎的席墙上、食堂门口全是大字报，还有漫画，自然也有画我的。

对于我的漫画和大字报，我也只能用眼扫一下。因为我是被人管押着走，不允许站住看。只扫见我的漫画上写着：“泡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反党分子李建彤，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这又够我想一夜的。

随着案子的升级我又升级了。我成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干将，真是高抬我了。如果我能为彭德怀帮上一丁点儿忙，我当认为是永生的光荣！

那一年，毛泽东曾提出：钢铁要赶英超美，“钢元帅升帐”了，各机关大炼钢铁，一切工作统统为炼钢让路。农村里，搞了人海战术，都去炼钢，粮食可就没人种，没人收了。把农民的做饭用的铁锅，铁勺，都收集去了，当废铁炼了。农村搞“共产”，吃大锅饭，百姓不需在家生火做饭，农民从吃饱，到吃不饱，到挨饿，到饿死。

其实那阵子，我们家里已经开始每顿按定量蒸饭，每碗饭二两，每人一碗，我父亲饭量大，我只得分一半给他，每顿我只吃一两。我解释说：“这是暂时的，明年就好了！”全家我是第一个浮肿的。

一九五八年我到陕西采访，一下乡，沿路买不到吃的，这里可是陕西关中的米粮川。我和画家石鲁同到三原县的武字区，访问了当地老干部黄子祥。到了中午，黄子祥给我们拿出两个麦面馍馍，我和石鲁啃着干馍，还高兴得不行。因为我们早上五点在西安吃的饭，一路上再也买不到吃的。到中午已经饿透了。吃着馍，我又想黄子祥是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住在乡下，我们吃的馍馍，可能是他的老红军补助粮吧，真剥削他老人家了。

一九五九年，我的同学白莉来看我，她是医院的院长。她告诉我，她带医疗队刚从河南信阳回来，那里的情况，简直不能提。她悄悄对我说：“人都饿坏了。今天刚给这家人看了病，明天再去，就没人了。死的死，逃的逃。这话，你可千万不能说，一说，咱们都成了“反革命”，或者是什么“分子”了。”

那时候我经常喝“小球藻”。“小球藻”是什么做的？有人说是脏水做的，有人说是骗人的，有人说可以治浮肿，我也不问青红皂白，反是机关发给我的，我就喝下去了。

这天，田星的孩子来看我，一进门就说：“阿姨，真把我气死了，我们学校会餐，每人发了两个肉丸子，两个馒头，我吃了一个，留下一个馒头夹着个丸子，拿回家给我妈吃，我妈当时就塞到我姥姥嘴里



了。我妈肿得比谁都厉害！”

我笑着说：“你顾你妈，她顾她妈嘛！”

我心里发酸，田星的丈夫一九四九年就去世了，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受尽了艰难。平常年月还可过，遇上这个“自然灾害”，她怎能贴得起三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的粮食？我说：“毛英，你真有福，昨天有个伯伯从西北来，带来些青海的干鱼，新疆的葡萄干儿，给你些，拿回去解馋吧！”

打发走毛英，我又想起了李力群（高岗的夫人），她也是带着一群没有爸爸的孩子，不管别人怎样说，她还是我的同学，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我拿了几条干鱼，两盒葡萄干，给她送去了。恰巧碰上她不在家，我对看门的老头儿说：“我是李力群的同学，这是送给她孩子们吃的。”

我身边的干部和高级干部，都是这样的生活，普通老百姓就更是苦不堪言了。中国的人民真好，都忍着，什么也不说。可是彭德怀说话了。在庐山会议上把问题提了出来，他说：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谎报，粮食没有收得那么多，百姓饿了肚子，太冒进了，有些地方太“左”，共产风刮乱了！这本是为民请命。他却被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我同情他老人家，可我没有胆量说出口，我怕戴那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康生却说：“李建彤写的小说，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恶毒！”

我什么地方恶毒？不就是反对了右倾，又反对了“左”倾么。既然“左”倾统治的时间最长，对革命的危害最大，我写的小说，刚好就是写那个年代，反“左”反得尖锐些，这就触犯了天颜。

“七大”以后，就是这位刚直不阿的大元帅、国防部长，官降几级。被下放到三线地区，当副总指挥。

我想起在西北时，彭老总的行为令人尊重，当时他是西北局的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他要求严格，对人关心，指挥有方，心中有数。我只见过他一次，是听他作报告。我对他敬重，那是由于他的行为：

一九四七年，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的义合镇召开土地会议。是传达华北土地会议的精神。传达的人照搬照套，把华北的新区和西北的老区弄混了。在那个会上斗争了许多老干部。刘景范也在被斗争之列，因为有人揭发他，说他主张照顾老区在土地革命后，由贫雇农发展起来的新富农。可是那时刘景范不在后方，他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兼任了第一野战军的后勤司令员，在前方朝夕和彭老总相处，彼此了解很深。后方给前方发电报，要刘景范回后方，彭老总挡了驾。他明知是要刘景范回去挨莫明其妙的批斗。便给后方回电话说：“前方需要人，不能回去。”可见彭德怀不同意那个土地会议的精神。当然，这件事，后来在米脂县的杨家沟会议上也解决了。毛泽东同意了刘景范他们的意见，纠正了西北土改中的偏差。

相比之下，康生在晋绥土改搞得“左”上加“左”，在他的领导下，把地主打翻在地，拉着手或脚，在地上拖来拖去，用石头砸，用土块扔，很多人被活活打死。民主人士也被斗争，影响极坏。不是毛泽东纠正，不知要死多少人。

一九五四年，因为高岗问题发生，在北京饭店开了西北历史座谈会。原来在陕北土地革命犯过“左”倾错误的人，要趁机翻案，要重新斗争习仲勋和刘景范。刘景范气得不说话，出来进去都绷着脸。有一天，刚走出饭店门口，彭老总叫住刘景范，笑着说：“你愁什么？我主持会，我心中有数，谁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我都清楚。”

这个心中有数彭老总，直到“文化大革命”有人对他还是“心中无数”，不解决他的问题。在我被抓起来以前，有个河北师范学院

的学生，跑到我家说：“彭德怀被揪回来了，在北京航空学院挨斗，斗得很惨！有打的，有踢的，……”

他年纪那么大，脾气那么倔，怎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我问那个学生：“有人保护吗？”学生说：北京的“天派”、“地派”都不保护他。只有我们这些不出名的学生暗中保护他，也使不上劲儿，他们的势力很大，有“中央文革”指使。

是呀！北京航空学院“天派”头子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地派”新头子王大斌，师范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谭厚兰，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的头子蒯大富，北大的造反头子聂元梓。都是直接听康生、江清、张春桥、姚文元指挥的，目前谁也插不上手。

那学生走后，我的心揪成个疙瘩。

现在怎么又把彭德怀和高岗连到一起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顺着脉略想过去：因为他当过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干部关系好。

一九六二年，我的小说被康生点名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把某些人的揭发材料抛了出来：“就是等这一天的，你们果然写起了小说。”一听这话，觉得领导人够阴的。

原来被揭发的第一人就是彭德怀，说彭德怀在高岗家里谈话，谈的内容是彭德怀对刘少奇的土地政策有意见。这就是他们的“反党活动”。

被揭发的第二个人就是习仲勋，说习仲勋不同意揭发彭德怀。习说：“高岗出了问题，拉扯长征干部干什么？”

第三个就是揭发了刘景范，说当时刘也在习家里，也表示不同意，说：“不能胡拉扯！”

这样就得出了结论：习仲勋和刘景范包庇彭德怀。

彭真说：“这个揭发早就有了，中央宽大，是观察你们，看改正不改正。结果，你们谁也不改，反而合伙又写了反党小说，这账要一

块算了。”

《刘志丹》小说和彭德怀对土改政策有意见怎能拉扯在一起吗？

如今正闹“文化大革命”，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和康生一捏合，把一九六二年定的“习、贾、刘反党集团”，提升为“彭、高、习反党集团”了。

他们的理由是：因为彭德怀在西北工作多年，和西北干部关系密切。

凡是长征来的干部，哪个没有在西北工作多年。难道只彭德怀一个人和西北干部关系密切？只能看思想正与不正。刘澜涛是西北干部，他对土地革命时的干部就一点感情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的劲头很大，他提出西北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习、贾、刘和彭、高、习反党集团”。他在西北整了一年多，从上倒下，人人自危。

没想到，康生在北京、天津又策划了南开大学揪“叛徒集团”，把刘澜涛也揪了进去。康生两手抓，都成了他的阶下囚。陕西又发出特大新闻，原来刘澜涛落进了头版叛徒网。刘澜涛那么卖力气只落了个和习仲勋一块挨斗，同行游街。

前个时候，听说康生派人把习仲勋从河南洛阳揪到了西安。不久，北京街上就贴出了斗争会的照片。那照片上有习仲勋也有刘澜涛，还有些男的和女的。都弯着腰，被人按着头，正在挨斗。我一见照片就心中起火，是我写小说株连了习仲勋，于心何忍？他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弄到这个下场，我决不能允许这张照片在北京街上存在！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个空房间里，写了张大字报，内容是“寻人启事”。趁天刚亮，街上没人，我跑到中央组织部门口，用“寻人启事”把那张照片盖上了。

我实在对不起他们！我有能力挽住这场恶浪吗？

#### 四 疯狂的“文化大革命”

这天，我一个人在地下囚室琢磨着在食堂门口看到的“朱成昭”大字报。

我对朱成昭的大字报很感兴趣。这人是地质学院的学生，响当当的造反派，是地质学院“东方红”的第一任头子，是北京第三司令部的司令，也算一路首领了，曾经红极一时。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地质学院的“东方红”造反派就围住了地质部大院，冲地质部办公大楼，静坐示威，要揪党组书记何长工。几天几夜，人山人海，真是兵临城下。

那时，康生讲话还没出来，我们的案子还没在群众中传开，没人理我们。我们的后院邻居，宋应副部长家就吃紧了。夜里也被围，敲打门。那边的女孩子爬上凳子，敲我家的窗户：“阿姨，阿姨！快，我们家的电话被掐断了。学生围着要冲我们家，快给部里打个电话吧！”

我答道：“孩子，叫你爸爸、妈妈放心，现在就打电话。”

我把前院住的秘书叫起来，赶快打了电话，求保卫科去照顾一下。

我家的阿姨很会关心人。她爬上窗户，透过玻璃往宋家看。宋部长的夫人是地质部的机关党委的肖书记，正在灯下收拾文件，还有些小东西，已用布包成小包儿，一会儿放在书架上，一会儿又取了来，改换一个地方。阿姨喷着嘴说：“把人逼成这样子，要能跳窗户，我就去帮她收起来。”然后她又骂道：“真他妈些龟孙子，这么闹腾法，还叫不叫人活呀？”此后，那边一敲窗户，她这边就答话。阿姨是位四十多岁的老姑娘。是个老贫农，她还识字。

地质部没有被围攻开，江青说话了：“地质学院的小将们，我很同情你们，你们围不开，冲不进，我就去和你们一块静坐！”

中央文革的副组长说了话，学生们闹得更起劲，闹得像疯了。一样。

过几天，中央在人大会堂召开干部会，传达中央的指示。点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夫妇的名，说他们要陷害林彪，是现行反革命。还点了全国四个所谓镇压“群众运动”的大反党分子，其中一个就是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

地质部内部又哄起来，到处打倒何长工。

围攻地质部的群众头子，就是朱成昭，那时他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何等坚决啊！一个普通学生马上成了大红人，成了第三司令部的总司令，在江青那里可以自由出入，有小汽车可坐。北京的第一造反司令部，第二造反司令部都赶不上第三司令部的人红。《人民日报》上也登第三司令部，好多学生组织都以和“三司”挂钩为荣。我被关在地质学院住的那间房子，可能曾经是“三司”的办公室之一，柜子上扔的有全国造反组织的电报，都是要求和“三司”挂钩的。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都支持三司。

最热闹是戚本禹组织的“围中南海战斗”。全城都轰动了。那时我还没有被关押，悄悄跑去看了一回。府右街的北头到南头，都搭的是席棚，每个棚上扎根旗子，写着机关或造反队的名称。好像哪个单位不来，那单位必然是“反革命”一样。棚里还搭个木板床，是值夜班人员休息的。江青还亲自去检查过阵容，发表过讲话。围城军闹起来，隔几条街都能听得见，呜哩哇啦的叫着：“揪出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江青又对群众讲话：“你们围吧！外边围，里边斗，用电视转播实况给大家看。”多么煽动人心呀！

这都是些什么名堂？想打倒刘少奇还不容易？中央开会作个决定就行了。从前的陈独秀、王明下台时也没动这么大干戈。从前给刘少奇提意见就是“反党”，现在又一百八十度转弯，用这么空前绝后

的办法，要打倒他。

在这些活动中，朱成昭当然是积极分子，指挥着第三司令部的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份我被造反派抓到地质学院关押起来。

也不知为什么，我在地质学院，他们是保密的，不让我说出自己的名字，只开小的批斗会，也不开大的斗争会，就是不让我出大门，不让我回家，但是可以到院子里看大字报。

我在地质学院时，朱成昭已作为现行反革命被逮捕了。我没见过这个人。外校的学生来贴大字报。要求公布朱成昭的全部罪行。地质学院用大字报答复：“朱成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布出来怕大家中毒。”外校人又贴大字报说：“我们有抵抗力，不怕中毒！”

我也听到了学生之间的对话。学生们对话说：康生，江青指示朱成昭去三线地区揪彭德怀。他以造反派的身份，带人去抄了彭德怀的家。搜出了全部档案。在那些文件中，他看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就是在庐山会议上受批判的那份给中央的信。彭德怀是揪回北京了。可朱成昭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觉得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批彭者是错的，他跟错了人。他痛苦，他失望，他懊悔起来。他觉得自己受了愚弄。不跟江青干了。于是，他坐了牢。

看来，中国的大小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欺的，总有一天会逐渐觉悟起来。

我又是一夜没睡，眼睛熬肿了。早晨，那个苏州姑娘又来了，见我正抓头发，便问：

“为什么不梳头？”

“我没带梳子！”

“吃罢饭我带你去买一个。”

真的，饭后她把我带到地质学院对面卯区的小商店买梳子。她先找到了梳子，叫了声：“老李，你看这种行不行？”我说：“行，什么

样的行！

再望她的脸，笑嘻嘻，甜滋滋的。原来这才是她的真面目。那么在人前肯定是伪装给造反派们看的。据说，她也是个知识分子，一个英语翻译。

## 五 第一次三堂会审

三天三夜未合眼，实在有些头痛脑胀。哪有这么大的精神？长此下去，怕要神经失常了。

我要求吃安眠药，在地下室睡不着。那天他们把我搬上了一层楼。搬到几个女人用的办公室里，当然一般办公室并不分男女，恰巧这个办公室全是女人。中午，人们都去吃饭时，我的两个女孩子跑了进来，给我送的粮票、钱、褥子、脸盆。我问：“你爸爸有消息吗？”孩子们说：“他们那里也来取过粮票，不让人去看。”

“他在哪里？”

“不知道！”孩子们含着眼泪。

“家里什么样子？”

“都抄光了。咱家北房和东西房都被贴了封条，把我们都赶到厨房里睡觉。他们要赶阿姨走，阿姨哭了。阿姨说：“你们把他们的爹、妈叫回来，我就走。不叫回来，我不能走。这些孩子交给谁？毛主席不是说过么，能拉过来一个就拉过来一个，我要拉住这三个孩子。”我点点头，心里笑着：“淑敏大姐，满有水平，她能对付那些坏家伙。”

孩子不敢多待，匆匆忙忙走了。

这一下就闯了乱子，几个女人慌起来：“谁看你来了？谁看你来了？”

“看你得通过我们。上边有命令！”

我没言语，心里说：孩子们可不知道这命令，也不知我住在这里，



总是有人指点着才进来的。

这天晚上，他们给我吃了安眠药，总算是睡了。半夜醒来，外间开着灯，可以照到我的床边。抬眼看，有两个男人睡在两张长桌上，原来他们是“看守”。

我坐在小床上发呆，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分，康生领导的“项目委员会”把我叫到中央组织部楼上会议室接受“三堂会审”。所谓“三堂会审”，就是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监察委员会三大机关组成的项目委员会，康生是主任，中组部长安子文是秘书长。但是这天，康、安没出场，出场的有：中组部长副部长乔明甫，处长杨以希。中宣部方面，按规定应该是副部长张子意出面。张没露面，只来了处长王谟、苏蓟。中监委有副书记钱瑛、伍云甫，处长李振海。

我一看那阵容，满强哩！虽非一号人物，也都是二、三号人物，我是被审者，坐下听他们发话。是钱瑛先开口。这个女人，我认识，平常我还称她“大姐”呢。虽然我对她有看法，也有个见面之情。她说：“受中央委托，要我们审查你那本《刘志丹》小说的问题。你说说写作过程吧！”

我从中宣部拟定的宣传烈士名单，《工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到向我约稿谈起，然后谈到采访，写书。

钱英冷冷地说：“你没参加过土地革命，这书你能写么？还不是得要习仲勋，刘景范他们写。”

看意思，他们要小题大做，往习、刘二人身上赖，我内心起火，出言也不逊：“你们是审案子还是大会餐？如果是审案子，那就要实事求是，如果是会餐，就嫌杀一只鸡不过瘾，非杀两头猪不可。杀我不解气，就想杀习仲勋和刘景范？”

中宣部的王谟眯缝着眼说：“要说实话，不能隐瞒！”

我说：“我说的全是实话，你们要实事求是”

中组部的杨以希忽地站了起来：“谁不实事求是？”

我说：“你们！”

全体都站了起来：“态度要端正！”

空气一阵紧张，我倒冷静下来，我仔细察看他们的脸。然后说：“今天诸位在审我。我却在透视诸位的灵魂，丑话说在前边。将来诸位都在我的小说中！”

一阵沉默，大家就坐。

中监委副书记伍云甫上了阵：“你为什么把高岗写成好人？”

我正身端坐，发起议论：“同志们，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我能把红军政委写成坏蛋吗？你们大家说说，能不能？如果今天不能定，就请示中央！况且，我并没有写高岗，仅用了他的一点素材而已。”

他们面面相觑，无言以答。

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解了围：“你那书中的问题多得很，我们今天顾不上说。”

我看这个人，瘦得可怜，据说是坐牢太久，折磨坏了，我不忍心顶他。见我不说话，他又说起来：“高岗是什么人？中央早作了决定。他是反党头子，你为什么要宣传他？”

“我没有写高岗。”

王谟问：“罗炎是谁？”

“罗炎是五个人的材料组成的，共出场七次，你说他是谁？”

“用一点材料也不行！”

我心中有火，只按住不发。我说：“列宁，是怎么对待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列宁夫人写的回忆中，还谈到列宁最初对普列汉诺夫的印象，第一次要见普列汉诺夫时列宁是那样激动，难道这也是为普列汉诺夫翻案？普列汉诺夫早已被定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高岗，虽然不能和普列汉诺夫相比，就算他是中国老根据地的一个村长

吧，也是在革命队伍里呀！难道被定为反党分子之后，就一点不能再提？”

王谟说：“中国和外国不一样，中国有中国的情况。”

我心想：你还是中央宣传部的处长呢，连这点常识也没有。那叫历史唯物主义！苏联人讲，难道中国就不讲了？

我还是要反驳，我说：“中国也有先例。我根据《毛选》写的，《毛选》第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中央到陕北后挽救了陕北的危机。第十条注释中说：“一九三五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过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

我说到这里，不知谁冒了句：“你倒背得熟！”

“我不背行么？我要照这个精神写小说。什么时候《毛选》上把这篇文章改了，我什么时候改小说。绝对不会用高岗一点材料。照《毛选》写，我没有错误。虽然这也是违背历史的。”

## 六 是谁篡改历史？

我又睡不着了，这比在地下室更糟。他们要每晚开着灯监视我。我倒不怕监视，怕的是那个常明的日光灯管儿，照得人难以入睡。我又躺下，在心里背那篇人人都必须背的“老三篇”。这是最“时髦”的，必须背的，否则，就会遭到刁难。

后半夜过去之后，我一早起来，就要求他们给我代买一套《毛选》四卷，我自己的《毛选》未带来，只带了《语录》和《诗词》。因为要以《毛选》来对付《毛选》，这里离开《毛选》就难过日子。

到中午，新的《毛选》四卷买来了。我一翻，是横排本，看看目录，那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在，只在“注释”第十条中去掉了“高岗”二字。我不禁从内心发出冷笑：“好个康生，偷偷改掉也算你输了！”

我仍坐在小床上拿着《毛选》沉思。自那次我提出《毛选》上有高岗之后，一九六四年听说康生把《毛选》改了，全文并未改，只单单把“高岗”二字抹掉了。不过，我早走在了你的前边，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报刊上发表的《刘志丹》片断，早已没有高岗的材料。你们手中拿的是些废稿。

对此，我还是有许多疑问：原来写这条“注释”时，可曾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如果他不同意，能编入他的著作吗？一九六四年修改的时候，是否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他的文章能随便修改吗？

也许康生的权力很大，不经过毛泽东也可以随便修改。去年江青不是也在群众中扬言说：“《毛选》上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去掉，因为那里边写了刘少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央的决议，把它编入《毛选》也得经过中央同意。江青为什么能随便当众宣布撤销，中央能同意么？

有权利的人可以任意篡改历史，现在的大字报宣传，说江青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她现在搞出几个样板戏，说她在延安演过《首战平型关》。谁看过《首战平型关》？她在哪里演过？一九三八年六月我到延安，七月看见江青演戏，她演的是《游击队长》中的坏女人“大红鞋”。

街上还贴出些照片，说毛泽东在延安去参观南泥湾，后边跟的只有康生，却没有王震。康生那时候不是常跟在毛泽东左右。南泥湾是王震领导建起来的，王震呢？原来他在农垦部挨斗。王震挨斗，康生被贴到照片上。

历史就是这样被他们改来改去，却不允许说实话的人存在。

他们借此案篡改多少历史？1932年的三嘉塬收枪，打散了刘志丹组织的革命队伍；1935年陕北的错误肃反，杀害，摧残了多少革命队伍中的忠烈之士；1942年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任弼时亲自坐镇的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们要达到否定、篡改历史的目的。要替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些犯下杀人罪的人翻案。到底是谁在篡改历史？已经看得明明白白。

## 七 思念景范

原来，我在地下室和女人办公室住的那几天，就是他们为我准备“新居”的几天。终于准备好了，要我搬家。

是一男一女陪我去的。我搬到地质科学院主楼东头一层的医务室斜对门114号。这是一间约十八平方米的办公室，东面临街，有个大窗子，窗前放个三屉桌，两把椅子，桌旁靠北墙放了一张单人床，是给值班人员和“提审官”们坐的。桌上还放有电话，是随时“报警”的，特别放了个记录本，一瓶蓝墨水，是值班人员随时做记录的。靠西头，约有两平米的地方，用木板隔了一个木笼子，里面放了一张小木板床，一张两屉桌，一个方凳。对着桌的屋顶上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罩灯。开了个小门儿，门上方有块小玻璃，值班人员可以随时往里窥视。

我给自己铺床，床板很脏，还有两个碗大的窟窿。我向他们要了几张旧报纸，铺在上面，再放上褥子，床单……。看来，我要在这里长住，必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为了把心安下来，我坐在桌前看《毛选》，从头看，决心再把四卷通读一遍。这是风气，不看《毛选》再无书可看，全国一本书。

一个上午，我才看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因为那值班人员每隔十分钟就进来看一次，扰得我心烦。我的思想随时都在走神。又想起一月八日的斗争会内容，我必须反驳。我向值班人员提出了要求：“我要去买些东西！”

男的问：“你要买什么？”

“我什么也没带来，我需要纸、笔记本，我要写“学习笔记”。那男的和女的对了一下眼，答道：“上级有命令，必需的东西，允许你买。”

下午，他们两个押着我，到“甘家口商场”走了一趟，我买了几个笔记本，几本稿纸，红蓝墨水，两支蘸水钢笔。到书店买了一本毛泽东字帖。我问押解人员：“我能买吃的么？”

“买什么？”

“茶叶，我满口都烂了，嘴唇也干裂，需要点茶叶。”他们点了头，我买了一盒绿茶。

我买的那本“毛泽东字帖”，我是想把它送给景范。于是，我在上面写了三个字“刘景范”，下面写着“地质科学院”。如果能把这东西送给他，他一见我的字，就知道我的下落了。否则，又给他增添一份精神负担。我把写好的字帖交给我的项目人员，说：“请把这字帖转给刘景范吧，他喜欢毛主席的字，他也喜欢写毛笔字。”

那位男的拿走了。不久，又带来个操徐州口音的人。徐州人拿着字帖板着脸说：“你这字帖不能转。上边有命令，不许你给刘景范送东西。”

我的打算落了空。景范现在哪里？他在想什么？他的性格那么刚强，这么冤枉能把气死。他有肝病，有十二指肠溃疡。这一年多来，每次斗争会后，他都用热水袋捂着肚子，他胃疼，吃不下饭，发烧。他的身体已经垮了。

从一九六二年十月后，他没舒展过一天，这个批判，那个审查。我算把他坑害苦了。不是我答应《工人出版社》写这本小说，哪会引来这么大的祸害？

记得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晚上，他的体温又一次升高。那是个大风天，是在中央组织部谈了三个小时回来后发生的。康生项目委员会把他抓得很紧，一次又一次地逼他，非要让他按照他们的想法交待。景范被他们逼得已经住过几次医院了。

首都医院已经诊断景范是初期肝硬变。这两年把他到处拉着斗，拳打脚踢，按头拧膀子。他哪能受得了？这次，他能活着回来么？

去年，南开大学“八一八”找来一批大学生，要把他拉到《工人日报》斗，《工人日报》在北城外的六铺炕，离西城的丰盛胡同那么远，我见那些人贼眉鼠眼，凶神恶煞的，真担心他们走到无人处会谋害他，因为我怀疑有坏人背后唆使。历史上的持不同政见持刀杀人者常有，我便派了两个大高个儿的中学生在后面盯着。两个中学生是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那次真险，直到半夜才回来，是两个中学生护着回家来的。

我坐在木笼子里想到天黑，硬塞了几口饭，已经上了灯。那个女的走进我的小木笼，问我：“你束的什么裤带？”我拉起衣服给她看看，是一条线织皮带。她点了点头。她是看我能不能用裤带“上吊自杀”。然后，就查找我有没有剪子、刀子、针线。我从提包里取出这些手头日用品，她全拿走了。我说了声“谢谢！你很细心。但是请你转告大家都放心，我这种人不会自杀！除非有人暗杀我。”她又点点头。

听到他俩向夜班人员交班，女人是山东人，青岛口音。值夜班的是两个男人，有一个是广东口音，很凶，刚坐下不久，就对他的同伴说：“留着这种人干什么？不如一刀杀了痛快。留着叫她反党？还得

管饭吃，又得用人看着！”

只听声音，不见外形，我借故扔废纸，出木笼走一趟。

我一看，这家伙像个屠夫，够恐怖的。我还真得防他一手。如今的世道，没有保障，他真把我一刀砍了，也不会有罪。有人会说他是出于“革命义愤”，他会成为“革命的英雄”。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有人还会马上介绍他入党。他是拿起真刀真枪“闹革命”的。我是被中央点了名的死案。谁敢替我说话？

我这个仅五十岁的老太婆，哪对付得了他那个彪形大汉？论力气，我打不过他，他会把我掐死。

今晚，我主要的任务是防身。时刻警惕着坏人的谋杀。

屋顶上的吊灯整夜开着。开关在外边，归他们管。我不能自由开关。这样，他们每隔十分钟，就从玻璃往里窥视一次，看我在干什么。然后听见外面的纸上丝丝响。大概是在做记录。好家伙，他们十分钟作一次记录，一天二十四小时，要作多少记录，这记录交给谁？

我把蘸水钢笔放在床头，万一有事，可暂作武器用，我也要“文攻武卫”。

这灯，要写字就显得暗了些，要睡觉就照得晃眼，无法入睡。这就是“犯人”的待遇，无法改变。

我只得躺着闭眼回忆往事。这一晚的回忆，就没有离开过景范：他肯定会比我更惨，可能是背着枪的人整夜站在他床前。深更半夜里，那些人不知怎么折磨他呢。

记得我见过他写的一篇纪要。纪要上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有一天下午，他被通知到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彭真的会客室里，见彭真和中组部部长安子文都已坐在那里等着。刚坐下，彭真就说：“你写的《刘志丹》是一本反党小说，篡改了历史，为高岗树碑立传，是为高岗翻案的。”



看到这里，我觉得这不是彭真的思想，他不认识刘志丹。这是一九三五年那些杀人者的思想。他们把这本书的问题，引上了歧路。我在地质学院看见过陕西省的几张小报，是康生支持的那一派出的报，那上面说：“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谢子长是正确路线。”现在，他们竟然要为王明路线翻案了。要推翻中央在延安时做的历史结论。

景范的纪要中还写道：彭真说：“习仲勋是里通外国的。这本小说，不过是个导火线。高岗反党集团的问题，过去中央采取不扩大的政策，没有彻底解决，这次要彻底解决了，你要彻底交代问题。你们都是反对毛主席的。”

我很吃惊，彭真这人并不坏，怎能这样提问题。他们把毛泽东当成了挡箭牌，对谁有意见，他们都扣上个“反对毛主席”的帽子。

这次要彻底解决“高岗反党集团”的问题，什么时候定的这个集团？反对了谁？谁代表党？他们要怎么解决？

我也看见了景范的答辩：“从前传说的那些话，高岗说，毛主席都知道。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

我心想：谁去向毛泽东对证呢，他承认吗？景范也只好吃哑巴亏了。

我深深知道，陕甘地区的干部，对毛泽东的感情最深。就因为1935年他们都被押在“瓦窑堡监狱”，将要被活埋时，中央红军到了，发现那里在搞“肃反”，狂捕乱杀，就把他们放了出来。虽然解决的不彻底——比如他们还是戴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但总算从监狱中放了出来，可以去打仗了。总比当“反革命”强。从此以后，他们就绝对保卫毛泽东，相信毛泽东，服从着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不满的话。虽然全国解放之后，国家内部出了那么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错误，是领导上的错误。他们都没有批评过，默默地干着他们该干的工作。

在高岗问题上，景范的默默地承受着强加在他头上罪名。他没有

参加过任何活动，只听说过他们对毛泽东已经说过的那几句话，就把他的工作连降三级，从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的党组书记（那时全国只有四个委：政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监察委员会。都比“部”高一级）降到地质部的副部长。可以说是连降三级。可是他不在乎，于心无愧，对得起中国这片土地，他做了他应做的一切。

就在彭真约他谈话的当天下午三点左右。中组部部长打来电话，要景范把我写书的草稿全部送去。景范答：“你派人来向李建彤要吧。”

很快就来了几个人，我把文件柜打开，他们把所有的草稿全拿走了。

又隔了两天，由中组部的安子文主持，在中组部又开了对刘景范的斗争会。他们说：“经过写《刘志丹》小说，又把“西北反党集团”组织起来了。

想不到，这些高级干部也会撒谎，这是又捏造出个“西北反党集团”。是早几年内定的，还是新编的？难道把陕甘和陕北的老根据地，老红军都当成了“反党集团”？他们反了什么党？

他们又说：“《工人出版社》是受欺骗的！”

《工人出版社》绝对说不出这句话。就在当时，康生派中宣部的王谟去逼供时，就遭到出版社社长高丽生的抵抗，高丽生毫不犹豫地：“这书是好书！”

中组部长安子文说：“阎红彦对这本书提出几十条意见，他立下了汗马之功。”这才是实话，他才是真正要害陕北干部的人。

一九三五年，陕北搞了那么大的错误肃反。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北方局来的人在北平听了他们这一类人的造谣，才错杀了那么多人。

他们还说：“中央已另派人找习仲勋、马文瑞谈话，要他们交代问题。可以看出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均遭到和刘景范同样的命运。

当天下午，中组部派副部长 XX 和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来收走了我的全部采访记录和书稿。不过那时我并不发慌，他们临出门时，我喊道：“何老，我的采访记录可是十八本，将来要如数还我。”我相信我最终会胜利。

又过两天，中组部的乔明甫和地质部副部长李轩又来了，收走了刘景范保存的在一野时期的枪支。他们把景范精心保存的东西拿光了。当然他们是奉命来的。

再隔一天，又在中组部开了对刘景范的斗争会，是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她先发言：“中央不说话，我们也不敢动你，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还是代主席嘛！受了中央委托，我们才找你来，你那份检讨不行。写《刘志丹》小说是个阴谋，你们早预谋好了，人证、物证俱在。”她扔出两个小册子。一本是我写的《刘志丹在桥山》。另一本是在《解放军三十年》上刊登的刘景范写的《太白收枪》。为什么陕北人写回忆就是阴谋？

景范表面冷静、怒目地望着他们，内心冷笑。

钱瑛说：“你们在西安有个地下印刷厂，要不然，谁给你们印刷呢？”

想到这里，我觉得特别可笑。你们都写回忆录，难道你们都有个地下印刷厂？

钱瑛是王明路线的宠儿，在湖北杀了多少共产党的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康生、阎红彦、钱瑛都是“左”倾一条线上的，他们几十年来目的是一致的，以实现他们的野心。

景范这次又落入了魔掌！这是二次的“陕北肃反”了。这次你受难的时间将会更长，我悄悄流出眼泪。

## 八 白坚之死

这里的项目人员抓得很紧，我刚进来几天，就叫我写“自传”。自从一九六二年以后，我写过无数次的“自传”，一个机关要一份，一个造反组织要一份。到了这里，还要写。好像不拿到我的“自传”这个组织就没掌握这个案子的核心似的。我的历史，不就是那么些熟套子么，可我还是答应了，不答应不行。

再一点，我想利用这点时间，写另一个东西：就是反驳一月八日斗争大会上揭发的假材料。我需要纸张，需要安静。一答应写这“自传”，就可偷天换日的写反驳，自然是要机密些，他们发现后要没收的。看守人十分钟到木笼里看我一次，我必须十分钟换一个内容，换一次纸张，把他们要我写的放在上面，自己要写的放在下面，慢慢写，啥时写完啥时再拿出来。

上午九时，来了一帮子提审人，有本机关的项目人员跟着。一个是徐州口音，人称老山，穿件蓝布短外衣，戴顶老头儿帽。另一个是小广东，穿件咖啡色皮夹克，圆脸，小个子，可能有三十多岁。

外单位扑扑通通进来一大堆，什么口音的人都有。

就在我的小木笼外边，他们都坐在沙发或椅子上，把我叫出来，我自己带着方凳，和他们坐个面对面。我沉住气，观察他们的神色，听他们要问什么。徐州人开了口：“李建彤，今天问你的是白坚的问题，要如实讲来，问什么，你说什么，不许搪塞，抵赖！”

我把徐州人盯了几眼，然后扫一遍所有的人。才开口说：“问吧。”

外来人问：“你先答复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认识白坚的？”

只这一句话，我即断定，这里边有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人，白坚是一机部的副部长。否则，不会问这么具体。

我说：“我早知道白坚，因为他是陕北人，我见他的第一面，是在天津。一九五六年，我们去参观“新港”，白坚当时是天津市的秘书长，他接待过我们。”

那人问：“你们？是几个人，都是谁？”

“我们，就是我和刘景范一家人，何长工一家人，王子宜一家人。是天津市政府接待的，不是白坚私人接待的。”

那人又问：“什么时候向白坚采访？他说了些什么内容？”

“一九五七年，他到一机部工作后，我去采访的。采访过程中，我知道白坚是西北红军的政治部主任。一共访过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一次是五九年。”

“他说的内容呢？”

“他说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搭轮船回北方得绕道威海，再绕道绥远，到西安后，在马鸿逵部队任党代表。”

又一个人插话，问道：“他不谈路线斗争？”

我心内有气，答道：“当然谈，他说陕北有两条路线斗争。举过两个例子，一是关于“梢山路线”问题。王明“左”倾路线的人说：刘志丹是“梢山路线”，不应当在山区建立根据地，不该在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又有人说：那时，不在山区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因为平原是敌人统治的中心，所以，反对“梢山路线”是不对的。”

“白坚是什么态度？”

“他和刘志丹的思想一致。”

我继续说：“再一个例子，是陕北第二次反“围剿”，怎么打法，这是路线斗争。从北平回来的郭洪涛提出“先打通神府苏区”，这种提法不对。因为神府苏区和陕北苏区相隔几百里，中间是白区，敌人统治力量较强，按照当时红军的力量，还不能那样打法。红军如果舍近求远，跑几百里去打通神府路线，就有可能失去陕北根据地这个中心地带。因此，刘志丹主张先消灭高桂滋的中央军，先解放六个县城，使“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打成一片。他谈了反“围剿”中的几个战例：杨家围子战斗，延长战斗，李家崂战斗，靖边战斗。只谈作

战意图，不谈具体故事。”

他们突然又问：“这些战斗都是谁指挥的？白坚没有说么？”

“当然要说，他说是刘志丹指挥的，刘志丹是西北军委主席，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白坚是秘书长。刘志丹的活动，白坚大部分参加过，是个旁证人。”

另一个说：“你谈问题的倾向性很大，白坚还说了些什么？”

我说：“谁都有倾向性，难道你们提问题没有倾向性？我谈的内容你们可能不愿听。我再补充几句，白坚说：反二次“围剿”一开始，刘志丹就写了个“动员令”，那“动员令”写得很好，像诸葛亮的“出师表”，把各种部队都动员起来了，而且指定了各自的岗位和任务，是老刘亲笔写的，署名是“军委主席刘志丹”。”

有人冒了句冷话：“白坚很会吹捧刘志丹！”

我明白，他们都是用康生所灌输的观点来审案子的，刽子手们只恨没有早把刘志丹杀掉，给了他作战的机会。

我说：“也许有人想吹别人，还无内容可吹呢，除非张冠李戴，窃他人之功，掠他人之冠。

“老实点儿！这不是辩论会，这是审问你！”

我一看，是徐州人。心想，听说你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为什么也学了这一套？我马上回他一句：“不是辩论，也得说明，如果不允许说明，我就不开口了。”

他们怕我不开口，又提出个问题：“白坚谈没谈高岗？”

“谈过，他说高岗在阎家洼会议被撤了职，姓郭的主张把他送到北平，军委成立时，他还没有走，又起用了。”

“就这些么？还说了什么？”

我说：“就这些，关于高岗，他就说了这些！”

小广东发了话：“你要老老实实交代，白坚决不止谈这些，一定

还有内容！”

“一定？那就不一定。他再没说什么。你去查记录吧！”

一时，都吼了起来：“高岗是这本书的关键，白坚是副秘书长，又是政治部主任，他难道就不谈高岗？”小广东排起了桌子。

“自从“高、饶事件”发生后，谁还谈高岗？有材料也不谈了。”

小广东，就住在这个楼道里，平时人家叫他“小董”，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好像是造反派的小头目，平常看不出他会作恶，今天竟然露出凶像，料定他们事先布置好的，我也拍桌子：“白坚没有讲，就是没有讲，压是压不出来的！”

小广东又拍桌子：“谁压你了？”

我绷着脸，不打算再回答问题。

暂时沉默，空气一阵紧张，外单位的人有些着急，僵持下去，他们也完不成任务。小广东站起来了。

也许这是一种经神战，打了小广东的气焰，伤了他的面子，他没想到我会专门攻他。他不敢再露面了。

徐州人开了口：“继续回答问题，白坚对刘志丹是什么评价？”

“谁也没有超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刘志丹的评价！”

一机部的人追问：“白坚具体说了些什么？”

“白坚说的也是大家说惯的话，刘志丹很能吃苦，平易近人，很用脑子，革命性强，一直坚持武装斗争，方向是正确的。”

那人又追问：“你的小说中用了白坚哪些材料？”

我说：“霍力坚那个人物，是用四个模特塑造的，去掉白坚的，都是别人的。”

“哪些是白坚的？”

“请查白坚的干部登记表吧！”

“现在是问你！”

“我不能把每个干部的历史都背下来，即令我是组织部长，也不可能都记得。”

一机部的人发了话：“今天谈的这些，都要写下来！”

这人的话还音没落，另一个人又突然问道：“你访没访过郭洪涛？”

问得我一愣，怎么？这不是一机部的人么？怎么问起郭洪涛？难道他们是联合搞项目？

管他呢，都是一脉相承的。

我答道：“必须得访，关键人物，还能不访？”

徐州人问：“郭洪涛谈些什么？”

我猛然记起：一九六七年春，南开大学的“八一八”兵团大卡车开进地质部，扬言说：

“我们是奉康老之命来的，直接受康老指挥。”就长期进驻在地质部，专门搞《刘志丹》案。有一次他们把我叫到地质部的六层楼上审问，也提到陕北的历史。我说：“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杀人总是不对的吧！”

“八一八”里边的头目和兆之，成员刘延生，都挺有计谋，说话会绕圈子。他们说：“关于郭洪涛的问题，我们也管，他承认自首叛变后，专门去陕北搞破坏的。”

可是另一次，地质部办公厅造反派中有个姓胡的审问我和刘景范时，他说：“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是对的，你们都是反革命嘛！”真是康生的好弟子，王明路线的接班人。

又一次，南开的“八一八”造反派成员和兆之，刘延生，到我家审问也露出过真面目，说：“从现在看，在陕北捕起来的人，都是反革命！”

我反问：“难道毛主席释放了他们，是放错了？”



他们又连忙说：“谁说毛主席放错了？”

那时“康老”正在为郭洪涛翻过案，又想露，又不敢露，太露了，又怕别人攻击，那时群众也在思考：如果王明路线对了，又为何产生遵义会议，如果现在为王明路线翻案，也会有人出来斗争。

我向他们谈起对郭洪涛的采访，边想边说：可能是一九五八年，我到经委办公室访过郭洪涛，递过介绍信，他劈脸就说：“你可不要把陕北人写成错误路线！”

我很迟疑，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我说：“路线斗争不是地区问题，是人。不管陕北或陕甘，谁是什么路线，就是什么路线，路线斗争没有地区之分，没有国界之分。”

我盯着他，仔细观察他的模样，他瘦小，眼神不定，晃来晃去，总想窥测什么。

我老生常谈地采访：“毛主席说，我们的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发展起来的，全国都有，难道陕北例外？陕北能脱离当时中国的环境？”

郭洪涛忙答：“有，有，我们那里也有！”

“有？谁带来了错误路线？”

“不是人，是文件。”

“文件是谁送来的？”

“是交通。”

“谁传达的？”

“我……不，（谢）子长传达的。”

“你呢？没有参加会？你是什么态度？”

“我参加了会。对“左”倾路线，我在会议上是拥护的，会后没有执行。”

“那你是两面派喽！”

“是的，我是两面派。”

那时他可能觉得，当个两面派比当“左”倾机会主义者要好些，就在“两面派”帽子下开了小差。其实，他执行“左”倾路线比谁都自觉，主动，凶狠！

我说到这里，听见有人绷不住了，发出丝丝的轻笑。

又有人问：“郭洪涛还说些什么？”

“郭洪涛说：‘本来要把高岗送走的，成立军委后，刘志丹是主席。刘志丹说：现在军事指挥员太少，还有人病重，不能行动，建议把高岗留下。他们就把高岗留下当了军委会主席。’”

“他怎么敢说高岗的事？”

“他说了不算犯错误，也不会有人整他，他有后台。因此，我的记录本上，谁说了“高岗”二字我都抹掉，唯有他和阎红彦的不抹。因为他们有特殊保护条件……”

下边的话，我就不便说了：“高岗”二字是有“阶级”性的，有人能说，有人不能说。他们“自己人”能说，别人不能说。

这天，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还给我留下两个要写的材料。

现在，我翻开这些材料，心里直哆嗦，白坚这位直率人，到底是被他们整死了。听说，白坚患严重心脏病，为《刘志丹》小说，一机部对他进行批斗，专政。在大规模的斗争会上，他的心脏病发作，自己忙掏出药，往嘴里塞，造反派把药打掉，他弯腰去捡，造反派把药踩碎，开完斗争会，送到地下室，白坚就咽了气。

他们为什么要对白坚这样残忍？这里边有多少文章！

比较一下郭洪涛呢？虽然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本机关闹派性，有一派曾冲击过他，可当时的当权者，对他是好的，是保护他的。他是西北干部中最早在报纸上露面的。他的身体很好。这些能明确看出什么人是他们“自己人”。

## 九 哪个人物是高岗

他们不让我喘气。下午，项目人员又提出，要我说明小说中哪些地方写了高岗，为什么要那样写？

我很清楚，康生印了五百本“供批判用”的《刘志丹》草稿，每个项目人员都能看到，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虽然看了，还是找不出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物。要找哪个人物曾在三十年代反党？更是海底捞针。大概是在一九六七年，我画过一张图，说明小说中的罗炎到底是不是高岗。就这张图，地质部两派的组织都拿去看过，到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又看过。有个师范学院来了一群人，开到地质部，要插手这个案子，把图拿去一看，撤退了，觉得没有多少搞头。

现在，这里又要，我还是照样画一张图叫他们找高岗去吧。

罗炎（小说草稿）	高岗的历史
①1929年冬，在苏雨生学兵队，当分队长。	①1929年冬，在苏雨生学兵队当分队长。
②1931年春，到职田镇给刘志丹传达省委决议，请刘志丹到苏雨生部队，搞西北反蒋大同盟。	②1931年春，到职田镇，给部队送文件。
③1931年夏：到邠县营救刘志丹。	③
④	④1931年，晋西来的部队，到陕甘边界，整顿山西部队，因部队要求枪毙阎红彦，他撤了阎红彦的职。
⑤	⑤1931年底，又来陕甘边界，开到三嘉塬。

⑥	⑥1931 年底，解决山西部队两股子的纠纷。
⑦	⑦1931 年底，反帝同盟军成立，和阎红彦去西安弄回些子弹。
⑧	⑧1932 年 2 月，刘志丹在三嘉塬被坏人陷害，囚禁，高岗来救出。
⑨	⑨陕甘游击队成立，高岗来游击队任某大队政委。
⑩1932 年 2 月，刘志丹去西安找省委，在王家巷，遇见罗炎。	⑩
⑪	⑪1932 年 4 月，在临镇打了败仗，高岗失踪。
⑫	⑫从临镇去西华池。
⑬	⑬去活动同学高鹏飞，搞了西华池起义。
⑭	⑭1932 年 6 月，部队从韩城回来，被阎红彦撤职，以示报仇。
⑮1932 年 8 月，罗炎从省委回来，正碰上打仗，罗炎带一队人出去打游击。	⑮
⑯1932 年 10 月，游击队打保安失败，罗炎回省委。	⑯
⑰	⑰1932 年 11 月，部队在保安解决过冬问题。分了六股，高岗走，杜衡来。
⑱	⑱1933 年 5 月，王泰吉起义，省委派高岗去联系过。

<p>⑱1933年9月，刘志丹从南山回到照金，碰上了罗炎。</p>	<p>⑲1933年6月，杜衡叛变，省委被破坏，高岗跑到照金根据地，恢复红二十六军。</p>
-----------------------------------	---

由上表看，罗炎和高岗，只有第一、第十九能对得上，第三只对上一半，其余全对不上号。

罗炎在《刘志丹》上卷中共出场七次，请看都是以谁为模特儿：

<p>①罗炎当过学兵队分队长。</p>	<p>①高岗当过学兵队分队长。</p>
<p>②罗炎从西安来职田镇。</p>	<p>②省委派军委的史直斋来职田镇，高岗来送过文件。</p>
<p>③罗炎来邠县营救刘志丹。</p>	<p>③史直斋回西安一趟，又来邠县。省委委员马子青带来西安营救刘志丹和信。 杜斌承来邠县营救刘志丹。</p>
<p>④刘志丹去西安省委碰见罗炎。</p>	<p>④在西安王家巷遇见的是黄子文。</p>
<p>⑤1932年8月，罗炎从西安来部队，出去打游击。</p>	<p>⑤李梗，小章，小冯从省委来过。</p>
<p>⑥1932年，打保安失败罗炎回省委。</p>	<p>⑥保安失败后，杨森去西安。</p>
<p>⑦1933年9月，刘志丹从南山回到照金，碰上了罗炎。</p>	<p>⑦1933年6月，省委破坏时，高岗和贾拓夫分手，高岗到照金。</p>

从对此表中看，罗炎出场七次，只有两次半能和高岗的历史撞上。

有人说：“你不要狡辩，基本是高岗的材料！”

请注意：什么叫“基本”。从前中央领导讲工业化时，曾声明：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才能称得上“基本上工业化”。

我写的罗炎，撞上高岗的材料还不到百分之五十，怎么能称得上“基本”呢？

凡事都应用统一的逻辑，不要一件事一个逻辑。

何况，这里指的是草稿，草稿是不应当批判的。如批草稿，再大的人物写的草稿也不会无懈可击！

我真想说：“请注意：我的最后稿，没有用高岗的材料。”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派从我家抄走了那份稿子，难道他们不交给中央项目组？既然项目组手中有最后稿，又何必再让我说高岗问题呢？

## 十 造反派联合斗争会——到底谁要复辟？

我想起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地质部礼堂开的那次批斗会，很能说明问题。

这次斗争会，是地质部的“红联总”，“革命造反兵团”，中组部的造反派，中宣部的造反派，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兵团联合组织的。那时，我被关禁在地质学院，由地质学院的一男一女，用汽车把我押送到西四地质部礼堂。女人满脸雀斑，男的是个大汉。

把我押进地质部礼堂，先到后台，景范已被押到。另外还有中宣部的副部长张子意，中组部的副部长杨以希，都是我们的陪斗人。唉！他们本来都是我们的项目人员，现在反倒成了陪斗人。

杨以希这个中组部的副部长，是中组部部长中最年轻的，自从康生领导的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派把“叛徒集团”的名单公布后，那些老部长都已押进监狱，只有把他拉出来当替罪羊了，他穿件短袖汗衫，半短裤，提个黑书包，像是每天都在应付斗争会。我不禁想：一九六二年他参加提审我时，他是处长。我和他还闹过冲突，双方都站了起来。谁知如今，我们被拉上了同一个斗争会，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最可怜的是张子意，这位中宣部的老副部长，身体竟是这样坏，他瘦弱无神，在后台他趴在桌子上不抬头，也许他太累，需要休息。中宣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之一，成了“阎王殿”，“文艺黑线”的老窠。大概他被斗的次数太多，撑不住了。可是到了台上，造反派叫我们统统弯下腰，低下头，张子意弯得最深，一动也不敢动。有人传说中宣部的部长们每天晚上在家练习弯腰，如上台弯不好，就要挨揍。

我也弯下，又直起来，用眼扫了张子意一眼，我心中发酸：一九六二年康生组织的中央项目委员会中有中宣部，中宣部分工负责这案子的是张子意，他没有审过我，我从未见过他。现在他成了这个模样，是不是康生嫌他搞《刘志丹》专案不得力？所以受这么大的罪。

这个联合批斗会批判的内容很怪，也很值得研究。他们说：“《刘志丹》小说，是反革命复辟的纲领。把高岗写成了西北的领导人，创始人，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决不是这样的。他是反党野心家！要把歪曲了的历史纠正过来！”

“一九四九年，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里通外国，分裂党，说什么‘军队党’、‘地方党’、‘白区党’、‘红区党’。”

“在财经会议上，组织会议上，进行分裂活动。”

“革命初期，一九三二年，他在临镇逃跑，成立过秘密队委。”

“一九三五年，任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嫌官小。”

“中央来后，他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拉拢了一批人。”

“可是小说中写了些什么呢？”

“第三稿，名叫崇炎，第五稿，名叫罗炎，这就是翻案！”

“翻案用三种方法：第一，是洗刷高岗的罪恶。”

“第二，凡是罗炎出场，都在关键时刻。”

“第三，掩盖他的丑恶历史。例如阎家洼会上他被撤职，临镇事

件，秘密队委，为何不写？”

“再一个是习仲勋，他支持写《刘志丹》，抬高刘志丹，才能抬高高岗。”

以上是斗争会的主要观点。

他们又自相矛盾地总结说：“这本书，不写高岗，就没有办法写，不能不写他当政委，还得是正确路线！”

他们还说：“书中攻击省委来的代表，不是右，就是“左”，只有罗炎正确，还写他曾经恢复起红二十六军。又当政委。

“总之，这本小说，从搜集材料到写作过程，就是为高岗翻案的过程。把他写成挽救革命的关键人物。正像从前他自己吹嘘地那样。”

“为高岗翻案，就是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本书的要害，就是要推翻党中央对高岗的结论。”

革命联络站的人发言说：“这本书，实际是反党的历史。是反革命复辟历史！”

这就是他们的理论。他们说是“反党历史”？中央什么时候说陕北、陕甘人的历史是反党历史，这和中央的结论一致么？那么，中央在延安时是怎么说的呢？可以查在延安时的档案材料。刚进城时，毛泽东还说：“陕北人来北京开会，坐头排。”可是高岗问题一发生，陕北人就该坐末排了。

再说：高岗问题是 1954 年发生的，是在 54 年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中央哪个文件上说过，高岗在陕北就是反党的，一九三二年就是反党的？恢复红二十六军也是反党？打了解放战争是反党？支援抗美援朝也是反党？

关于“秘密队委”，“临镇事件”，已经在延安高干会，历史座谈会上都说清楚，解决了。现在他们又要翻旧账。

这些问题，我在中央的档案中都看到过，不但看见了延安高干会、



历史座谈会的文件，还看了一九三一、三二、三三年陕西省委的文件，所有人是什么情况，我心中都有数。

为什么不允许说省委派来的代表有右，也有“左”呢？翻开省委的文件看看：一九三一年王明路线上台后，提拔起那么多不懂事的领导人，哪个人到了红军不是瞎指挥一阵子，批评指挥员是“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回省委又检查自己也是“右倾”了。

最拥护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他们在土地革命时就瞎指挥，乱杀人。现在他又在为王明路线翻案。他们勾通了康生，康生又把他们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带到中央，冒充是“中央”的意见，都贯彻在这个案子里，遍及全国。哪个造反派的人都是带着这个框子。

现在，康生利用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兵团，在各省、市设立了联络站，动员全国的人来打这本小说，而且全是用康生的观点做炮弹。他们要把历史颠倒过来，把王明“左”倾路线说是正确的。把全国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功勋据为己有。

一九六二年中组部没收了我的采访记录，已在造反派中手，按照造反派开出的名单，他们一个一个在挨打。

在一九六七年春，南开大学“八一八”的刘延生跑到我家问我：“田均是谁，他在哪里？”

只这一句话，我就明白了。因为我的采访记录中，所有被采访过的人，都是真实姓名，只有一个“田均”，因谈材料时，本人说：“我以前叫田均。”我就顺便写了个‘田均’，以后再未补写真名。现在他们把所有的人都通知了所在地区的造反派，立了项目，动员各单位来斗争，来审讯，形成个全国性的、庞大的项目网，世界第一流的项目网，还是没找到田均。跑上门来追问。

我冷冷地回答刘延生说：“田均就是田均，你们去找吧，反正他在中国，不在外国。其实，田均就在宁夏工作。我不能说，我要保护

他。

在地质学院十二楼囚禁时，那个江苏小伙子和一群教职员问我：

“你为什么写高岗？”

我说：“我没有写高岗！”

他们问：“罗炎是谁！”

“罗炎就是罗炎！”

他们厉声说：“罗炎是高岗！”

我马上将上一军：“这是从你们口中说的。我写的罗炎，可是个好人，是个红军干部。你们说高岗是坏人，你们怎么能把好人当成高岗呢？可见你们脑子里不干净。我的书中也写了不少坏人，有错误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把坏人，有错误的人当成高岗呢？”

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说：“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他们不能自圆其说了。

有个年轻人说：“我问你，为什么写《刘志丹》小说？里边为什么写个罗炎？在罗炎身上又为什么用高岗的材料？”

“我写的是西北红军，红军中需要有政委，不是张三，就是李四，反正得从政工人员身上找材料，不能凭空捏造”

他们说：“交代你的政治阴谋！”

我一生气，冲口而出：“要复辟资本主义！”

“为什么要复辟资本主义？”

“我还要复辟封建主义呢！我要当皇帝！”顶到了最高峰。

“你敢写下来？”

“拿纸和毛笔来！”

他们真的拿来了纸和毛笔。我用毛笔写上：“我写《刘志丹》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我要当皇帝！”下边签上我的名字，向前一推说：“拿去，贴到天安门前，你们去动员五十万人，到天安门

去斗争我，就说李建彤要当皇帝！”

这个案子，整个是荒诞，我便以荒诞对荒诞。

到底谁要复辟？谁要翻案？越来越清楚。

## 十一 康生的指示

也不知是谁，往木笼里塞进一张报纸，我捡起一看，是旧的小报，我早看过，是“红代会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代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编辑部出的联合报，共四大版。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出的。

报尾有个说明：“本期稿件除《宣判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死刑》是本报撰写外，其它均是反党小说《刘志丹》项目调查、批判联络站提供的稿件，他们是：

《反党小说《刘志丹》项目调查、批判联络站》

天津地质学院“卫东”红卫兵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

《工人日报》革命造反联络站

地质部《红联总部》

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所《红旗公社》

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

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近代革命史所

中宣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全国总工会《革联》

中组部《人民勤务员》

以上共十二个单位，写的文章有：

“看，反党小说《刘志丹》怎样剽窃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以写小说为名为反党罪魁翻案”

“反党小说《刘志丹》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

“为反党头子高岗翻案的反革命复辟纲领”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辉”

“刘邓黑司令部炮制和庇护反党小说《刘志丹》罪责难逃”

“宣判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死刑”

不过，这些文章都是不实之词，他们要打倒谁，谁就和这本小说有关系，谁就包庇这本小说。

只有一篇文章，我倒可以看看，那标题是：“康生同志对于反党小说《刘志丹》问题的重要指示。”

全文如下：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揭发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手策划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件，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康生同志对这一反党案件十分重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至今，康生同志曾多次作指示彻底清查这一反党案件。但是，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的包庇纵容下，旧中宣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旧中监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瑛，旧全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颀伯、马纯古，旧《工人日报》反革命分子高丽生、XXX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狗胆包天，竟拒不执行康生同志的指示，瞒天过海，舍车保帅，蒙混过关。现在旧债新账要一起清算！

这里发表的是康生同志关于这一反党案件的多次批示中的部分摘录。这个摘录，除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的批示外，其它几次均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的记录整理，未经康生同志审核。

康生同志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指示：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

十中全会上揪出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案件，中央指示《工人日报》重印三百本《刘志丹》送给中央。此事立即有人给作者，反党分子李建彤通风报信了。中央知道以后，要《工人日报》进行追查。康生同志十月五日在《工人日报》的检查报告上批示：‘显然是杜映告诉李的（按：指李建彤）。找杜映等谈话后，应当让杜等亲自写材料，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林（按：指周培林）、杜（按：指杜映）亲自写的材料，望请注意，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已有一月多了，为什么林等一点材料不写呢？’

康生同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指示：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康生同志对全总党组向中央写的假检查报告很不满意。康生同志批评说：《工人日报》几个人在政治上有错误？应提高警惕，从组织上追查，不能说组织上没有问题。

康生同志一九六四年指示：一九六四年冬，康生同志看到全总党组对《工人日报》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很不满意，在报告上逐段做了批示。

康生同志认为：（一）《工人日报》的问题，首先是报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存在严重问题，当然全总党组也有责任。（二）报社存在的问题：（1）不是根据毛主席思想，党的方针，而是严重存在着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不是一定程度存在着资产阶级办报作风。（2）五八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彻底，右倾思想并未肃清，继续发生错误。（3）报社组织人员干部严重不纯，人员中有坏人。报告中未着重检查。在《刘志丹》案中，很难说没有同情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人。而叫一个右派同李建彤一起写小说，问题揭露后，还在报社留了二年之久，难道是偶然的吗？要发动群众，清理坏人。（4）报社高丽生毛病很大，报社的错误与他分不开，全总报告里轻描淡写，不能教育他。决定调职后，又长期留下，还准备送党校学习，早应该送到工农中去锻炼。

（听说已下去，早该如此）

（三）今年（六四年）一月，组织检查组，五月作出总结，但并未彻底，压了五个月，十月送中央。有些人已下去了，给进一步检查造成了困难。应再复查一次。

康生同志认为不是像报告中所说的，组织观念、纪律性薄弱，而是违反纪律。也不是严重的不负责任，而是政治上严重错误，未发动群众，彻底的把坏人清查出来。

康生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指示：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同志提到《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刊登反党小说《刘志丹》问题时，康生同志说：杜映是推销员。

康生同志又说：宣传部也有人支持李建彤，李建彤因此有劲，不理睬阎红彦……我一看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

康生同志一九六六年六月指示：一九六六年六月在一次会议上，康生同志指出：《工人日报》不只有一个《刘志丹》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张报纸至今我仍保存着）

康生是这个项目的领导人，所以随时可以发任何指示，他的“指示”，还不止这几点，我还可以给他补上几点：

康生曾给中央写报告，说：《刘志丹》小说是篡党篡国的纲领。

康生说：《刘志丹》小说，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恶毒。

一九六七年一月，康生说：地质系统要揪刘景范，他老婆写了反党小说《刘志丹》。

造反派整理的“康生指示”，且不说文字如何，那逻辑就有些混乱。头一点就是，把一九六二年以来的项目人员都说成了包庇人。

康生说：叫“右派”（指何家栋）当责任编辑，这是《工人日报》的罪状之一。可是康生自己的回忆录《革命母亲夏娘娘》，就是这个

“右派”（何家栋）当责任编辑，还送康生本人审阅过。他表示喜之不尽，难道他就不怕“右派”观点？

康生说，他一看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他什么时候看的？从北戴河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只隔几天时间，就在全会期间，康生和阎红彦还要求中宣部从书中检查对谢子长是怎么写的。中宣部曾通知我，要我说明哪些章节有谢子长。可见康、阎都没能全部看小说，只管信口开河。阎红彦只看了有关他自己的章节。康生根本未看，就妄下结论。在康生还未见到书之前，就从北戴河向中宣部发出指示：通知各报刊，一律停止刊载《刘志丹》小说，迫使《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将要采用的稿子停下来，如今校样还在我手里。

这张“联合报”，我看后收藏起来，准备慢慢反驳。虽然是各群众派别的报刊，那些材料，却是他们到处搜罗来的，没有中央项目的内部人物支持，也写不出这种文章。

## 十二 “造反派”中的好人

那张报纸，究竟是谁塞进来的？

这几天，来值班的人轮换很快，像是各单位的人都有，各派别的人都有。面目不一样，表情不一样。有的和气些，有的凶狠些，看来，大多数是好的。我和他们无冤无仇，他们值他们的班，我当我的犯人。

突然，值班人又伸进头来看看，见我手中拿张报纸，伸手拿去看一眼，是批判我的，又还给我。

这天上午，又有一拨人来和我吵架，是要我交代李志舟的材料，我说：“我不认识。”那些人发了顿脾气，走了。

下午，值班人员换了。听见两个人对话，一个说：“我请会儿假，到街上买点东西。”听脚步声是走了。只剩下另一个，他把头伸进来看看，又伸手去翻我的褥子。我问：

“干什么？”

他说：“我看看你床板上垫的是什麼。”我揭开给他看，并解释说：“全是旧报纸，因为床板上有很多大窟窿，又脏又烂，没法睡，我才要求铺了旧报纸。”

那人轻声说：“这报纸上有毛主席像，别人发现了，又会给你扣上个‘现行反革命’，快拿下来，我另找些纸给你。”

我才醒悟过来了，马上把被褥揭开，他手疾眼快地把报纸卷起来，夹起来走了。一阵子，他又跑回来，拿了三大张写大字报用的黄色油光纸，给我铺在床上，我也连忙把被褥铺好，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轻声答道：“兰州大学毕业的。”

我没敢问他姓名，因为这是犯禁的，也怕给他为难，不问为好。但我记下了他的模样：三十岁左右，瘦高个儿，白皙的脸，下巴有些尖，戴着黑边眼镜。我万分感激，他真是救了我一命。要不是他这个突然来的胆大勇为，我还没意识到，眼前正抓这种“现行反革命”。谁弄烂了毛泽东像，谁把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擦了桌子，或者把毛泽东像章掉在了地上，都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这个时期，所有报纸天天必登毛主席像，谁把毛主席像弄脏、弄破，就要被打成“反革命”。

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国盛产“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断了种；到一九四三年，延安盛产“特务”；一九五七年，中国又盛产“右派”；一九五九年中国盛产右倾机会主义；如今，又盛产“现行反革命”了。恐怕有几十万。

这又是一种恐怖空气。

这位兰州大学毕业的学生，为什么这样照顾我？只能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中国人民的正义感！



一九六七年，我在地质学院被软禁时，也遇见过类似的人。那是东北某化工厂的两个人，不知是工人，还是干部，他们是一个项目组，专门调查“谭生彬”案的。

他们来提审我，是因为谭生彬在监察部当部长助理时，我向他采访过。他在红二十六军当过骑兵，当过班长，在陕北的延长县当过县委书记。他给我讲过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的故事。一九六二年，把书打成“反党小说”，他就随着一批西北干部一起被从领导岗位上拉了下来。他那时是青海省委的副书记，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东北某省化工厂当厂长。这种分配只能意味着“贬职”或“流放”。“文化大革命”一起来，他又被点了名，揪出来挨斗。化工厂的人曾跑到北京来提审我，问他的案子。

他们这次到地质学院，十二号楼找到我，是学院的造反派陪着来的。一来就凶神恶煞地，大声叱问：“李建彤，你老实交代，和谭生彬是什么关系？他给你谈了些什么？怎么密谋反党的？”

我只得从头说起。他们总是拍桌子，吼叫得我说不下去，又引起我的愤怒，不免和他们顶撞。学生们听不出名堂，站起来走了。只剩下化工厂的人，他们马上变了另外一付脸。笑着对我说：“实对你说，我们是保谭生彬的，他在我们那里工作得很好，工人们拥护他。有人打，有人保，我们是保的。”

他们说着，还给我递一支过滤嘴香烟，点上火，说：“抽吧，看把你折腾成啥样子了。”

我也笑脸相对，问道：“你们去过西安吗？这是有人捣鬼，不然西北干部不会这么倒霉，一下子打下去这么多。”

他们说：“我们去了西安，查了谭生彬的档案。就因为你这本小说，西北局的书记和中央组织部串通，打下去几十名省级干部。中组部对谭生彬的批示是‘免职’，以后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又私自改为‘撤

职’。无形中加重了对谭生彬的处分。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只说是和‘彭、高、习反党集团’有关系。”

说着说着，他们埋怨起我来：“论干部，你也不算小，论级别，你也不算低，刘老的待遇更高，你们两位老人可以过舒服日子，你为什么要吃那种苦，写那本书么！害了那么多人，据我们看，被打的都是好人呀！”

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工人出身，现在科室工作。

我心想：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工人阶级，他们有分析事物的能力，敢于探究事物的本质，他们还有些文化。当我写的材料上有疏忽时，他们还帮我改了几个字，改得很不错。

趁着没有外人，他们竟和我聊起天，说说笑笑像是一个办公室的人，他们嘱咐我千万注意身体。大部分群众是清楚的。

他们说：“你也别担心老谭，我们会保护他，虽然北京有人指示要揪他，我们不让他离开，怕他到别处吃苦，我们都喜欢他……”

一小时以前，他们进来时，是那样气势汹汹，如今又是这么和蔼可亲。我喜欢这种“两面派”。他们一面可以应付敌人，一面可以给自己人透点消息。

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真希望中国盛产这种“两面派”，这是革命的两面派。

我听景范说过他去年挨打的事：西北工学院来人揪他，把他弄到地质部一间小房里，把门关上，说着就有人先动手，给了他一拳。另一个学生，叉着腰横着站在前面，看似要打人，其实是挡住了那个最凶的人，使凶手没能得逞。

### 十三 挨打

当别人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时，我才恍然悟到，我晕过去了，什么

时候晕的？记不得。

送到医务室，韩大夫听了我的心脏，对项目人员说：“让她休息吧？她的心脏有病，打晕过去，是有危险的。”

我才明白，刚才挨了打，是谁打的？好像是天津来的人，什么机关？我不清楚，反正是延安同学王超的机关，是交通运输部门的，要了解王超在延安的情况，还有他的老同学顾丘的情况。

可真难住了我，我就知道那么一点点，在延安才认识的，更多的事，一无所知。他们来审我的有四五个人，其中有个半老太婆，嘴瘪得好像没有牙。老太婆一九六七年冬到我家来过，说她是天津来的，是真是假，还很难说。她总是搞得挺神秘的。她到我家，假装闲聊，在我吃饭桌上聊，似无大事，实则是来当尖兵的。

她和我说着笑着，聊着问着，自以为得了大量情报。

王超据说是抗战前在航空测量学校学习过，抗战开始，自己投奔了革命，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顾丘和王超同学，他是在重庆解放之前，来到北京。他不愿离开中国的大陆因为他有妻子儿女在内地，反而被打成了“特务”。

有些话到嘴边，我并未说出口，就惹来一顿暴打。有个年轻小伙子，为表现他的“革命性”一拳就把我打倒了。

当我醒来时，他们已跑得无影无踪。

我挨打当然不止一次。

下午刚休息一阵子，甘肃又来了人，其中一个用纱布遮着一支眼，是个独眼虫，他们硬说电影《红河激浪》的本子是我写的。

对这个电影，我既未看过，也未参加过，只是听说过。是一九六七年，有个甘肃庆阳来的项目人员，审问我：“是否认识铁娃？”我哪能认得。

后来慢慢的他们才说，铁娃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原型是庆阳南

梁地区的一个农民，为批判那部电影，康生指示到处打人、整人，铁娃的原形已被整死，连庆阳的地委书记也吓得不见踪影了。

后来听说：康生点了名，说这个电影是李建彤写的，也是“为高岗翻案”。好像我成了“翻案专家”，所有的“翻案作品”都成了我写的。

想到这些无端的诬陷，我出口反驳独眼虫：“《红河激浪》与我无关，谁说是我写的，叫谁来当面对证！”

独眼虫说：“好大口气！谁来和你对证？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说明是你写的。”

“把材料都摆出来！”

“你现在是什么地位？还敢强辩！”

“什么地位也得允许说话，还未宣布剥夺我的公民权！”

“难怪都说你顽固，你就是顽固！”

“我不知道的事，你们硬逼，是我顽固，还是你们顽固？”

独眼虫又转了口气：“你的小说都给谁看过？”

“我列出过名单，到组织上查去！”

他又突然问：“给北影的于蓝看过没有？”

我心想，好恶毒，还想把于蓝拉进这个案子，要陷害她。

我说：“没有，未正式出版前，不给任何无关的人看！”

“北影和你有无关系？”

“有关的只是个别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关系。”

“北影你都认得谁？”

“我认得的人多啦，凡是从延安来的，我几乎都认得，但是平素无来往。”

正在这时，医务室的小于大夫进来了，已过下午六点，她来接班。这时独眼虫他们才要离开。

小于大夫问：“你房里天天都有人吵架呀？”

“可不是，天天都有好几拨人来吵架，不是拍桌子，就是踢板凳。”

小于皱着眉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你可千万不要得了什么病。”

这天下午和夜里，都有医务室的大夫或护士来值班。特别是晚上，他们听不到我熟睡的声音，互相悄悄地说：“她没有睡！”

是的，我真的没有睡，只是闭着眼想问题，这么繁杂的局面，不用脑子，应付不了。凡是来的人，都要吵闹。可我呢，要把真正的东西摆出来，使群众从康生和阎的迷网中清醒过来。这工作，只有我能做。我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在斗争风浪中，顶风行船。

早晨起来，我要求大夫给我安眠药。他们答应了。医务人员一连值了几次班，确实知道我整夜不眠。出于人道主义和医务人员的责任感，他们批准我吃安眠药，每吃三天，停三天。安眠药交给值班人，每晚九点，我在值班人手里领两粒安眠药，当面吃下。

我也明白，他们怕我把安眠药留下，一次吃过量，呜呼哀哉，都是好心。

其实，我才不会自杀呢，宁肯等着康生他们指示人杀我，我决不会自杀。

我的任务很重，我要和他们斗到底，争取将来把这部小说写完，出版，才能对得起延安的小米，延安的人民。

项目组命我每天打扫楼道，包括医务室门前的垃圾。那些垃圾，主要是瓶瓶罐罐，针剂瓶、药瓶，玻璃罐子。我对值班的女干部说：“你看，这东西吃下去，随时可以死，连抢救都救不过来。我看过一些书，什么样的死法我都懂，只是不用罢了。请你们大家放心，我要好好地活着，挣扎地活着。这是为了斗争的需要。”

那位女干部点点头。

然后，她坐在桌前做记录去了，我也希望她把我的话写在记录本上。

#### 十四 解答十个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早八点，地质科学院的“红旗公社”就来审我，命我答复十个问题，其实这是一派群众组织来抢材料。我只得公事公办。现按原材料，摘要如下：

一、

问题发生后，地质部的部长们谁找你谈过话？

答：有一天，党组书记何长工的秘书打电话，叫我去何长工家。到他会客室后，何长工对我说：中央组织部叫他告诉我，说你写的《刘志丹》是宣传高岗的。叫你交代问题。

这是他代表地质部正式通知我的。

二、

何长工怎样到你家取的笔记本？

答：在这之前，已经有两次，一次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周扬，派人来我家取走习仲勋看过的稿子。一次是中组部的安子文，派人到我家取走我的第三稿。何长工是最后去取的。那天，是中组部叫刘景范去谈话，回来时和何长工一块进的门。何长工叫我当场把陕北干部看过的稿子和采访记录，全部交出来。我取出一大包，他的警卫员刘振英拿上汽车的。

我自己正用的那份稿子没有给他。我已修改一半。问题突然发生，我也得修改完。后来我向中央项目组声明过，我要留一份作检讨用。这份稿子，去年被地质部的群众组织“二兵团”拿走了。

三、

乔明甫到你家取枪枝弹药是怎么回事？

答：这可能是以后的事。有一天，地质部副部长李轩陪着乔明甫到我家，来取枪枝弹药，好像是怕刘景范自杀。李轩还问我有没有安眠药。我把枪枝弹药都找出来给了他们。都是在西北战场上用过的东西。是李轩和刘振英拿走的。

我没有见乔明甫，他在东房客厅和刘景范谈话。他走后我见桌上留个纸条，写着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从前我不认识他。

四、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什么人到你家去过？

答：十中全会前，刘景范在地质部主持轮训班。没有人找过他。

十中全会后，除上边说的人外，张邦英来过，是中央派他来的。

十中全会前，习仲勋的秘书来过。因为我写给中宣部的两封信，是对阎红彦本人及其文章的批判。那一段历史，习仲勋了解，我送去征求他的意见，看我写得准确不准确。习看后打发秘书送还我，他没有说我写得不对。可他表示不同意发。

我还是把信发了，习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我不听他的话。

《工人出版社》的杜映来要过第三稿，我没有给她，当时我以为阎红彦逼他们来要的。

五、

你两次去西安，都干了些什么？见了谁？

答：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五月，我在监察部请的假，《工人出版社》写的介绍信，我一个人去的西安，住在省委招待所。那次主要是调查渭华起义的材料。

第二次去西安，是一九六〇年，还是我一个人。

这次主要是调查一九三二，三三年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

在西北党校看了前省委的档案。在省档案馆也查了档案。在省图

书馆翻了几天旧报纸。

经过副省长杨玉亭（管政协工作的）介绍，到政协找过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谈过一九三二年一一九三四年杨部和红军作战的情况。西北党校的人也参加了。

七月底，我到陕北走过一趟。那时刘景范正在陕西的汤峪养病，我就动员他和我一块去陕北。目的是想看看老苏区。

先到照金，转延安休息几天，又去志丹县，看到刘志丹的出生地，生长地，就去陕甘边界的南梁苏区。一路调查材料不多，主要是看地方。八月二十日，我回到北京。

六、

写稿和改稿问题。

答：我已写过材料，请去项目查看。

第一稿是整理材料，是我和《工人出版社》的王勉思，边调查边整理出来的。一九五八年我从西安回来后，我写出第二稿，初步加工，在此基础上加工成小说。参加人是杜映，何家栋和我，三个人一起研究出来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初到国庆节，这就是第三稿。第四稿是我去老区回来，我一个人于一九六一年夏写出。第五稿是一九六二年我又一次写出。整个写作过程，出版社的编辑，总编都随时提意见，随时修改。

第三稿送习仲勋看过，他说没有写好，提了很多意见，等于推翻了。

七、为什么给何长工，江涛看稿？

答：一九六〇年我住在西安芷园时，何长工出差路过西安，也住芷园。我碰见他，就送他一本第三稿，因为他是地质部的领导人，我是地质部的干部，应当送他一本，也请这位长征干部提提意见。回北京后，我问了他的秘书，秘书把稿子退给我，没表示意见，也不知看



没看。

一九六二年，第五稿印出后，送机关党委一份，因为我暂归那里管。作为我个人的工作汇报，不是给江涛个人的，后来则是江涛退还我的。

八、

问题发生后，为什么又到习仲勋家？

答：十中全会期间，习仲勋的秘书打电话叫我去一趟。我中午赶到，习说：你的书有了问题，是为高岗翻案。

我说：就像一个孩子已经出生，就是合法的人，谁要掐死他，就要负法律责任。我没有写高岗。

他要我把写了几次稿，给他送过些什么，都写下来。因为上面逼他作交代。

过几天，他的秘书又打电话，我去了，他问我一九六〇年谈话有无纪录？我说：“有，出版社和我都作了记录。”我回来找出，又送给他。这是正常的，从前我们没有请他审阅过谈话记录。

九、

你为什么修改采访记录？

答：因为我写的历史是真的，阎红彦文革中写的历史是假的，他竟能得到领导的支持，我反而受审。事情可能会闹得很复杂，许多人要受我的株连。我觉得对不起人，决定修改记录，保护好人，宁肯自己坐牢。

我修改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干部中互相之间的意见，我怕坏人拿去挑拨干部们的关系。例如：许多人对“肃反”有意见，骂了搞肃反的人。而肃反的主持人，都还是高官厚禄，手中握着大权，他们看到记录，岂不要打击报复？

阎红彦一口咬住高岗问题，记录上那怕有骂高岗的话，我也得涂

掉。因为他成了犯忌的名字，谁说了这两个字，谁就是反党，就会大祸临头。

我的估计没错。贾拓夫的谈话记录没有涂改，我原以为他们不会整贾拓夫，因为土地革命时贾不在陕北，和他们没有矛盾。谁知他们狠狠地整了贾拓夫，就是因为他说了高岗的一个材料。

十、

中央项目组找你谈过几次？谁说的？什么内容？

答：第一次，是中宣部的周扬找我谈的，他说我写的书是反党的，要我交代。

第二次，是地质部部长办公室通知我，叫我到中监委找副书记钱瑛谈话。那次是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参加人有伍云甫。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她们让我写出写书的过程，并质问我为什么把阎红彦写得自杀了。

第三次，是中组部直接打电话叫我。还是去找副书记伍云甫。那次是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主持会议。在中组部的会议室。参加人有乔明甫、杨以希，中监委的伍云甫、李振海（处长），中宣部的王谟、苏蓓，集体审我。

这次一连谈了两天。头一天，是要斗争我，提出许多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高岗问题。我和他们顶起来。

第二天，我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去的，这次主要是要我交代问题。也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大家叫交代的那些问题。

第四次，专案组又把我叫到中宣部，由苏蓓、王谟主持，对证笔记本。一连对证了两天。

第五次，杨以希叫我去中组部，核实我交代问题的记录，让我签字。

第六次，中监委的处长李振海，叫我去核实田 X 看过的稿子。

那时交代总是需要我回忆，谁谈了什么，记录都在他们手里。不像现在，你们手中无记录，我也一无所有。

我认为，一九六二年，我的问题已经搞清楚，谁知拖到现在，也不知谁在搞鬼？

## 十五 潘自力案

外交部项目组来人审查潘自力案。

潘自力是做外交工作的，曾任过中国驻苏联的大使。他是陕西人，早期的革命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渭华起义”时，他担任书记。

“潘自力项目”，的项目人员，来提审的语气，蛮横无理，他们的意思是：一九二八年搞“渭华起义”失败了，就是错误。言下之意，潘自力是参加起义的人，就应当有错误，怀疑潘自力的历史。

他们要我交代出我所知道的潘自力的一切，并说：“这对你有好处。”

我当时就说：“我不需要别人给的好处。”

这次，我的项目人员，是徐州人参加，还有个说广西话的，有人叫他“小林”，三十多岁，是个不讲理的人。

他们和外交部的项目人员，对我展开进攻战。不过，就是那么一套，不去理他了。问题在于我如何写这个材料。既是“交待”，又要说明事实，表明我的思想。

潘自力的亲友对我说过，他青年时代是个精干的人，曾到德国、苏联学习过。

但关于潘自力的历史，我一字不提，绕过去，何必引起项目人员的猜想，给人找麻烦。

我就事论事，开门见山：

访问潘自力的原因，是因为一九二八年他是陕西省委书记，领导

过“渭华起义”。

我写的“渭华起义”一章，基本上是一九五八年在陕西搜集的资料，多得教于西安市副市长杨晓初，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许尚智，他们当年都参加过起义。草稿，在西安已写成，回北京再请潘自力核实，因为他当时是省委书记。大约是一九五八年秋，我在北京东郊外交部招待所里，访问了潘自力。第一次去，是先送上我写的稿子，请他审阅。一位女干部代收，他本人不在。第二次去，他已阅完，谈了如下意见：

1、他认为我整理的草稿，基本轮廓是对的。当然，以后我写成小说时又有很大改动。

2、我向他订正：“刘志丹当时究竟是什么职务？”

他说：“刘志丹是渭华起义的军委书记，省委是把任务交给他的，他直接对省委负责。”这一点，他谈的和许尚智相同，许当时是军委秘书长。

3、对许权忠的看法，他认为那时许权忠不对，起义前放松部下，把部队拉走一部分，还把重武器搞走，影响起义的力量。否则，“工农革命军”的力量更大些。

4、起义失败时，省委把刘志丹调回来了，因他另有任务。后来许权忠把队伍带到别处，失败了。省委没有决定把队伍交给许权忠。

5、我问：“在敌人大规模‘围剿’前，刘志丹曾主持军委会议，准备把‘工农革命军’撤到渭河北岸，向陕北转移，以保存实力，在陕北建立根据地。这个意见，未来得以实现，不知省委有无指示？”

他说：“省委事先没有指示，军委可以事先讨论，然后报省委。”

6、我问：“一九二八年的渭华起义是否对？”

他说：“当时起义还是对的。那是‘八七’会议后就准备好了的，是省委领导的。关于这个旅的起义，中央也有过通知。当时不起义也

要被敌人消灭。已经被消灭了一部分，前任领导已被杀害。另外，渭华的农民已经起义，需要军队去配合。至于失败，原因很多，不是光这个地方有失败，其它地方也有。”

为了反驳提审人利用起义失败为借口扣帽子，我又翻阅手头的《毛选》。我写道：

按照毛泽东指出的情况，一方面是北方不如南方，都不具备武装割据的条件。另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可以搞武装起义的。

关于在陕西为什么发生了“渭华起义”的条件和原因，我申述道：

当时陕西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是‘八七会议’后，各地革命者都有起义的思想。省委也有准备。另一方面，就整个陕西说，是比南方落后，而渭华地区，则比较好些。是在大革命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的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引用毛选）。这个地区建立革命组织最早，可能是一九二二年或一九二三年。这一带的中、小学校中就有许多“火种”。农民中也有许多“火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斗争很激烈。

这里的农民协会很普遍，参加过对北洋军阀刘镇华的作仗，许多农民有武器。这里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到一九二八年，就发生了农民起义。

起义的军队，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里边革命青年多。在陕西来说，只剩下这么一支革命队伍。就像毛主席说的：“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所以这支军队就有改造成‘工农红军’的条件。加上白色恐怖的压迫，军阀之间的混战和不安，就发生了“渭华起义”。

渭华起义：一九二八年一、二月开始，军队五月开到，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两三个月，失败了。

我研究过其它地方起义的时间和情况：

广州，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起义，产生过三天的民众政权。

海陆丰，是一九二七年九、十月建立革命政权，坚持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失败。

湖南省东部，湖北省东北部，是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坚持三十余日。

湖南南部，是一九二八年一月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坚持三个月之久。

就是说，在南方，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到一九二八年一月，都有起义发生。坚持最长的是七个月，最短的是三天。一般能坚持一个到三个月。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我觉得潘自力说得有道理。“渭华起义”是可以而且是应当发生的，他有起义的因素。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条件差。

至于我写的省委书记是谁？自然要在潘自力身上取些素材，但也不完全是他。我没送他看过写成的小说。

你们提出很多问题，我手头无材料，暂不答复。不过我敢肯定，“渭华起义”中无“高岗问题”。

我写出来了，但是很冒险。

果然，交出去的第二天，广西人和徐州人来把我训斥一顿：

“李建彤，你是怎么写材料的？你是见机就宣传你的观点呀！”

我说：“潘自力的项目人员不是也宣传了他们的观点么？那口气中带有阎红彦的观点！”

我气愤的是，阎红彦的观点竟然渗透到各个角落。他又没参加过“渭华暴动”，可是企图否定一切。

徐州人严厉地说：“以后，禁止你这样写材料！”

我说：“如果不许按照我知道的，我理解的东西写材料，我可以什么东西都不写！”

徐州人到底是个知识分子，没有再发凶，他憋着气走了。当然，如果我从此什么也不写，他也没辙。

据我估计，潘自力一定遭受过很重的打击。我观察：凡牵连到我这一案的人，特别是某一段历史的关键人物，只要是说了真话的，康生他们决不放过，唆使项目人员狠狠地打，能活过来的人不多。

以后得知，潘自力到底是被整死了。

## 十六 李志舟案

常到我这里来值班的有个胖姑娘，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似乎在斗争会上见她举着拳头吆喝着向前挤。听值班人聊天，知道她是长春地质学院毕业，两口子都在本单位，她的成份好，是贫农出身，正在想进领导班子，又想换大房子。这一天她值班，趁伙伴没到之前，她招呼我：“喂！出来，跟你谈点问题！”

我心想：你一个人跟我谈什么？值班人没有单独提审权。

我满脸冷气，带着我的小方凳，走出小木笼，坐在木笼门口。胖姑娘拉个椅子过来，也坐在木笼口，她摆开架子问话了：“地质部的部长、副部长，谁到过你们家？”

呵！依她想，谁到过我们家，谁就和“反党小说”有关系，或者和我们同伙“反党”。

我说：“来的人多了。”

她说：“你谈具体点，何长工去过没有？李轩去过没有？”

我暗想：这是不是为派性搜集炮弹？我可不给任何派性提供炮弹。我说：“从前，我们在菜市口米市胡同三十三号住时，离地质部太远，来的人少，自从搬到丰盛胡同二号，离机关近了，谁都来。我们家是

部长们开会的地方。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来过。”

她问：“难道李四光也去过？”

“也来过，都是工作关系，公事公办。”

“你去过谁家？”

我说：“我去过李四光家，他每年请一次客，大家都去，我当然也去。”

我知道，他们不敢找李四光的麻烦，周恩来总理保护着他

她沉吟了一阵，好像找不出茬口，没有油水。又问：“你最熟悉的是谁？”

“我没有最熟悉的。”

她没有达到目的，眼皮忽闪几下，说：“算啦，你这人没用！”

这是个想要捞稻草的人。

下午又来个穿军衣的，陕西口音，又是李志舟专案的人，还是问的那几句话：“你认不认识李志舟？他们在颐和园请客，你去了没有？”

我说：“你已来过两次，我不认识这个人，也没有在颐和园吃过饭！”

“都说你去了，你还不承认？”

“都说的？谁去了，我怎么不知道？”

“那是一次反党的集会！”

我说：“反党集会还跑到颐和园？在大厅广众面前反党？”

“你们有来往，关系很密切。你们是一个反党集团！”

“一个反党集团的人，我为什么不认识？他是干什么的？”

他厉声吼道：“你不老实！要自食其果！”

我说：“你说的人我不认识，也犯罪？”

他暴跳了，用手一指：“你站起来！给我站起来！”



值班人听他一吼，溜了。

我稳稳当当地坐着，用眼紧盯着他。

我们互相盯着，相持着。我就是不站起来，心想：不要仗着你是军人，敢在我面前撒野！我也当过军人，见过的军人多了。

他的思想也在活动，估计他在考虑如何对付我。他已经来过三次，开始是两个人，以后都是他一个人。

我已经准备好，只要他动手打我，我就和他拚。先撕他的领章，再揪他的帽征，再大

声叫群众来看，要把这不懂政策的家伙示众。

我们互相盯着，盯着，一秒钟，一分钟地过去，他忍不住了，再吼一声：“站起来！”我仍稳坐着不动。

他坐不住了，忽然站起，把皮带解下。

我的手已抓住我坐着的方凳腿，只要他用皮带抽我，我就用凳子砸过去。

他提着皮带在我面前来回走了几步。我仍然盯着他。

最后，他把脚一跺：“呸！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找你们领导去！”

他走出门。我想，这又是一位想立功的英雄，只要在我这里吼出点李志舟的材料，就是捡来的便宜，不知要换个什么“官职”呢！

我真不认识李志舟。见的人多了，谁记得那么多。除非是我采访过的。我确实没有采访过李志舟。

几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刘志丹的夫人在北京时，李志舟请她吃过一顿饭。这就有了罪，成了个大案。

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算真正看见了李志舟。那时他是北京军区装甲兵的副司令员，一位威武雄壮的军人，是西北的老红军。

他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来看我们，我也提到“文化大革命”这

场闹剧。他还不知道有人到我这里逼材料。我把这事告诉他。他只是哈哈大笑。

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斗过，关押过。虽然我没向他作过采访，有人仍然把他往这个案子里拉。

经过“浩劫”后，人都非常亲热，他看见我的儿子个子很高，便一把搂住说：“到我们军队上去打篮球吧！”

## 十七 一九六二年我给中央的信

专案组要我交代：为什么给中宣部写那两封信？

这件事，眼下我是推开，还是不推开？因为直到现在，未曾见到中央项目组的人。不见他们，只给做具体工作的人絮叨，用处不大，他们不是决策人，不能解决问题。

这一天，又是好几拨来提审，搅得我思绪繁乱。目前，我得有非常健全的神经，才能应付这个场面。

打发走提审人，我又坐下，从头儿回忆：

那是一九六二年七月，我到前门饭店访问云南省省委书记阎红彦，他是来参加中央会议的。

我在前门饭店二楼找到他。还是在一九五八年我见过他，那年我们就顶撞过几句。今天，我是以尊重西北老干部的口气，给他送书，请他指教。

我刚坐下，他摆着官架子说：“我那篇《回忆陕甘高原早期革命的武装斗争》你看过没有？已经在陕西发行了十五万册，还要再印……”

我说：“我没看过。不过，像那种文章，过几天人们就扔掉了。没人看！”

这说明我已看过。

他转到刘志丹身上。他说：“对于刘志丹，作为勇敢的战士，当然可以。但是……”他“不过”“但是”地支吾了半天，终于没有说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写出来的要比你说得好。我有我的根据，我有大量材料。尤其是对于刘志丹的描写，我是在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他的战友、同学、亲属所提供的，才动笔。我自会去粗取精，分清真伪，对别有用心的人，我不能听其指挥……”

他慢慢坐下，再未站起，直到我告辞，他都未能站起。大概他在生气。

他那篇文章基本上是“谣言。”在《星火燎原》上发表前，大家都提过意见，他坚持不改，现在又到处发表……

那时我家住在西四丰盛胡同二号。访问阎红彦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在东房办公室里看稿子。接到一封信，是阎红彦派人送来的。上边写着：“李建彤同志：你写的小说，我不同意出版，那段历史中央没有做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

我一想，不对头！昨天下午我见他时，他还未看，难道一夜之间就看完了？他的文化很低，不会看那么快！按时间计算，他绝没有看，只是要阻挡这本书的出版而已。

我一怒之下，提笔在原信上批了几个字：“好跋扈！好武断！难道你写的文章中央都作过结论？刘志丹的结论早已作过，而你的结论恐怕尚未作吧？”

我要把这封信送中宣部。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对方说：“我刚接到阎红彦的电话，他提出，你的书他不同意出版，不同意发表。要我转告你，不要发表吧。”

我说：“我刚接到信，全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管，这件事你不

要管，我自己的事，自己作主！”

“叭！”我把电话挂上了。

何家栋急问：“谁，谁，谁的电话？”

“习仲勋的！”

何家栋说：“咋办？咱们原决定要发一些稿子，我今天就是来问稿子发不发？”

我说：“发！”

欺人太甚，逼得我只有如此！如果向他让步，永远没有尽头。

《工人日报》从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四日，连载了五天。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杜映找我。她坐在沙发上，很久不说话。

我问：“有事么？”

她凄然一笑：“上边来了通知，《刘志丹》的稿子不许再发！”

我说：“又是姓阎的在捣鬼，他到北戴河开会，心也不在会上，天天只查报刊，看有无我的文章发表。你们的领导也是上当了。”

她不敢多说，只闪烁其辞：“我们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你放心……”

《光明日报》从七月二十九日开始，把《渭华起义》载完，即停止。

《中国青年》连载了两期，也已停止。

接《人民文学》来信：

“李建彤同志：您好！作品《终南山暴风雨》，我们本拟在九月号发表，但因临发稿时，听说有关领导同志对此作品还有些意见，我们想再斟酌一番，因此，暂时未能发表。抱歉得很，至希原谅。

具体处理意见，待研究后奉告。

此致

敬礼！

人民文学社 9.10”

《人民日报》的校样《回照金》，存在我手中，再也不敢来取。  
这是康生下了命令，“任何报刊，不得再发表《刘志丹》。”

天津消息迟到，方纪竟派《新港》的编辑来向我索稿，我未敢再给，怕事态向恶境发展，株连他们。我说：“有人提了意见，现在不能给你们，免得给你们找麻烦。”

来说：“我们不怕，领导上说啦，要你写的重要部分。”

我还是坚决不给。后来听说，天津文艺界负责人方纪，“文革”期间被打得很惨，他牵连上几个罪名，我暗暗自慰：我总算保护了你，否则你还得牵上我这条“反党”的线儿。

有一天，出版社的出版部主任周培林匆忙跑来，告诉我：“听说康生有通知，把新、旧两稿各印三百本，送中央。我留下两本，将来供你使用……”

临走，他说：“我再不来了！”

多么忠厚的朋友们！都是冒着危险来的。

一切的一切，都这样倒行逆施的进行着。后来才知道，姓阎的和姓康的诬告我的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恶毒透顶。领导人也够糊涂的，竟然能全部接受。

我定心坐下，翻阅阎红彦文章，提起笔来就写。我要从头到尾地批判他的文章，那文中的重要段落，恰是我小说中的第三部。而我写的是真，他写的是假。作为一位当事人，一位将军，一位中央委员，一位省委书记，竟能够如此伪造历史！

你有权阻挡我的文章发表，我有权批判你的文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找康生，我找中宣部。我是合乎组织手续的。

所谓的两封信，一封是批评阎红彦的为人，他在历史上有错误，还死不承认，以假乱真。

另一封信，就是对他文章的批判。两封信，都是写给中宣部的副

部长周扬和林默涵的，因为他们俩位是分管文艺的。

这里只摘要公布对他文章的批判。

批阎红彦写的《回忆陕甘高原早期的武装斗争》：

这篇文章有两种错误，一是历史事实上的错误；一是路线上是非不清。

事实上的错误如：晋西游击队过黄河，即从黄河东的山西渡到河西的陕北。是游击队长拓宽和政委黄子文带队过来的。原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现全国政协常委）说：是我接待的黄子文，他带来了山西省委的介绍信中介绍了干部情况。干部中就没有介绍阎红彦的。后又接山西转来的信，要黄子文去北平，因为他妻子被捕，又恰遇上生孩子。阎红彦却诬赖黄子文逃跑了，伪造是阎自己带队伍过的黄河。

过河后的队伍只有二十七人，不像阎说的有三十多人。阎文中说的第一次部队整顿，那是整顿他自己，他一路上违法乱纪，战士们提出要开除他，枪毙他（见1945年历史座谈会档）。

至于三嘉塬的整顿，那不是整顿，是阎红彦和谢子长阴谋缴了刘志丹部队的枪，打死了刘部的人，把整个部队解散了，使部队遭到很大损失，这是他们的错误，不是功劳。阎红彦还得意的写到，他送给刘志丹一支手枪。不对！是在三嘉塬他夺了刘志丹的手枪。全体人员都看到的，因为刘志丹不动手，始终让着他们。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为王明“左”倾路线翻案，也是伪造历史。要翻案，必须伪造，两者紧密相连。

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写的是“陕甘游击队”的历史。王明路线的人上台后，陕西省委书记坚决执行王明路线，使军事遭受失败，而阎红彦却混淆黑白。现摘要略说几点：

第一，文章说，游击队一成立，就在“枸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一带，广泛地展开了游击活动，在那里开辟和建立了根据地。”

根据我的调查：翻遍一九三二、三三年省委文件，当时的陕西省委，根本没有这个决定。游击队内部，也没有这样的决定。陕甘游击队是一九三二年二月成立的，当时省委就批示游击队开到渭北平原，开辟“渭北苏区”即三原、富平、高陵苏区。而阎红彦的文章，却掩盖了这个错误的事实。伪造了另几个县。

伪造的那几个县，有的在山区，有的在平原，说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苏区。实际没有这回事。省委没有这样批示过，游击队也没有这样干过。游击队在正宁县的三嘉塬成立，到职田镇的阳坡头打了一仗，就走了，走的方向是渭河北岸的平原地区。从旬邑到三原，要路经耀县边境，边打边走，匆匆而过，两三天就到三原。怎么能说是建立根据地呢？（可查一九三二年春省委的指示和游击队的报告）。

第二，文章说：“在攻克职田镇，阳坡头，马家堡和清水源、四村塬等地之后，都迅速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赤卫队等组织，还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一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抗捐，抗税，没收大土豪的田地，烧毁了地主的契约。把土地、牛羊分给农民群众。广大群众斗志昂扬，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在红军游击队攻山河镇一役中，就有三千多赤卫队员，拿起了红缨枪，包围山河，配合游击队打仗。”

这一段文章有两个问题：

一、文中说的职田镇，阳坡头、马家堡、清水原、四村塬，当时都没住敌人，用不着“攻克”，去就是了。可是游击队并没有进去。因为根据省委的指示，是要急急开往渭北三原一带。游击队没有驻下“组织群众”，也没有“分配土地”，更没有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或什么“革命委员会”。群众工作没有做，怎么能建立政权呢？

一九三二年三月以后，省委曾发过一个指示：

“要建立一区、一乡、一村、一镇的苏维埃政权”并“坚决分配土地”，但这些指示又是互相矛盾的，他不让游击队到山区去，只能

死守三原，游击队只有二三百人，敌人不但有正规军，还有许多民团，随时跟踪，包围游击队。游击队在平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每到一个村，只能住一天，最多也住不了三天，工作无法进行，那些指示就成了空文。游击队曾按省委指示跑到过四村塬，但是不到三天敌人就打来，游击队就得撤，怎么能建立根据地？怎么能给群众分粮食？分牛羊？谁敢要呢？分地更是不可能！

二、“攻山河镇”：也是过“左”行动。“山河镇”是敌人的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县城城墙较高，驻有敌兵，又有碉堡据守。当时游击队仅二、三百人，武器简陋，去山河镇攻坚，实为冒险。一攻再攻，旷日持久，使群众厌战，不愿配合。此仗失败得很惨，游击队伤亡大，群众损失亦重。结果是：总指挥谢子长被撤职。

这种战例不必再吹，那是在王明“左”倾路线下，攻城市，占平原的错误产物。如果三十年前阎红彦糊涂，三十年后不该再懵懂，如果明知故犯，则更是别有用心。

第三，文中的阎氏到三原的辛字区，武字区的活动，更是子虚乌有。

①文章说：“我带五支队到三原县的辛字区，午字区一带活动。这一带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就有了党的组织，农民群众斗争基础较好。我去后，随即组织了雇工会，贫农会，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建立了‘渭北游击队’及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还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这是个弥天大谎！

三原辛字区，武字区的老干部说：“三原辛字区、武字区的各种群众组织早就有，不是什么姓阎的来后才建立的。一九三〇年前后，这里就有各种群众组织和武装组织。有“灾民自救军”，规模很大，是黄子文领导的。“九·一八”后，又成立“反日会”。一九三二年农



历八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三年才正式建立起“渭北游击队”，都归黄子祥领导。而姓阎的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底四月初来的，几天就走了。”按时间说，阎红彦两头不沾边儿，这些都不是他建立的。（关于这里的革命活动，有三原县的文件为证）

文章为何如此写法？无非是要歪曲历史。阎氏那次去三原县，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省委书记把他调去的。

②文章中的绝技是：先把阎氏提一下，然后把许多事件的时间、地点、写成一笔糊涂账，用以假乱真的办法，混水摸鱼，把有用的东西，都搂过去，算在自己账上。

文中还说：“阎氏在辛、午两区，领导农民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游击队也很快发展到成为一千余人的队伍。”

有人开玩笑地问：“老阎，你带的队伍到底发展了没有？去时一、二百人，回来怎么又少了呢？”

从档案中查到：三原的辛、武两区，一九三三年以前，根本未分土地，那时，省委指示中，有分配土地的任务，而根本不能执行。因为敌人常来“围剿”。省委曾骂那里的领导是“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因为没有分土地。当地的群众又骂省委书记是“日弄主义”，所谓“日弄”，就“愚弄”的意思，因为土地不能分，分不了。那里是平原，距三原城很近，敌人常来常往，谁说那时能分土地，全是痴人说梦。

关于游击队，文章说：在三原辛、午两区，“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千余人的队伍。”

这是指的哪个游击队？

如果是“渭北游击队？”那是一九三三春成立。阎氏是一九三二年去的，对不上茬。

如是指“陕甘游击队”，也差之千里。因为盲目攻山河镇后，部

队仅余二百余人，阎氏带的只是二分之一。跑一趟三原回来，并不见增加，哪来一千余人。

五月，刘志丹带游击队进军韩城。途中作战曾有增加至千余人。不久因阎氏值勤失职，遭敌袭击，则降至四五百人。韩城之战后，又减员，这是“左”倾路线造成的结果。

③文章说：“尽管三原城里住着不少白军，我们周围的敌人有好几个团，但由于群众封锁消息，豪绅地主慑于群众压力，不敢进城向敌人告密和求救，敌人根本不知道。”

真实情况是：阎氏去三原，是省委书记指使，书记亦在三原午字区，亲自促战。攻三原县城，引来了敌人，三原群众为此遭难。因此省委干部及当地干部皆很不满。

摘材料于下：

▲三原的党员干部写材料说：“一九三二年春，省委派杜衡来工作，将“反日会”改为“农民联合会”，在午字区发动了分粮斗争，引起伪政府土豪劣绅注意。三月七日，三原伪民团李养民带团队向午字区进攻，午字区群众有七十多人被杀。”

阎氏他们把这个塬上积蓄的革命力量，完全暴露给了敌人。

▲一九三二年，省委文件中提到省委书记在三原的错误时说：“以杜衡同志的意见为中心，决定攻取三原，这是：①对敌统治力量作错误的估计。认为敌人的军队不能很快开到三原。②对我们游击队力量作了“左”的估计。”

可见阎氏思想之顽固，三十年前被批判了的行动，三十年后又作为“功劳”宣扬。他要为杜衡翻案，硬说他们在三原的行动“正确。”

第四，阎说：“把敌人拖到外线后，我们的两个支队又在枸邑县职田镇一带汇合了。开辟了以枸邑县为中心的三原、宣君、合水、庆阳、正宁、淳化、洛川中部（即黄陵）、保安一带苏区，大力发展游

击战争。”

试问：那时哪里来的“内线”、“外线”？游击队成立刚两个月，还未建立起根据地，连游击区尚未成熟，何地是内线？何地又是外线？

再数一数所指县名，有十个县之多。游击队成立两个月，才二、三百人，就打下十个县的苏区？难道一开战就比井冈山发展得还快？

据调查：此时此地，连一个乡，一个村的苏区也没有。竟敢伪造出十个县。当地的农民也可作证。毛泽东主席曾说：“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下列条件：①有很好的群众；②有很好的党；③有相当力量的红军；④有便于作战的地势；⑤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当时陕甘游击队不具备这五个条件：①游击队刚成立两个来月；群众工作还没有做；②省委执行王明路线，派来的政委也执行王明路线，带着军队在平原上乱跑，只想打城市，又打不进去；③在平原作战，地势不利；④没有正规军，游击队的力量太小，仅三百人左右；⑤经济力量太差，打下来就吃，打不下来就饿着。

就这样的条件，两个月能建立十个县的苏区？

再看这十个县的面积，距离，前后左右有几千里路，靠一支三、四百人的游击队，能解决问题吗？就是敌人不打你，欢迎你去，一个月也占领不完。那时没汽车，只靠两条腿走路。

那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是正遇上敌人八个团来“围剿”，三、五支队会合后，即向宜君、中部，洛川绕路，到黄龙山，韩城去游击。部队是一边打仗，一边转移。沿路经过宜君、中部、洛川，每地只住一夜。怎能一夜之间产生大块根据地？至于合水、庆阳、保安等县，那时根本还未去过。难道脑子一想，就冒出来一块根据地？

查省委档案，一九三二年连一个县的根据地也没有。到一九三三

年，换了省委书记，才在耀县的山区照金，建了一个小苏区，可那时，阎氏等早已不在陕西了。

这篇文章如此写法，是何用意？无非是想说：陕甘根据地是他用两个月打出来的，不是一九三三秋后经过千辛万苦创建的。想贪天之功为已有。

阎氏可曾想到，脚板到过的地方，并不是根据地，脚板没到过的地方，更不是。毛泽东都不曾说过，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全变成了根据地。

我不是冤枉他，他文章中还说：“从此，陕北红军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为后来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的扩大，打下了基础。”

在关中搞了两个月的游击战，和陕北能沾上边儿吗？陕北的红军离阎氏远得很，是后来创建的。

阎氏曾说：“什么路线不路线，都是瞎干。”他还明目张胆地说：“对于王明路线，也要两点论，陕北苏区就是郭洪涛用王明路线创建起来的。”

这就是阎氏的真面目。他否定了千百万红军战士和革命干部，对错误路线进行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后，有人告诉我：你批评阎的文章，送到中宣部，在康生闹得最紧张的时候，中宣部拿了出来，印发给八届十中全会。本来正批《刘志丹》小说，这个材料一发，激起一场风波，有人说：“既然双方有意见，还是下去解决后再说吧！”

阎氏见我揭了老底儿，他有点心虚，声明说：“那文章不是我写的，是我的秘书写的。”

有人议论：“秘书能作主发表吗？”

康生要包庇一方，打击一方。他说：“这两封信，不可能是李建彤写的，她是个年轻人，怎能知道这么多事？这两封信，不是西北局

书记，就写不出来。我看，这两封信是习仲勋写的！”

康生真是恶毒之极，把我写的信栽在习仲勋身上。从此阎被包庇，习仲勋就背上了黑锅，撤掉了他的副总理职务，被康生他们立案斗争，审查。

我怎么能想到，我写的信又栽到习仲勋的头上。

这一切说明，是能不能写历史上“左”倾造成的灾难，并不是小说中写不写高岗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 十八 一顿陕北饭引起的后患

近日来，为吃“陕北饭”问题，已有几个项目组来提审过我。

在陕北时，陕北人把好吃的送给别人吃用，或者请人到家来吃饭，都认为是对别人的尊重，照顾、关心。陕北人热情好客，是当地的乡风。特别是对待外来的干部，长征来的或从其它地区来延安学习的人、工作的人，都是这种感情。自从高岗问题发生之后，有人借此要把陕北干部搞臭，谁在陕北人家里吃顿饭，就要受到侦察，调查，没完没了。如果是陕北人一块吃顿家常饭，简直是大有篡党篡国之嫌。

陕北一大批干部，在一起战斗过，一起坐过牢，挨过打，他们的血是流在一起的，他们都是真正的亲密战友。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时，陕北人见了面很亲热，景范就约了几个老乡到家吃了顿养面条，就惹下了不小的后患。

那时来吃饭的人不是一次来的，而是陆续来的。我们住在丰盛胡同二号，北房很大，可以吃饭，吃罢饭就到东房客厅聊天。

那时的东房，又是我的办公室，我就在那里写作。桌上放着些数据和稿纸，也有印出的《刘志丹》稿件。因为皮上写有《刘志丹》字样，他们就问几句。我说：“我正写，还没有写完。”有人摸了摸书皮，有人扫了一眼书皮，就打扑克去了。

就这样一闪即过的事情，竟被他们认为是件了不得的事，认为凡是来吃过饭的人，都参加了写小说《刘志丹》，都是阴谋家。

就拿宁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说吧。当一九六二年夏天北京正在开八届十中全会时，康生和阎红彦正对《小说》发难，各省来的人都在议论，有的人不以为然，有的人兴趣很大。在西北各省的驻京办事处，驻有宁夏自治区的第三书记李景林，还有尤香斋，还有些一九三五年在陕北执行“左”倾路线的人。他们手上都染着人民的鲜血。这些人在几十年后还握有一部分权利，成堆结伙，他们有后台老板。他们碰见罗成德就问：“你看没看过《刘志丹》小说？”

罗成德顺便答道：“看见过。”

这个老实人，他只见过一张封面，就不加思索地说他见过“小说”。于是李景林和尤香斋就向罗成德开了火：“交代！现在中央正批判《刘志丹》小说，你们是怎么密谋的？你们要写什么？是怎样为高岗翻案的？”

罗成德不知内情，被唬懵了。也不知说什么好。

李景林、尤香斋和阎红彦，有康生的大力支持，他们听说罗成德到我家吃过饭，早就盯上了。

就这么一点小事，罗成德在北京被李景林他们斗了几天，回到宁夏之后又斗，然后就被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成员，发配到中央党校学习（有中央组织部八处的大字报为证）。一九六五年从中央党校“毕业”，贬到河北省。“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揪来揪去，揪到北京，揪到河北、山西，轮转着斗争。

河北省某大学到我家“外调”，我说：“罗成德没有提供过材料，也没有看过稿子，就看见一张书皮，能定什么罪？”

学生们说：“罗成德自己可是认了帐的，他说看过《刘志丹》。”

我真替他着急：“他看见过内容么？我写了什么，他知道吗？”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七年，他已经为“一扫书皮”挨了五年整，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他挨整的实质，就是因为他在陕北时，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追随者。

这几天，原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专案、原甘肃省委副省长张鹏图专案、原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项目、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项目，都来“提审”、“外调”、还是为在我家吃的那顿“陕北养面”。

我只得一遍遍接受这些项目的审讯，为每个人讲清楚：

毛应时，陕西省志丹县人，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工作过，那时，刘景范任民政厅长。“七千人大会时”毛应时到我家吃过一顿饭，这顿饭吃的是陕北养面。我家的炊事员不会做养面，刘景范只得去帮厨，客人们在打扑克。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的恶果正在起作用，人们都在愁楚，忽见《人民日报》上登着“陕北丰收了！”大家喜笑颜开，谈论家乡。

我未向毛应时采访过，他也未看过小说稿子。

王耀华，同样是志丹县人。我未采访过他，他更没看过稿子。仅仅在我家吃过一顿饭。

这些提审人走后，值班人叹了口气：“你的家真麻烦，老乡在你家吃顿饭，现在还得交代，怎么得了！”

又记起，我曾跟着人群跑到中央组织部看大字报，有一张是中央组织部八处贴的，明是揭发，实是编造，他们说有个“西北反党集团”。名单中公布了二、三十人。都是一九六三年从西北五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省级干部。送党校学习，也成了处罚人的办法。那些被调来“学习”的人的罪名，都是因为“反党小说”而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可那些人中，许多我不认识，既没见过面，也没采访过。这是按什么标准定的反党成员？是用“反党小说”为借口，把他们从各省的领导岗位上拉下来，换上去他们“自己人”，这就是政治手腕。

## 十九 审查创作经费

今天又审我，主要是经费问题。

从一九六二年到现在，已经六个年头了，对我用来写作所用的经费，竟弄不出个结果。

一九六二年“三堂会审”时，他们就提出：写这么大题材的东西，要调查研究，要出差。人来客去，要吃、要喝，需要钱，哪来的经费？

刘志丹是英雄人物，他是个单独作战，艰苦创业的人物，是中国最后一块根据地的最主要的开拓者、坚持者。如果国家组织人员去写他，至少要组织三、五个人，调查他三年五载，逛山逛水走遍全中国，车船旅费，要化国家多少钱？可是我写这本书没用国家一分钱。项目委员会却到处查账，查我的机关，查景范的机关，看有没有我报销费用的单据。

查不出，他们打开了想象的翅膀，从中国怀疑到外国。

去年传来很多消息：国务院的机关工作人员批判副秘书长高登榜。因为他是陕北干部，又担任国务院的管财务的副秘书长。康生他们就把副秘书长高登榜和副总理习仲勋联在一起，推理出国务院副秘书长当了我的“后勤部长”，供应了我大批经费，叫我写《刘志丹》，以便篡党篡国。被康生推想为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行动，一个无限大的阴谋。

中央项目委员会善于怀疑，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查账，开斗争会。好大的声势。

有人还提出个具体数字，说副秘书长支持我二十万元人民币。又有人说：“二十万的数目，是要总理批件，也没有这项提款。”就成了莫名其妙的大案。

其实，我写小说时高登榜副秘书长不知道。他管的是国家大事，我干么去麻烦他。



况且，他是个忠厚老实、埋头苦干、光明磊落的人。哪能偷偷摸摸供应我经费呢。说实在话，如果有哪位领导人想得周到一点，国家是应当供应我经费的。可惜，谁也没想到，我只得耗尽了自家里的生活费，还借了外债。即使是这样，我连广东也没敢去。没有看看当年刘志丹活动过的《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一牵连，我才真正感到有罪恶，并不是我写的书中有什么罪恶，而是我不了解那些所谓领导人的品德和为人，我一味直闯，给恶人以借口，去迫害好人。

康生的大批人马，在国务院没查出证据，就想到外国，要跑到赫鲁晓夫那里调查。那时候中国的领导是非常讨厌赫鲁晓夫的。

安子文他们批斗刘景苑时，就说：“你们哪里来的经费？是不是赫鲁晓夫支援了你们？老实说，习仲勋是里通外国的！”

真是些政治流氓！竟然制造出赫鲁晓夫供应经费的谣言，来诬陷习仲勋“里通外国”。从前，鲁迅先生曾被反动派诬为收了苏联的卢布。现在，我也成为被卢布收卖的人。不过，他们还没编出，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支持我写《刘志丹》，那卢布又是怎样飞到我手里来的。

他们有的是人力物力，可以跑遍全中国，也可以跑遍外国，为这件事，可以周游世界。他们到处跑外调所用的经费，能超出我写书用费的百倍、千倍。他们不会心疼，他们用的是国库。

我自己出经费，谁能真正理解，我为什么要写《刘志丹》。

从事情本身说，是《工人出版社》约我写的。但是，如果没有出版社约我，我也一定要写出来。不过，动笔的时间要晚二十多年，是等我离休之后。

他们想象不到中国会有这样的傻瓜，别人不敢写的东西自己要去写，别人不敢碰的题材自己要去碰，最曲折的道路硬要去走。

在延安时，土地革命时的人基本全在，谁都可以闯进那段历史的

世界，走进那些人物的心灵，探索其中的奥妙。可谁也没敢往深处走，太费事，太头痛，太危险！

为什么那样可怕？是因为迫害过刘志丹的人，大都仍是身居高位，手中操着权力，他们可以从背后捣鬼。全国解放之后，迫害过刘志丹的人还在中央。谁要是写刘志丹，谁就会成为他们的靶子，身披枷锁。除非写作人屈从恶势力，把真实的，尖端的事件隐去。作个“屈从文人”。

我喜欢刘志丹这个人物，我没有见过他。当我走进陕甘宁边区时，他已牺牲了两年。未见其人，只闻其事，那时我还不懂得去注意这个世界。

那是一九三九年春，我在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学习时，第一次听到讲党史课。我被吸引住了。讲课的老师是大革命时的干部。参加过省港罢工，名叫王德。他讲的路线斗争，是那么生动，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革命，“左”倾机会主义又几乎使整个革命覆灭。红军被迫从南方转移到北方，这些红军内部的投机分子造成：常胜将军可以随便被拉去杀头；敢说真话、埋头苦干的人吃亏，投机取巧、夸夸其谈、的人青云直上……

在我年轻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机会主义的憎恨、特别是对“左”倾机会主义的仇恨。总觉得“常胜将军被杀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然，这只是理性知识，自己没有身临其境。

到一九四三年，康生在延安发动的“抢救运动”，波及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却使我身临其境了。我在内心对照了一下，几乎每个作法都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比如：谁给领导提了意见，谁就是“反党”，被斗争、拷打，甚至致死。究竟谁是党？我弄不清。

对那些整人的人，我简直是疾恶如仇。为在队伍中藏着那些坏人而忧虑。我苦闷，我徘徊，我感到意外。因为在参加革命之前没有这

种思想准备，没有想到党内的种种怪现象。正因我的幼稚，把每个革命者都看成一张白纸，认为这队伍永远是光辉灿烂，连个黑点儿、黑影也没有。正因为幼稚，我内心藏着一腔要向真正的革命者倾诉的衷情。可是，在那些年代，我没有找到。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些介绍刘志丹事迹的文章，他是那么坚强，那么有胆有识，那么光明磊落，那么无私。然而，他受迫害，受屈辱，经受过难于忍受的折磨，在折磨中还要为真理而斗争。他挺过来了，又献出了生命。对于他，我像找到了知己。我可以向他倾诉，也为他倾诉。我要告诉人们，这个革命组织里有多种多样的人。有真、善、美和假、丑、恶之分。那时我自己就给自己立下誓言：我一定要把《刘志丹》写出来。

现在我既然写了，我就要坚持到底，谁用什么言词批判，用什么方法打我，都不能使我回头，我不能向恶势力低头认罪。

康生这一帮人，把我这个为写书而倾家荡产的人，诬陷为苏联卢布收买的人，甚至诬蔑为被美元收买了的人。就是连刘志丹本人，也被他们出卖了。

## 二十 高锦纯、王兆相、朱理治、王恩惠案

这几天，“提审者”又跑破了门。

他们把高锦纯、王兆相、朱理治、高锦纯等的事情都擦在一块儿了。

让我一个一个地打发他们：

他们可能是华北地区的项目人员。问道：“你对朱理治的看法从何而来？”

我的答复很干脆：“从《毛选》而来。请查看《毛选》第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注释第十条。那也是对陕北历史问题的结

论。”

提审人说：“中央首长已经宣布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取消，因为里边有刘少奇问题。”

我问：“哪位首长？那文章是中央的决议，不是随便那个人就能否定的，要修改也得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你们应请示中央，是否经过了政治局？即便是现在要修改个别问题，也取消不了整个决议。请问关于陕北问题，中央修改了么？只要没有修改，我对朱理治还可那样写。因为他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这错误和中央的那个路线连系着的，只要中央还承认遵义会议的作用，只要承认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猖獗时代，只要承认那是应该否定的时代，我对朱理治这个人物的看法就没有错。按照中央的说法，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执行者。

提审者问：“只根据一条注释，你就写出一个人物？”

当然不仅仅是一条注释。还有这个人物的档案，有别人提供的情况。他自己的检讨也叙述了他的历史和错误。当时我认为他的检讨比较好，敞开了一些问题，比郭洪涛好得多。所以，我写小说时，对这个人有所照顾只把他写成知识分子中的书呆子。犯错误他也只是思想问题，不是品德问题。一旦他明白了，便幡然悔改。我是依我的看法写的，不受别人的干扰和控制。至于细节，也由我决定，这是写作者的权利。

是的，只有朱理治我没有采访过。没观察他的风貌言谈。只是凭着文字材料。如果见了他，也许是另一种印象。就像我访问过聂鸿钧一样，感到他很诚恳。虽然“左”倾机会主义者，把西北军委主席的职务从刘志丹身上拿下来，送给了他。提起这事，他是那样的愧悔不已，永生引为教训。这就使我把反面人物的形象一扫而光。所以，我的书中就没有了他的影子。我要保护他，说真话的人，应当受到保护，

要区别对待。同样犯过错误，认错者和不认错者，要受到不同的对待。

内蒙的项目人员，要我供出高锦纯和小说的关系。

康生他们的手伸到了内蒙。

记得清清楚楚，我访问高锦纯是在北京的粮食部宿舍，他是粮食部副部长。由别人介绍，我登门访问他。是我和《工人出版社》的王勉思同去的。高锦纯是红二十六军骑兵团老团长，朴素，热情。他谈了红二十六军南下，省委的“左”倾路线对红军的摧残，对刘志丹的排挤，观点都很明确。正因为这样，康生绝不能饶他。

高锦纯什么时候去的内蒙？我不知道，大概是被贬下去的。那些年代，遇上西北干部就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西北干部被一个个打下去，贬了职。比如对甘肃的黄罗斌，内务部的王子宜。

我估计，这是康生他们整个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又有人来提审了。我抬眼一看，认识。他们是湖南长沙测绘学院的。要从我嘴里掏他们的政委王兆相的材料。去年我关在地质学院时，他们已经来过两次，那两次是两个派别的人，从态度看，一派的态度好些，一派的态度很坏。很坏的那一派头子，是个穿白衬衫的大高个子，长方脸，拍桌子瞪眼，肯定说王兆相跟我谈过高岗的材料，要为高岗翻案。我说：“那是无稽之谈。我调查红二十八军东征的情况，怎么能谈到高岗呢？高岗又不在二十八军。”我把他们顶了回去；另一派的头子是个矮个儿，圆脸，有四十来岁，心平气和地问话。今天来的是这个矮个儿，还带着两个人，没想到，他们也转了向，非要说王兆相谈过高岗。

我说：“去年就对你们说过了，王兆相没有谈过高岗。”

那人说：“你不老实！”

苏州姑娘是陪审官，她在一旁拍起桌子：“老实点儿，顽固没你的好下场！”我抬眼一看，她可真凶，黑眉毛都立了起来。和她的外

形完全不相称。这是造反练出来的习惯。

我也火了：“叫我胡说，没门儿，谁拍桌子也没用！”那个矮个子平静下来：“你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就照实说吧！”

原来那矮个子是先来咋呼，看我怕不怕。我也缓和下来，一五一十又将去年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是王兆相怎么参加的红军，怎么南下终南山，怎么回到神府闹革命，成立红三团，又怎么配合红二十八军东征。

我讲完后，苏州姑娘说：“你会背小说呀，这不都是你书中写的么？”

“我干的是这种事，采访的是这些，写的也是这些，没有特殊东西。”

矮个子叫我再写一遍。我想，去年不是写过了吗？大概是他们听说我们都被关押起来，定能出奇制胜，赶忙跑来再逼一逼，看有没有油水，免得另一派把材料抢去，自己变得被动。我答应写，按照看管者的规定，我应写两份，一份给外审单位，一份留本单位。他们也要趁机掌握我的全部情况。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没写上。凭我了解的写。

王兆相可不是个普通的团长，他虽是红二十七军的红三团团长，他可是个单独开辟了神府苏区的军事首领。这个军事首领的家中还有几个烈士。他的父亲，是因为杀了叛徒，而在“肃反”时，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杀害的。他自己也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撤职几次，他搞胜利了，就被撤职；“左”倾失败了，又叫他复职；军队一有起色，又要撤他的职。他为革命立了功，也吃尽了苦。

1936年红军东征时，刘志丹到了神府。群众对志丹的那个热情啊，多少话也说不尽。还编了许多的歌。比如他们唱着：“一杆杆红旗，一把把号，咱们的老刘啊，你可来了。”这都是王兆相说的材料。

天津来人追问神府苏区的情况。材料从哪里来？我很反感，有什么可追问的。他们是怕我写出神府苏区死人太多，杀人太荒唐吧？

他们绕着圈子追问，原来是要在王恩惠身上打主意。我的答复很简单：“我没访问过他，他没有提供过材料。”

“你认得他么？怎么认得的？”

“是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认识的。他是边区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凡是项目人员，问哪个人的情况，还要问他们和习仲勋有什么关系？

我怎能一切都知。都是西北干部，有历史关系，工作关系，这有什么可问的。我只得回答：“去问他们本人吧。”

这句话是要得罪人的。无非是惹得他们狂吼一阵。

## 二十一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引起的深思

这几天，情绪烦乱。外边也乱糟糟的，特别是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天（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有些值班人员故意说话给我听：

“又一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陕西是个重要地方。”

这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配合文章，题目是《砸烂高岗的功德碑》。

有人用念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批判我。无的放矢地念道：“一九三五年以前，高岗在陕北究竟走的什么路？历史的本来面目是，高岗在陕北执行的根本不是正确路线，而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单纯地依靠在敌军内部搞秘密活动和“策动兵变”来扩大队伍，很少发动和武装群众。根本不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东奔西闯，搞流寇主义。高岗走的这条路，使陕北面临着严重危机。是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根本上挽救了陕北根据地……”

“他们不是全面宣传毛主席如何领导陕甘宁军民创建根据地，如何粉碎第三次“围剿”的英雄业绩，而是篡改历史，颠倒黑白……”

我听说现在中央领导人是天天必读《人民日报》的，对这种文章，不知中央领导人如何看待？

为什么不敢去科学的研究历史？目前是用阎红彦为康生提供的邪说来歪曲陕甘和陕北的历史。这种歪曲使人感到既丑恶又愚昧。搞兵运工作，组织起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吗？“八四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搞过多次起义，难道都是“左”倾路线？怎能脱离那个时代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瞎议论呢？倘若只搞起义，不建立红军，不打敌人，怎能建立起根据地？去查查历史，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那里是否已经有三十几个县的根据地，有两个正规军：即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三十几个县都建立了政权；还有游击队。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这么大的根据地，难道不要人去领导，去工作，去打仗，去做群众工作？究竟都是谁去干的？谁出的力？执行的什么路线？从《毛选》中可以找出首领的名字。

更有甚者，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批判《红河激浪》的文章中，竟然明目张胆地提出：“所谓‘南梁’就是反党头子高岗窃取红二十六军政委时活动的中心。”“他们把高岗盘踞的南梁地区与毛主席创建的中央苏区相提并论。”

我要质问：“南梁住的是高岗的一个人么？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就是一个高岗么？”这不是否定一个高岗，是否定整个陕甘苏区。

应当指出：把红军住的地方叫做“盘踞”，是白军的口气。现在的《人民日报》被造反派接管了，登文章就是这个水平，这说明造反派接管《人民日报》后的结果，证明反动派掌握了舆论工具。

## 二十二 刘景范被逮捕



早上起来，要去打饭，一出木笼，看见左墙上贴了张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

右边靠窗的墙上贴了一张：“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还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一看就明白，彻头彻尾把我当成了敌人。不过，头一张可是写颠倒了。我如不给他们指出来，写标语的人和贴标语的人，都得被打成“反革命”。

今是来值班的是一男一女，不管是不是他们亲手干的，我都得告诉他们，我说：“喂！这语录写错了！”我指着头一张。应当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那个男的连忙说：“是是是，对对对！错了，错了！”

他快手快脚的把那张标语撕掉，重新又写了一张。

上午，又是外地的项目组，来和我吵闹了半天。中午，值班人员押着我去吃饭。到院子一看，满院贴的是刘景范的大字报：

“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景范，好得很！”

“刘景范攻击无产批级司令部，罪该万死！”

食堂门口贴的是：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景范被逮捕！”

虽然看见了这么震惊的标语，如雷轰顶的消息，我还是尽量沉住气，镇静下来，不要使自己晕倒、使敌人高兴。

我不动声色，从大标语前低下头走过去，打了饭，拿回我的小木笼里，一口一口地吃下去，又出来洗了碗。让值班人员看见，我还是把饭吃完了，我仍然吃得下。这时的值班人，是两位政工干部，我明知他们在察言观色，我只装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

就在这天下午，项目组把我押到楼上提审，那些人员，除原来的

徐州人、广西人、青海人、浙江人之外，还有个穿军衣的。

他们围住我，空气是那么紧张。都是横眉立目的。我心想，不要制造紧张空气，我什么也不怕，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又逮捕了一次么。一月八号，他没戴手铐，是送到卫戍区的，这次戴上手铐、脚镣、送进监狱，不就是这么回事么，有什么了不起。我脑中明白如镜：历代国家首领，取得政权以后，无不如此。我们的首领到底也没能脱俗。

徐州人先问：“你看了刘景范的大标语，有什么想法？”

我慢慢地说：“很好嘛！”

穿军衣地问：“什么，很好？为什么你认为很好？”

我还是慢慢地说：“我觉得陕北人，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什么角色也得演。土地革命时，他们演的角色是打倒反动派，从反动派手里夺得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演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他们又得去打顽固派；如今，他们却得唱甩发戏了！”

穿军衣的问：“什么叫甩发戏？”

我说：“你没看见旧戏上唱的，凡是犯了罪的人，都得脱掉莽袍，摘掉乌纱、甩着长发、脖子戴枷锁，脚手上镣铐，在舞台上甩发，翻打。一般这种角色都是忠臣良将，被诬陷冤屈。如今，舞台上唱这种角色的是陕北干部。除了刘景范，其它人也一样。时代变了，陕北人就唱这种角色了。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谁让他们曾有一块根据地呢？”

“你，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事论事，我就是这样看的，难道他们从前不曾革命过？”

空气仍很紧张。他们互相对视，可对于我，他们也无辞可对，最多说我“反动”。已经反动了，就反动到底吧，究竟是谁“反动”，以后再算账。

有人冒出一句：“刘景范攻击毛主席，难道不该逮捕他？”

我说：“他当然不该攻击毛主席。从前他可不是这样，凡是毛主席说的话，他一定听。现在，也许变了。不过，我不相信他攻击毛主席！”

“你不相信党？”

我心里说：谁知你们是哪个党？这话我可没说出口，只有沉默。

又把我送回木笼。值班人员看得更勤，原定是十分钟作一次记录，今天可能五分钟看一次，记一次了。

我坐在木笼里沉思：

是的，景范在唱“甩发戏”，习仲勋、马文瑞呢？是否也在唱“甩发戏”。据说，贾拓夫那样的老实人，已经被他们整死。马文瑞是和我们同一天抓走的，这是他们布置的统一行动。习仲勋早已被他们揪到外地，这也是康生使的一条计谋，暗中指使学生把他从洛阳揪到西安，是否已回北京，不得而知，我暗暗地骂道：

自己人杀自己人，是犯罪！我这个河南人，要为陕北干部鸣不平。陕北干部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他们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们受用，保护你们的安全，把你们奉为老师、领导、伟人。可谁知你们，用心却这么狠毒，全国一解放，政权刚巩固，就设了多少圈套，耍了多少伎俩，千方百计的打他们，只要是陕甘宁的，沾着陕甘根据地的边的干部，就挨打。没罪也得有罪，甚至捏造假罪。

我冤枉你们么？不，我有根据，且不说为我这本书，整了不知几万人。在这以前，又何偿不是钻空子打击陕北干部。你们要消灭陕甘、陕北干部（除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外）。例如：

前边提到的那个黄罗斌，是原陕甘红二十六军老三团的政委，解放后是省级干部，曾在甘肃白银厂当厂长。从北京去了一个“大人物”，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回来写了个报告，罗列黄罗斌种种罪状，结果是黄被打进深渊。告发人的人，一时成为“调查研究”，“坚持原则”的

红人，就是因为他打倒了一个陕北干部，越级提拔。知情人说，那些“罪状”全是捏造的，而且凡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事，全是告状者本人所为。他却反咬一口，陷害忠良，那案子至今是个黑洞。

又如，原内务部的副部长王子宜，是刘志丹的老战友，于一九五九年被贬职下放。事情的起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时，内务部没有“右倾”，领导人就找王子宜的麻烦。说王子宜反对正部长谢老，谢觉哉根本不承认，他们硬要写上。用这么个糊里胡涂的案子，还捏造了个“反党集团”借此打倒一批干部，把王子宜轰出北京，下放到河南工厂任副厂长。

（注：黄罗斌案，王子宜案，均在打倒“四人帮”后解决，属于冤案。）

若干年以后的情况最有意思。打人的首领钱英问“反党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岳局长：“你是哪里人？”

岳答：“我是上海人，和你一样，抗战后去延安的。”

钱瑛说：“哦！原来你是上海人，我还以为你是陕北人呢！”

当时作为内务部局长的岳嵩，就这样糊里胡涂的当了“反党分子”。可见，他们专门消灭陕北人。把这些人打倒，就消灭了一段历史。当时他们不仅仅打陕北干部，别处的干部，只要不是他们“自己人”的，也照样挨打，只看对他们有利无利。

我又在推想景范：他为什么攻击毛泽东，难道他气糊涂了？不可能，他不会。平常提起毛泽东，他比我忠得多，就是因为毛泽东挽救过陕北的危局，1935年把他们从瓦窑堡监狱里放了出来，他永生不忘。比如关于小说这个案子，我说：“这是胡整！完全错了！”

他说：“什么也不要说了，只要是毛主席说了话，咱们就照办，就检讨。照顾党的威信，咱们个人算不了什么。”

凭他平日的表现，他决不会攻击毛泽东，定是骂了哪个可恶的坏

人，他们不好公布，只公布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或者说“攻击毛主席”。又是以假乱真，把景范骂的真正坏人掩盖了起来。

现在的战略布署可是发展了。不只打陕甘、陕北干部，把各个“山头”的干部全打倒了。

先打彭德怀，是给长征干部看的。

打贺龙，是要肃清二方面军的影响。

打陈毅，是消除新四军的影响。

打倒刘少奇，彭真这些人，是要削弱华北地区的势力，以免失控。

.....

总之，打倒一个人，就砍掉一大片，扫荡光了，才好重新建立新的势力。就像鲁迅说的，无功受禄者，讨债者也。历代如此。

### 二十三 高朗亭专案赵连璧之死

走进一男一女，男的约有五十岁，鬓发已白，武装整齐，穿着发亮的皮鞋。

那女的，有三十几岁，军人装束，夹着皮包，像是秘书。在军队上，带秘书外出办事的人，应该是“将军”。可是，什么人的问题，值得“将军”出面提审？若真是将军，恐怕不会自己出来办案。

我拉出方凳坐在木笼门口。那位将军坐在靠背椅子上拿腔弄势的。女人军帽下压着长发，也摆开架势，展开本子，伏在桌子上，要做记录。

男的开头就问：“你的小说中为什么写了高朗亭？”

听这句话，我已明白，这人是“高等军事学院”的，他问的高朗亭，原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我曾去向他采访。高朗亭是个陕北老红军。他曾告诉我：他的命，是刘志丹救的，一九三五年春，陕北的“左”倾机会主义头子要杀他，被刘志丹强行拦住了。那时，“左”

倾机会主义者的军队尚未到，手中还无军权，不敢太猖狂。

高朗亭本人，全国解放后也是将军，是个很有特点的人物。我的小说中是用了他的材料，那是在第三稿的草稿中，不是以后的新稿上，以后的稿子只写到一九三三年，那时刘志丹尚未见到高朗亭，还用不上他的材料。由此可见，康生领导的项目组，已将不发表的废稿也传遍了全国。

本来，自景范被捕之事发生后，我随时准备自己的问题升级，戴上脚镣手铐也在所不惜。这几天，他们没有动手，估计是想在这里留个“舌头”，所有的人都是我去采访的，书是我写的，不留这个“舌头”案子进展不下去。目前，是要把全国被牵进的项目都引来北京，从我嘴里得到材料。而我呢，已下决心，决不为康生当“舌头”，我要为受冤的人当反驳的“利剑”。

“高朗亭为什么不可以写？”

“将军”动了怒：“你可知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陕北的老红军，没有人否认过，难道你们现在否认了？”

“将军”训斥道：“你可知他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我故意漫不经心：“只要参加革命，怎么来的都可以。不管从家中逃跑的，还是从敌方开小差的，我们都欢迎！”

“将军”跺起脚：“他家是地主，他老子被民团杀了，他要为老子报仇，就拿起抢去打民团！”

我反问一句：“他算不算参加革命？只要他拿起抢，打的是反动派，我们都应当欢迎，视为自己人。不要忘记，他是学生出身，那时他已是共青团员，难道不许他革命？”

“将军”再说一遍：“他是为他的地主老子报仇！”

我说：“正好，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增加我们的力量，岂不更好？”

“将军”气得直骂我：“你是什么思想？怎么能同情地主的儿子？反动透顶！”

我也不客气了：“看样子，你是个老军人，难道就不懂得统一战线？敌人打他，我们就可以拉他。你没有看过《水浒》，梁山上的人打了大名府，拉出‘卢员外’，上了梁山，共谋大事。这种事，古人能干，我们也能干。请你好好学学中国历史，吃透战略策略。这是基本常识……还有，你再看看《三国》诸葛亮对孟获是七擒七放，是为了使用他。毛主席不是教导过，要古为今用么？”

“将军”恼羞成怒，转移了话题：“你书中都写了些什么？连个土匪赵连壁都写了进去！”

我一眼盯死他：“什么？赵连壁是土匪？他抢过你家么？为什么叫他土匪？他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投降白军，为什么叫他土匪？这是听的那家谣言？”

他和我吵起来：“他行军带着老婆，影响很坏！”

我不让步：“把老婆带上就是土匪，把老婆放在家里就是正规军？试问：日本投降后，咱们向东北进军时，你们没有带老婆？”

他没有答话。

我又接着说：“告诉你，赵连壁是雇工出身，娶不起老婆，二十八岁才娶个寡妇，他没有家，把老婆放在哪里？那时都是白区。有些人，家庭生活富裕，比如那个姓阎的，他有个当土匪的哥哥，就有钱给他娶个老婆放在家。阎出门在外再娶一个。还有阎红彦最崇拜的那位谢子长，也有个当民团团总的哥哥，家庭是富农。从小就娶个老婆放在家，外出后再娶一个，家中有钱有势，有人替他养活，当然就不要带上行军。只有那个无钱无势，穷光蛋的赵连壁，无家可归，只得带上老婆行军，这就犯了天大的罪，甚至遭到谢、阎的抢毙。这件事本来就是颠倒是非，四十年过去，还要算‘行军带老婆’的旧账，还要

用这件事整现在的人。真是岂有此理！”

这可激怒了冒牌将军，他跺着脚说：

“你真是高岗反党集团的干将，表现最恶劣！”

我怒目直视，眼里冒出火星，心里骂道：“你是阎的帮凶，是康的走狗！”

他又指示“秘书”：“给她记在本子上（指值班人员桌上放的本子），告诉她的组织，这人表现太恶劣！”

他们踢踢踏踏地走了。

我心想，这是阎红彦为历史翻案的证据。军事学院怎么知道赵连璧？

赵连璧是一九三二年“三嘉塬缴枪”事件中被错误打死的一个大队长，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由中央领导的西北高干会上和历史座谈会上都谈清楚了。阎红彦还作了检讨，并且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阎红彦的发言中把前后过程都检讨了。但他打了埋伏，没有说出到西安找张汉民送信的实质是谢子长要求杨虎城收编，回来后不久就袭击刘志丹的部队，打死赵连璧，这是整个的阴谋。他只讲了枝节，没有讲本质。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向组织上隐瞒了几十年，直到他死，都没有向组织上说真话。

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一九五八年我到西安采访，从杨晓初老人那里得到全部材料，因为那时张汉民就住在杨的家中，谢子长给张汉民的信，杨也看到了。汉民如何处理的，也向杨全部说过。谈到这些问题，杨还很气愤，觉得谢、阎太狡诈，志丹太忠厚……受害了。

我为了照顾谢子长，从前的小说中没有写这件事。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们还要用打死赵连璧的理由，来整活的人。那我也就不留情面了，以后就索性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写下来，历史无情。

下午，项目人员又来了，是广西人和徐州人，他们怒发冲冠地对



我训斥道：“李建彤，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到这里后，有不少人来提审你，那是“外调”。可是你的态度，算最坏的。没有哪个人走后不告你的状的。今天人家又告了你。你不想想你的前途？”

我说：“我不要什么前途，目前的处境，就是我的前途。”

“你不为你的孩子着想？”

“哼！孩子？被打倒的人这么多，被关押的人遍地是，谁家没有孩子？人家孩子怎么活，我的孩子也怎么活。”

我已横下这条心，绝不当“文化大革命”中的应声虫，绝不推卸责任，绝不诬赖好人，绝不损害陕甘、陕北的干部，也不损害长征干部和文艺界干部。总之，我谁也不能损害！我不存任何幻想。

我何尝不想孩子！难道不知他们在被压迫和被歧视中？可是，如果按康生他们的要求胡说乱写，我将遗臭万年。

## 二十四 华北局斗争张邦英、朱理治

天热气闷，我的小木笼连一丝风也透不进来，早上不到六点，我借口上厕所就推开了门。我要看太阳，要呼吸新鲜空气。

如今，值班人员已是整夜敞着窗户，可空气都是别人的，我没有空气，把我关在四面不透风的木笼中。不行，我要坐在木笼口听窗外的鸟叫，呼吸空气。

只有早上这一点时间，能坐在笼口儿看会儿报纸。

早饭后就来了提审的，今天来的是华北局的张邦英项目。

一九六二年冬天，《小说案》爆发，我和景范被审查时，中组部三番五次把我和景范叫去审问，邦英本不是被审对象。有一天，康生，安子文派个特使来找景范，特使就是张邦英。

邦英在历史上，是陕甘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是景范的老战友，好朋友，这个情况，谁都知道。可康生和安子文偏偏要派邦英去当说

客，叫他说服景范作检讨，作交代。那难处，就可想而知了。倒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好说，而是这案子本身，就是个稀奇古怪的冤案，难道邦英不知道？他怎么开口呢？明知是圈套，还得往里跳。邦英来了，又去了。还得回去交差，这比直接挨整所受到的伤害并不轻。康生打的是党中央的招牌，毛泽东的招牌，谁能抵抗。

邦英挨打，是板上钉钉的事。因为我向他采访过，他谈过“耀县起义”，采访记录都在康生、安子文手里，迟早会拿他开刀。可他们，先要利用张邦英，用心何其毒也。

五年之后，就是一九六七年，在地质部礼堂开我和景范的批斗会时，有一次，就把马文瑞和张邦英都拉去陪斗。那也是夏天，在出台之前，我还瞅空问他俩的身体好不好？希望他们保重。

有人透露，“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揪了出来，劳动改造，打扫卫生了。

在那些日子里，谁都心中无数，都被造反派拉着到处挨斗，斗也无怨言，因为都迷信毛泽东，都听毛泽东的话，要去“经风雨见世面”嘛！

今天，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天，邦英的专案组又来审我了。

他是华北局的副书记，没有人唆使，不会轻易被揪斗。有位“外调”人员悄悄告诉我：不要看每天都有人被揪上游街、批斗，那都不是“自发”的，只要是大点儿的人物，都是上面有指示。每天夜晚十一点后，人大会堂是灯火通明，小会议室坐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当然也会有康生，他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是个军师，摇羽毛扇的。由他们点名、分工，哪天该揪谁，谁去揪，都有指示、预谋。

我听值班的“苏州姑娘”和同伙谈到：华北局机关开的批斗大会是两台大戏对唱。一台是斗争副书记张邦英，一台是斗争另一位副书记朱理治。

斗争张邦英的内容说：张邦英也是高岗那条路线的人，因为一九四二年，他在延安参加过“西北高干会”，批评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高岗是一个立场。如今，那次会议已被否定了，当成了“黑会”。会议上被批判的“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郭洪涛、朱理治现在又成了“正确路线”，杀共产党人也成了功绩，在延安受批判全是冤枉。

既如此，朱理治又为何挨批呢？

自从“炮打司令部”公布之后，刘少奇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万箭齐射。有的，没的，是的，非的，都往他头上堆。去年，我在街上看见几张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其中有个问题，就是他答应为朱理治翻案。

文中说：朱理治曾写信给刘少奇，说他一九三五年在陕北执行的路线，是反对高岗的。因此，他是正确的，从前对他的批判、处理，都是错误的。和他一块受批判的郭洪涛，已经得到康生的平反。因此，他也应当平反，求刘少奇批示。

刘少奇的回信说：要朱写出书面材料，经他审阅后，才可批示、平反。

只因为有刘少奇这几句话，就说朱理治和刘少奇有勾结。

群众批判朱理治说：“你为什么在陕北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00 页）打击陕甘、陕北干部，搞错误的、莫须有的“肃反”，诬陷了那么多干部，错杀了那么多人。你必须交代所有的罪恶。决不许翻案！”

另一个台上又批判了张邦英说：“你们为什么批判“左”倾路线？根本没有什么“左”倾路线”，“左”倾路线就没有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开的什么“西北高干会”，完全是个阴谋，是个黑会！从前逮捕你们也是对的，因为你们是反革命！”

群众两边跑着听，听听这边，是批判的那边，听听那边，又是批判的这边，究竟谁是谁非？

有认真的人说：“这样批判不行呀！是自相矛盾，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又有人说：“为什么都是副书记呀？”

有那凑热闹的人说：“闹吧，就这样闹吧！”

有人挖苦说：“这样互相矛盾的批判，就能使中国不变颜色？就能肃清修正主义？”

中国是“有心人”多，那些“有心人，”就组织起来去研究历史，翻阅资料，借“串连”的机会去调查研究，要弄清历史的真象，就产生了种种怀疑，对那些批斗会也产生了种种不满，一传十，十传百，竟传到了我这个机关，被“苏州姑娘”听到了。

如果说“苏州姑娘”开始有些糊涂，如今她可是越来越明白了。

## 二十五 朋友为我受难

值班人中有个“小诸葛”这人有小四十岁，山东人，粗粗壮壮，说一不二。论实诚，他可算最实诚，论机灵，他比谁都看得远。论文化，他不是大学生，可他比大学生社会经验多，因为他在军队上是营级干部。托他打听点儿什么事，没有打听不到的。

说也奇怪，这里的复转军人都很通情达理，有自己的看法，可真不愧是在军队中受过严格教育的。

这个“小诸葛”和我素不相识，他头一次来值班时，就指着桌子上的“值班记录”说：“没用！没用！这有什么用？十分钟记一次，啰啰嗦嗦什么都记上了。记这些干什么？吃一个馒头也记上，去一次厕所也记上，梳头洗脚，统统记上，这是干什么？吃饱撑的！”

这话，是在只剩下他一个人时说的，我也试探着说：“各人有各

人的看法，有人认为，我打个喷嚏都得向中央报告，因为这是阶级敌人的动向，要不为什么十分钟伸一次头呢？”

他眉头一皱说：“实对你说，你这个人，我们研究过，没啥。现在这么整法，多余！”我说：“我的案子是全国第一流的。”

他说：“你写的交代，我也看过，人家提审你，你的谈话，大家都听见过，谁心中无数？中国老百姓不是阿斗，是认真理的！”

我心中一闪亮：原来有一部分群众是这个态度。

以后，每次他来值班，我总要托他打听一些事情。时间长了，我不托他打听的事，他主动去了解情况，瞅机会告诉我。

今天，“小诸葛”一进门，就把他的同伴打发走，趁机给我说了些情况：

有一天，文化部系统的造反派来揪你去开批斗会，上级项目组没有批准，怕把你抢走不见了。美术界的斗争会已准备好，写的横幅标语是，斗争反党分子李建彤大会，但是会上没有李建彤，只拉去些陪斗的美术干部，有朱丹、刘迅、李琦。那斗争会可真凶，拳打脚踢，把朱丹几脚踢趴下。三个被斗的人都挨了打……

听了“小诸葛”的话，我的心又紧缩起来，朋友们都在为我受难。

我想起了这些朋友：

李琦，西北文工团的成员，他进团时我已离去。是五十年代经过石鲁介绍，在北京才见面认识的。他送给我一张他的作品《毛主席走遍全中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发现了抄家成灾，已经乱了套。封建王朝是拿着皇帝圣旨抄的，我们现在抄家，连圣旨也不拿，没有任何手续，随便进门乱抄，拿到支言词组，都可夸大为篡党夺权，罪大恶极，株连九族。我一狠心，把朋友们的东西，只要有笔迹可查的，一火焚了。

烧的东西中，有闻捷送我的诗集，石鲁写给我的信、王亚凡的诗集、朱丹为我写的条幅、李琦签名的画。特别是已过世的石鲁、闻捷和亚凡。他们的手迹已成为遗物。可那时，我气疯了，烧吧，烧吧！保住朋友的命要紧，过了一关再看一关。

这件事，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

朱丹，我们称之为“老丹”，何等忠厚。我的稿子送给他一次，他看一次，那时是三十多万字的稿子，他总共看过两三次，每次看得都很认真，都写上许多眉批。特别是我的第五稿，他几乎把每页都写上了字。他说，他要像“脂砚斋评石头记”那样用心，要把眉批永远留着。

“老丹”眉批的最后一稿，本在我手里，康生派人到我家收我的稿件时，我把这本子暗中扣下了。从一九六三年，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都没舍得拿出去，眼看我家成了众矢之的，抄家的次数越来越多，实在什么也放不住了，我才托朋友拿去。

经过我这样的处理，他们再斗朱丹，也斗不出来什么来。手中无证据。

由“小诸葛”说的情况，引起我又想起前个时候的两起提审者，一起是田野的专案，另一起是张松涛专案。这两人，都是我的朋友，可是不是西北干部。

认识田野，是因为他的爱人白利是我的同学。几十年我们没断过来往。我们是知根知底的朋友。想当年在延安，我特意从桥儿沟跑到北门外参加他们的婚礼。

那时白利在和平医院做医务，田野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做文化工作，他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笔很好，能诗能文。到北京后，我和他仍有来往。写出《刘志丹》第五稿后，就去求田野看看，出出主意。他是内行嘛。田野是位忠厚谦虚的人，再三声明，自己长

期不写东西，没有水平了。我再三请求，他不好推辞，只得拿去看了。然后，他很谨慎地提了点意见。当然，他不了解陕甘、陕北的历史，只能在文字上提点意见。比如他说：像“器宇轩昂”这样的句子，不要用在刘志丹身上，刘志丹是另一种气质的人。

像这样的意见，他有什么错误？竟然三番两次的来审问。这位一辈子谨慎怕事的人，却被我拉入漩窝。

另一专案是张松涛。是我的女友贾志先的丈夫。老张是老北京人，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在延安时，他是联防司令部的作战科长。对陕甘宁边区的地理环境挺熟。我求他为我的书绘一张红军作战地图。那图绘得可真好，标准、细致、正规。谁看了都说好。

就因为这份地图，他被阎红彦的老乡亲、老朋友吴岱峰揭发了。因为我拿给他看过，谁知他是从前陷害过刘志丹，到今仍不悔改的人，连绘地图者也要坑害。

关于绘地图的事，老张的机关（国家计委、老张是国家计委的局长）来过两三次。我深感对不起老张。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那份地图已不知去向。“反党小说”平反后，我再写书时，去求老张绘图，他已老了，血压高，眼睛昏花，绘不出那么细致、准确的作战图了。老张，多么可惜的人才。我向你致歉！

## 二十六 株连陕西的朋友

一天夜里，听到了枪声，北京发生了武斗。机关驻进了“军宣队”。在这个犯人看管室里，他们竟然打开了窗户，让外边喇叭声灌进来，放着钢琴伴唱《红灯记》。实在烦人，我钻进闷热的木笼里，沉思。

就因为我两次去西安采访，康生他们造谣，硬说我在西安举行过

“记者招待会”或者“文艺界招待会”，还说利用吃饭进行“反党活动”。

一九六三年，“项目委员会”审问时就提出来了。我很坦然，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我要写文章，必得去采访，到西安采访，必定遇见熟人，吃饭聊天，人之常情，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可是还要不依不饶地追查。这些天，又穿梭般地来了。

一九五八年“反右派”刚结束，我就请假到西安采访。到西安的头一天，就遇见西安市的文化局长高歌。

高歌是我在“西北文工团”时的老朋友，我一说想去看看柯老（柯仲平），第二天，他便要了吉普车陪我去。柯老住在几十里路外的常宁宫。

要写刘志丹的事迹，必得先访柯老。一九四三年西北局就把写长诗《刘志丹》的任务交给了他。十五年了，他已搜集了不少资料。以我的推想，他的《刘志丹》长诗可能已写成了。

到常宁宫，说明来意，柯老便和我一块到麦田里散步。那是阳历五月，正是不热不冷万物极盛的时节。我们边走边聊，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柯老一一作答。我也把这个题材上的新发现，告诉了柯老。下午回来，高歌又在街上饭馆里请我吃了饭。根本没说“反党之事”。

西安美协主席石鲁，来北京找过我，要写《刘志丹》电影剧本，和我交谈材料。这次和石鲁一见面，他也要同我一快去采访。

都是西北文工团的老朋友，怎么说都好办，我们找到西安市副市长杨老（杨晓初）。他参加过渭华起义，杨老很热心，要了辆吉普车，和他的夫人李馥清大姐一块儿，把我和石鲁带到渭华起义的司令部所在地高塘源。参观了当年司令部周围的遗址，访问了当年参加起义的苏维埃干部。近看高原，远看南山，来兵之路，退兵之峪，一目了然。李大姐还赋诗一首：



## 高塘憾怀

工农起义高塘塬，叱咤风云敌惊慌。  
土豪恶霸齐丧胆，人民欢喜喜欲狂。

参战多是少年郎，武装斗争初次尝。  
遇事难得好检点，惨痛遗训永毋忘。

志丹堪称人中杰，为国为民忘一切。  
出生入死千百遍，流尽最后一滴血。

李馥清

1958年6月11日

同访高塘。

大姐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干将，既美且灵。返回西安，杨老和李大姐请我们吃“羊肉泡馍”。请的可不是我一个人，而是请了许多西工团的老朋友。有石鲁和夫人闵利生，有杨拯民和夫人陈影。当然，杨拯民不是西工团的人，但他是西工团的“姑爷”。

关于和杨老、李大姐的接触，六二年我就一五一十地讲了。我知道这个项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安子文，是李大姐的“难弟”，他们在地下工作时交往甚深。谅他不敢加害于他们夫妇。

我和石鲁又去商洛。坐长途汽车走了一整天，一路见到多处红二十六军一九三三年南下失败的地方，使我明白了地形对红军造成的困难。晚上到商洛城，在山上找到地委书记王杰。

就是因为我的这次访问，王杰也受了难。因为项目委员会在记录上查到了王杰的名字。

王杰有什么罪，无非是一九三三年敌人“围剿”紧急，使红军造成失败时，他从终南山接出了刘志丹。如今这种整法，明着整的是和

“小说”有牵连的人，暗着整的是和红二十六军有牵连的人，和刘志丹本人有牵连的人。

渭北第一块苏区，我一定要去看看，又是和石鲁同往，下了火车又雇平板车上塬。因为我的脚踝扭伤，不能爬山。

三原县午子区的塬又高又大。我们先找到那里的老苏维埃主席、红四团团团长黄子祥（当时是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请他谈了这个地方的历史。在塬上还找了些当年的红军战士，地方干部，谁都说这里的黄氏兄弟功劳大。

是的，以黄氏弟兄为首的革命者们，创建的这块根据地，是渭河北岸的第一块根据地，曾给了红二十六军最大的援助。

一九三二年春，“白衣秀士王伦”（一九四五年延安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给谢子长起的代号）来了，要独掌军权，把刘志丹的队伍搞垮了，把另一部分人吓跑了。队伍由七、八百人降成一百多人（即“三嘉塬缴枪事件”造成的结果）。他们向三原午字区的黄氏弟兄求援，黄氏兄弟派来一百多人，才成立起“陕甘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冬，“白衣秀士”把队伍带出去，打得只剩下一百七十人。又向三原午字区求援，又派来一百多人，才成立起红二十六军。“白衣秀士”的谋士们，总想把黄氏弟兄功劳夺去、擦掉，由他们占领。

看看红二十六军的阵容，就知道三原人在里边的位置：红一团，是关中耀县人多；红二团，是保安、安塞人多；红三团，基本上是三原、耀县人；骑兵团，就是黄子祥创建的红四团改编的，纯属三原县人；义勇军，是黄龙山和河南人多。可以说，红二十六军的人马有三分之一是从三原县来的。这个军队，就是西北的第一支红军，是创建陕甘、陕北红色根据地的主力。而黄子祥一家人呢？其兄黄子文，被迫害数年、长期受冤，后来在作战中牺牲。他的妹妹，在北平做地下

工作，牺牲了。他的女儿，被王明路线派往陕甘搞错误“肃反”的鲁本和安建平杀害了。

黄子祥这个政协主席现在如何？老了，在老家住着，与世无争。

这次我一访问他，又糟了，他又要挨打。他与世无争，人家也要借机和他争，是争历史。那个姓阎的和康生串通起来，要把整个西北的革命史搞得以他们为轴心。除打倒刘志丹外，还要打倒已经牺牲的黄子文，因为黄子文领导过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底儿。不打倒黄氏，把功劳夺不到手。

西安来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黄子祥就被斗争了。可怜的七、八十岁的老人，革命了一辈子，全部家当为革命用尽，家人为革命牺牲了一半，已到老年了，还得挨一次打。而杀害他亲生女儿的刽子手，却被保护着，没人敢去碰。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北京享清福，康生的人，可保他们安全无事。

在这个县上，谁整了黄家的人，最不得人心。

回到西安，石鲁要请我吃饭，便跑到山上去打野鸡。红烧了一脸盆，好酒好肉、罐头、水果，摆下一大摊，把西工团的老朋友，能找到的都请来了。记得有裴然、周冰、刘芳、王琳、程士铭、胡兰。

我常常思念过去。从前在延安时，希望着赶快胜利，可以走出山沟沟。一九四九年进了大城市，我倒思念起延安。不单单是因为那里的山水好，那里的窑洞冬暖夏凉。主要是人，和我一块相处过的人，大都纯洁朴实，亲密无间。特别是西北文工团时期，我们简直还是一群娃娃，总是以诚相待，也许为某件事互相争论过，一阵就烟消云散了。所记得的，就是那些使人捧腹大笑的过去，无忧无虑的过去，那些赤诚之心的友谊。所以，我常常记起他们，每个人都像当年一样，生活在我心里。

可是听说，就因为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共同吃过一顿饭，他们都

被拉去游街了！

去年，有人借“外调”来告诉我：“你也不要着急！那也是一出讽刺戏。开始，被拉上游街的人都很生气，觉得受辱，丢面子，谁知道见许多熟人都在游街，今天游一回，明天再游一回，每天碰见，也不觉得难为情了，反正游街的人何止千万，还可天天见面，点头问好。”

一九六〇年，小说第一稿印出，《工人出版社》要出版，我请他们送给原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审查。习仲勋看后说：“没有写好，许多事还没弄清楚，需补充材料。例如五顷园子分地。”

我又跑到西安，这次主要是查档案。在市内访了些人。

这次柯老又请了客，把西北文工团的人都找了来，而且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有陕西歌剧院裴然夫妇，音协的关鹤岩夫妇，美协的石鲁夫妇，作协的王汶石夫妇……

柯老热情的敬酒、劝吃、说笑。

我过意不去，几天后也请了一次。无非是想多玩玩。见一次面好不容易。这次见了面，谁知哪年再见呢。

这就是一九六三年康生的项目委员会宣扬出去的，我去西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谁是记者？我宣布了什么事情？

又说是“文艺界招待会”，不用招待会，我接触的都是文艺界，因为我是从那里出来的，那是我的家，与其说我招待了“文艺界”，还不如说我回去“坐娘家”呢。

果然，一九六二年，柯老就被戴上了紧箍咒。因为他们查遍全国，查找还有谁写刘志丹？谁写这个人物，就意味着谁“反党”。刘志丹不合他们的胃口，不是一个路子，刘志丹是不坑人，不害人的。很多人早知道柯老写《刘志丹》，不管他写没写出，都要整他。

一九六四年，柯老终于辞去了那个正在逼迫他的人世间。

听说裴然被打断了肋骨。就因为他想写《刘志丹》剧本。一九六

二年报刊的选载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给我打过一次长途电话，这就是他的罪恶。

石鲁的遭遇更残，他不但自己想写电影剧本，还答应为我的书插图，他说起刘志丹，是那样偏爱，他觉得刘志丹走的曲折道路，在他身上有共鸣，他要用特殊手段去表现这个人物，他有些独特的想法。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说得来，我们用通信交换过意见，研究问题。

整人的人去揪斗他，他不得不把我的稿子交了出去。这些人还不饶他，批他的画，批他的诗。他画的“吊梅”，说那意味着“倒霉”，对社会主义不满，被批判为“黑画”。

有人悄悄告诉我，《毛主席去安源》那幅画发表后，造反派拿着画去问石鲁：“这幅画好么？”他不以为然。人家就说他是“现行反革命”。

从此，他被斗死斗活，把他斗得不像人样子，还拉到钟楼前罚跪。他跑掉，再揪回来毒打，他的神经分裂了。一代才子，如此下场！

真是“文字狱”呵！一本书，一幅画，一首诗，一句话，都可成为“反党分子”或者“现行反革命”。

那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就是给“文字狱”贴的告示。

## 二十七 第一次“思想汇报”

项目组下命令，要我写“思想汇报”。

他们的口气是：“从今天起，你要老老实实地，每两礼拜向毛主席写一次思想汇报！”照我目前的思想，写出来非使问题升级不可，再加上一两项帽子。

又想起景范常说的话：不管什么时候，也得听毛主席的话，不管他说得合不合你的心意，都要听他老人家的。当初，我们的命，是他

老人家救的。陕甘那块根据地，是中央来了才能保存下来的。所以，要照顾大局，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要违背他的意志……

正因为这，景范在这次事件中，尽量作自我检讨。不是他的错误他也拦在身上。唉！他们太纯洁了。

听说仲勋也是这样，只要是毛泽东说的，他一定服服贴贴，叫检讨就检讨。我刚被押送到这里，专案组的徐州人说：“就是你顽固，习仲勋都认帐了。”我说：“那是他编的，死猪不怕滚水浇，任人宰割了，这里边根本没有他的事！”

“你坏得很，谁检讨你骂谁！”

也许仲勋根本没有检讨，是他们骗我的。

我的思想没有他们纯洁，不像他们那么驯服。

我分析了形势，我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承认“反党小说”。这是“语录”中登了的。目前，我硬顶，对整个事件没有好处。还得承认采用高岗的材料是错误，——虽然这是违心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承认这种错误的本身就是错误。只有这样吧，以后再讲理。否则，我就被封了口，其它的情况全不能讲了。

我决定，写检讨。

现抄原件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项目组规定，除每天写汇报外，每两礼拜还要写一次思想汇报。在这次思想汇报中，我向您老人家说说我的思想。

近一个月来，专案组命我每天对着您老人家的像片请罪。项目组在“请罪词”中规定了几条语录。其中有一条是：“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跪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

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很明显，我的问题已经升了级，把我和汪精卫、张国焘同样看待了，所以我思想一直不通。现在我确实对党的政策不能理解了。

我是什么人？汪精卫是什么人？我参加革命前是个学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在任何反动的党、政、军机关中干过事。参加革命后，我也没犯过大的政治错误。就是后来写《刘志丹》那本小说中，发生了高岗问题，也就是在红军政治委员身上用了高岗的个别材料，这是个很大的政治错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错误能否与汪精卫相比？“反党分子”这个内容与“汉奸卖国贼”是否有区别？

现在我是被定为反党分子的。我这个反党分子和高岗相比，可能还有区别。起码大小总还不同。如果高岗不自杀，毛主席还会给他工作，也许还不一定开除党籍。

张国焘是个另立伪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统一的罪人。在他没有逃跑之前，毛主席还给了他工作。难道像我这个因写了一本小说而犯了错误，既没有自杀，也没有逃跑的人，就已经可以和逃跑了的张国焘同样看待了？

根据中央过去的政策，在革命队伍里的人，就是犯了错误，他和汉奸卖国贼还是有区别的。犯了错误以后，自杀，逃跑和不自杀逃跑相比，也是有区别。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我没有别的事，就因为写了那本小说，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八年一月，我家被抄过数次，我挨过七斗八斗，也挨过打，停发了工资，我已被关起来八个多月了。每天日夜四个人轮流着管着我。也有人唆使小孩子等我每天打开水时，截

住骂我、打我、用树条子抽我、用煤块砸我。对这一切，我都没说过什么，我觉得这是群众运动，都不必去计较。我既不反抗，也不自杀或逃跑，我已下决心，无论处在怎样的困难境遇，也要对得起我的信仰。已经犯过错误，就再不能犯错误。我这种态度，是否和张国焘一样呢？汪精卫是个老牌的国民党右派，是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李建彤是十几岁就到了革命队伍里，从来没有出卖过人民国土，怎么能和汪精卫相提并论呢？

解放战争中，我们俘虏过许多战犯，他们手上都沾满人民的鲜血，国家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并没有每天把他们称为汪精卫。李建彤怎么能成为汪精卫呢？

以上就是我的思想。写出来求得指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李建彤

1986. 8. 26

下午，徐州人和广东人来收我的“思想汇报”。一看，便生了气：“谁叫你这样写的？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思想汇报就要写真实思想。这就是我的真实思想。不对么？”

徐州人说：“要是这样写，你就别写了！”

我写得不合他们胃口，他们不满意。

## 二十八 赵耀先 方仲儒 秦川专案

这几天的项目组是审问延安“抢救运动的”，触动了我心中的那些坟莹，在“抢救运动”中无辜死去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年轻美丽，洁白无私，都尚未恋爱，也无婚姻，一身清白地牺牲了。我为他们流泪，又失眠了。我真疲倦了，有点发烧，头晕、无力。我可能是病了。

在木笼里，身体再疲倦，也得支撑着。



这几天，提审的人直往这里拥，像抢遗产，抢乌沙帽、发洋财一样。我得带病应战。也不晓得是哪里来的人，向我提出了赵耀先问题。

我真觉得自己犯了罪，把刘志丹少年时的同学都牵连上了，我对不起他们。

我想起那位老实巴交的保安县人——赵耀先，他总是嘴抿得紧紧的，带绉纹的脸是那么忠厚，他是榆林中学的毕业生。解放战争年代，在转移中我见过他，他在为战争服务。土地革命时，他当过陕甘宁省的经济部长，后来在宁夏管经济。

那年，他来到北京，我和王勉思去访问了他。他听说要写刘志丹，几乎涌出泪来。他们是孩提之交，他滔滔不绝地，慢条斯理地，严肃认真地，讲了他们在永宁山学生时的故事，又讲了一九二八年永宁山党支部的三件大事：头一件是夺了教育权，撤了旧的教育局长 XX。第二件，是夺得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第三件，领导了饥民斗争。他讲得很投入，如同恢复了青春。那是在讲他的青年时代。

就是这些，他有什么罪？

赵耀先的身体不好，他坐过敌人的牢，已是年老体弱，现在，就因为他讲了年轻时的故事，就把他当“敌人”审来审去，七斗八斗，关押起来。听说，不几年他就死去了。

将来谁还这笔债？

又是一位老干部，方仲儒也被他们抓了。听说已被关起来。除了在他的历史上捏造罪状外，还加上我这个案子。

他们问我怎么认得他的？

他是西北野战军的后勤副司令员，刘景范是司令员，两人在前方形影不离。我去过前方，在同一个院子里居住，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当然是熟人。

在那炮火纷飞的年代，和全国的其它战场相比，西北战场最困难。

敌人用飞机、汽车运输，我们用人力和毛驴运输。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们也战胜了敌人。整个后勤工作，是刘景范、方仲儒领导的。

这些人，追问刘景范和方仲儒都说了些什么？

那时候他们谈的都是军事秘密，我难道去偷偷摸摸的窃听，准备三十年之后向你们交代？而且那时的军事秘密，和现在的项目有什么关系？难道我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就预谋着要“反党”，解放战争也为着“反党”？

我访问方仲儒，是一九五七年，在华北招待所，与何家栋同路去访问的。他说起大革命中，他们在西北国民革命军中如何做政治工作，他在哪个军任党代表，刘志丹在哪个军任党代表。冯玉祥如何清党，他们如何被驱逐。

他们怀疑我一九六〇年去西安采访时，是否方老在介绍信上批了字，省委才给我介绍了那么多地方。

他是省委负责人之一，他当然可以批，别人也可以批。到了陕西，比到我自己的老家河南还熟，找到哪个负责人都可以批，追查这些都是无效劳动。就是没有批，我不带介绍信，找到那些老红军、老干部的门上，人家也会谈的。谈刘志丹的事迹，西北干部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很热心、只有个别的“杀人犯”瞠目。

他们追问：到底是赵伯平批的，还是方仲儒批的？其实谁批都一样，他们都会批的，都可以批。问得好无聊。

他们问我，为什么住在芷园，谁批准的？那时刘景范在西安养病住在芷园，我到西安当然住在芷园。

真像鲁迅说的“缩小了像细菌，放大了像大炮”的罪名，信手拈来，无限增多。

这些老干部，都要因为我登门访问而受鞭笞。方老，在敌人的牢狱中受过鞭笞，现在又受“自己人”的鞭笞。

有些想不到的人，也受到株连。也不知是哪个机关的造反派，又跑来调查秦川了。听口气不像中宣部的。

追问怎么认识秦川的，有哪些来往？

在延安，我就知道他，也见过，但没打过交道。解放战争中，打榆林时，我们都参加了随军工作队。沙家店战斗时，我们都在距战场不远的山上观战。在这个村里设了接收站，准备接收战场上下来的伤员。

沙家店战斗后，我又和秦川等人一块从榆林地区，走到绥德地区，过了黄河。过河后，各回各的机关，他回西北局，我回边区政府。战时转移过河的机关，都很简单，在农民家里住着。

全国解放后，他在中宣部工作，我不知道。我去找苏一平时，才遇到了他。那时我正找人看书稿，提意见。因为苏一平在中宣部文艺处，又是老熟人，我这个不速之客就找上了门。后来听苏一平说，秦川也看了书，我就请他提意见，就在苏一平家里，说了一阵子。

秦川的头脑是很清楚很清醒的。在延安时他旁听过高干会，对陕北的历史，有些理性知识，知道刘志丹的作为、革命性，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

他是那么热情，一夜就把三十万字看完了。也许因为这句话，人家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感到对不起所有的人，可我没办法，只怪我没能把人想得那么坏，更没能把领导人想得那么坏！

## 二十九 两面派

看来，今天来的提审者很了解情况，问得头头是道。又问得奇奇怪怪。

来的两个人都是男的，一个高个子是主审，他问：“你访问过吴

岱峰几次？”

吴岱峰是个老红军，在中央某机关当局长。

我答：“一九五七年夏天我去采访他，说了一天，是拿《工人出版社》的介绍信去的，说明是写刘志丹的传记。一九五八年我写的第一稿印出，分段征求意见，核实材料。给他送过一段。他看后我又取回来。一九五九年我又采访他。一九六二年我给他送过第五稿。同年，我和画地图的人又去访问过一次，要他说一些作战的地点。”

问：“你为何那么相信他？”

答：“我还没发现不该相信他的理由。”

问：“他谈些什么内容？”

答：“从‘晋西游击队’谈起，一直谈到陕北的第二次反‘围剿’。这中间谈的有‘反帝同盟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开辟陕甘苏区、陕北第二次反‘围剿’及其所经历的战斗，凡是经过的、或者是和刘志丹有关的活动，他都提到了。”

问：“他对陕北的一些历史事件，是什么观点？”

答：“很难说，因为有些观点他说出来，有些他没提。”

问：“他对陕北‘肃反’事件怎么看法？”

答：“对一九三五年陕北发生的肃反事件，他也认为不对，不应该把刘志丹他们逮捕起来，郭洪涛的作法不对，虽然他本人没有被捕，对整个事件来说，他也认为不对。是中央到陕北后解决的问题，那是‘左’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以后没有人替‘左’倾机会主义说话。”

提审人变了脸，忽地站起来，用很重的山东口音说：“你说话不实！现在再三声明，他一贯坚持一九三五年‘肃反’是对的，所捕的人，都是应该捕的，一个也不应平反，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反革命！”

我愣了，在采访中，虽然感到他有些吞吞吐吐，可没想到这么严重，是两面派。

难怪去年在地质部斗争我和刘景范时，有个姓胡的科长指着刘景范说：“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是对的。因为你们都是反革命，没有把你们杀掉，是那时领导人的一时糊涂！”

我说：“那是毛主席放的，难道毛主席放错了？”

造反派怕毛泽东，他不说话了，但那气势、那表情，特别可恶。当时我奇怪，这人为何能说出这种话？现在明白，是康生和阎红彦扭在一起，把他们的错误观点，一传到底，所有的造反派都是一个观点。康生为杀人者翻了案。

问：“他对你写的《刘志丹》同意么？支持么？”

答：“我的印象他是支持的”

“人家根本不同意。那是应付你的。”

我说：“既然是应付我，你们就别审他了，反正罪在我，不在他。现在谁反对我谁能立新功！”

提审者说：“我们审他，对他有好处，反而立了功，因为他揭发了你们，他和阎红彦一块告发了你们。要不，你们的阴谋也不会被揭穿！”

我简直傻了，吴岱峰也参加了揭发？他和姓阎的是同伙。

问：“他对一九三二年、三三年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的作法如何看待？”

答：“他认为杜衡的行为不对，不应该撤军事首领的职。”

提审者绉起眉说：“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没有看他们写的文章？那篇文章不是明说着么，省委领导的好，两个月建立起十个县的根据地。”

我像被打一了闷棍，原来吴岱峰是阎红彦的帮凶，我上当了。

问：“他对刘志丹和谢子长怎么看法？”

答：“他认为刘志丹指挥作战好，老谢办外交好。”

问：“不仅如此吧？有谢子长传略。”

答：“更多的他没有说。”

问：“一九五三年他们写的《谢子长传略》上是怎么说的？”

他扔给我两页纸：“看去！看看人家如何评价的？”

我拿起一看，上面写着“谢子长和毛主席素昧平生，毫无来往，但他的战略策略和毛主席无不互相巧合。”就是说：毛泽东有什么政策，他就有什么政策，更谈不上什么“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

假如是我这样写书，该说我是“反革命”了。要说我“剽窃毛泽东思想”了。可是他们没事。康生保护着他们，他们可以放在毛泽东之上。

再往下看“传略”上说：谢子长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因此，他反对读一切书。他说：“尽读书不如无书，只要读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隆中对’就够用了。”

我惊奇：“他为何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全部否定了？《传略》上还写着，谢子长在参加革命以前，在陕北军阀井岳秀手下当连长，参加过打‘硬肚’，一九二一年，谢子长屡建战功，辗转陕北二十余县，英勇善战，为全军寇！”

原来，谢子长是参加镇压一九二一年前后灾荒年中农民反抗的，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还要拿这个资本去争领袖。可见，他的资本太贫乏了！

我也提问：“这是用谁的观点写的？”

提审者说：“这不用你管。阎红彦和吴岱峰的观点都在内。”

我暗想：他们的水平如此之低，还要当领导人。阎红彦还是中央委员。

问：“你认为阎红彦那篇文章不对么？”

答：“不对！那是为王明路线翻案的，伪造历史的。”

问：“那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难道你比他们还高明？”

我一惊：仨人？指的谁？除阎、吴，还有谁？他们做事好隐蔽。我忙又答：“我不高明，但是我知道，一九三二年在错误路线领导下，陕甘游击队在关中平原作战，决不会比井冈山发展得还快。”

提审人拍起桌子：“不要嚣张，允许你说话，不许你批评省委。”

答：“为什把盲动攻打城镇造成的失败写成战功？那是颠倒是非。阎红彦，吴岱峰全错了。还有人袒护！”

问：“你说，一九三二年游击队去打韩城不对么？”

答：“不对。开始，我是访问的阎红彦和吴岱峰，他们说必须去韩城，打了个大圈子，才能扩大影响。后来，我去查了档案，档案里说，那是省委书记杜衡的决定。决定的本身就是错误，杜衡在省委书面检讨。阎红彦和吴岱峰没见过那份材料。这本书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历史事件的参加者，也不一定说得准确。”

问：“你为什么反对攻打三原城？”

我反问：“难道你赞成么？红军只有二、三百人，敌人在三原城里住有一两个团，人力和武器都占优势。还有个坚固的城墙，能攻么？这是量力而行么？这是知己知彼么？这种攻城是违背了一切常规，省委书记杜衡不懂军事，阎红彦可是个军事干部，也不懂么？能盲目执行么，结果如何？自己几乎被敌人消灭光，才匆忙撤退。敌人一直攻到塬上，杀害了许多干部和群众。这就是阎红彦的功劳。”

提审者叫道：“住口！谁让你反驳？”

答：“我是回答问题。”

问：“陕甘历史上重要事件中，有个“缴枪事件”，你怎么写的？”

答：“你说的是“三嘉塬缴枪事件吧？我没敢写。这是陕甘历史上的“禁区”。这是研究陕甘历史上的“拌脚石”。就是因为护短、跋

扈、不让说那次“缴枪”事件的真相和缴枪的错误。阎红彦和他的老乡们都护着。这是他们的命根子，把这根子一拔，真面目就全露出来了。”

问：“赵二娃是什么人？该不该枪毙？”

答：“赵二娃就是赵连璧，是雇工出身。一开始，领导的是饥民队伍，反对的是白军反动派，按革命原则说，他不该被枪毙。谢子长和阎红彦耍阴谋，把人枪毙了，罪名是行军带了老婆。”

我脑子一转，又问道：“阎红彦没带过老婆行军？在山西打游击，把第二个老婆带到黄河边儿。谢子长没带过老婆行军？把第二个老婆从陕北带到张家口。按他们枪毙赵连璧的章法，他们也早该枪毙了。”

问：“难道你不明白，那是‘整顿部队’？”

答：“我明白。整顿部队可以，但是他们违背了毛泽东的整顿原则，毛泽东说：“红军成份，一部分是工人、农民，一部份是游民无产者，游民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我又问：“毛主席说过用枪毙的办法了么？在这件事上，谢子长和阎红彦的行为，简直是土匪！”

问：“吴岱峰也这么说过吗？”

答：“他说不知道，没有参加。”

提审者又发火了：“吴岱峰是参与者，他亲手夺了刘景范的枪，打死过人，你为啥包庇他？”

我糊涂了。这两个审案人咋这样审呢？一会儿横着审，一会儿竖着审，一会正面审，一会儿反面审，是啥用意？

问：“是不是你说过阎书记该枪毙？”

答：“我说过。按他枪毙赵二娃的标准，我认为阎就应当枪毙。”



第一，他勉扣军饷，第二，他强奸妇女。在陕甘的南梁时，战士们就提出枪毙他，被谢子长包庇了下来。两个相比，哪个该枪毙？”

提审者怒吼：“不许诬蔑领导人！”

我骂道：“兵痞！一个马弁、号兵而已，流氓气十足！”

提审者叫道：“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

我说：“我是犯人，只要有人问，我就有责任说。”

问：“你在吴岱峰处，还看过什么？”

答：“一份旧文件。是郭洪涛向北方代表写的报告、是诬告陕甘地区干部的。他要陷害人。是马蔺纸印的。很粗糙！”

问：“你为什么要看那份东西？”

答：“我不知吴岱峰有那份东西，他翻箱底，无意中给了我。我一看，竟是郭洪涛的杀人罪证。难道现在吴岱峰后悔了？”

沉默。

问：“书中写的有无吴岱峰？”

答：“也算有，也算没有，因为是小说。”

问：“戴鸿远是谁？”

答：“谁也不是。他们没有资格往自己身上套。”

问：“为什么吴岱峰说是他自己？阎红彦又说是他自己呢？”

答：“阎红彦不是把‘周光’当作他么？就因为这，他诬告我‘为高岗翻案’。”

问：“你书中的人物是怎么安排的？”

答：“根据写作的需要安排，如果照他们宣传的谢子长，他什么书都不读，那像什么话，好坏他已被‘左’倾路线提到了领导岗位，我还是写他懂马列主义。”

“按别人说的情况，他在路线上是个胡涂涂，甚至常常投靠到错误路线那一边，根本不够领导人的资格。我写时照顾了他。”

问：“如果他糊涂，能有人拥护他？”

我反问：“谁？”

提审者说：“吴岱峰最拥护谢子长。”

我说：“是呀，最坏的人才拥护他，比如郭洪涛，在土地革命时是杀人犯。他拥护姓谢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么？”

问：“你为什么把书稿送给吴岱峰？”

答：“我高抬了他。我把他当成西北老干部，征求他的意见。”

提审者说：“不是为了抓你的辫子，人家才不看你的书呢！人家都立了功。要打得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提审者走了，我出了一身冷汗。倒不是被他们吓唬的，而是今天我才认识到吴岱峰的为人，吴岱峰的真实面目。

从前听别人说，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时，他是暗地和王明路线勾结的，专门提供假材料的，那些杀人者把他当作知己。

那时我不相信。从表面看，他挺老实，见人也热情。他还有点聋，有人说他装聋，干起坏事来可精明。快八十岁了，还天天写信指挥他们的帮派如何攻垮《刘志丹》；还拼命为姓谢的翻案呢。看样子，他一贯是个“细作”。

今天这两位提审者异常，引人深思！

### 三十 “左”倾路线的说客

提审人中五花八门都有。今天来的人，年纪不大，像是些大学生，可是很老练，是些“说客”。他们是从宁夏来的。

去年，半夜来了一批学生，硬逼着刘景范承认李景林是“好人”。是“革命干部”。景范说：“那是个坏人！”他们就动手打，原来，李景林今天又是宁夏造反派的后台，又摆出了一九三五年的架势。

今天这帮人，是来当“说客”的。

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老干部都是被打倒的。不，有一些是被造反派保着的，而且要混水摸鱼，为他洗刷历史上的罪恶。

这帮子提审人并不手执钢鞭，而是要“和平过渡”。他们绕了几个弯子说：“你是否了解李景林的历史？”

他们是来了解李景林的历史，不是追查和我的书有关问题，我本可以不答。可是这个人，大家都说他很坏，我手中握着他的许多材料，在我以后的小说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反面角色。我不说，怕没有人敢说。因为大家都在挨打，大多数陕甘干部是被他迫害过的。现在他又装成一贯“革命”，那就坏了。

我便说：“不了解，只是听说过一点，坐过牢，表现好，向敌人下过跪，告过饶，出狱后失掉组织关系。回家抽上大烟，穿上二毛子皮袄，不想干了。只因郭洪涛要招兵买马，为自己扩充“左”倾喽罗，才把他挖出来……”

提审人忙说：“不，不！据我们了解，他不是这样，那时他年龄还小，不懂得害怕，没有向敌人磕头求饶……”

我没有说话，在心里计算了一下，一九二八年他已经二十多岁，和诸葛亮出山时的年龄差不多了。还小么？

他们又问：“你听说他在“肃反”事件上有责任吗？”

我说：“据我调查，他是陕北“肃反”头目郭洪涛的三大金钢之一。一个是“大板嘴”专门派到神府杀人的；一个是鲁本，专门派到关中杀人的；一个是李景林，专门派到陕甘杀人的。”

他们说“据我们了解，不是。安建平大姐说，那时主要应由鲁本负责，和李景林没有关系。”

他们竟然叫起了“安大姐”，可见他们早已接上了头。

他们不提安大姐，我本可以不提这个人。他们一提我就火了，不

禁“哦”了一声！鲁本和她本是夫妻，要杀谁，由他们两口子决定。多少人都揭发，说他们是杀人的刽子手。姓鲁的，已经死去四十年，都推给了他。她以为这样更好，舍去一个死人，保住一个活人。而且保的是她的老搭档。

安建平这是转移目标。那时候，安建平是在陕甘、关中两头跑。而陕甘地区的杀人指挥者就是李景林。他不但杀人，还破坏了陕甘地区的经济政策。

提审人说“李景林自己说，搞‘肃反’时，他在前方，不在后方。这点可以信吧？”

我说：“你们知道那时的前线在什么地方？就在延安附近的‘劳山’。那时正和东北军作战，都在劳山。捕人的和被捕的都在劳山前线。刘志丹就是打了胜仗刚从前线下来，就要捕他。刘景范也在前线，刚回后方，李景林就通知他去‘开会’。刘景范听人家说，这是一计，他又借故返回下寺湾，那是党政军基地。李景林一见他回来，便慌了手脚：‘你怎么回来了？’这时，李景林已占领了刘景范的窑洞，以为他永远不会再回来。李景林又催促说：‘前方正等你开会，快走！程政委（程子华）正等着你！’”

所谓的“开会”，就是“逮捕”的代名词。多少人都是去开会时被捕的。都是去找的程子华政委。

我还告诉他们：“夺了刘志丹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人，也在前线，他也命令逮捕了許多人。所以，那时逮捕的正是在前方的干部多。重要的军事干部都在前方。先逮军事干部。”

提审人说：“据我们看，他还不是那么坏，他对陕甘的工作，还是有感情的。”

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感情？他在那里干了许多坏事，破坏了陕甘的经济的建设，使人民陷于穷困之中。

我一生气，背起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毛主席说：日常生活的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断绝贸易、食盐、布匹等项目，必须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些苦痛，中等阶级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地主阶级。”

据此，我说：“这说明，农民跟着革命走也不愿挨饿，受穷，使农民穷困是犯罪行为。”

我又背了一段当时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说：“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是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受不住，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忍耐不住之时。”

我说：“这可不是我说的，不是因为我有资产阶级思想，而偏谈经济问题，这是毛主席指出了的。陕甘的领导人也是这样设想的。谁都知道，经济问题也是革命的重大问题，解决不好，就要影响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

陕西有个副省长，名叫杨玉亭，那时他在陕甘苏维埃政府当经济委员长，他谈过苏区的经济政策：粮食，红军是打土豪得来的，不够时，在市场上赎买，农民大批卖粮食，公家收购粮食，设立了流动仓库，归农民管。那时，他们没有摊派，也没有把农民限制死，完全是活的，用政策领导经济。

“集市”：设了许多集市，活跃根据地经济，可自由交换，白区商人也可进来贸易。

“苏票”：就是苏区的货币，信用好，一块顶一块白洋。用这种办法，苏区可买进自己缺乏的物资。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

“自从李景林到陕甘边区之后，就打击这些切实可行的政策。一

曰：这是“勾结”外来商人。二曰：发展资本主义。他把外来商人吓跑了，从白区运来的棉花、布匹，放在大街上没有人敢动。直到中央红军到后，中央的经济部长林伯渠老人提出要收买那些棉花、布匹，给红军做棉衣，陕甘的干部才托人再把外面商人找来，做成了这笔交易。难道李景林不知道陕甘地区不种棉花，断了外源就会冻死人？可他们根本不懂从实际出发，一味高叫口号，打倒一切，宁可把红军困死，冻死，也不设法去解决问题。谁去解决问题，他们就去逮捕谁，杀谁。把集市也取消了，变成死水一潭，人民重陷困苦。”

“恐怕不能算在李景林帐上，他一个人有多大能耐？”说客又在开脱。

我说：“一个人？他没那么大能耐。他是靠后台吃饭的，他的后台是什么样的人？全国的人都知道。他们到了陕甘，还找了助手是郭洪涛，又发展了李景林，李景林再拉拢几个流氓，他们把好人逮捕，扶持流氓上台专政。”

审者说：“不会吧。”

我说：“不会？你们去问问陕甘老区的百姓。那些流氓现在还活着。比如那个姓王的被李景林扶上台，当了陕甘苏维埃主席，是当年林伯渠老人长征到达陕甘时才把他撤了职的。”

我又想起眼前的现实：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是好人死得多，坏人都活着，多是高官厚禄，这里边究竟包括些什么奥秘？费人思索。

提审者担心地问：“别人来找过你么？”

我说：“来找我的人，多得数不清，各有各的目的。”

我盯着他们，不愿再说话。他们才快快撤退。

### 三十一 孩子们去插队

每月大女儿米拉来给我送粮票，都被人监视着。不让说话。也不让她进我的木笼。

八月底，米拉又来了，她当着值班人的面说：“妈妈，我和都要插队去，很快就会走。现在，动员中学生去插队，我们就走吧。”

我无法，只得说：“好吧，你把弟弟带上一块儿走。从前，抗日战争开始，我就是带着弟弟走的。”

早听到了风声：中学生一律到建设兵团或农村插队，可又听说，建设兵团都在边疆，在东北或者内蒙。我曾忧心忡忡，怕孩子受不了。特别是米拉，是战争中出生，落地才四磅，地点就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延家川后边的郭家沟，是卫生部的战地临时医院。

因机关已撤走，我无法回去。到五十天头儿上，我雇个毛驴抱着米拉就走，到延安休息几天。七十天就到了前方。跟随着军队，紧追在敌人后边。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吃敌人糟塌过的脏水。特别是到了黄龙山一带，传染病很多。米拉病了，患的是肠炎，一路上都没好，弄得身体很弱。一周岁，她还不长牙齿，到北京后才把身体对付得好些。好不容易长大了，高中刚毕业，又遇上这个灾难。平时，她最怕冷，到了冬天，不管穿多么厚，她的脚手总是冰凉，可到了夏天，别人身上都上凉的，她还全身发热，这是一种病态。如果到东北，零下三十度，怎么受得了？非把她葬送在那里不可。

由于思虑过度，我又连夜失眠。

有一天，“探马”来值班了。我悄声问他：“都要去插队，去兵团，我那孩子身体太弱，我不放心，你可知道些情况？”

“探马”是复转军人，什么都懂，哪里都去过。很通情达理，遇机会我就问他。他说：“你先别急，我帮你打听一下，看情况如何？”

过一了个礼拜“探马”又来值班，他趁搭挡去打开水时，告诉我：“不要紧，可以不去兵团。听说兵团要的条件高，家庭有问题的不让

去，怕越境逃跑。兵团都在边境上。”

我放了一半心。似乎“家庭有问题”倒还有点好处，可以不去兵团。去插队，就比较灵活一些。

下个月，米拉又来了。她说：“我已和学校商量好，把都都调到我们学校，和我一块去内蒙。他们学校也是去内蒙，比较好转。”

我听说内蒙，心又一紧：“好冷呀，你受得了么？”

米拉说：“妈妈，不怕，人家都去，我们班的都在一个村，都是熟人。”

“衣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们把家里东西卖掉一些，备了行装。”

这次值班员干涉得更严，不许多说话。

最后，孩子再来时，值班人员不让她进门，孩子在门外伸个头说：“妈妈，我走了！”

我一狠心说：“走吧！勇敢些，什么也别怕！”

其实孩子一走，我的心全被她带走了。

下月初，小女儿来给我送粮票，说姐姐、哥哥已经来信，他们到了农村，都很好。一下车就给吃羊肉。我想，谁知道呢，孩子们都是报喜不报忧呵。

就是这些，值班人员也不让说，小女儿说话时，值班人员站在我们娘俩中间。

当然，值班人员并不是每个都坏，大部分是好的。个别人确实很恶。

小女儿走后，我就在小小的日历上划记号，九月二日点个点儿，是起程日，九月十日点个记号，是来信日。只要听见一点儿消息，我就划记号，有各种各样的记号，那就是我的记录，别人看不懂，只有我自己懂，可孩子到了哪里，我不知道。



从那以后，再也不准小女儿给我送粮票。

我日夜想着孩子，从我的想象中去梦他们的生活。过个时候，听说又一批青年去云南西双版纳。我就想，也许南方好一些？西双版纳真美，都是从电影上看的。

“探马”偷偷告诉我：“不好，那里虽是南方，可吃的全是老玉米。那是森林地带，闷热，不服水土。还是北方好。”我信他的，因为他当过兵，见识广。

又过几天，听说又一批青年去延安，报纸上还宣传，是江青到车站讲了话，把孩子们送走的。

从表面看，有人说这是“光荣”，是“旗手”送走的。

这个囚室里的值班人员也有议论：“她为啥不送自己的孩子走？他们那些新贵的孩子都走么？恐怕一个也不走。”

有个女值班员悄声说：“在火车站，车上车下一片哭声，谁家的父母愿意把儿女送到不知深浅的地方？都未成年啊！”

是呀！高中生最大的不过十九岁。初中生最小的才十二三岁，到陌生的农村，会遇到些什么困难？他们这一手，可得罪了全体人民。谁家没有孩子。

这么一想，就觉得孩子生不逢时，不该生出来。

我开始羡慕农民，谁也不如他们，永远在那块土地上耕种，世世代代的耕种，谁也不离开家，不用牵挂儿女。早知如此，我不如在几十年前就去种地，也给儿女安下个窝儿，打个基础，免得孩子满天飞着，落不下个窝儿。

又羡慕起家乡的那些农民亲戚。她们都在自由地耕种生活，哪像我竟成了个犯人。从此以后，我时刻注意农民的消息，我自己在考虑，什么时候能允许我下乡务农？孩子，让他们锻炼去吧！这就是报纸宣传：“中国没有失业者”。

## 三十二 政治混子

今天来的这两个人，我都认识。是我原机关的老熟人。一个是做机要工作的小韩，另一个是程副部长的秘书小吴。他们现在都属于XX部的造反派。他们俩，一九六七年两次到地质学院去找我“外调”。

那两次，态度特别好，好像去慰问我。他们看我被管制着，便把地质学院的监视人支开，单独和我攀谈，就可以轻松的说说笑笑。让我抽烟，慰问健康。我总算是他们的“老同事”嘛。

他们来的目的，是调查他们现在的副部长李景膺的情况。这个李景膺，就是陕北“肃反”时把人吊在梁上，搞“天崩子、地崩子”的政治混子。因为我和李同在一个机关，又不知他的历史情况，便就近向他作过采访。

六七年那次，小韩他们是来问我，李景膺谈了些什么内容？我书中用了他多少材料。其实，这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他们想告诉我，李景膺目前又造了些什么谣言。李景膺说：“一九五五年习仲勋到过监察部，开了个会，指示刘景范，要他写小说《刘志丹》。”我说：“这些事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刘景范早已离开监察部，一九五五年监察部的负责人不是他，根本没有他。”

李景膺是郭洪涛的亲信，目前看来一点儿不假。从表面看，胖墩墩的，说话结巴，像个老实人。历史上的事，也许出于幼稚，也许屈于权势，也许贪图眼前利益。再原谅一些说，是由于年轻无知。可现在，这些原谅之词全用不上了。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当了多年的副部长，老经事故、还在造谣生事。真是投机分子。

一九五五年，刘景范已离开监察部，习仲勋如果真的去监察部，只能和钱瑛打交道，再也见不到刘景范了。

刘景范根本不会写小说，他连看也不看小说。就是我，一九五五年也还没有打算写成小说。是一九五七年才开始的，那也不是小说，

只是历史素材的记录。

习仲勋一贯反对我写《刘志丹》。因为他怕我惹事。他能预料到，一写刘志丹，必然写出他如何受迫害。而迫害他的那些刽子手们一定要报复，他们这些人解放后又掌了权，得了势，报复起来非同小可。

总之，他很慎重，很担心。虽然他没有完全说出口，我能领悟到。但是我没有听他的劝告。

记得一九五七年我要开始采访时，去请习仲勋谈材料，他拒绝谈，他说：“人家要写《刘志丹》，让人家写去，你不要写。”

我说：“我也是中国的公民，为什么不能写？”

他说：“你是景范的夫人嘛？你写了，别人会给我们赖上，会说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企图。”

竟让他说着了。

不过当时，我反对他的观点，觉得不正常，我认为：“毛泽东时代是最讲理的，如果不能写出刘志丹，那就不是毛泽东时代。”事实证明，我估计错了。“毛泽东时代”并不那么宽容、合理。连柯仲平要写《刘志丹》长诗，也照样挨了打，整得丧了命。

我还记起另一件事：一九五八年冬，我写出第一稿时（实际是素材整理），李景膺看过一部分。他说：“千万不要写‘肃反’。我已去找过习仲勋同志，提出千万不要写‘肃反’。”

当时我很奇怪，他为啥那么关心‘肃反’问题呢？莫非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原来，他亲手主持杀过人。有一位已经贴出布告，还未被杀的人，是恰巧碰上中央赶到，未能开刀，才活了下来。这个人现在是外经部副部长。

那年，我曾向李景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肃反’问题还是得写，因为那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陕北后解决的首要问题。那是毛主席的一大功劳。现在许多书上都写着：党中央到了陕北，挽

救了危局。所谓危局，就是指的纠正了错误肃反、乱捕、乱杀。如果不写这件事，就把毛主席的功劳全否定了。这是抹煞党中央的贡献问题。

李景膺忙说：“是、是、是！应该写，应该写！”

他也怕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

同样，关于两条路线斗争他也反对写。他说：“现在写书，不能写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你对我错的，全不能说。”

这可能是犯过错误人的通病，怕写路线斗争。我说：“中央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时说：革命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全国都是一样。”

他说：“这话，党中央可以讲，别人不能讲。”

这又是一怪。我说：“难道我们和中央不一致？中央说东，我们说西？”

他说：“当然不能，当然不能。”

今天，小韩和小吴又来了。这次可是大变样。大概是听说我被正式关押起来了。要和我划清界限，气势汹汹指着我说：“李建彤，你和李景膺怎么勾结的？”

莫名其妙：我被关押着，怎么能见到他？

他们说：“李景膺交代了。前几天他见了李建彤，订了攻守同盟！”

对这两位年轻人，我不忍伤害他们。只解释说：“我已被关起来十个月，日夜有四个人看管着，哪有可能自由外出呢？这里值班人员有记录，你们去查查看。”

我看出这个花招，是小韩、小吴设的圈套。借口来审一审我，叫别人看看，也许是李景膺又造了什么谣言。

小韩又问：“李景膺在高岗问题上是什么态度？”

我说：“他是反对高岗的，一贯反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是‘正确’的。”

“他自己为什么说，他是站在高岗一边的？”

这才是千奇百怪，我几乎笑出来。稍加思索，也明白了。投机分子，是不知自己往那边站了。从前，他听说高岗是反党野心家，便表示，一贯反对高岗，投靠安子文一边。现在，他看见安子文被定为“叛徒”，他连忙转过身，再三掂量，两相对比，觉得“反党野心家”比“叛徒”还强那么一点点。他便一转身，说他是站在高岗一边的。现在是宁愿落个高岗的漏网分子，也不能沾安子文的边儿了。

我问：“你们相信么？”

他们反问：“你怎么看？”

我说：“有一次，我在监察部听钱瑛传达全国组织会议情况。她说：“安子文同志讲过，西北干部里，只有李景膺是最好的干部。他在组织会议上能反对高岗他们的意见，坚决拥护安子文的意见，拥护在农村把富农都发展成党员，共产党员可以去当富农。这事，也许我记得不全面，你们可去向钱瑛核对。”

小韩说：“我们已调查过，钱瑛也供了，说李景膺从前是反对高岗的，拥护安子文的，可现在李景膺死也不承认。因为他看见《人民日报》上正批判安子文的这个问题：说党员不能去当富农。”

其实，后来还有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因为李曾站在反对高岗的一边，占了大便宜。李景膺曾调任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的工作出了问题。所有的领导人都受了处分，唯有李景膺没受处分。钱瑛去贵州视察工作，把他包庇下来调回北京，又当副部长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拥护安子文，钱瑛也是拥护安子文的。他们有权，官官相护地过了关。

我才发现李景膺是最聪明的人，是个政治混子。他转来转去不能让自己吃亏。

小韩又说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就领着一派人反对我们的部长，想取而代之。成了一个派性的后台。这话我信，因为这时造反派最时髦，也最容易升官。我见过他们那个机关里的造反派。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一开口就说“打倒一切，是我们造反派的脾气！”

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讲话保他们的部长，说那位是革命干部，李景膺又慌了。连忙跑到部长那里道歉：“我错了，不该反对你！”一转脸，又起来反对另一个副部长。

是呀，李景膺觉得自己最聪明，其实，到头儿来没人理他了。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袁老说：“我谁都可以看，就是不看李景膺，坏透了，你还是个副部长嘛，怎么能翻来覆去呢？还造的什么反？”

### 三十三 请求给景范带用品

我的一封信

地质部军代表：

天气快到严冬，刘景范有病，我要求组织上把我家那条皮裤子送给他。那是二十年前在西北战场上穿过的。家里还有他一条被子，也带给他。

另外，他的毛衣、毛裤、棉衣、毛袜、棉鞋、围巾、手套、皮大衣等，如果不在他身边，也请送给他。监狱中如果买不到日用品，请送给他点牙刷、牙膏、毛巾、肥皂、纸烟、火柴等。

李建彤

1968.10.23

我多么希望这个要求得到实现。自己的人在另一个监狱，这边时刻挂念着他的死活，因为他患十二指肠溃疡、肝病。深怕他熬不过这场灾难。

第二天，专案组的徐州人和广西人来了，在那一刹那，我还以为要告诉我：“军代表答应了，这事你别管，我们一定送去。”呢。

出我意料之外，他们的脸变得像庙里的“周仓”，把我训斥了一顿，首先说：“你很反动，为什么说皮裤子还带上二十年前在西北战场上穿过的呢？是说我们把上过战场的人也逮捕了，不合理么？”

我想，你们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他确实是立过战功的人。刘景范在一九三四年，开辟过保安等几个县的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他当过陕甘地区的军委主席，领导那里的五次反“围剿”；当年冬天，“左”倾造成的三边反水，是他带军队去消灭的叛徒，收复了几个县。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他尽了职责，他当过陕甘宁边区的副主席、代主席。目前，曾当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主席的人都已去世，只剩下他这么一个人了，你们还把他关进监狱。

我说的“二十年前西北战场”，确实是真的，那条皮裤，真是在西北高原冰天雪地中转战时穿的，在解放战争中他整整奔走了四年，他以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身分，兼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林伯渠主席在后方主持工作，难道搞项目的人不知道这些历史？”

那广西人气得嘴唇打哆嗦，继续训斥道：“不要妄想，我们不会给他送东西。刘景范的事，你不要管，不许你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感情问寒问暖，对他的事，以后不许你发言！”

我这几天情绪不好。报纸上正宣传政策，我顺手写了个“思想汇报”。我写道：

报纸上的社论说，“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坚决清除出去。”

在政策上、理论上，中央是这样规定的，究竟怎么执行？我不了解情况，不知现在有无实际例子？比如说，某人按问题的性质，他是个走资派。但是，因为认识了错误、承认了错误，不再坚持走资本主

义道路，就没有成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所以，没把他当成敌我矛盾处理。

关于这个政策界限，涉及到怎样才叫‘顽固不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我还没弄清楚。比如，以我这个人的实际情况讲，就是写了一部小说，怎样才叫“不顽固”呢？

写书的过程，产生错误的原因，我都讲过了。此外，是不是别人提出什么问题，我就承认什么呢？比如，他们说：“习仲勋交代了，他对写那本书，有他的打算，他想把那块根据地写成‘正统’，他想当那块根据地的‘第三继承人’，我就按他们的要求。马上承认说：“对对对，他就是那样说的，我就是按照他的意见写的。”这样是否就算我彻底交代了呢？不顽固了呢？比如我说：“他那样的思想我不知道，他没有对我说过”。这是否就算我顽固呢？在我身上，这是个实际问题。

中央的政策是宽大的，但是在我的问题上，究竟怎么才叫“不顽固”？怎样才算“交代清楚”了呢，我感到这是个无底洞。

对《刘志丹》这本书，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五年去掉，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也已经打了两年人民战争。你们都说，这本书的要害问题是“为高岗翻案”。我敢断定，就在这场人民战争中，也没有人敢说我和谁商量过“要为高岗翻案。”我访问过那么多老干部，从来没

有议论过这些问题，可见那事情的本质，并非某些聪明过度者所想象的那样。

如靠想象，我也可以想象出某些人正在做陷害人的文章。

李建彤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项目组规定了题目，要把我的思想，系统地挖出来，摆在桌面上，叫大家批判。

当然是前几天我写东西惹出的麻烦，和他们纠缠不清。我只有在“检讨”中写出“反检讨”，在“承认”中写出“不承认”。在“紧箍咒”下写出挣脱。在“顺从”中写出反抗。

我按规定的题目写道：

### 一、我的认识过程

确实，我没想到，这本小说是反党的，更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恶果。

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前，就是中央领导人（康生）讲话之前，我始终认为这个案子是阎红彦与安子文之流勾结起来搞的鬼，怎么能说是“为高岗翻案”呢？根据是什么？什么叫“翻案”？

所以，当问题发生之后，旧中组部项目组找我谈话时，我的情绪是这样的：“我没有宣传高岗，是姓阎的宣传高岗。”“我写的不是高岗，谁说我写的是高岗，拿出证据来，罗炎身上有多少高岗的材料？”

项目组有人说：“基本上是高岗的材料。”我说：“什么叫基本？百分之六十以上才叫基本。不到百分之六十不叫基本。那是个综合人物，七个材料中只有他的两个半，还不到百分之五十，怎么能叫基本？”

我说：“既然高岗历史上是个坏人，我书中写的省委干部罗炎是个好人，是五、六个人的材料揉合起来的，所以，他不是高岗。谁说他是高岗，就是谁为高岗翻案。为什么不把那个叛变了省委书记杜康当成高岗？为什么不把那个有毛病的军委书记江力当成高岗？为什么不把那个戴眼镜的政治委员李可夫当成高岗？为什么不把游击队里的大队长周光当成高岗？偏偏要把罗炎当成高岗呢？又说他历史上是个坏蛋，又说一看罗炎就是高岗，罗炎可是个正面人物，这矛盾如何解决？”

我也曾拿现实的事例作比方，比如阎红彦是某省的省委书记，现在是红极一时的人物（指一九六二年），如果以后他发生了什么问题，再查到云南省的历史时，就再不能说这里曾经有个阎红彦了？如果再提起他，就是为阎红彦翻案？

我的思想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虽然在一九六二年的项目委员会，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但对这件事的性质，我不能认识，我也没有写过思想检讨。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份，中央文革的姚文元写文章点了我那本书的名字，我才感到事情越弄越重了。为了维护毛主席的路线，不理解的也得去理解，要多从错误方面去想，从大局着想，为了大局利益，要上纲，从那时起，我才在思想上的把小说定为反党了。

## 二、我的反党思想和罪行

我的反党思想和罪行，是表现在我的《刘志丹》小说里。

每次批斗，都说明本书的要害问题是为“高岗翻案”。高岗早已定为反党分子，世人皆知，为什么书中发生了高岗问题，这就是我的“反党”思想所在。

开始是有所警惕的，在第一稿的写作过程中，凡涉及到高岗，都回避了。到第三稿改成小说时，就变了样子，要塑造各种人物，就需要个红军政治委员，谁的材料也可以用，反正是写小说嘛！文艺作品就是虚虚实实。红二十六军的政治委员身上，牵连到用不用高岗的材料问题，我和《工人出版社》的杜映、何家栋一块研究过。认为他的材料可以用，不过要尽量少用。从历史上也找不出不能用的理由。过去没有经验，也没看见什么规定，只有从书上找根据。杜映和何家栋从出版社找来《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那里边曾提到毛泽东也受过陈独秀思想的影响。陈独秀早已被否定。可是毛主席自己讲的受过他的影响。

我又翻开《联共（布）党史》提到普列汉诺夫时，肯定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也承认他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根据这些前例，我就认为高岗的材料也不是不可用，历史唯物主义嘛！我给自己的“反党”思想找到了根据，讲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我的“反党”核心。

我的罪行是，在第四、第五稿中，“罗炎”身上用了高岗的两个半材料，我认为土地革命时他是对的，那时打倒反动派，建立工农兵政权，不能说那就是错误。这就是我用他材料的根据。按新的规定，既然是反党分子，就应当把他的历史一笔勾销。中央已指出来了，要“把他对革命的局部贡献一笔勾销”。我理解，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否认他过去是革命队伍里的人。而且有“局部贡献”。另一个是，要把这“局部贡献”一笔勾销。我没有照中央的指示做，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措施，这个行为就是反党的。

至于《我们的老高》那本书。是一九六二年中宣部的某负责人找我谈话后，我告诉了出版社的编辑们。因为那负责人说：“高岗也可以写，毛主席说：过去他还是对的，在延安时我还是听他的多！”何家栋就去借了那本书，我没有看，不打算再增加材料。

在批判中，说我的第二个罪行：是书中剽窃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说的话，过早的，不恰当地用在别人身上，就变成了反对毛主席的性质。例如“星星之火”，“武装割据”、“钦差大臣”、“愚公移山”等话的用法。

产生这问题的原因，是我认为那些都是古人说过的话，用早用晚没关系，谁用都可以，这就是我的反党思想。怎么能把伟大领袖用过的话用在别人身上呢？真是罪大恶极！

批判我的反党罪行三：我的书中写了一堆反党分子，因为过去和刘志丹一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人，特别是陕甘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除早已牺牲者外，能活下来的，都被高岗之祸牵了进去，能站住脚的

已经不多，可以说，陕甘根据地一扫光，都成了“反党分子”，或者“反党骨干”了，只要我塑造人物时收集他们的材料，必定是反党行为。

批我的第四个反党罪行：一九六二年我改动了采访记录，那是我认为，安子文和阎红彦结合起来要消灭陕甘干部，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干部，怕他们借我的记录陷害别人。其实，谁谈材料都是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打过什么仗，谁陷害过谁，谁搞的“肃反”，我怕安子文借记录挑拨干部关系。借刀杀人。

我还认为：记录是我的，我有权修改。

我认为：我是正义的，要保护大多数人。如果一定要追究，我宁可牺牲自己。

这种义气是“反党”的。

### 三、当初写小说的动机

写《刘志丹传记》，是《工人出版社》提出来的。这个动机，可能是在一九五六、五七年那种写，革命回忆录，的空气中造成的，中宣部、出版社、都有写刘志丹的计划。后来改成小说，也是《工人出版社》提出来的，觉得我写出的真人真事。人物太多，不好处理，便改成了小说。

至于我自己的动机，很简单，在延安当学生时，就听过刘志丹的故事，唱过刘志丹的颂歌，觉得刘志丹是革命烈士，他胸怀全局，应当学习他，把他写出来，大家学习他的风格，他艰苦朴素，忠于人民，在任何情况下毫无怨言，直到牺牲，正像毛泽东给他的题词中写的“他的牺牲，是出于对人民事业的忠心耿耿”。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所以，我写他时倾注着很深厚的感情。

那本书的前半部，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后半部是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王明路线的存在，是中国革命的真实，可查看毛泽东的《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说：在遵义会议以前，即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中国的党是被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着。毛泽东在讲到王明的路线造成的恶果时说：“是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

王明路线的浪潮，自然也涉及到陕甘地区，那个路线的黑手也伸到了陕甘地区。不写这些，就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我写到这些问题时，总是强调只有毛泽东主席才能挽救革命。那些受王明路线迫害的好人，日夜盼望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记得在第三稿的最后（一九三五年），曾特别写道：“毛主席救了陕北”。

那时写书的真实的想法就是这样，因为书中用了高岗的两个半材料。就造成了恶果，成了相反的东西。使人掀起了一个打《刘志丹》的运动。

#### 四、小说和习仲勋的关系

按事情的过程，就是从前说过的那样，我曾请他谈材料，他不谈。一九五八年，我把初稿的照金地区部分送给他看，那是核实资料，他没表示支持。

一九五九年冬，出版社用公函给他送去第三稿，一九六〇年他才看完，他认为没有写好，不同意出版，要我修改。我和何家栋又写了修改提纲送给他，并要他谈点材料，他才谈过一次。参加的有出版社的总编吕宁，出版主任周培林和我。三个人都做了记录。那次，最高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也在场。这实在是个阳谋，不是阴谋。第四、第五稿也送给他，他没看完，没表示态度，我们写的那个修改提纲，习仲勋是看过，但在整个过程中，我把它抛在九霄云外，自由发展了。

在修改第四，第五稿中，也接受了习仲勋一点意见。现在回忆起

来，大的问题可能有这么几点：

(1) 他认为我们对刘志丹还不理解。他对刘志丹的看法是：“志丹是好人中的好人。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那个地区，他有代表性。”

他讲之后，我和吕宁、周培林、何家栋一块研究过，怎样去理解刘志丹。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为刘志丹的题词。认为他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英雄。

我又翻资料，陕北的群众那样喜欢他，到一九三五年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时（中央未到之前），几乎每打一仗，当地群众都编的有歌。刘志丹每到一地，干部和群众就把他围起来。敌人呢？又是那么恨他，对他作过专门的研究，把他当成西北地疆的“匪首”，当成陕西，甘肃的祸根。他牺牲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都悲痛万分，开追悼会，人们哭得天昏地暗。敌人则是那样高兴，开了庆祝会，把打中刘志丹的那个部队全体升了级。

这样鲜明的对比，就说明了一切。

我没有见过刘志丹本人，当我去写时，也要写出他那“民族英雄”的气概，“群众领袖”的风度。

(2) 习仲勋说，在最困难的时候，要对敌斗争，又有党内斗争，这时敌强我弱，斗争很残酷，人那么少，天天都有牺牲，能多团结一个人也是好的。所以那时对高岗是尽量团结。在路线问题上，高岗也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反对过右倾，也反对过“左”倾。但那是过去的事，不必提了。

我在改稿中，没把高岗的材料完全甩光，没有按他说的“不必提了”。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责任。

(3) 在永宁山一章中，我本来写的是个“红色堡垒”，意思是说，这个县的军权、教育权、都被革命者掌握了，成了我们活动的据点，

他看后说：这是个“白色堡垒”，不是“红色堡垒”，因为整个政权还在敌人手里，虽然有革命活动，最多是点“星星之火”。

我改稿子时，就把标题改成了“星星之火”。出版社编辑主任杜映说：考虑考虑这句话能不能用，因为毛主席在南方的根据地是称“星星之火”。我说：毛主席在南方的根据地是全国的红旗，全国的榜样，毛主席把全国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都是当成“星星之火”的。况且，这是成语，古人用过的。永宁山的革命者夺了一个县的军权，教育权，也可算一点“星星之火”。不会有人说，这句成语别人能用，我不能用。

习仲勋和这本书的关系，基本上如此。

专案组说：习仲勋思想里有什么打算，要在这本书里捞个什么资本，他确实没有对我说过。什么“正统”，什么“继承人”。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不能瞎说。

李建彤

1968年10月30日

这篇检讨交上去了。

### 三十五 吴台亮专案

外地又来人提审，是追查陕西省检察院院长吴台亮的事。对这个好老头儿，我很尊重，虽然他文化低，却是极诚恳的。一九五八年我去访问他时，他是那么热情、真挚，要把肚子里装的事统统倒给我，甚至连他记起的红军时代的歌曲，也唱给我听。

他的脑子真好，歌词一句不拉，曲调风味很浓，充满了陕北工农干部对红军、对革命的感情。真的，在向他采访时，我又记词又记曲，忙个不停。因为他唱的歌，连我在“鲁艺”学习时也未曾收集到。我回来后曾写信给石鲁，让他去听听吴台亮唱歌。

可是这些，我不愿告诉现在的“造反派”，因为他们会把好事说成坏事，造老干部的反。

西安这次又来了三个人。对陕西人，我是有半个乡亲之情的。但到了这时，却成了敌我矛盾。成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双方都是如此，一切都被扭曲着。

他们先问：“你为什么访问吴台亮？”

我说：“因为他写过‘革命回忆录’，我想要他的材料。”

他们说：“什么革命回忆录？是反革命回忆录！”

我说：“他写的是红军时代的故事。为什么说是‘反革命’回忆录？把红军称为‘反革命’，这是反动派的观点！”

这下子惹恼了他们，外地来的和本机关的项目人员一块和我吵起来，这就谈不成了。

第二天，项目组把我带到楼上，在个办公室里，有四个人提审我。其中一个穿军衣的。我也弄不清是哪来的“军代表”，还是康生派来的武装提审人员？样子很神气，摆出了“权威”架子。他问道：“听说你的态度很不好，你还骂群众？”

“我什么时候骂了群众？骂了谁？”

徐州人和广西人出来作证明：“她骂外省来的项目人员是反动派。”

一说这话，我马上火了。我说：“他们真是反动观点，为什么把红军当做‘反革命’？我现在还是认为他们是反动派的立场。”

那军人说：“他们是群众！”

“带着项目任务来提审我，也叫群众？不要用群众名义打掩护，真正的群众不会是这样！”

那军人还要说，我又顶了上去：“如果说，搞吴台亮项目的人是群众，那么，中央直接领导的《人民日报》呢？也是群众？那报上为



什么把‘南梁’说成是红二十六军‘盘踞’的地方？‘盘踞’是反动派对红军的诬蔑，把红军贬为‘土匪’，把红军住的地方叫做‘盘踞’。

《人民日报》的编辑应当撤职！那你就去撤吧，就在批判《红河激浪》那天的报纸上。决不是只有我这个人才看得见。谁心中无数。”

顶到这里，卡了壳，那军人的脸唰地变红。

我不罢休，他们也不罢休，要我按他们的规定写个补充材料。

我写道：

补写吴台亮的材料

陕西某机关：

一、一九六〇年去西安时，我没有找过吴台亮。（这里声明）

二、一九五八年吴台亮谈的材料我没有整理出请他核实。

因为他谈的材料和他写的文章差不多，没什么大事情。我的初稿和以后的稿子都没有给他看过。我和吴台亮只见过一面，素无来往。

三、我写的第一、二稿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说，所有的人都用真姓名。吴台亮也是真姓名，这稿子现存在中央项目组。稿子中没有“罗炎”。没有高岗的材料。到第三稿改成了小说，所有真名实姓全不见了。里边出现了许多不认识的人，出现了“李拐子”，这就是吴台亮的变名，为写红军的政治委员，也出现“罗炎”。

“小说”中的人物都得和政治委员打交道，但人家本人可没谈过这人的材料，这不是吴台亮一个人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如果把我小说中写的，凡是和“罗炎”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是谈了高岗的材料，就都当成“反党分子”，打击面就太宽了。这件事实际上是我写作中的“错误”，与别人无关。

四、吴台亮谈的材料中还有：陕北一九三五年二次反“围剿”时，游击队在山上打落了反动派的飞机，俘虏了驾驶员，群众痛恨敌人，要打死俘虏，刘志丹就给他们讲俘虏政策。老刘说，因为这些人脑子

里有反动思想，才干出反动的事，我们不杀他们，要给他们换脑筋，进行政治教育。

关于吴台亮谈的材料（包括前次你们来时我写的东西）还有他写的革命回忆录，你们说：“那是什么革命回忆录？是反革命回忆录。”我很惊奇。如果你们把三十多年前，为建立民主政权而消灭反动派的行为，看作是“反革命”行为。这是自从世界上产生马克思主义以来从未听到过的奇特现象，只要你们觉得这种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你们就去作结论吧！不过，我相信，毛泽东主席不会同意这种观点，虽然那时毛主席不在陕北，他也会把陕北红军（包括陕北和陕甘）为消灭反动派所作的许多斗争，都看作是革命行为。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也已提到，中央来的时候，陕甘边地区是块革命根据，不是反动派统治的白色区域。当然，应当着重指出，中央来的时候，那块地区正发生着王明路线所造成的危机。中央用遵义会议的精神，挽救了那块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中央来陕北以前，那是个什么局面？反动派动员了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甘肃的杨子恒、陕西的十七路军，陕北的井岳秀，山西的阎锡山，反动派还派来嫡系高桂滋师，加上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以数十倍的兵力，从四面八方来“围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他们把红军当作“赤匪”，把红军的领导当作“匪首”，把红军的活动当作“流窜”，把红军的根据地叫做“盘踞的巢穴”。现在我们的“自己人”为什么也用同样的腔调？把红军和干部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这种立场究竟是和谁站在了一边？谁会拍手称快？

为了创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牺牲了多少革命人民？在陕甘边、陕北的人口中，几户人中就有一位烈士。没想到三、四十年之后，他们这些流血牺牲的壮举，却被某些人看作是“反革命”历史。好不使人痛心！去问问那些烈士们的家属，他们家中的人是跟

着革命队伍打仗牺牲的，还是跟着反动派打仗牺牲的？是打白军牺牲的，还是打红军牺牲的？历史岂能容人随便颠倒？

现在，我虽然已失去自由，这也算不了什么，我还是要说话的，不管我的话会带来什么恶果，我都要明确地对你们说：“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因为你们这种观点是违背人民意志和普通常识的。

李建彤

写完，专案组拿去看了，又退回来。他们说：“这样写法不行，这是反攻倒算！”

我把材料放下，自己在上面注明，此材料项目组不肯收，作废！他们命令我再写一个补充，我又将上次写的作个摘要。

我看见他们在后边加了批语：“李建彤系反党份子，此材料仅供参考”。

事情并没有结束。过几天，青海人把我带上楼。在另一个办公室里，坐下后，徐州人和广西人轮着向我训话。

他们说：“你来这里后，有几百起人来找你，人家找你一次也不容易，都要走上千里路，还经过军代表批准，才能见上你。可是你，毫无诚意。凡是来过的人，对你都有意见，告你状有几百条。怎么得了？”

我说：“虱多不咬，债多不愁，有一千条意见我也不怕。我有个硬肩膀，能够承担一切压力！”

他们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想想你的前途？”

我冷冷地回答道：“前途不能靠向错误投降来取得”我没有违犯宪法，没有违犯刑律，我应当有权去当农民！

那时，我的确把一切都看淡了，我真想去当农民，就怕他们不让我去。

事情没有完，我等待着对我的处置，可我有闷气，怕气出癌症。

赶快钻回木笼里唱歌。我的木笼和值班人只有一板之隔。唱什么都会被听见，出口气都会听见。我只得看见报纸上登什歌，我就唱什么歌。因为这些歌不犯禁，引不起猜疑，都是些颂歌。我管他好听不好听呢？只是为我散心、活血。忘记那些不合理的一切……

唱吧！唱吧！管他们如何汇报呢！

## 第二部

### 一 难友

一九六八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按照命令，我又搬进地下室。

刚进来，空无一人。我以为又把我一个人放在了这里。可是看那房中，是放着四块木板床。我先进来，就住了靠窗的床。窗户只有半截，这是地下室，大半截在地下，一小块露在地面上，透进些微弱的光。这里白天晚上都需要开灯。

我刚铺好床，专政人员又押进一个女人，行李就放在我对面床上，样子很面熟，她在木笼外也曾经值班看管过我。她的样子很可爱，一付热情而机灵的脸。那时，我就喜欢她。虽然她是看管人员，我是犯人，不能多对话。我问她：“你又派到这里来看管我？”她摇摇头，苦笑着：“不是，我自己也被关押了。”

她很年轻，看去约有三十四、五岁，审查她什么？为什么关押她？我问：“你有什么问题？”

她说：“我的家庭是资本家。”

我纳了闷：家庭是资本家也要被关押？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呢？他们也不是工人家庭呀。

我问她的身世。她很坦然：“我名叫张坤娣，是地质学院五六届毕业生。大学加入了共产党。母亲是位老京戏演员，父亲早年是在东北开银行的资本家。我母亲生了我们姐弟三个。父亲在东北解放前就去世了，资本没有了，就剩下一幢楼房。母亲只得靠出租房子的收入养活子女……”明白了。她说的资本家，就是出租了一幢楼房。

又进来一个女人。齐耳短发，精瘦精瘦的，额首上绷着黑带子。她像个小姑娘。我呆看了一阵，叫起来：“你这么小，到这里干什么？”

这人也够直率的，毫不犹豫地：“我名叫钱凝，是右派。”

“我不小了，已经三十九岁，学物理的，解放后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

我一计算，打右派那年她才二十六岁。好个聪明年轻的人才！我问：“右派已经这么多年了，还要关押？”

“斗争我好久了。我有海外关系，父母在美国。”

不知怎么搞的，我心疼她。虽然她说已有三十九岁了。可我看她不到二十，瘦得只有七十多斤，身高一米六以上，只穿一套蓝布棉袄、裤、蓝布罩衫。额前那绺头发，拨拨楞楞地，像个中学生，一说话就低头。

她们两个认识，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就说起来。互相问着孩子。钱凝问张坤娣：“你的孩子留给了谁？”

坤娣哭起来：“我的小女儿还不到一周岁，正喂奶时把我揪来了。”

钱凝擦着泪说：“我的两个孩子都交给了阿姨，大的三岁，小的才一岁，唉！有什么办法？我爱人也被抓走了。”

我这个囚室复杂起来，不像木笼子里那么简单了。

快到中午，又送来一份行李，后边跟着一位年纪稍大的半老太太。我一看是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的同学。我叫了一声：“宋克，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她把脸一扭，不理我。别人和她说话，她都理，就是不理我。看她那胆怯的样子，好像里边有什么文章。我想：我这个“反党分子”是登了报的，全国出名的，既然把你和我放在一块儿，就是不怕你中我的毒。可她本身又有什么问题呢？

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学习时，就听说她在开封女师念书时，集体参加过什么组织，到革命队伍里就交代了。大概就是那件事，现在又翻出来，三十多年前交代过的老事，现在还揪住不放。

原来是专政办公室知道我们俩是抗大同学，规定不让宋克和我说

话。不过，谁也没有告诉过我。而我呢，却偏爱较劲，我不能让空气紧张，刺激人的神经，我要打破他们的规定。

有人来开锁了，外面有人叫着开饭。这里和木笼子完全两样，不派人押着我去打饭了，食堂派人送到地下室，拿来什么吃什么，别无选择。一看来打饭的人，站了一大堆，可真多。约有二、三十个。

吃完饭，房门又上了锁。我们四个人在这间小房里坐牢。吃罢饭，再叫人开锁，好出去洗碗。有一个大缸，装着凉水，里边漂两把大木勺，各人舀水洗碗后倒在污水桶里，然后回房里再被锁上。

晚饭后想休息一下，一看房顶上挂的管儿灯，照得人眼发胀。想关掉，狱卒又在外边叫着：“不许关灯！”

他们要往里张望，房门上端玻璃上不许封纸，不许挂布，要敞得透明，不能挡住狱卒的眼睛。他们要窥看犯人的行动。

钱凝悄声说：“我可以做个灯罩！”

上面指定宋克当组长，我们请宋克去找旧报纸，她找来了两张。钱凝动手做，把纸做得一头轻、一头重，用绳子拴在管儿上。下边吊两根活动绳。晚上把纸拉上去，既有灯，光又暗，房里人可以睡觉，狱卒也可从外面看见犯人的活动，白天拉下来，满房子大亮，可以看书。我们说钱凝：“到底是个学物理的。”

我们要用开水，要由组长宋克去打。这是上边对她的信任和优待。因为打开水要跑到院子里，靠不住的人不许出去。她也真能干，双手提着四个暖水瓶。在地下室跑来跑去。每到晚上，四个人都要用点热水、洗脚擦身、老太太可忙得够呛。

## 二 门外有狗

按上边规定，犯人晚上九点以后才能睡觉，九点以前不许躺在床上。自然也不许拉起灯罩子。

吃饭后四个人一起敲门，要求上厕所。狱卒开了锁，我们四个人由人押着，一起爬上一层楼，到了女厕所，我们把门闩上，把狱卒留在门外。这正是说话的好时间、地点。趁两个年轻人都进了小格子门，我问宋克：“他们叫你汇报吗？”

我说：“咱们四个人在房中说的话，你可千万别汇报，那能把人憋死，目前一切都不正常，他们拿去一上纲，就乱套了。”

宋克点点头说：“是呀，我明白，我明白。和你的想法一样。”

回到房中，四个人对坐着。我暗想，单身牢房最苦，能使人变成哑巴。如今我们四个人，可以动动舌头说话了。但必须成个团结的集体，互相帮助、互相掩护、互相体贴，才能熬过这个苦难的日子。据我的判断，他们三个人都不是坏人，都没有违犯党纪国法，都是不该受这种刑罚关押的。

现在，在房里说话，门外总有人听，总有个人头在门上端的玻璃外晃来晃去，因此，我们四个人就想办法。我床前有个两屉桌，是准备我写口供用的。我把报纸和《毛选》摞起来，人躲在书后面，再用右手托着脸，使门外看不见我在看书，还是在说话。

张坤娣床前也有张两屉桌，是供他们三人用的。坤娣坐在床上，宋克坐在朝门的一头儿，她的脊背刚好挡住门外的人眼，她俩可以悄声说话。

钱凝的床铺在门后边墙犄角里，透过玻璃往里看，根本找不到她的影子。她可以自由些。狱卒们要进来，锁一响，大家就紧张起来，正襟危坐。

我怕老宋愚忠，胆小怕事，我以老同学的身份，干脆当着大家挑明说：“老宋，上边也知道我们是同学，就不让你理我。可他们为什么偏把咱俩放在一个房子里？听他们那一套，咱们都该死了！”

坤娣和钱凝都笑起来：“原来你们是同学呀！现在又同学了，关



在一间囚房里！”

苦中取乐，谁有心笑呀。坤娣一转脸，又拿起她给女儿织的毛线帽子掉眼泪。

宋克也敢说话了：“真不讲政策，她的孩子正吃奶，就把她拉来关押。按法律讲，有正吃奶孩子的母亲是不许关押的。”

我问：“坤娣，谁给你管孩子？爱人是干什么的？”

“刚把婆婆接来看孩子。我爱人是 XX 乐团的独唱演员。”

“你也爱唱歌？”

“我从前是大学生合唱团里的，我爱人是派到我们学校教唱歌的，我们就要好了。”

“呵，你们还挺浪漫的。”

这边说着，钱凝那边唉声叹气，低着头，像是向谁祈祷，虽然她什么教也不信。我们三人有同一个心思，怕钱凝孤独，她家在海外。三个人同时小声叫她：“喂，钱凝，你在想什么？”

她说：“我是想孩子，我国内没有亲人，把孩子扔给了阿姨，都那么小，我怎么能放心？”

我们问：“阿姨好么？”

“还可以，是南方人，我怕造反派把阿姨赶跑，孩子就不堪设想。”

我们三人同时小声劝她：“这种境遇不止你一家，阿姨和孩子如果有感情，她会想出对付的办法，困难总会过去的……”

我问钱凝：“你为啥没去美国？”

“我父亲是工程师，当初是随着他所在的工厂迁到台湾的。后来自己又转到美国。我舅舅在美国。我那时正上高中，想毕业后考清华大学，我喜欢清华大学。不愿随父母走……”

“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呢？”

“我给领导提了意见，说他们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他们就说我攻击领导。”

只这几句话，就明白个大概。我可怜她太幼稚，太天真！心想，你这个身份，这种社会关系，怎么敢提意见？

“专案办公室还命令我，每礼拜写一次‘思想汇报’，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你们写过么？”她的头低得不能再低了。

宋克和坤娣也说有这个任务，就是不知怎么写。我说：“不要怕，那容易，我常写。我的办法是，借他的风，行我的船。给他们留下历史记录。他们会给你放在档案里。是我们的历史记录，也是他们的历史记录。我们这段历史并不是耻辱。他们这段历史也并不光荣。”

一夜钱凝未眠，她在展转反侧。

早晨起来，按照规定，要集体向毛泽东主席请罪，要对着毛泽东像，先唱对毛泽东的颂歌。

我们四个人，整整齐齐站在毛泽东像前，齐唱《东方红》。

也不知怎么搞的，平常都会唱。现在四个人唱了四个调，乱七八糟互相串音，唱着唱着，自己笑起来。请罪的内容也是各说一套，宋克是某研究所的领导人，她请罪的内容是为何没有开好“钻头会议”；张坤娣是检讨她不该吃资产阶级家里的饭；钱凝检讨她不该给领导人提意见；我当然是先背毛泽东的那条针对我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四个人同时说，各说各的，互相干扰，串音，大杂烩，说不到一个点子上，越说越乱，越乱越说不成条文。逗得我们笑了又憋，憋了又笑，正笑得不可开交，坤娣一扭脸，叫了声：“门外有狗？”

原来门楣玻璃上有个人头，瞪着圆圆的大眼。

### 三 关押的非无产阶级分子

地下室有十个囚室，我们女囚室是第三号。

外边哨子一响：“集合，放风！”十个房子都出来了人，就在地道里排成队、报数。带队的也是“犯人”，名叫董西。

“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报到最后，整整二十七个人。排在最后的那个人不能叫“二十七”，要说“满伍”。那个说“满伍”的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高级工程师，名叫盛继夫，浙江人，把“满伍”说成“麦喔”。我们四个女犯人只想笑，从此这“麦喔”就成了那位老工程师的外号。是个辛酸的外号。

董西带队上了一楼，出了院子，在东专业馆门外排队，冲着毛泽东像三鞠躬，请罪，由专政组长朱山领头背《语录》，就是全国当时最盛行的那些语录：“凡是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不化……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大家低下头，向毛泽东主席请罪。听头目训话。突然有人喊到：“宋克，低头！”

宋克却突然把头一仰，向台阶上一望，她要看清那是谁喊的，然后甩一下头发，再把头低下。

我明白，喊的人不是朱山，是另一个掌权人。老宋要认清那个人是谁。

老宋对这里的人很熟悉。她已在这里工作多年，那个专政组长朱山，就是她领导下的一个技术员，如今一造反，成了造反小头目，得意忘形了。

朱山又气势汹汹的吼道：“黄汲清，你今早请罪没有？唱歌没有？”

黄汲清，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副院长、高级工程师。全国闻名的地质学家。这时已六、七十岁。他怯生生地说：“我唱了，和那个朝鲜族青年一道唱的，一块请罪的。”

朱山吼道：“我在窗外听了，你没有唱！”

真是有口难辩，谁敢出来作证明？

朱山又吼道：“黄汲清，站出来，到台阶上自己唱！”

这不是成心耍弄人么？我的心紧绷绷的，替黄老捏一把汗。他一个人怎能唱得成啊？这么大年纪。和别人一块儿唱，还可混过去，硬让他独唱，是让这个老知识分子难堪。

黄汲清不敢不听造反派的命令，他只得迈上台阶儿，一个人弯着腰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到“呼儿嘿哟”，再也唱不下去，只能“呼儿嘿”、“呼儿嘿”的重复。我们听得哭笑不得。他老人家唱得哭笑不得。

最后，朱山厉声喝道：“下去！”

黄老只得弯着腰，羞辱难当，又气闷难忍地归了队。我的情绪极坏。心里在咒骂：“中国的知识分子活得太委屈了，简直不当人看待。要受这么大的污辱、委屈！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这位黄老，如果不是认为解放了的中国好，他为什么从国外回来？难道从国外回来不是可贵的？”

放风，当然是囚徒享用的专词。其中包括请罪和跑步。带队跑步的人还叫着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我的心脏不好，请了假，不参加跑步，只抓紧时间散步。地点是在汽车库外面的小广场上，时间仅有一个小时。

这个不大的广场，包含着侮辱、反抗、讥讽。这里边有副院长（正院长是地质部的一位副部长兼任。不在这里参加“运动”）还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研究所所长、技术员、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观察着，据说这都是“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来的“非无产阶级分子。”

我的一次思想汇报中写道：“从十一月三十日起，允许我们每日

“放风”一小时，可以见见太阳，散散步，呼些新鲜空气。真感谢毛主席，还让我们这些人放风！”

只要有“放风”二字，就说明他们违法，侵犯人权。这就是我给他们做的历史记录。让后人知道，在这场“革命”中，中国有一部分人过着囚徒生活，我也在其中。我绝对相信，他们会把我写的东西统统放在我的档案里。

#### 四 马文瑞专案

两个专案人员是浙江人和青海人，拿了个木牌下来，往专政办公室一放，就把我领走了，这是要提审。一个木牌儿换走一个“犯人”。

自从第二次把我锁在地下室，虽然能和同伴们悄悄说话，可我内心却充满着愤怒：凭什么锁我？我跟随专案人员走，上楼梯时，我把脚踏得又稳又响。

在二层楼的一个办公室里，正面坐着一个大个子军人。我刚坐下，他便从军大衣袋里掏出个本子，晃着说：“看我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向我说明，他手里拿着我的采访记录，他是中央专案组派来的。只有进了中央专案组的人，才能拿到我的记录。那是一九六二年中央专案委员会的人从我家里没收的，一代一代交下来，交给了现在的仍属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记录就是他们的宝贝，他们的资本，我自己的记录我认识，虽然事隔多年，我的每个记录本都有特点，全是精装硬皮的，颜色各异。

我把这个胶东嗓音的军人盯了两眼，说：“我明白，你手里的东西就说明你是从上面来的，你有权力！”

他以统治者的口气问：“你到这里后有什么想法？”

我答：“自从我被捕那天起，就没想再出去！”

“谁捕了你？这不是监狱，这是群众专政！”

我说：“不是监狱？为什么落锁？为什么提审？为什么放风？哪一点不是监狱的办法？”

他无言对答。其实，有的话我还忍着没说出口。我想说“恐怕是‘犯人’太多，大监狱里装不下，才在各机关开设监狱的吧？”

我计算本机关的职工，共有七、八百人，关押的有百分之十几，将近百人。除了我们这个地下室，对面还有个大楼，叫做“野外大楼”，是为去野外工作的人而建造的，而这个时期，却关押着几十人，有人说，那叫“日托”，就是白天关着，晚上可以回家睡觉。

随武装人员来提审的记录员，坐在我左边的桌子角上，他随手写的标题是“提审李建彤”。

胶东大汉板着脸向我摊牌：“把你和马文类（瑞）的来往交代清楚！”

原来他是管马文瑞专案的。可惜连“瑞”字也说不清。

在中共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原是定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自从贾拓夫死后，就又补上马文瑞，变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也成了头目之一，没有马文瑞，就拼凑不成什么“集团”。只有两个人，就只能称谓：“联盟”。

马文瑞是和我们同一天被管制的。即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下午。

胶东人又在发问：“马文类（瑞）跟你说过些什么？”

当年采访马文瑞，他谈的和后来利瓦伊汉谈的问题是同样的。刘志丹牺牲后，他档案里还写着“严重右倾”。虽然不当“反革命”对待了。可还按“右倾机会主义”对待。我听讲后，当时几乎哭出泪来。刘志丹是背着政治包袱上前线的，牺牲在战场上。我非写出来不可，我要鞭挞那些坏人，揭露那些人，为刘志丹申诉！没人敢写，我敢写。

但是这些，我不能对目前的专案人员说，只能埋在心里。

我只说：“很简单！在延安时马文瑞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我只

是见过。不算认识。我写《刘志丹》，应当向他采访。他说的内容就是他曾经见过刘志丹的事情。都在记录中。”

胶东人的眼睛像磁珠儿，滚了两下，绕个圈子，提出他认为的“要害”问题：“马文类（瑞）对陕北领袖的排列是怎么说的？”

我说：“他是按中央规定的排列说的：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即刘、谢、高。”

胶东人说：“他对西北党校的 XX 说的就是刘、高、谢。对你怎么是另一种说法？”

我说：“他对别人怎么说的，我不清楚，反正他对我就是这么说的：刘、谢、高！”

胶东人和我争起来，他说：“刘、高、谢！”

我说：“刘、谢、高！”

就这么“刘高谢”、“刘谢高”的争了几个回合。我一急，冲口而出：“你手里拿着我的采访记录，打开让大家看看嘛！”

他才不得不把记录摊开。其实，他用手死死捏着的地方，正是那一页。摊开一看，记录上明明写着：“刘、谢、高”。

我说：“怎么样？谁说得对！”

我想，如果我记不准，就不会豁出去和你争。虽采访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的脑子还未失去记忆。

他只得说：“你还记得呀！”

我轻轻冷笑：“我如果记不清，你就会冤枉别人。这是关于别人政治生命的大事，我能忘记么？果真我忘记了，马文瑞这一辈子也洗不清了。”

我仍然盯着胶东人。周围的专案人员，好像松了口气。也有些莫明其妙。年轻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总是会有想法的。中央来的人，就是这么一套呀？唬了半天，还是被审者说得对。

这个穿军衣的是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的人，走了。他们从来都是来去诡密。

我真想宣布：不带介绍信的我一概不会面，不说一字。他们不会给我这个权力。

目前，在我这个案子上的所为，完全不符合党纪国法，整个案件都是荒唐的。有理无处讲，有理也说不清，一片混沌！

我断定：受这个案子株连而被逮捕的干部和群众，均没有违犯过刑法和宪法的行为，而捕人者则是违背宪法的。

## 五 搜查铁器

“搜查铁器”，是专政办公室的秘密决定。

只听门外“通通通”的脚步响，不知有多少人来检查“铁器”了。

我们东隔壁房里吵得嗡嗡响，不久，就有人大声喊话：“朱效成！站起来！”

是朱山恶狠狠的声音：“你留这东西干什么？必须交待清楚！进来时对你说清楚没有？连根针也不许带。你为什么留这把剪子？”

大个儿头的院长朱效成，是位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老头子，他向来没有隐私，不隐瞒任何事情，没听说他捣过鬼，连说话都不会小声。我们在墙这边只听他瓮声瓮气地说：“我留干它干什么？难道我还会自杀？这东西是我剪脚垫后压在了褥子底下，忘记了！”

“胡说！这么大把剪子，能忘记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老朱气得“唉”了一声：“你们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我真担心老朱会挨打。在这里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可以任人宰割。虽然他还不直接杀人。但拳打脚踢、扇耳光的事是经常有的。我轻声问宋克：“咋办？会打起来吗？”

老宋说：“不要紧。如果真的有人动手打，也会有人拉架，那里



边住的有工程师程浴琪，有年轻工人王小成，工程师不好动手，工人也会动手，他一定会保护老院长。对那个管押人的朱山，他可不在话下。”

我和老朱见面不多，内心却熟悉。老朱是被一派群众管制着的。可老头子不在乎，照样吃饭、睡觉，吃饱睡足就找工人下棋。他已六、七十岁了，又是老资格，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这老头子生气时候少，笑的时候多。直到现在，还听见他和人辩论：“就不许人有个忘记？”

只听朱山叫道：“先没收，朱效成你等着受处罚！”

已经坐了囚室，还罚什么，那时可不许罚款。

专政人把老朱的剪刀拿走，又到别的囚室去了。

他们进门就叫起来：“搜查铁器？”

我不说话，却站了起来，把桌子、床，都让出来，叫他们搜！

他们理直气壮地在翻别人的东西，每个人的东西都翻个遍，连积压的报纸也要抖落几下。临出门，那个专政头目朱山还瞪着眼，喷着唾沫说：“这是专政！决不能有一点铁器！这是上边的规定！”

他们走后，老宋像个老小孩儿，吐了下舌头：“我的针……”还是老宋有办法，她把针别在眼睛盒内，那么凶的搜，竟没发现她的针。

我说：“老宋，真有你的。求你办件好事吧，咱们四个人的洗脸毛巾没处搭，如能找到两个钉子，拴根绳子，问题就解决了。”

老宋说：“我的天！哪能弄到钉子呀？又是铁器。”

我很相信这位老同学能想出办法。便说：“老宋，你的眼不近视，比我看得远。去替咱们‘偷’两根吧。这机关大院子的地上，到处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木棍、铁丝、竹杆……什么都有，一定也会有钉子。”

老宋绉绉眉头，做了个鬼脸：“你叫我去当‘小偷’呀？”她当时

就叫值班的人开了门，提上四个暖水瓶走了。还在楼道里叫道：“打开水啰！”

老宋去打开水晚回来几分钟。她进门就笑，就眨眼。我们明白她有鬼。她把四个暖水瓶放下，就从衣袋里摸出个小钉子。她说：“在烂木头堆找的。我一看见，先用脚踩上，然后放下水瓶，提提鞋，顺手就捡起来了。”

几个人不敢大声笑，都背对着门，张着嘴不出声的笑。

第二天放风回来，老宋又从兜里掏出个钉子。轮到钱凝想办法了。她从墙犄角找了块半截砖。对着墙缝，把钉子楔进去，拴根小绳。大家轻声叫着：“成功了！”

我们挂了四条毛巾。如果他们追问起来，我们就说：“那是原来就有的钉子！”

## 六 为囚徒画像

神经衰弱的人，什么都想，越要躺下睡觉，偏偏就是不能入睡，头脑特别清醒。闭上眼，又觉得是在坑道里走路。又像是外边“放风”。我默默计算着我的“难友”。闭上眼，在被窝里扳指头数着：

<1>朱效成：他当过地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院长。他是1930年的共产党员。他的罪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几年前已调到西安工作。去年夏天，是某个群众组织专门把他揪回来批斗的。当他揪回北京，一下火车，就被戴上了“高帽子”，拉回机关。他却不知为何如此。造反派拉他去看大字报，他才悟出点原因。

<2>程裕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副院长，六十岁左右，青年时代留学英国，地质学家。罪状是“特嫌分子”。因为他是从英国回来的。

<3>王小臣：物探队的工人，二十多岁，北京某中学毕业，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因为他和同学议论过副统帅林彪。

<4>赵时之：地科院政治部主任。河北省的老干部。我在木笼里时，听见挨打的就是他。造反派劈劈叭叭地打他，他却高声叫着“毛主席万岁！”够可怜的。造反派还说他是“叛徒”。

老赵是个老实人。已五十多岁，叫他打扫卫生，他就一丝不苟，打扫得干干净净。

<5>吴俊如：副院长，东北大学毕业，已六十三岁。他曾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造反派说他是“叛徒”。他忍受不了屈辱，曾以命相抵。如今，他住在我的西隔壁，听不见他的一丝声音。放风时，只见他脸色腊黄，走路一歪一歪的，毫无力气。大概是有心脏病。

<6>崔 XX：地质学院毕业，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朝鲜族人。像他这样的人，这里关押的有三个，都是同一个罪状，跟在国外的亲人通信，说他们是“朝奸”。

<7>孟继声：不到五十岁，也是副院长，河北省的老干部。我在木笼时，有一天在院中劳动，恰好碰见他刚从斗争会上刚被拉回来，拉来拉去的，打倒声震耳。也不知怎么搞的，他的腿成了瘸子。

现在他住的囚室是第八号，里边关了八个人，他是八号的犯人组长。

<8>胡岳文：也是位河北省的老干部，一口通县口音，满脸胡子。放风时，他穿件黑色厚呢大衣，又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就把大衣襟子拉起来，用根绳子捆在腰里，像个樵夫。

<9>郑直：四十九岁，某研究所的所长，“西南联大”毕业。他之所以被关押，可能问题就出在“西南联大”上，被怀疑加入过反动组织。从放风时的行动看，他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斗争，没想到会自己人斗自己人。

<10>王和吉：是山西省的老干部。某研究所的党委书记。罪名：家庭是地主。

<11>路 XX:一个混血儿、父亲是外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曾当过英文翻译。罪名:出卖过情报。据说他早已交代过,处理过,现在怎能仍按“出卖情报”论处?

这个人,后来又走了一段崎岖之路,从这个地下囚室放出后,又随他本单位迁到某县的山区,在那里,又被送入公安局监狱,本单位即向公安局提出“罪该枪毙”。公安局尊重原单位的意见,准备执行。临刑之前,公安局长找他谈话,按你的罪行,应该枪毙,就要执行。你本人还有什么意见?

本人提出:我犯过错误,1958年已经交代清楚,也处理过。有案可查。

公安局长还算认真,一查档案,果然如他所说,早已清了的案子,决定马上释放。他才捡了一条命,又回到北京。

<12>郭文魁:某研究所所长,曾留学美国,水文地质专家。罪名:在全国解放之前的旧日记里,查出他有不满意现状的情绪。那时是对谁不满?说不清,就定罪了。

这人不到五十岁,体魄健壮,声音宏亮,头却总是深深的低着,每早按例请罪时,他的声音最大:“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隔着几闲房都能听见。这也是一种反常现象。

<13>黄汲清:副院长,留学瑞士的地质学博士。中国有名的地质学老专家,已六十六岁。罪名是:怀疑他曾参加过什么组织?只是怀疑。加上又是“反动学术权威”,就成了专政对象。

有人传闻,他听见最高指示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的斗争。”他说:“是不是指的我们这些人哟?我们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果真如此。太无政策了。全国人除了从解放区来的,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难道现在要对他们进行斗争?那要斗争多少人。

<14>盛继夫:七十多岁。古生物学家,浙江人。就是每天放风排

队在最末的那位“麦喔”。

专政组对他很残忍。竟命令这七十多岁的老人从楼上往地下室挑水。大水桶，压得老人身体摇晃。

<15>张子枚：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北京大学毕业。小伙子满有心劲儿，看他放风时候，除跑步外，还闷着头做健身操，身体练得笔直挺拔，满脸罩着聪明。他的罪名是：和他在香港的父亲通信，全是用的英文——用英文写信，也是罪状。这在法律上不知属于什么罪。

<16>葛幼岗：二十岁出头儿的小伙子。上海人，白白胖胖的，他是最年轻的犯人，某研究所的技术员。他的罪名，更是可笑。他买暖水瓶时，专挑有齐白石作品的画面。他喜欢齐白石的画。恰巧，那时报纸上正批判齐白石，说齐白石反动，葛幼岗正碰到刀刃上，也就等于和齐白石一样反动了。

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并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每天请罪弯腰时也不知说什么好。

据我所闻，此人已神经错乱，至今（从1969至1986年）并未痊愈。

<17>温小济：五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此人不到四十岁。工资不到七十元。在国外结婚个洋女人，生了个女儿。也不知什么人说他老婆是特务，他就成了“犯人”。可他自己悄悄对难友说，他相信老婆不是特务，因为她是工人家庭出身，本人也是工人，跟他到中国来也吃了不少苦。三口人只靠他的七十元工资过日子，老婆也没埋怨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自从回国后，没给老婆买过一条围巾。”

从外表看，这人的情绪低到了零。他认为自己的家庭是贫农，既然成分好，就不应当被怀疑。这个时候正在讲究唯成分论，谁知在他的问题上，又用不上了成分。他陷入精神的迷茫，头发乱得像鸡窝，拖双破皮鞋，走起路来拐来拐去。放风时，他只低着头，靠在墙根晒

太阳。

<18>贲鄂山：是某研究所的领导人之一。安徽籍老干部。罪名是什么？不清楚。

有一天我被提审回来，路过八号囚室门口，恰好遇上开门放风，我见他坐在床上，一支手按着另一支手的脉搏，闭着双目听心跳，大概他的心脏不好。也不知什么原因，不许他外出放风。这也是一种处罚。

这里的人，待遇分四等，头等最受优待，可以出外打开水；二等人能到楼道劳动；三等能出去放风；四等人是连放风也不许，锁在黑屋里不许见太阳。这位贲鄂山，就是属于第四种。

<19>李成章：四十几岁，戴付眼镜。罪名：据说是因为旧社会从什么矿业学院毕业，又在什么煤矿工作过，不知得罪过谁。对这个人，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和人接触，也不说话。毫无表情。

我知道的信息，大都来自三位女难友，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接触面广，特别是年轻人和年轻人之间，是无话不说的。可是对这个人，谁也没说什么。

<20>李正：行政工作干部，很精明，他在“犯人”中受着特殊优待，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外出买东西。被关押的人，每两个礼拜可以买一次东西，都由李正代买。烟只能买一毛三一包的。要买出格的东西，就得另外再请示上级。

我们曾议论过他：“这人是怎么回事？这样被信任！”都说：不知道。对于他，也是问号成堆。据说，因为他被关押过，老婆和他离了婚。这人真倒霉，一场文化大革命”，革掉了老婆。

<22>王老汉：此人近七十岁，南方人，锡矿专家，须发已白，虽老尤壮，声厚气足，在放风中，如有人当场被批斗，他必然上前凑热闹：“坦白从宽！”使许多人对他讥笑不已。

我曾问三位“女难友”：“那老头子为啥不知趣？”她们说：“这人旧社会在新疆找矿，解放后查出他向外国人出卖过情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当时新疆的领导人听说他是个专家，就把他保释出来留用，越是这种人越积极。”

难怪他和别的专家表现不同呢。

<23>孙云铸：我第一次遇见这位老人时，倒抽一口气：这么大年纪犯什么罪？他是干什么的？

女难友讲：“他名叫孙云铸，古生物学家，已八十多岁。”

他满头白发，老眼昏花，满口无牙。但是，他仍在工作。在学术上，他不断钻研、奉献。何罪之有？有人说：他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一贯参加民主活动的。

这位老者，总是默默无言的。

加上我们四个女犯人，一共二十七名。

## 七 赌棍

提审者规定，凡是要我交代的人物，都得写上“某某某的罪行”。

我拒绝用“罪行”二字。他们何罪之有？对我自己，怎么用都可以。说有“罪行”、“罪恶”、“劣迹”全可以。我把它当凉水喝下去。可对别人，我决不能加“罪行”二字。对所有被审查，受株连的人，我一视同仁：他们全没有罪行。

去年有一拨提审者，表现异常，临走时给我留下个字条说：一九六二年告你“为高岗翻案”的不仅仅是阎红彦，还有贺晋年、吴岱峰，是在贺晋年家预先策划好的。他们几人出谋划策，阎红彦出面告状。阎红彦找了很多门路：共青团中央、总工会、中宣部、中央办公厅，都没告准。最后找到了康生，一拍即合，两人结合了起来。

我已明白，阎红彦、贺晋年、吴岱峰，他们是小老乡，一个县里

的人，是个小小的乡亲集团，还沾点什么亲戚。他们在历史上，都是杀人的帮凶，手上沾有革命者的鲜血。现在，他们又做出这件伤天害理的事，诬陷了这么多人，论正理说，他们已灭绝人性。可我目前对他们，仍然以礼相待，一视同仁。他们可以不仁，我却不能不义。

现在，我向提审者解答的仍是如下问题：

一、我向贺晋年采访过，谈的内容是一九三五年的陕北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中的主要战斗。他也谈到刘志丹的战略战术思想，佩服刘志丹的指挥才能。

二、我写的部分初稿，请他核实过。他提出的意见是：不要把谢子长写得和刘志丹意见不一致，不要使人看出谢子长有错误。

三、肃反事件：他说他不赞成，他本人虽未被捕，因为被捕的人太多，他也愁得吃不下饭。

四、是否同意一九四二年西北高干会观点？根据他说话的语气，还是赞成一九四二年高干会观点的。（也许他内心并不赞成，因为是对我说话，不得不做个姿态）。

五、他没有谈两条路线斗争。他说：“我是军人，只管打仗，不管他路线不路线。”

我认为，这其中潜台词很多，不必提了。

这份材料很难写，因为最初，我对西北干部的印象是好的，把他们当成有着共同经历，共过患难的战友，从未想到谁在背后搞谁的鬼。从阎红彦这次的暗枪冷箭，我体会到了刘志丹当年的一切苦衷。到一九六二年，在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他们仍能找到靠山整人。四十多年前呢？即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他们更是气焰嚣张，胡作非为。刘志丹是那么正派的人，当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当时不知，事后才得悉，“文化大革命”初期，贺晋年也被机关



群众批斗过，关押过，是把他当成刘志丹战友而斗的，当成拥护《刘志丹》小说，为小说提供过“炮弹”而斗的。

于是，他再三声明说：“我没有拥护《刘志丹》小说，我是反对《刘志丹》小说的。来我家的不是习仲勋，而是阎红彦。阎红彦在我家商量好了对付的办法，向中央告发了《刘志丹》小说。”

由于这种表白，很快就洗清了“怀疑”，政治面目亮了相。他获得了解放，还成了功臣。

对于他这种情况，我丝毫不知。直到1975年，我们搬进北京西郊的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听说他生病，特地去医院看他，才产生了怀疑：他为何神色不定？他为何吱吱唔唔，躲躲闪闪？言不由衷，神情恍惚？

直到后来遇上他家里的人，听到他亲人的口述，我才恍然大悟。

## 八 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毛主席语录》，已经读了三年。《毛选》四卷，不知读了多少遍，去年我又通读了一遍，真想读点别的书了。没有其它书可读是最苦恼的事，特别是在关押期间。

钱凝为我解了急。他带进一套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卷集。我赶快借，抓紧时间阅读，只要提审回来，我就挤时间看。虽然许多文章过去都看过，终归没有系统地通读过。必须利用这个时间吸收，武装好自己，才能有力量作战。

我做笔记，想搞出个《马、恩语录》。我征求钱凝的意见：“这书上我能打记号吗？”

钱凝特别慷慨。他说：“你愿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写在上边就是给我留下的纪念品，这书我要永远保存。”

多么深的友情！就在此时此地。

我把要解决现实的问题搞出来，对难友们说：向毛主席请罪，咱们就读毛主席语录，回到这个天地，咱们就读马、恩语录。”

只要用心读，“马、恩语录”还真能解决问题，可以使人辨别方向，不致被权威所蒙蔽，使自己心中有数。可以解除苦闷。使头脑清醒，不受欺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怎样说的？经过研究才知，在许多问题上，那两位大胡须不同意我们现在的做法。

这是个学术问题。我们围绕着这个学术问题，可以说说笑笑了。因为这书不犯禁，再大的造反派，也不能禁止这两位老祖宗的书。毛泽东主席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至少表面上这种书还不犯禁。只听那位“副统帅”说过：什么也别读了，《毛选》就是马列主义的结晶。

我们几个女犯人在囚室里悄悄地讨论着马克思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

忽听门外敲打：“为什么用报纸遮住玻璃？”

宋克高声叫道：“我们要洗澡”。

老宋真机灵，把狱卒堵回去了。那是钱凝和坤娣的心计，凡是我们要敞开口说话，他俩必须把玻璃上贴的活动纸拉下来，不让外面窥视。

我们仍旧说我们的。

这几天特别紧张，又在动员坦白交代：谁没交代清楚，没彻底的，都要再彻底挖，要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人民日报的语言），统统倒出来。

听说院子里又刷了新标语。食堂里的斗争会又开得震天响。我们这个囚室里的空气也紧张了起来。坤娣特别愁怵：“又动员交代了，还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呢？”

钱凝说：“斗，吹！要怎么斗，就叫他们斗吧！我只有七、八十斤，全交给他们斗去，我豁出去了。”

老宋强忍住不说话，有一派经常把她提出去，到处去参加被斗争的行列，甚至拉到外单位去斗。只要有她们开封女师同学的地方，都拉到一块儿斗。据说，曾用卡车拉到宣武门外斗。

从1966年到1969年，北京这股疯狂劲头还未过去。

我当然也估计到他们会怎样整治我。可是我心中有数，再榨也榨不出油来。我也想，情绪激动也解决不了问题，索性使大家沉下心来，过一天说一天。我便说：“凡事都有个规律，有起就有落，有张就有弛，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是辩证法。也是事务发展的规律，这个运动发展到沸点，自然会落下来。不要紧，不要紧。总会降落下来的。一定会降落下来，放心”

大家笑了：“你真乐观！是呀，细想也是这样子，一切事情，发展到顶点，不是爆炸，就是降落。”

下午，坤娣叫我：“老李，咱俩到厕所去吧。”

我俩就敲门，狱卒开了锁，派人跟着我们到女厕门口。我俩进去，随手把门一闩，让尾巴留在外边（他们是男的）。坤娣拧开大池子的水龙头，让自来水哗哗地向池中流淌，急水冲刷着水泥地，声音特别响，那水声能遮盖一切声音。坤娣说话了：

“我有个问题和你商量，我家的情况你已知道。母亲有些手饰，在我要结婚时，给我们兄妹三个分了。我分了一双金手镯，我曾拿出了一支给婆婆，让她卖掉，为我抚养孩子。因为婆婆是工人，经济困难，住在广东。我把儿子也送到了广东。另一支，我扔掉了。是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扔的，扔在街上的煤堆上，谁捡去就便宜了谁。反正不让在我家抄出金首饰。这件事，我没有交代过，你说现在交代不交代？”

我稍沉片刻，想到，他爱人是个工人出身的艺术家，不能让人借机会泼脏水。便说：“你的问题，永生永世交代不清，因为你是吃资

本家的奶水长大的。什么时候能把你的奶水全吐出来，才算交代清楚，三十六年了，你能吐干净么？”

还有几句话我没有出口。心想：就是抽干你的血也交代不清，这是“血统论”“统治的时候呵！”

坤娣笑了，她已经明白。

我又说：“不能提你婆婆，一提婆婆，就把一个工人家庭毁了。造反派会把她打成‘工贼’。你爱人也要倒霉，孩子会变成流浪儿……”

我认为这种搞法是不合理的。不就是一点小小的遗产么，一点妈妈给女儿的陪嫁么？又不是汉奸遗产。

## 九 张鹏图专案

这次提审，是来审张鹏图的情况。使我回想起了刚进城时，我所在的机关——政务院监察委员会。1955年改为国务院监察部。当时的监察部坐落在北京市西单绒线胡同88号（现在四川饭庄地址）大院。那个院子，是旧社会一个资本家的（原是明清时的王府）。

张鹏图，是机关的办公厅主任。出身于陕北老红军。整个部机关大院的重新安排修理，后边新盖了小楼、礼堂、俱乐部，满院的花树盆景，全是在张鹏图指挥下布置的。那些干部的提拔、合作，甚至连哑巴的使用，他也关心备至。

张鹏图是个忠厚的人，可是早几年就有人想在他身上使坏。那时，《刘志丹》小说案尚未发生，整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是陕北红军。而且是倾向于反对“左”倾路线的红军。

1959年监察部撤消时，人员都要分散。当张鹏图调走时，照例也开会给他做鉴定，大家都说他很好。觉得他是兢兢业业在工作，也能团结干部。

可是当他走了之后，监察部的部长和管人事的副部长李景膺勾结

起来，又给做了另一种鉴定，说了许多坏话，一无是处，寄给他新去的单位。这事，当然是有合谋的，钱瑛指示管人事的副部长李景膺干的。李景膺担任主管人事的副部长，也是特意安排的，因为他是陕北“肃反”时的得力骨干，和钱瑛一个思想体系。

由于张鹏图是陕北老红军，我向他采访过。因为我向他采访过，他就受到株连。1959年监察部撤消后，他被分配到甘肃省。1962年我的小说被诬陷，他也倒了楣。1964年，他便从甘肃省副省长的岗位上被贬下台，送到中央党校“学习”。现在他到了哪里？我也不清楚。我的灾难也落到了他身上。我实在觉得对不起人。

访问他时，他谈的内容很特殊，却充满感情。他说，他很想见刘志丹，但始终未能见上。1936年，当红军到了他工作的那一带，大家都去看刘志丹，他也去了。走进一个院子，看见人山人海，他挤不到跟前，只能远远地看了老刘一眼。

他谈的内容，都在采访记录上。纪录早被没收了，难道为这“远远地看了一眼”，就被株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说公道话，陕北、陕甘干部跟着新中国只过了五年太平的日子。

## 十 中央专案组又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遇见的是，一阵子官斗，一阵子民斗，都不讲理。我总在想，也许上面的人可能是清醒的。按道理说水平应当高一些，不会那样胡说八道。目前跟这些人，有理说不清。如果上面派来有点水平的人，定会讲出能服人的道理，到那时，我就跟他们摊开讲理。

这一天终于来了。青海人，浙江人，到囚室提人。把我押着上了二层楼。

这就是“李建彤专案组”办公室。满屋坐有七、八个人。主要位

置上坐的是个军人。其余位置，坐的有地质部“刘景范专案组”的李XX、石XX，还有那个邓中和。地质科学院“李建彤专案组”的于XX、杨XX、林XX。我的位置留在他们大家的对面。

我进去，不屑一顾，近似旁若无人，但是一切都看清了。那军人是主审。他先声明：“我是毛主席派来的，要全面审查你的问题，几年了，你没有写出一份象样的交代。这次要彻底弄清楚，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

这人是河北人或是东北人，我弄不清他的口音。像个中年人，鬓角已有几丝白发，也许是少白头。

我对这位军人，还是很诚恳的。我说：“早就盼望毛主席派人来审查。我感谢毛主席。”

其实，最早的那个“中央专案委员会”，难道不是毛泽东派的？不也是荒诞不经么！那些人的资历也老，地位也高，有些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是部长、副部长、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哪一个又是实事求是呢？目前我有幻想，只是觉得这么多年了，他们也应该有所觉悟。包括最高领导，总该冷静的思考一下，这么整一本小说，对不对？

但是我一转眼，思绪断了，看见那个邓中和，就来了气，我质问他：“1968年1月8日那天，你们在批斗会上讲的都是真事么？能按那十条罪状定案么？完全是捏造，虚构，无稽之谈！”

那个戴眼镜的邓中和很尴尬。他摸摸眼镜：“我、我……”

我说：“你？就是你搞的，你是重点发言人。那些假材料，都是你搞的。我要反驳！”军人连忙替邓中和解脱：“他是群众，一直是群众！”

“什么群众？冒充群众！共产党员，处长级干部，还如此恶劣！”一股气上来，在气头儿上，很难消下去。这个军人我未见过，可

他和邓中和已经厮熟。邓中和原是部长秘书，文革后竭力造反，自从天津的“南开大学”进驻地质部以来，邓仲和如鱼得水，是最活跃的一个。难道这几年他们搞的那些鬼，这个军人都参加了？一月八日他也在场？我的视力不好，分不清他们的面貌。否则，他为什么替邓中和开脱？

那军人说：“一月八号的事暂时放下，今天是审查你的问题。”

他随手拿出语录卡片。真是中央下来的人，什么都高级，是斗审“专家”，连语录都是用最好的卡片纸写成的。拿出一张念一张。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敌人是不会自动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一切剥削阶级，都要挣扎，他们怕失去地主阶级的天堂？……”

我越听越不对头：把我当成了敌人！便冲口叫道：“住口！”

他们一愣。

我对准那个军人说：“既然你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就不许对我瞎念语录。就应当讲政策。群众对我念什么语录，我都可以原谅，因为那是群众，他们不了解情况。作为中央派来的代表，你就不许瞎念。我不接受，我不是地主阶级，我是无产阶级！”

那人倒也机灵。忙说：“你既然是无产阶级，就交代吧，把反党的罪行全部交代出来，你为什么要反党？”

我劈脸问道：“你先说说，什么叫‘反党’？你把‘反党’的定义摆出来。有了章程，我就有所遵循。就可以不再反党。否则，如果没有规范，没有标准，我可能还要反党！”

他们张口结舌，吱吱唔唔。

等了一阵，我说：“你们拿不出标准就听我说出个标准，谁违背

历史唯物主义，谁就违背了马列主义，谁就是背叛！就是反党！”

我一摆出这个定论，他们急了。竟然脱口而出：“你不要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我们只讲目前的实际，只讲你的问题！”

原来，他们把马列主义真的扔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扔了。好一伙冒充的马克思主义者！

军人说：“你写的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是反党的。”他们对这个错误论断再三坚持，不知他们是懂，还是装糊涂？

我伸直腰，仰起头，几乎站了起来，大声地申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事，总要给世界做出个榜样。如果我的小说已经定案，就请在《人民日报》上向全世界公布吧！就说我写了三十年代的事情，是为五十年代的事翻案。刘志丹是一九三六年牺牲的，我只能写到一九三六年。高岗问题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的，相距十七年之久。两个人的事，能连起来么？听听国际上会有什么舆论，《毛泽东选集》可是发行到世界各国去的，《毛选》上也有刘志丹和高岗的名字……”

军人又说话了：“不用提世界上，只说中国。你的问题必须解决，要提高认识，不认识到反党的程度，就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毛主席说了话的。”

我又反问一句：“我反社会主义么？反党和反社会主义是紧密相联的。只反党，不反社会主义，解释不清，我那书的内容，写的是革命斗争史，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我无意中向左瞥了一眼。见那位姓石的，只是做记录。第一页上就写着“提审李建彤”。

又听军人说：“你的书中问题很多，剽窃毛泽东思想。例如武装斗争，农民运动……等等。这些，你自己都知道。要挖出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为什么要那样写？”

我反问道：“你说该怎么写？”



我再次抓住要害不放：“咱们不是有语录嘛，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这样？”

军人只得说：“是这样。”

我说：“马克思主义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不客气地说：诬告者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他也就是反党的，无可辩驳。那么我写的小说，哪个地方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请拿出来。干什么事都要讲理，不讲理百事不通，有理不遵循就要碰壁！”

已经成了僵局。每次到了僵局，只得宣布停审。

想不到，中央派来的军人，说的也是老套子，没有一点新精神。不同的就是他加了一句“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可又有哪一点是体现了政策呢？

## 十一 贾拓夫之死

“习、贾、刘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贾拓夫，被整死在北京的西郊外。到现在真象不明。

在这本小说中他有什么罪？我只用了他讲的一个材料：1933年省委破坏时，他们被包围，他和高岗都跑了出来。高岗跑到照金，是带着省委的指示去的，要恢复红二十六军。

“通天政委”提审我时，我说：“书中只有高岗的一个材料。就是带着省委的指示去恢复红二十六军，那是唯一的绝材料。”

“通天政委”说：“一个材料也不能用，更不能用绝材料！”

就是因为这条真实的史料，贾拓夫丧失了一条老布尔什维克的命。

贾拓夫是个正直的人，是个实事求是的老革命。他是陕西神木人，早年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他在中共

陕西省委工作。1934年他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又到了江西瑞金，参加了共产党的六届五中全会。1935年随红军总部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红军走到了甘肃境内，得到了一份《晋阳日报》，上面有一条消息：“陕北刘志丹赤匪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长征队伍中，只有贾拓夫是陕北人。叶剑英、毛泽东都向他了解陕北的情况，他把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作了汇报，中央决定往陕北走，寻找这剩下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

贾拓夫带一连人，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他在下寺湾，见到了红十五军团的程子华及陕北人郭洪涛。得知他们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陕北红军的领导人都关押了起来。他用最快的速度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并派贾拓夫、王首道、刘向三一起，去瓦窑堡接管了陕甘边保卫局。他们向中央写了关于为刘志丹等同志的平反报告。毛泽东到了瓦窑堡后立即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同志，周恩来亲自释放了刘志丹。

假如没有贾拓夫及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假如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派贾拓夫等人接管了陕甘边的保卫局；其后果不堪设想。

解放后，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做计划工作，是计委副主任。由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59年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七千人大会已经为他平反。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又制造了“刘志丹”小说案，罗织出一个“习（习仲勋）、贾（贾拓夫）、刘（刘景范）反党集团”。这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康生的阴谋。康生自己说过：“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

我和王勉思采访过贾拓夫两次，他非常认真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的小说稿他没有看过，当然更没有给我提出任何意见，说他是小说的后台，太冤枉了。

他被康生套上“反党份子”枷锁后，被下放到北京钢铁公司当副

经理。

文化革命开始。康生又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从此对他的斗争变本加厉。

一天他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斗争、折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被押送回来，一夜竟然满头白头发了，他疲惫不堪，匆匆喝了碗面汤，又被来人带走了。第二天，工人在西郊的树林里发现了贾拓夫，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怎么死的？谁害死的？到现在都是谜。

一位为国家，为民族，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职业革命家，就这样惨死在阴谋之中。

## 十二 马明方专案

在地下室内新设了一个提审室。就在我们囚室的西头儿。

今天，我被带进新的提审室。他们一说出马明方的名字，我便知他们是东北来的。马明方是东北局的副书记。他是大革命时的干部，当过陕北特委书记，西北局副书记，东北局副书记。

提起马明方，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这几年，他们已经为陷害马明方，来提审我几次了。据说，在沈阳的大街上，地面上、墙壁上，都贴满他的大字报。那些恶人，还制造新疆假案，诬蔑他是“新疆叛徒集团”的头目，又加上他“为高岗翻案”。说他参与了写“反党小说”。真冤！

我采访过马明方，他谈了许多陕北情况，也谈到他和刘志丹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思想一致、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他们都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为群众打算。达到创业的目的。他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基于相同的思想，在陕北选举苏维埃主席时，刘志丹便提出马明方为候选人，以免把政权落在不三不四的人手中。

从马明方和刘志丹的关系看，陕甘、陕北的干部是团结一致的。不团结的人，是思想不对路，并不是地区之分。明方是陕北人，从未在陕甘工作过。志丹是陕甘边界的人，但明方对志丹的理解是那么深，互相合作得又那么默契。如果某些人之间有意见分歧，那不是地域，而是思想路线不同。这是肯定，不容混淆的。

造反派不断地逼问：马明方是否主张写高岗？

明方再热心也不会谈高岗。他没有谈高岗。在理论上，马明方是对的，他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在具体问题上，他绝不提高岗，这是个矛盾现象，可在那时，却是合理的也是对的，因为当时中央是这种态度。这是那个时期的特点，是那个特定时期每个人心灵上的“紧箍咒”，迷信、荒唐，可是人人都得接受。在西北干部的口中、心中，更是严守这个禁区，噤若寒蝉。绝对不能说出“高岗”二字，谁不怕家破人亡？

在那个时期公开提到高岗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主席一九五九年在南宁会议上说过一句实话：“高岗过去还是对的，在延安时，我还是听他的话多。”像这样的话，永远也不会写在语录上，很多人假装没听见，或者想方设法地回避，或否认这句话。确实，按照“为高岗翻案”的特殊原理，毛泽东主席在南宁会上讲的那句话，就是十足地“翻案”了。他讲的是实话。

马明方的头脑是最清醒，我写的小说初稿请他看过。我问：“你看这样写人物怎么样？”

他笑着说：“小说是镜子，叫大家照镜子去吧！照它像谁就是谁。”

他可没有搞唯心主义，也没有搞封建主义，没有提出这个人物不能写，那个人物不能写。或者某个人物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犯错误的材料不能用。他更没有说“这样写会影响团结”。他的意思是，大家要认真对等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由自己的脚

印连成的一条线、一大片。写小说，跟着人的脚印写，坏人捧不成好人，好人更贬不成坏人。那地方的人民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群众口中都有好人和坏人的史料。

我佩服马明方对艺术作品鉴赏力的高超，独立论断的胆识，他还说：“谁好谁坏大家都知道，本人更清楚。”

一言戳透，确实，不管是谁，都最了解自己。嘴里说不出，心中暗盘算，要不然，阎红彦为什么在小说中选中“周光”当作自己的影子呢？他为什么不把“罗炎”作为自己的影子？

提审人还再三追问：“你剽窃了毛泽东思想，马明方难道没有看出来。比如农民运动吧，毛主席什么时候讲的？小说中写的刘志丹是什么时候讲的？几乎是同时，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是一九二七年春发表的，刘志丹也在一九二七年谈农民问题，岂不是有意剽窃？这是很明显的问题，你不明白，马明方也不明白？你们岂不是同谋？你必须严肃认真交代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脑子里已经考虑过千百次。在所谓“群众小报”上已是再三刊登，我剽窃了“毛泽东思想”。前几天中央来的专案人员也提到这些问题。似乎很理直气壮，实在是知识欠缺，愚昧顺从。

其实，关于农民运动问题，最早写文章的是彭湃、邓仲夏。毛泽东最初讲农民问题，也不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政治周报》上全看见过。现在讲出来，他们决不允许，不认账，反会诬我造谣。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记得去年大街上还贴着批判彭湃的大字报，批得彭湃一无是处，功劳全归别人。

怎么办？我思索了一下，不能再有奴隶主义了，还是得把真话摆出来，也考验一下他们的水平。我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列宁说过，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正等待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所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

便有许多党员去做农民工作。马、恩的原著是把农民问题当作基本原理之一。凡学过马、列的人，都知道去搞农民运动，有迟早罢了。所以，与其说我剽窃了毛泽东思想，不如说我剽窃了列宁思想、剽窃了马、恩思想。因为我在写这些问题时没有摘上马、恩、列语录。那时还没有用语录的风气。别人也和我一样。”

我刚顶撞完，东北来的专案人员便有了醒悟，忙说：“算啦、算啦！这问题你不要交代了。”

可见，他们比较聪明，没有敢骂列宁，也没有骂我。

陪同提审的本机关专案人员，也不再发言，他们都不笨。不好再当奴隶了。我想，还是列宁份儿大，能压住“最最最”。否则，这问题不知要纠缠多少年。

还真灵验，以后中央专案那些穿军衣的，也没再逼我交代这个问题。可能他们已经汇报。

由此可看出两个问题“第一，群众是盲目的跟着瞎闹；第二，领导群众运动的人没有知识。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盲目服从，有些人则是自以为是。”

我想起了马明方的音容笑貌。他是善良的，正派的，我每次去采访，他都热情地接待我，像自己家里人一样畅谈过去。可是这些话，我只能回忆，不能说出口。我越说他好，他越倒霉。因为在“语录”上写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现在是“敌人”，从我口中不能说出他一点好处。为保护他，我只能沉默。

在以后的年代——大约是 1975 年，我听说他押在北京监狱。身患重病，送进医院，还是用背枪的人管押着。他神志不清，不能走路，躺在病床上，在朦胧中还叫着：“冤枉，我没有问题……”与世长辞了。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曾有几个日日夜夜不能入眠。这个人太好

了！

### 十三 王世泰专案

一九六九年元旦，专政组长宣布休息两天。我可没有休息。因为甘肃兰州的造反派组

织中“红三司”的“王世泰专案组”来提审我。

所谓“王世泰专案组”也不知有多少个。从1966年到目前的1969年元旦，不知来过多少次，多少人。记得1967年春有个“兰州大学”的王世泰专案组，到我家看见《康熙字典》就拿走了。说是借，实际是抢。谁来还？都是冒充的或者自封的“王世泰专案组”。

也许因为我的小说中写了个名叫“石太”的人物，他们“想当然”的以为，那一定是“王世泰”了，其实那是用几个人的素材揉合而成，不是只用一个模特儿。里边还有马福记等红军干部的素材，模特儿至少有三个。连康生也认定“石太”一定是“王世泰”了。

再提几句旧话：全国正闹“三结合”那阵子，甘肃有一派群众提出要结合王世泰（文革前他是副省长）。康生听后火冒三丈：“要结合王世泰，还不如把高岗的尸体拉起来呢！”

康生对兰州的讲话，对王世泰压力之大，无法估计。

群众，就是群众嘛。上边怎么讲，下边怎么干。上边说谁有问题，下边就去斗谁，这叫做“组织观念强”，“党性强”。王世泰正处于异常恶劣的环境。

来的人总是声色俱厉的对我吼叫：“老实交代王世泰的反党历史！”

我说：“我怎么能写出王世泰的历史？”

他们说：“你写小说，还不了解被描写人物的历史？”

我若把要写的人物，每个人都写一部历史，岂不成了‘人物列

传’？我能了解多少？浮光掠影，皮毛得很。我不可能仔细追问每个人的历史，我只写事件。

对这些专案人员，只能将些皮毛，略写一二、打发走了事。这已经是反复多少次了。他们当然不满意。他们要的是：王世泰对高岗怎么看？谈了些什么？怎么为高岗翻案的？

我的答复是：“这个问题是禁区，谁也不敢谈。谈者格杀勿论。谁能不要命？”

下边的话我未说出口：谁提起这个名字，都小心谨慎，警惕性过高。头发根子都是竖起来的，不骂几句，不足以表现立场坚定，不足以显得划清界限。王世泰那样的老实人，既不提，也不骂，全当历史上没有这么个人物。

他们追问：“听说你请王世泰看过稿子？他说了些什么？”

我说：“很简单，他不赞成小套人。所谓小套人，就是把许多人的素材揉合在一起，塑造出来的人物。”

头一天，就纠缠了这些。

第二天他们又拿出个事先写好的稿子，要我照抄、签字。那内容是：王世泰要为高岗翻案。还列了几个专案。

我看后又和他们争论了一阵子。然后宣布，明天答复。

晚上加班，写了反驳，一条一条地驳回去。我觉他们欺人太甚，哪有这样强迫照抄，强加于人的！

这一天展开了激战。在地下审讯室里，三个人抢着轮番审问：

“王世泰谈过多少次？”

“谈了些什么？”

“是不是他谈得最多？最反动？”

我也怒上心头，答道：“王世泰的罪状就在于他参加红军早，和敌人打仗多。所以他谈的战斗故事多。如果要了解他谈的战斗，我可



以背给你们听，你们记录吧。”

有人伸手夺我手中“反驳稿”。一看，他们气炸了。狂吼起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竟敢对我们反驳，太狂妄！太狂妄！交你们组织上处理！”

我顺手递给陪他们审问的浙江人，他是我的专案人员。

我细心注意浙江人的表情，是否对我发火？可是他，真出我意料之外。他竟然不动声色，平静地把那几张反驳稿折起来。当着他们和我的面，在桌子上抹来抹去地擦了桌子。我的内心为他叫好：“好一个合理的大个子！你真合理，真敢干。这证明你明白了，你超越了。不像以往跟着他们发怒了。你敢于不赞成他们的胡作非为，虽然你是无言的，你用行动说明了一切！”

一连三天了，王世泰专案组硬是不走，准备和我最后决战。

这天，在另一个审讯室，拉开一张两屉桌，我站在正面，那三个人（两男一女）各站一方，指着我的鼻子骂。什么话都骂了出来。骂来骂去，也离不开那一套。说我顽固、反党、反革命、不老实、不交代、包庇坏人、罪该万死！

我把心一横，提高声音说：“今天，你们把我吞掉，也达不到目的。叫我照你们的要求说，办不到，没有就是没有！”

斗了半天，每人都憋着一肚子气。没撤了，只得放我回去。

回到囚室，我简直累瘫了。坐在床边直喘气。

囚室里的难友真是亲人。老宋忙送来来一杯泡好的热茶。钱凝去帮我打饭。坤娣为我端菜。可我哪能吃得下？又气又累。这几天，白天挨斗，晚上失眠。日夜考虑着如何对付他们。

老宋悄悄问：“怎么样？还是昨天那一拨？王世泰我认识。他在三边工作时我也在三边。他若知道你在这里为他受的气，还不知怎么想呢。”

我叹了口气：“唉！我们这些人，将要进入老年，千万不能瞎说，一句话也不能瞎说。一个字也不能瞎写。一个字万斤重，轻易不得！我们写下的东西，将来都是史料。是别人的历史，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步一个脚印儿，不能给别人脸上抹黑，也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

老宋叹口气说：“对，我赞成！是得这样子。”

第二天，我的头胀疼，还得去参加大会，这是叫去受教育。只听大会上宣布“孟宪民畏罪自杀了。”会是在大食堂里开的。

孟宪民是什么人？高级工程师，锡矿专案，共产党员。把他关押在我们头顶的楼上，过新年不让他回家，他就跳楼自杀了。

在这个劲头儿上自杀，当然得说是“畏罪”，没有罪也是“畏罪”。马上就宣布他是剥削阶级出身，还有等等罪状，总之他是有罪的。

自杀，还有保密的。有人悄悄说：“打字员柳巴也自杀了。因为她是外国人，不让她与丈夫见面，隔离了。”

这是军代表进驻以后发生的事，他们怎么想？负什么责任？

就借这个机会，又得大斗大轰一番。强迫交代一番。掀起又一次高潮。

会场里还在呼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最后总得喊出“打倒刘少奇！”这已成了定例。可是，有人把第一个字母喊错了。“打倒母……”

还没出口，立刻被揪了出来，定为现行反革命。推来推去，斗来斗去。有人喊道：“劳动改造！”这个人，从此就到大院子里推煤去了。

这个人，就是看管过我的工程师王奋。因为家庭出身好，当了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一转眼就从天上掉在地下，成了劳改犯。这还是对待出身好的人的优待，只让他在院子里劳改，没有关押。

好荒唐，只是一个字，更准确地说，只是半个字，后半音还未说出来，就这样成了‘反革命’。

## 十四 杨明轩老人

穿军衣的专案人员又来了。

今天他们抽出两张语录卡片，让我自己念

一条语录是：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另一条语录是：

“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

真可怕：读到第二条，我真是感到毛骨悚然。最高领导竟是这样看待彭德怀的，而且是这样把他和高岗连系了起来，这是否就成了死案？他提意见的方法可是合法的呀，直面中央，没有捣鬼，怎能这样对待他？

这次来人的另一个特点是，那个胡作非为的邓中和不见了。他为何没有来参加提审？也许因为上次我专门打击了他的气焰，不敢来了。也许他永远不敢，或者不能再来了。

自从到这里之后，我当面击跑了两个人，一个是小广东，姓黄。一个是邓中和。

主审人还是那个穿军衣的，他不免又要交代一翻政策。满口是毛主席的政策。我心说：我坐在被审席上，你穿着军衣来提审我。这叫武装提审。是不是“军事法庭”？对我这样一个人，写了这么一本革命题材的小说，又不触犯刑律，怎能用武装提审呢？不管是谁的决定，都是荒谬绝伦。

因此我对这位军人说：“看起来，你很会说话，你是做政工工作的吧？是什么地方的政委？现在你是通天的（意思是他通着康生，或者更大的人物）将来我再写小说，把你写成‘通天政委’。”

周围的专案人员，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通天政委”这个浑号，就算定了下来，因为没有一个人反对，包括他自己在内。

“通天政委”又滔滔不绝地问这问那，提到了杨明轩老人。这大概又是他代表杨明轩专案来逼供了。

一提起这个名字，我真是又悔又恨。当初，我为什么把书给给杨老看呢？当然，是他亲自跑来要去的。每年旧历除夕，他都到我家来一趟，春节时我们也去拜年。他年高德望，是刘志丹的师辈之人。又因他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景范同为副主席，来往较多，我很尊重他，把他看成我的父辈。

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我请教他，王懋亭是否在绥德师范教过书。

他说：“那是一九二四年，或者是二五年，我在绥德师范当校长，王懋亭当国文教员，听说志丹入党，是王懋亭到榆林中学去发展的。”

他一言中的。别人也是这么说的。

杨老对刘志丹的事情很热心。他说：“听说你正写志丹的传记？给我看看吧。”

我当然愿意请他指教。对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还是当事人清楚，我马上取出一本送上，那也是送审稿。

过了很久，老人拄着手杖又来了。他的热心，使人倍受感动，他说：“已经看完。志丹的道路太曲折，‘左’倾路线总是对他刁难，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气，还在坚持。你把我写哭了。”

老人直擦眼泪，引得我也擦眼泪。他对志丹的真实感情，使我很受感动。深感革命队伍里老少几代都是心心相连的。

杨老哪能想到，就因为刘志丹的经历太曲折，在死神那里搏斗过无数次，和掌管“生死簿”的活阎王抗争过无数次，才受到我的尊敬，吸引我去写他。当我写到激动处，不知流过多少泪水。

那天杨老临起身，给我留下话：“我已交《光明日报》，让他们选一些发表。”

那时杨老是民主同盟的主席，兼《光明日报》社长。以后，《光明日报》便选了《渭华起义》，连载了几天。

“通天政委”今天提审这个问题，大概是《光明日报》被点名了，被康生或者别的“大人物”点了名。

前几天从报纸上看见杨老去世的消息。我内心直嘀咕，是不是我的书牵连了他？我想，不应该，因为他没有参加过土地革命，是在白区做秘密工作，还不致引起某些人的疾恨。他的身份是民主人士，要整他，总得顾点面子。况且，《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一段文章，根本沾不上高岗的边儿，何罪之有？

最可能的，是有人给他脸色看，给他气受。老人是解放战争初期才到延安来的，他没经受过解放区的大轰大嗡。这次是不是受了窝囊气？

为杨老的去世，我内心深深不安。我们也不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不能去慰问家属。真把人急死了！

现在我把往事谈出来，他们也找不到杨老了。可我还是有节制地谈：“书，是我求他看的，请他纠正错误。”

“通天政委”突然又问：“还有谁，对你的书感兴趣？”

我故意气气他们。我说：“感兴趣的人多啦！因为那是几十年来人们都渴望写出的书，我写出了，写得好不好也是新鲜的！”

“你说，说具体些，还有谁感兴趣？”“通天政委”很吃惊。

“我在马路上遇到个老同学，她一见我就说：“你真有决心！我看了你的书，很痛快。是得那样写，干这件事，得有艺术家的坦率和洒脱！”

“这个人是谁？”

我说：“是个女的，抗大的同学，名字记不得了。我也没问她在哪里工作。不过，能看出她很有头脑，很胆大。一九六二年书已成了‘反党小说’，并没有出版。她不知在哪里看到过‘供批判用’的书稿。一九六五年在大马路上她竟敢大声称赞。是个不要命的。”

“通天政委”更急：“你必须把这个人想起来！”

“我如想不起来呢？近三十年不见了，连名字都叫不起来。真是无能为力。”

其实，我当然能记得起。在那种形势下，太生疏的人也不敢对我说心里话。她就是内蒙古的女干部乌兰。是个大胆的女性。

她才真正是洒脱呢，穿着靴子、裙子，就在西城的丰盛胡同东口和我相遇，匆匆吐了几句最精彩的知心话，就各自分手了。

现在，我只能说记不起，如能记起，她该倒霉了。“通天政委”该立功了。

## 十五 书稿形成

老生常谈的问题又来了。《工人出版社》主编吕宁的专案组又来提审。没有见人，出了个题目，留下叫我写答卷。题目是：几次书稿的形成。

再写一遍，留个底稿，谁再来纠缠，抄给他们一份就算了。

一九五八年、五九年的两次稿，全是我一个人写成的。书稿经过《工人出版社》的总编吕宁、编辑室主任杜映、责任编辑何家栋集体研究，认为真人真事，人物太多，军队上的干部牺牲一个得换一个。一个连牺牲了十个连长，第十一任连长仍在火在线。不如把人物集中，将十一个写成一个，改为小说。这样，就采取集体讨论。何家栋执笔的办法。何家栋是位老编辑，已经写过几本书了。

何家栋写后，杜映修改，我再改。我发现我和何家栋的文字风格

不同，问题的提法也不尽相同。这就是第二稿，也就是小说的第一稿。写成了，印出后准备出版，我提出送习仲勋审查，因为他当过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把这部书否定了，他说没有写好，许多事情没写进去，例如五顷园子分地，还有些事没写清楚。不能出版。

我又着手调查材料，亲手写第四次稿。从头到尾地重写。特别是开头几章。资料越多、越好写。除把文字，结构动了之外，又增写了第三部分。也就是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创建照金根据地等好多章节。第四部分也有增减，修改了好多。这一稿，是我亲手写的。请大家提意见。

稿子刚印出，我自己再三考虑。还有值得推敲之处。马上又作了修改。写成了第五稿。

有些报刊要发表。我又边修改边发表。这就形成了第六稿。

为此，何家栋跟我开玩笑，说：“我要当拐棍儿，你要丢拐棍儿。”

那确实是在行文和问题的提法上各有不同的习惯和想法，我只得一个人包办了，直到最后，这就是《刘志丹》上册。

所以，这部书的问题全部由我负责。与吕宁、杜映、何家栋全无关系。因为是由我一手包办的。

但是我也说明白，作为编辑，他们都出过很好的主意，花过不少心血。

这问题我写得很简单。他们看着只咋嘴：“就这么简单？”

我说：“当然还有细节，比如在最初合并人物时，什么人和什么人合并，谁的问题和谁的问题联起来，都是经过讨论的。谁出了些什么主意，可能是各自胸中有数，你们若要仔细了解，只有把几个人叫到一起对证了。”

我还是强调，不管谁出了什么主意，最后还得由我决定取舍。所以，一切责任由我负。

## 十六 习仲勋专案组的人

自我移居女囚室后，只听别的专案人员提到习仲勋，或这里的专案人员转述习仲勋的态度外，还未见过习仲勋本人的专案人员。

今天又把我带到楼上提审，习仲勋的专案人员到了。

是个一身戎装的人员，看似满神气，却又那么幼稚。他在我面前走了几步，第一句就冲口而出：“把你和习仲勋的阴谋交代出来！”

我马上还击：“什么阴谋？全是阳谋！”

这是在二楼上被提审。如果录音，可以听出我的声音比平时说话高四度，因为我太气愤太激动，变音了。

今天来的这个穿军衣的，一开口，就听出是河南口音。他神气十足地吼着，装得煞有介事。

我毫不客气地继续反击着，没有必要跟他客气。反正我是犯人，向你们屈膝是犯人，打你们几拳也是犯人，索性来个针锋相对，界限分明。

他说：“你，你被审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是这种态度？”

我说：“你开口就叫‘阴谋’这么主观主义的人，怎能审这么大的案子？你懂辩证法吗？”

他也反击我：“我们不懂，就是你懂！”

“也许你读过书，就是不会用。别人说什么，你就跟着说什么。主观主义的瞎折腾。没见过这样审案子的，一开口就钻进死胡同。”

他搓着双手，又站了起来：“你这么嚣张，这是向我们进攻！”

我便说：“我是个进攻型的，今天是进攻定了。你说下去，你说完，我还要进攻。”

我已经豁了出去，沉着脸，双目直盯着他那张尴尬而又强装镇静的脸。

陪他提审的，是属于我机关的专案人员。他们的表现很好看，都



背着脸，用手捂着嘴笑。我睨见了，又装着没看见。由这点迹象表明，本机关的专案人员，已把这些穿军衣的属于中央的专案人员，也就是康生他们直接领导的专案人员看透了。他们的神秘，高傲的外衣全被剥落了。他们手中并无真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材料。只有瞎诈唬，加上那套军衣，最重要的是有一顶“中央专案”的桂冠，维持着他们勉强支撑着的架子。

他又站起来，捋捋袖子，催着：“你写，把你们的阴谋写出来！”

我抬起头，严肃地盯着他那张四方脸：说：“拿纸来！当面写。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阴谋，全是阳谋！”

我心中好笑：这么个愣头青，竟然是习仲勋专案组的成员之一，他审得了副总理的案子吗？康生竟然选择这样冒冒失失的人来打前线？看样子不到四十岁，装得满神气。我又可怜他的不知天高地厚。顺便问了一句：“河南人么？”

他答：“是的，河南巩县人。”

我惋惜青年人在风浪中迷失方向。只图一时的虚荣，却不知将来都会变成耻辱。

我没法对这些人说出他们的后果，只换了个口气说：“对不起，我就是这个脾气，要辩论我能和你们辩论一天。慢慢讲，我也可以慢慢讲理。”

他毛毛草草地说：“对于你，我们都知道！”我心想：知道更好！

他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只咬定“阴谋”二字，要我写出来。我也打算写出来，是用“阳谋”二字顶回去。

那人走后，我仍在思索。习仲勋总算西北的出名人物，他们把他定成“反党”的带头人，定为“习、贾、刘反党集团”的第一名，就派来这些什么都不懂的人，到处指手划脚，打着“中央专案”的招牌，甚至有时还打着毛主席的招牌，真是给中央脸上抹黑。

## 十七 周扬专案

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专案组？还是“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我不好询问，看劲头，是来者不善，要找周扬的麻烦。这些家伙，都不是只来一次两次了，无数次地往返。

我写的书，请周扬看看，原本是正常。以公而论，他是中宣部管文艺的副部长。我写的小说，又是陕甘宁边区的题材，当然应请他看。以私而论，他是我的老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我是“鲁艺”的学生。

可是，他们却来钻空子。“通天政委”突然问道：“你找周扬看，找过陆定一没有？”

看样子，他们还想把我和陆定一拉成一案，因为陆定一的案子更严重。“文革”一开始，他和他的爱人严慰冰被逮捕起来。头一条罪状就是严慰冰写信骂了林彪，这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现行反革命”。老婆的事株连老公，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况且，砸烂中宣部“闫王殿”时，陆定一被称为“大闫王”！

我说：“我本应当找他，还没来得及，他是中宣部部长，我随时都可以找他。组织上让他们做中宣部的负责人，一切由组织上负责，与我无关。”

“通天政委”被闷回去了。他既无法追问，也无法批判，更无理由发作。

满屋人都傻着脸。“通天政委”只得转回话题：“你说说，你和周扬接触过多少次？”

我本想噎他几句：我在鲁艺学习三年来，常听他讲话、报告，每天都碰面，你说我见他多少次？可是我没有说，咽了回去，懒得和他说了。

我只说：“全国解放后，我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在晚会上，一

次是请他看书。”

他问：“书是你送给他的，还是苏一平送给他的？”

“我送给他的”。

“苏一平承认是他自己送给周扬的。”

“不！他记错了。是我送给周扬的。我送到中宣部的传达室，转上去的。”

“周扬为什么找你谈？”

“是我自己要求的。苏一平是文艺处长，他派苏一平来我家传达他的意见。意思是，我的书可以出版，修改一下也可以，不修改也可以。我提出要见他面谈，有些问题要当面请示他。我认为中宣部长可以解决许多难题，这是他的职责。”

“谁催的？”

“我自己催的。我请他的秘书催的。他的秘书我不认识，只是打过电话。”

“为什么不让苏一平打电话？”

“各人有各人的历史关系。苏一平是延安西北文工团的团长。周扬是鲁艺学校的院长。我既是西工团的，又是鲁艺的。我可以催，谁也不会拒绝。也不会节外生枝。”

那时，我怕在这个问题上把周扬和苏一平连在一起。在中宣部内，大闫王、二闫王、小鬼、判官地打上一串。我说话是有意把他们分开的。

“周扬向你都谈了些什么？”通天政委发问。

我很快在脑子里播转着当年的镜头：头一次，是秘书通知的。我和北影的导演水华一块去的。在周扬的办公室。还有他的秘书谭晓行在场。

开头儿，周扬先表扬了一番：“你带了个头儿，起了个模范作用。”

你本来是学音乐的，不是学文学的，竟写出了小说。我很早就想叫人写出这么一本书，你写出来了。我们全家都看了。这个本子，可以出版。修改一下可以，不修改也可以。还可以拍电影。电影剧本你们俩谁写？”

我说：“水华同志写。”

水华说：“建彤同志写。”

以上是序言。真正的开始，是我要提的问题。我问：“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写？”

周扬说：“当然可以写，都是有结论的嘛。”

我又提出个问题：“三嘉塬缴枪问题可不可以写？就是谢子长缴了刘志丹部队的枪。”周扬说：“这些具体事情我不清楚。还得问西北的同志。看他们的意见如何？”

我说：“有人说能写，有人说不能写。犯过”左“倾错误的人不同意写。”

我又问：“高岗的材料能用不能用？”

周扬说：“高岗的事也能写，历史唯物主义嘛。他过去如无功劳，全国解放后能给他那么高的地位？”

我觉得周扬说得很对，到底是文艺理论家，别人是不敢这样说的。越糊涂越胆小，越清醒者越胆大。这叫做理论上不糊涂，有水平，才能心中有数。

周扬很有兴致，他接着说：“你写刘志丹不要到处贴毛主席的标签。因为他们南北分离，相距万里，没有电台，互不通气，毛主席的著作，那时也不是到处都宣传，都能看到的。刘志丹在实践中的作法，也许有和别人不谋而合之处。大家都在实践嘛！”

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周扬很有见识，很大胆。到底水平高一筹。在这个期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别人是不会，也不敢这样讲

的。

这些在脑子里闪现的东西，记是都记起来了。可如今，我在被审席上，能和盘托出吗？我不能，决不能！

通天政委催说：“讲么！在场的又不是你一个人。”

我说：“是呀！可是我没做记录，你们看别人做记录没有。我是向周扬提了些问题。他说：他不了解具体历史，不好解答具体问题，具体问题还得请教西北的同志。他只能说：对待事物要实事求是。”

通天政委说：“你不交代有人交代，工人出版社的人都说了。”

我一想，可不是，那时我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关系很密切，在这部书的问题上是无话不谈的。听说我到周扬那里谈小说问题，都来了。我高高兴兴地毫无顾及地，把什么话都说了出来。可是没想到，康生和阎红彦借题整人，把好事变成坏事。大家都被打得焦头烂额，他们就不能不交代。现在我们都不能见面，只能凭各人记忆的情况去说了。这么一来，可真要给周扬增加“罪行”了。

我正在发呆，“通天政委”把话题一转，又问：“张水华怎么找上你的？”

我又打了嗑巴。我不能说是先见了我的老师潘琦（水华的夫人），才通知水华找到我的。能少拉扯一个就少拉扯一个。我只说：“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通过出版社的编辑，找到出版社，由出版社做桥梁，才找到我，就和水华联系上了。”

“张水华都说了些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不了解历史，想从我的书中了解。”

乱子真多，在这之前。北影的造反派已来对水华进行“外调”，我也是这么说的。水华这人很正派，人缘好，我估计，他不至于受大罪。

“通天政委”又发话了：

“你以为周扬就对你那么好？他是吹捧过你。但事情一发生，他就慌了。到处通知，不让理你。”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挑拨离间么？用不着。我明白，在这个国度里，一桩政治事件，或者一个政治动乱到来之后，会把人逼成什么样子。即令他那样做了，也是合理的。我决不怪罪他。

“通天政委”又让我讲第二次见周扬。

第二次的见面空气全变了。是一九六二年的中秋节那天。中宣部打电话，叫我到周扬办公室。我去了。在座的有中宣部秘书长童大林，有秘书谭晓行。

周扬这时的表情使人很难受。他很严肃，但又觉得他在为难。头一句话就说：“你犯了错误，陕北干部是反党的。”

我不禁凄然泪下。这是对他信任的泪，自觉冤枉的泪，也是对他同情的泪。他在做违心的事。不管怎么说，那时我还是信任他，在凄惨的空气中，我还是说了一句“我没有错！”

周扬问：“你那两封信是谁写的？”

他指的是我反击阎红彦的两封信。那时，我只能写给中宣部的周扬。他是管文艺的。

我说：“是我写的。”

他说：“人家说那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的，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谁让你写《刘志丹》的，难道在鲁艺学习时受过什么影响？”

对后边的话，我不需要答复，我只说那两封信，我说：“那信是我写的。我看过许多旧档案，别人没看过。我调查过的东西，习仲勋他们也不知道。我访问过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实际上，他们没有我了解的材料广泛。”

周扬没再说下去，只是说：“你要好好交代！”

那秘书长和秘书，都一句话没说。我临走时，秘书把我送到大门

口。她说：“你不要难过。这部作品出了事，还可以写别的东西嘛！”

善良的姑娘，在这个劲头儿上，她还敢对我说宽心话。该有多么大的胆量，多么大的同情心啊！我感激她。

关于这些，我能向提审者都供出来么？当然不能，那是坑害好人。

我只能说：周扬批评了我。说我犯了错误。陕北人是反党的。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是习仲勋写的。这当然是康生的陷害和栽脏。

其实，周扬找我谈话后，中监委的副书记钱瑛又提审我。她问：“最近谁找你谈过？”

我说：“周扬。”

她说：“那是我们叫他找你谈的。”

呵！明白了，这里边还很有名堂，我断定，周扬是被迫的，比如说：“陕北干部是反党的”。决不是他的真心话。只有钱瑛才能发出这种腔调。

在事情发生之前，还有个插曲，周扬在某会场碰上了习仲勋，告诉他，李建彤的小说写得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又打电话到我家，转述了一遍。因此，周扬的内心情绪，决不会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反党”的，也不会把陕北干部看成是“反党”的。虽然他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可他也有正义感。

自从周扬被迫召见我之后。我在电视上看见他露面，总不见一丝笑容。我心里揣测，他现在也很苦恼。

从一九六二年秋到“文化大革命”，我经常关心着他的音信，听说他被揪斗了。在体育馆和许多老年人一块被揪斗了。我的心缩作一团。因为他有病，是做了肺癌手术不久的人，对一个病人，施出那么不人道的凌辱，岂不使人万分愤慨！

后来又得知，1962年小说事件发生后，周扬见了毛泽东便说：“我犯了错误，支持了《刘志丹》小说。毛泽东主席说：“你是管文艺的，

发现了人才，发现了好作品，当然要支持嘛！”像是谅解了他，没有事了。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原来的面孔了，满不是那么回子事了，开始揪斗他了。

## 十八 苏一平、闻捷

对于苏一平，他们决不会放过。“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找过我多少次了，一次换一拨人。整苏一平，也联带着整曹冠群，一批判就是一对儿。

苏一平、曹冠群夫妇，我和他们相识几十年了。从一九四〇年起，我就和苏一平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们相处得很合谐，谁也没坑过谁，遇事都是实话实说。

我请他看小说，是因为他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我的突然上门使他很意外，他没想到我写小说，更没想到我会上门找他。我和文艺界的关系，已经中断十几年。这次，是一九五九年或者是一九六〇年我才找到他。他说，中宣部对小说不做事先审查。我说：“不让你代表中宣部，以私人关系看看，提点个人意见吧。”

就这样，我就把书放下，他们夫妇俩看的。苏一平是从文艺角度提意见。曹冠群说，她是要向刘志丹学习，因为她正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她是要看看刘志丹在逆境中是怎样渡过的，以什么态度渡过那段屈辱的时光。我很能理解，别人就不能理解。就要找她的麻烦。

这个陕西妇女干部，陕西味太浓了，特别直爽。她是全国妇联的书记处书记。一九五九年农村发生的情况，她下乡看见过一些，回来就讲，听说是在某个会议上讲的。反映下边的情况，这是惯例。可是，那些不了解下情的人，又有满脑子的教条，就觉得冠群是“替地主富农说话”，是“右倾机会主义”，她被斗争了。说实话者挨斗，空想家



整人。

就是因为这些，他们夫妇就没有清闲过。“文化大革命”以来，不但中宣部的人找我调查苏一平的材料，全国妇联也来调查曹冠群的材料。我哪有那么多的材料给他们。他们贴大字报，画漫画，把“反党分子”李建彤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曹冠群画在一起，说两个人正在商量“反党”。真是低级的造谣。

听说他们夫妇被斗得好苦。苏一平，几年前就病了。他人太老实，在这不讲理的年代，越老实的人，越挨整。比如一九五九年正斗彭德怀，他却说：我对彭德怀的印象是正面形象。人家当然得斗他。斗多了，他就患上了心脏病。

遇见这些事，我总是不免有些抵触情绪。专案人员就要对我施加压力。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通天政委”。

他说：“一谈周扬，苏一平的事，你就抵触情绪很大。难道你没听说，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代表，苏一平执行文艺黑线也有很大责任。”

我说：“不管黑线、红线，都与我无关！”

我心想，那线头儿在哪儿，还很难说。现在也分不清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了。只凭有权者说吧。

关于苏一平的材料，我写后他们不满意。

我说：“那就算了，我什么也不写了。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通天政委”觉得棘手，只得摆了摆手，意思是“暂停！”

“通天政委”也只能那样做。上次为西工团的同志们在一块吃了顿饭，他审过我一次。我也是顶了一顿。不是我不讲理，是他们欺人太甚。在他们脑子里，凡是沾了我的边儿，就是“反党”了，虽然他们还说不清什么叫“反党”。

就在一九六二年那个夏天，闻捷看了我的小说后，我们见过一次

面，说得高兴，我请老朋友吃顿饭，在新街口的西安饭庄。去的人不少，有苏一平夫妇，朱丹夫妇，闻捷夫妇……约有十来个人。

那天吃得高兴，喝得痛快。祝酒碰杯，谈笑开怀。闻捷可能喝多了。举起杯说：“祝你成功！不能退却！”

这话的意思，是我告诉他，已经有人企图捣乱。执行过“左”倾路线的人，在觊觎窥测，暗下鬼喊伎俩，但尚未成功。在准备迎接战斗的情绪中，我也举杯还礼。

“即令为此书坐牢，我也要把它写完！”

像是誓言，确实是真心。

饭后，有人回家，有人到北海茶座聊天。我是去北海的。和朋友们叙叙旧情，海阔天空的聊聊，轻松愉快，我们已有近三十年没有一块聊过了。都感到青年时代很痛快，但过得转眼即逝，眼下已进入中老年了。

像这样一桩及平常的事，也成了“反党”！不过，我相信，我那句誓言，不会有人供出。这些人都非常可信，没有一个软骨头。即令供出，又有何罪？一个人若下决心干一件事，就得干到底。半途而废，不为人杰。

《刘志丹》为什么写不得？以他为首创建的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起的什么作用，世人皆知。现在有些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过河拆桥，实为奸雄。

后来听说闻捷在上海去世。我也怀疑是否因为我的事遭株连？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令人怀念，惋惜。我们曾是姐弟相称的，我怜惜他那瘦弱的身体，苍白的脸，囚徒般的乱发……

## 十九 专案组人员

近来，报纸上又在宣传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职工和“八三四一”

部队驻厂支左的经验。这股风很快吹遍全国，吹到各机关，又开花样翻新的批斗会。

天寒地冻的，冻得脚疼，我站在最后边，看不清，听得见。军代表——革命委员会主任作报告：“我们要对那些表现好的，问题交代清楚的人，实行宽大政策。”

上台坦白交代的头一个，是姓程的高级工程师。他说，他在英国留学时加入过什么反动组织……

第二个是王奋。就是错喊了半个字母的人。家中是贫农，哥哥是县委书记。江西人，他的罪行就是说错了那半个字母，就被斗争了，劳改了。现在说他改正得好，交代了“反动思想”。军代表宣布，解除对他们的专政。

老宋悄悄对我说：“这两个人根本不该专政。那老工程师的历史问题，是刚参加工作时就交代了的。王奋那事算一场笑话。叫“毛主席万岁”叫惯了，一慌，口中失误。这也算落实政策呀？失望，这种落实政策是骗人。可怕！”

第三个上台的，是个少数民族，地质学院毕业的。因为姐姐在朝鲜工作，他给姐姐通了信。他坦白交代说：“我们朝鲜族，在鸭绿江两岸都有亲戚，是互相通婚的。姐姐在那边结的婚，是某地方的委员长。她叫我去，说那边优待知识分子，每月有特殊供应，全民公费医疗。知识分子的吃住都受优待……”

这也算交代，解除了专政。地下室还关押着四个朝鲜族人。

我脑子翻腾，很想写点什么，记点什么。否则，时光流去，白费日子。

这里，除了有限的书，频繁的提审，真应当写点什么。起码，可把眼前这些过来过去的专案人员，专政人员写一写。他们是这个“运动”的特产。如果想写长东西，还不可能，谁也不能每天记日记，专

案人员经常来搜查，连报纸都要提起来抖一抖。要写，只能用中国画的大写意手法，一下笔就是一棵树。

目前，我的专案人员，经过反复筛选、较量，像是固定下来几个人。我的印象中，还是那个穿军衣的最能说，最有权，手眼通天，已经被选定了，绰号——通天政委。

还为他们编了号：

一号：通天政委，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的军人。

二号：憨厚老二，地质部派来的处长。可是他说话较少，也不发脾气。听说是工人出身，也许是目前的“唯成份论”所使，把他派到了这个“光荣”的岗位。

三号：秀才老三——地质部来的，不知是位局长还是处长。这个人，一到现场，就做记录。偶然说句话，也可看出他的实在。

四号：合理大个儿——地质科学院的专业干部，像是学物理的，叫不出名字，江苏或浙江人。开始，他很认真也相当凶，逐渐地，在提审中他越来越合理了。比如甘肃的王世泰专案组正在逞凶不讲理的时候，他却把人家给他的“我的罪状”擦了桌子，这里边包括了许多文章。表现出他有他的看法。

五号：小老虎——地质科学院的专业干部，学地球物理的。兰州大学毕业。青海省人。这小伙子仅三十来岁，是专案组中最年轻的。最初，在造反高潮时，他只是皱起眉头叫几声，声音也不响亮。后来，就越变越和善，我倒觉得他是个很可造就的干部。他办事不动声色，脑子比较清醒。有一次，他们审我一九三七年夏天在河南许昌时，接近过哪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我谈了些，再问，我记不起来了。有一天我要稿纸写“交代”（那时，不允许自己买纸）他给我送来一整本稿纸。我一揭开，里边有许昌的外调材料，是某个人写的证明材料，材料上说我在他主办的进步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我纳闷了，这个举动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呢？怕是忘记了，疏忽了。我退给他，倒使他难堪，如不退给……我也没什么用。

我正写“小说提纲”，小老虎突然跑进来：“走，有人找你！”

我知道这是又要提审，我桌子上摆开的东西也来不及收拾，被他瞅见了。便问：“这是干什么”？

我理直气壮的说：“写小说，这是小说提纲。”

他真是有些无可奈何：“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还有心写小说？”

他到底是专案人员，只得伸手拿起，押上我走。

到了提审室，大家一看我的“小说提纲”，气就来了。憨厚老二，先沉不住气。质问我：

“谁憨厚？憨厚就是没有阶级立场，就是软弱！”

我不理会他。

“通天政委”问：“你这些代号都是谁？为什么想写小说？”

我说：“这种事你就提不成了。这是以后的事，我决不会在这个地方住一辈子。我要写的“通天政委”就是你。你不是直接通着中央么？你头一天来，就向我声明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

这话很噎人，他满脸通红。

“要把这个案子写成‘小说’或者‘纪实’。早在一九六二年，事情一发生我就定了，开始提审我的是中央专案委员会，就是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三个机关组成的。集体办公在中组部的楼上。他们第二次提审我时，我就表过态度。我说：“今天诸位审我，可是我却透视诸位的灵魂，将来诸位都在我的小说中。他们只能互相对视，现在人都活着，可以对证。”

我又补充几句：“我不是只和你们几位为难，只要沾着这案子边儿的人，统统都要写进我以后的书中！”

注：经过“文化大革命”。原来的专案人员都又被康生整治了。那些老的，身体弱的，都已去世。现在活着的，还有原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中宣部的处长苏蓓。中监委的处长李振海。

## 二十 牺牲前的战友

又是重复提审。

刘志丹牺牲前的战友是可贵的。宋任穷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关于宋任穷和二十八军的干部受株连，我内心很是过意不去。专案人员已来过四次。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都来过。今年是一九六九年了，又重新上门。

这次的声势大些，因为我和西北的一些干部都被关押起来。他们认为，这是确定无疑的“反革命”了。从前说“反党”，把我这个“反党分子”也变成“反革命”了。

宋任穷是东北局书记，当然是从东北来的专案组，都是些机关干部。1967年来的那些大学生，说是搞宋任穷专案的，谁知都是干什么的？一大群人在北京呆了两三个月。最后只剩下一男一女，隔几天到地质学院打扰我一次。开始我还耐心对待，后来我就火了，越看他们越不象话。刚来时，女学生的脸红扑扑，时间长了，那女学生的脸就成了黄巴巴的，大概是怀孕了。这个作孽的“革命”，要造成多少不正常的后果？我看不下去，只得用善意和同情的方式发了火：“人家都回去了，你们还呆在这里干什么？宋任穷的事不是说了那么多次么？还磨蹭什么？”

从那以后，他们再没有来过。

过了几个月，我被放回家。从街上买的“小报”上看见，东北又在造谣生事了。竟然写着“宋任穷为高岗翻案。”真是岂有此理！

自此之后，凡是东北来人找我。我便质问：“谁说宋任穷为高岗

翻案？哪里弄来的材料？高岗不在二十八军，根本靠不上边，宋任穷怎么会谈起高岗呢？你们出小报造谣，写大字报造谣，不怕给这个“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抹黑吗？”

来的人满口推脱：“那不是我们搞的，是群众。”

“群众”这个词儿成了某些人的挡箭牌，群众成了他们利用的工具。

这次来的人很厉害，也很狡诈，卑鄙。他们利用名利进行诱供，他们说：

“你要学张体学，不要学宋任穷。”

我问：“张体学是怎么回事？宋任穷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张体学当了代表。他交代的好。把他做的错事全部交代清楚了。都是王任重叫他干的。他很快得到了解放。还当了代表。”

另一人接着说：“你交代彻底，也可以当代表嘛。”

还有人插言道：“还可以当副总理呢。”原来现在的副总理什么的都是这样当上的。

我把脸一沉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也不想当官！”

他们又挑拨：“那你是要学宋任穷啰？”

我问：“宋任穷是怎么回事？”

“宋任穷和邓小平是一个县上的，死顽固。”

我说：“哦，原来宋任穷和邓小平是同县的，为什么听口音不像老乡？”

他们又解释说：“不是一个县，是一条在线的。”

我暗想：难怪你们一打一大群呢。原来你们把人都穿成了线儿，一打一大串儿。

再想起红二十八军的干部，都在为我倒霉：二十八军特派员裴周

玉的专案组也来过。原来，我看到《人民日报》上登的新疆领导人名单中还有他，还很放心。我虽采访过他，而他还在领导岗位上，可见不是每个人都受株连。谁知不几天，他的专案组就到了北京。报纸上公布他是领导人，背后却派人调查他的材料。他们硬说《刘志丹》第三稿是裴周玉替我定的，这当然是诬陷。可他们说：“为什么他那篇《英雄血染黄河水》的结尾和你的“东征”结尾相同呢？是你抄了他的？还是他抄你的？怎么勾结的？”其实，即令是谁抄了谁的都不犯罪，何必这么大张旗鼓？

我用一句话答复了他们：“那是编辑喜欢那几句话，从报纸上剪下贴上去的？这和他和我都无关系。”

他们最注意的是在宋任穷家里的那次集会。我说：“宋任穷是红二十八军的政委，刘志丹是军长，他们是战友，宋老是红二十八军目前健在的最高领导人了。一九五八年夏天，在他家院子里开一次核实材料会。那是我和大家要求开的。因为东征时间短，好多人记不清打了些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的仗，特别是从南方来的长征干部，不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记不清地名，要求和陕北干部核对。

“会是晚饭后开的，当然是宋任穷主持，他是领导嘛！只是请大家核实材料，参加人有：红二十八军参谋长唐延杰，特派员裴周玉，一团政委王再新、二团长于占彪、政委张家吾、葭县游击队政委张俊贤、神府苏区红三团长王兆相。大家全是说的打仗，一路上如何贯彻中央的政策。地方干部说：‘军队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的政策，纠正了错误路线。’”

“军队干部说：‘地方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们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他们还表示：刘志丹同志是烈士，应当写出来。可千万不要写我们。总之，没有超出东征的范围。哪来的反党？”

宋任穷对刘志丹的称赞，是我单独访问他时谈的，他说：那时志



丹刚从监狱放出不久，指挥打仗还那么机智、勇敢。大家都知道他受了很大委屈，可他从来不提那件事。有一次我问他：“你说，陕北的‘错误肃反’应当由谁负责？”他说：“我不想提这件事。如果认真问起来，我认为，应该是本地干部郭洪涛负责。外来干部不了解情况。不能责怪他们。”对那桩错捕错杀的，破坏性极大的“肃反”，这是刘志丹最后一次表示态度。他的感觉是灵敏的。看问题很有深度。

## 二十一 难友钱凝

不知为什么，把我们四个女难友分开了，专政办公室宣布：李建彤和钱凝搬进小仓库，由李建彤负责。宋克和张坤娣住原来的房子，由宋克负责。

宣布后，宋克眨眨眼开玩笑说：“1938年咱俩在抗大学习，是两个班长，每人带十来个人，现在咱俩又当了小‘班长’，每人带一个兵。”

我问：“为什么这样？”她说：“大概是狱卒们透过玻璃看到坤娣和钱凝说说笑笑，又怀疑她们是什么关系了。”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也无法挽回这个局面，我和钱凝只得住进仓库。

这小仓库可真小，约有五、六平方米，四壁擦的全是小木箱。只有门口留出一条路。在木箱占据的剩余地方，我和钱凝能铺两张木板床，是一横一竖，头对头的拐弯床。

我们刚安放好。我对钱宁说：“你看，这房子没窗户，房门一落锁，像个方铁筒，连点儿空气也进不来，能把人闷死。再说，咱俩睡在旮旯里，那些专案人员们窥不见咱们的行动，他们岂能甘心？”

钱凝是个绝顶聪明的机灵鬼。脑子一转，就四处翻腾起来。我只是呆望着。她说：“我们学理工科的人，都懂这个。我查一查有无窃

听器，什么样的我都懂。”

她几乎把每个木箱都翻个遍，墙犄角、门窗犄角都查个遍。床底、墙缝也摸个遍。才摇摇头说：“没有，他们还来不及。不过，咱们说话可要小心。只能用手势和用笔谈了。”

她伸出拇指和食指，做了个○字形：“这个圈儿就代表你们家的那一位。”

又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对成个方块儿：“这代表我们家的老方。”  
其实，她爱人并不姓方，是姓孙。名字中有个“方”字。

真是特殊环境产生特殊感情。一个反党分子和一个右派，竟是这样亲密无间。我了解她，喜欢她。

晚上，我俩躺在床上，头对头的说话，我问：“你和方块儿怎么结的婚，感情好么？”她叙述开了：“我们是清华大学同学，都是学物理的，我们同样都喜欢天文，夏天在楼顶上观察星星。星星又成我们的月下老。我们要好了。但是没有结婚。直到我成了右派，劳改回来才结婚。”

“难得他等你那么多年。对你够忠实的。”

她说：“是的，我爸爸也喜欢他，我爸爸喜欢做学问的人。”

说到要紧处，钱凝从她的床上跳到我的床上，钻进我的被窝儿。搂着我的脖子说：“我真幸福，能和你在一块儿，我真幸福！你是全国几大串儿的一员。什么‘刘、邓、陶、彭、罗、陆、杨、彭、高、习、习、贾、刘’……我永生不会忘记……”

她不我面前隐瞒任何事情，滔滔不绝地往外吐：“他中学时代，在家乡念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这些往事，都在日记里写着。他的日记，也交给了组织上。就因为三青团，他被专政了，不让回家。我的两个孩子，男孩四岁，女孩一岁多，都由一个南方阿姨带着。现在情况不明。”

说着，她哭起来。我心像在雨水中泡着，甭提是啥滋味儿了。是呀！为什么把人家夫妻俩都关押起来呢？

我又问：“你呢，参加过什么党、团么？”

“没有，什么也没参加。我受家庭思想的影响：‘君子不党’，所以什么也不参加。”我轻轻笑了：“好个‘君子不党’！”

她说：“刚解放，我就考入清华，考分是前三名。清华毕业后我懂了四国外语：英、俄、德、法，所以我工作起来很方便。前年外国讲法语的专家来了，是搞地质的，调我去当翻译。咱们搞法语的人太少。前几年重视俄语，不重视法语和英语。”

我爱才，我是真正喜欢她的才干，灵敏、纯真。她也是真正的信任我，无话不说。我看到的她那双眼睛，细长细长的。瞳孔像透明的黑宝石，我从未见过这么黑亮的瞳孔。

她又告诉我，她父亲抗战后期跟随电厂去了台湾。她想上清华大学，不想离开大陆。现在她的一家人父母和六个弟妹都在美国。

上边命令我去劳动，打扫楼道，清除垃圾。我终究是双腿患着关节炎，双目患着白内障的人，走到光线弱处，摔倒了，恰巧把胸部珞在筐的木提手上，使胸部受了内伤，疼得钻心。我咬牙抬起身，把活计交给别人，回房就躺下了。

把钱凝吓坏了，也忙坏了。趁着宋克敲门取暖瓶打开水之际，她便托宋克向坤娣借来暖水袋，装上开水，给我捂在受伤的胸部，她问我：“要不要看医生？”

我说：“算啦，要看就得到医院去，惊天动地的。我又走不动，悄悄保密吧。若能热敷好，就是万幸。”

她说：“恐怕得半个月。”

钱凝是个有心人。这天晚上，她又和我睡在一个床上。把暖水袋放在我胸前，捂在受伤处。我感到血液在流动。钱凝又和我喃喃地说

起来。

她告诉我，她怎么去的北大荒：“打成右派后，就逮进公安机关。当天进去，把全身脱得只剩下背心，一条裤叉。这叫搜查。”

我捏着她的手，偷偷流下泪水。我在这个队伍里几十年，除在采访中听到人说起陕北错误‘肃反’时扒过女犯人的衣服，此外，从来没听说在正常情况下公安机关是这样干法。钱凝那时还是个年轻姑娘，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一个懂四国外语的物理探矿工作者，竟然受到这样的屈辱！

听坤娣说：她的探矿技术出名得好，曾经是模范工作者，如不是打成右派，早是工程师了。《人民画报》上登过她的照片，介绍过她的事迹，标题是“女勘探队员”。

她把我当成知心人，当成了姐姐，偎依着我说：“和你在一块儿不但光荣，而且放心，你能体谅人，是真正的革命者……”

我说：“我很相信你，根据我的观察，你是纯洁的。咱们在这里相识是偶然的。我估计你将来会到美国去探亲，希望你到国外不要说出你和我一起关押过，也不要说你认识我。我这个案子传出去，对国家的不好。刘志丹本人是无罪的，《毛选》传遍全世界，在一九六四年以前的《毛选》上，是把刘志丹和高岗写在一起的。高岗的错误，那是全国解放以后的事，与刘志丹无关。并不是因为高岗的问题，目前是他们借口整人，是诬陷。

她搂着我哭起来：“你真好，你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又安慰她说：“钱凝，你受委屈了，在北大荒受苦了。”

她说：“我去的那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说的北大荒，那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冷时温度在零下40度。冬天把腿用很厚的东西裹起来，背上东西出去一趟，腿就冻僵了，脚手都冻坏了。房上的冰柱粗得像小棒槌，女人中最能吃苦的，都感到吃不消。”

从她身上我发现，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独立性很强，也是从小教育的结果。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教员，家中七个子女，她是老大。在抗战期间，家庭南北迁徙，到处流亡，她是母亲的助手。这样的人，个性也是倔强的，宁死不屈，斗她多少次，她也不低头。打在她身上，她也不哭叫。有的人见她国内无亲人，就专门欺负她。那个姓朱的专政组长最可恶，动不动就大声吼叫：“钱凝，你站住，弯下腰，低下头……”要不，就踢上几脚。

有一次，她从外面跑回来就恸哭。这是向亲人的恸哭。述说那些人对她的无理虐待。

我把她拉起来边安慰边鼓励地说：“你真坚强，像个铁蛋儿，以后我就叫你，‘铁蛋儿’了。受这么多折磨，你的精神没有垮。证明你心里是踏实的，你没有做错事。”

她干脆蹲在地上，抱着我的腿求援：“你给我出出主意吧！他们还会整我，都很凶，我怎么办？我没可说的东西呀！我和家里几年不通信了。在北大荒劳改期间，我祖父来找过我。他是从杭州来的，从机关打听我的消息，机关的人说‘出差去了’，骗了他。他老人家在北京住了几个月，等不到消息，哭哭啼啼走了。我叔父从香港也来找过我，得不到消息，也痛苦地离去。可是我没有给亲人们写过一封信，怕他们知道我在北大荒劳改过。机关还是不断地审我，硬说我有问题。怎么办？怎么办呀？”她真是悲恸欲绝。

我拉着她的双手：“快起来，免得那些人进来看见，又胡说八道。目前这种情况，只能如此。他们用软的，你也用软的。他们来硬的，你也来硬的。当然不能胡说，但是不要和他们骂，他们会打你。看目前这个乱劲儿，打死白打死，生命没有保障。你没听见有个最高指示么：‘好人打了坏人，活该！’什么是坏人？眼前没有标准。他们说咱们是坏人，过几年以后，说不定他们就成坏人了。”

她站起来，坐在床上，双目望着我：“他们会不会把你打死？”

我说：“估计不会。我是政治犯。他们误认为有个反党集团，误认为我有很多材料，想从我嘴里得到重要口供。若打死，连这点希望也没有了。”

“你给口供么？”

“我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我的每个字比金子还贵。决不使任何恶人得逞。我也不会自杀。留着这条命回家给我的‘圈儿’做面条呢！”

她噗哧笑了：“什么什么？做什么面条？”

“我是给你说笑话。我不会做饭，只是打个比方。有一出河南戏，叫做《花打朝》。说程咬金的夫人跑到朝中大闹。皇帝说，只要她不闹，就封她个国公爷。她答道：‘我那老头子是国公爷。我们家有一个国公爷就够了，又不开国公爷铺子，要那么多干啥？我不当官，回家给我老头子做面条，他吃一碗，我给他煮一碗。’懂了吧？”

“懂啦，懂啦，你真好！”她笑得眼睛迷成一条线。

自那以后，我和她更贴心了，我根本不把她当成右派。

今晚我们躺在一个枕头上。她述说北大荒的政治情况：那里真复杂，什么人都有。小偷、妓女、政治犯、右派，什么都有。还有洋妓呢，就是为外国人卖淫的。

我很吃惊：把这个干净的姑娘放在那么肮脏的环境中，怎能对得起人类的良心？我说：“出污泥而不染，最可贵的是你还是这么纯洁！”

我问：“你是怎么回来的？”

“何局长找我。他是物探局长。打我右派时，也是他经手的，还用手枪吓唬过我。几年之后，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物探人才又把我找回来。只使用我的物理探矿技术。政治上还是把我当右派对待。”

我能预料到，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不会持久。

我拉着她的双手说：“在这里认识，咱们是朋友。将来你如到国

外探亲，千万不要说出你在北大荒的情况。仇视中国的人会借口攻击。你是爱国的，千万要照顾大局。记得我看过一本书，大概是斯特朗写的《伟大的史太林时代》，她在苏联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连她采访的记录都没收了。可她认为那个国家还是伟大的，因为它能抵御任何侵略的敌人。虽然他们也有错误，她不计较史太林做了多少错事。咱们也是同样，“毛泽东时代”也是伟大的。虽然有缺点、错误，还是推倒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是好的，这个队伍里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善良、正直、通情达理的。只看看这被关押的人吧，对你都含着内心里的同情和关怀。而这些人，大都是无罪的。”

她说：“我听你的，将来万一出国探亲，我决不写文章骂中国，”说着，她滴下了泪珠。

当时我认为我应当那样做。

## 二十二 收缴存款单

春节将临，领导上表示宽大，讲政策，让犯人洗一次澡。可不是么，我到这里一两年了，还未洗过一次澡。如今沾大伙儿的光，也要进一次澡堂了。

澡堂，就在本院的野外大楼（东门为野外工作人员回来时住的）。四个女犯人同路去，她们三人都照顾我，说我是半瞎子。钱凝开玩笑叫我“瞎大婶”。其实，我们四人同在一室内，就苦中取乐地给每个人取了绰号：称宋克为“精大娘”。宋克比我身体好，眼力比我强，可以说，基本上没什么病。只是血压有点高，也不太妨事。

坤娣的绰号是“勤媳妇”。她爱帮助别人。

钱凝的绰号就叫“小铁蛋儿”了。

进澡堂时，宋克、坤娣的动作最快，迅速进去放水，钱凝本来也比我快，她脱衣服时不知为什么磨蹭了一阵儿。宋克在里边直叫，我

就进去了。宋克一看见我，拉住就帮我搓背：“老同学，看看你这样子，一两年了，成了泥猴儿。让我把你洗干净吧！这是遭的啥罪呀！”老同学的话充满温暖，到底是老同学呀！

我们四个人说说笑笑的声音，被哗哗的水声淹没了。押解的女人没进来吼叫。

第二天晚上，可遭了殃，那个押解女人，找上门来发疯了。她脸像个“丧门神”，气势好比“母夜叉”，个子不高，圆脸小眼，冲着钱凝又拍桌子又吆喝：“钱凝！你说，还有啥问题没向组织上交代？”

钱凝猛然吓得口吃起来：“没，没有呀！”

“哼！昨天洗澡时，你在外边磨磨蹭蹭干什么？”

钱凝才突然想起了：“我裤衩里装的有存款单，我怕洗湿，先掏出放在干净衣服里。”

“你为什么不交出来，上面有规定，你们这些人的钱都要交出来。你为什么不交？”

“我交过呀！”

“为什么不交干净？一条裤衩就放了一千元的存单，还有没有？”

“没有了！”

“一千元，我们没收了，早知你不是好东西，我专门注意你呢！”说着，把凳子一踢，走了。

我用睥睨的目光看他的背影：这么无聊，偷偷掏人家的裤衩，卑鄙透了！

钱凝几乎哭起来：“怎么办？他们还会斗争我，揪住不放。怎么办？”

我安慰她说：“不要紧。他们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没收了还得退还你。因为你不是资本家，不是地主，是劳动工资的节余。”



钱凝哭丧着脸，悄声对我指指头顶，又指指桌子。我不懂她才说：“楼上还有我的办公桌，抽屉里还有存款单。是用纸贴在桌面底下的。抄家也抄不出来，我不能不这样办。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才一岁多。孩子需要吃、用，还需用钱请保姆照管。我爱人每月一百多元工资，我有五、六十元，共二百元左右，除保姆费 30 元外，我们五口人的生活很节省，每月都要节余一点，以备万一。孩子一病，就得花百、八十元，一住院花得更多。从前我不知节省钱，孩子一病，我就得卖东西。大孩子一岁发高烧，一次住院我就卖掉我一架照像机。我又不愿接受父母和弟弟妹妹们的接济……”

不用她细说，我都看见了。自从她进入囚室，我看见她穿的棉衣和外边的罩衣，全是蓝布的，补着一块一块补丁，毛衣的袖口，也烂得乱七八糟的絮絮。贴身穿的线背心，烂得像蜂窝。连我这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对她穿的衣服都看不下去了。我说：“你为啥这么可怜？买一件背心能用多少钱？”

她说：“穿新的没用，何必用钱去装门面？”

她是真的节省，吃饭尽量吃粗粮，一粒米掉在桌上，也要用指头粘起来放在嘴里。这就是她——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工程师、华侨的女儿。她有六个在国外大学里工作的弟弟妹妹。她，一个懂四国外语的物理探矿专业人员，生活就是这么简朴。

在省吃俭用中省下来的钱，我们政府机关却要没收！向谁去说理？这是“中央文革”的指示：“牛鬼蛇神”的工资要扣发，存款要上交。这是整个的，不是哪个机关、哪个小人物的创造发明。

钱凝闷着头想了一阵，便问我：“上边放的那些存款单交不交？都是三百元的。为了使用方便。”

我大胆地说：“不交！”

她的眼睛一亮，接着又是惊疑：“你怎么这样大胆地直言？”

我就说：“这不是我的意见，这是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要剥夺那些剥夺者。没收地主、工厂主的剥削财产。但是，对那些靠工资生活者的收入，以及他们的生活节余，一概不能没收。目前，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将来都得退还，我不是包庇你，我有理论根据。光明正大，可以摆在桌面上。你有孩子，需要用节余的钱去抚养。这是合理合法的……”

在这里，只有马克思的话才能镇住人。否则，一概被斥为反动。有人一开锁，我们停止了谈话。

是查囚房的三个男人进来。有个人手上提着两个暖水瓶，无言地放在门后边。三个人向房内巡视一遍，便退出去，又上了锁。

钱凝笑起来：“今天查房的人怎么这样文明，先送两瓶开水？”

我说：“那个提开水的是河南许昌县人，我的老乡，是我单独关押时认得的。他在木笼外值班时，他的搭档一外出，他就问我的籍贯。我告诉他后，他就特别关照。中国的老传统，重乡土之情，给咱们送开水，就表示出他的态度。”

钱凝笑说：“真难得，但愿中国的老传统常在！”

我将永远记住那位老乡。时间过去十几年了，我再未见过那位老乡。据说他是地质学院毕业的专业干部。在那个年代，他没留下姓名，我也没敢问。不知他到了哪里？我的问题已平反这么多年了，他也不来找我。我还真想见见他！

## 二十三 饺子

老宋到门口送开水，故意把门敲得咚咚响。我和钱凝就趁机叫看守。恰巧，这时对面他们的门也刚敞开。

两间对面敞开的囚室，那怕是一刹那，年轻人也能乐一阵。钱凝和坤娣一见面，就打手势，说暗语，表示年轻人的友谊。坤娣扔过来

一把巧克力糖，说这是“小羊子”的爱人送来的。小羊子慰问大家，让每个难友都能吃上糖。

两年没有吃糖了，都成了小孩子，敢快塞进嘴里一块，才说起小羊子。

“小羊子”的爱人也是工人，可以来探监。还允许她留下了巧克力糖。“小羊子”一高兴，就请难友们吃糖。就这么一包糖，竟成了犯人中的一件喜事。

“小羊子”还真懂事。前几天集体到大门口扫雪，老老少少的犯人都去了。“小羊子”专往老人身边挤。看见七十多岁的老工程师步履艰难，他赶快把老人身边的厚雪扫掉，让老人迈步平稳些。“小羊子”又跑到我跟前，把厚雪噌噌噌地铲掉、推开，叫道：“老李，咱们这里算完了。回去吧！”这次扫雪，我根本没扫几条帚，全是中青年们替我干了。这是群众的心。

转眼就要过春节。专管打开水的宋克，故意在楼道里叫道：“过春节有饺子吃。食堂门口挂了牌子：春节有饺子！”

这话是她对值班人员说的，声音特别大，有意使大家都听见。

这天放风，我也照例去了。在车库小院里活动，有监管人看着，不许说话。囚徒们都在那里跑步、散步、活动身体。宋克还是悄声说着“饺子，饺子。”大卡车进来，运的是白面和大白菜。宋克噓噓着说：“包饺子，包饺子哩！”

副院长黄汲清走到我跟前，也噉噉道：“我要买一斤饺子。”原副院长朱效成也大声说：“是饺子，我就多买，一年多没吃饺子了。北方人嘛！”

当天晚上，老宋忽然给我打手势，连比划带张嘴，表情很是愤怒。我一看就明白，她是在告诉我，春节的饺子没我们这些人的份，满腔的热望终于泡了汤。

我的心里也很别扭，春节是中国人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凭什么不让我们吃顿饺子庆祝一下？这里关的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都是对国家有过贡献的人，在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自由之后，他们如此简单的要求竟然都得不到满足，即便是关在真正的监狱里，恐怕也不会如此。看来，我们还不如个犯人！越想我心中越有气，顺手拿起笔来，在正准备写“思想汇报”的一摞纸上，写下一段顺口溜，现抄录如下：

### 饺子

说饺子，道饺子，  
大娘最爱吃饺子。  
手里比划包饺子，  
嘴里念叨煮饺子。

想饺子，盼饺子，  
外边风传有饺子。  
食堂黑板写饺子，  
过年一定卖饺子。

思饺子，念饺子，  
心中难忍馋饺子。  
不管是否有饺子，  
大婶夜夜梦饺子。

恨饺子，怨饺子。  
咱们纸上画饺子。  
囚室不让吃饺子，

大娘跺脚骂饺子。

写好后，我抄了一张，趁开饭时开锁买饭的时间，我便揉个纸蛋蛋，扔给老宋一张。

不久门上了锁，就听见老宋和坤娣的笑声。

钱凝把《饺子》放在手边，不料专政组的副组长突然开锁进来，一把抓住问：“谁写的？”

她只得说：“李建彤！”

穷凶极恶的腿子，拿起就走。我随后跟去闯进专政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我的饺子呢？还我的二十个饺子！”

那人扭着脖颈说：“我要交到上边去！”

第二天，小老虎来提人。把我带到楼上的专案办公室，“通天政委”已端坐上方。真是正颜厉色，郑重其事的像审查发生的大案。劈头问道：“你为啥写那么多饺子？”

我却不经意地答：“想吃饺子！”

他问：“都有谁想吃饺子？”

“都想吃！都是人！放风时碰见的人都说想吃饺子。”

我怀疑他们支持派性，借机整人。所以，我不按他们点名的人回答。意思是：你不要钻空子，各派的人都馋，都是人，不是木头，在吃饺子上没有派性。实质就是都想回家。

他说：“你们都是老干部，一顿饺子不吃，就那么大意见？那么馋？”

我说：“你不馋？这些人都会被关押一两年了。又不许家里送饭。年龄又大，想吃口饺子又不犯法！你看见我写的结尾了吗？盼了几天，也没见饺子。你们虐待政治犯。大家都吃饺子，偏偏不给政治犯吃。这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吗？这是小事。可是以小见大！”

我又声明说：“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小题大做。《饺子》里边写的

‘大娘’就是宋克，‘大婶’是我自己。我和宋克是同学，开玩笑起的绰号。你们不要神经过敏，以为又是哪个省哪个县的大娘，大婶和我们串通着了。借口拿上公家的钱坐上火车、轮船，到处外调！”

以“通天政委”为首的一群人，都哑口无言。

## 二十四 感谢临时工梁大爷

我在木笼囚禁时，是在一层楼，看管人员命令我打扫楼道。我可以利用这机会走出木笼，吸些新鲜空气。

扫到东专业馆（地质系统的专业楼）的正门楼下，常看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在楼道内修补东西，干的是些钉木箱、修篾子之类的杂事。人们都亲热地称他为“梁大爷”。据说，他是个临时工，会做木匠活，勤快和善，人缘特别好。这个机关里的人个个尊重他。这个机关就把他长期留下，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在这里仍可干些零活儿，给予机关许多方便，他自己生活也有保障。他也把机关当成了自己的家，不论干什么事，都是尽心尽意的。

依我看，他心地良善，对人诚恳，也不知他认得多少字，看起来，什么事他都心中有数。碰见我，素不相识，可他总要点点头。还告诉我，扫地要用长把条帚，免得弯得腰痛。过几天，他真的给我找来一把长条帚，一句话不说，递给我就走。这件事，我心中有数，不能吱声，以免砸了梁大爷的饭碗。这是从前的事。

我和钱凝刚搬进小仓库，有一段时间，报纸上都在宣传《毛主席去安源》那张画。《人民日报》也特别卖力宣传。还有江青那帮人的鼓劲、吹捧，一时成了中国的政治大事件。喜不喜欢那张画，似乎成了对毛泽东主席的态度问题，对中国政治的态度问题，从这张画上可以看出江青的拔扈和专横。这幅画，也似乎是为扫清刘少奇在安源的“流毒”而作，要大肆宣传一番。

专政组也到犯人中宣传了。这些犯人，不买行么？几乎人人都买，至少是每个囚室买一张。

那时正开展“三忠于”活动，到处表示忠于毛主席。囚室内也要弄成“红海洋”贴上“忠”字，敬上毛泽东像。

记得是过新年，犯人中的采购员可以到街上为犯人采购毛主席像的剪纸。

就在那几天，每个囚房门上、窗上，到处贴的是毛泽东像的剪纸。有的能贴三、五个、十来个。我暗想：毛泽东变成了守门神。可那些领导人，却认为这就是“革命”，是犯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改造的表现。

我和钱凝的囚室内也贴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是贴在一个木柜上，下靠钱凝的床头。专政人员进来查房，发现画上毛主席的下巴上有一点伤。急忙追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俩都说：“不知道，我们没有碰过。”

这事却成了政治大事件。两天内，派人轮流来观察、审问，似乎是我们有意把毛泽东像弄伤的，成了“现行反革命”事件。

我确实不曾发现这件事。也未碰过那张像，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半瞎子，再大的伤我也看不见，除非是个窟窿。早知这么惹事生非，就不该买那张画像。

闹到不可开交时，他们把梁大爷找来了。因为这位梁大爷管仓库，他常进来倒腾箱柜。他们问梁大爷知不知道这件事，梁大爷一口应承：“那是我搬箱子时没注意，碰在像上了，请求处理。”

当权人看到老工人满口应承，也无法怪罪，老年人搬箱倒柜，难免磕磕碰碰的，不好处理。

我和钱凝长出了口气：暗自感谢梁大爷。梁大爷呀，梁大爷！你真是个特大的好人，公正人。你这位普通劳动者，却是这么正直。免

了我们俩的一场大难。

一个右派，一个反党分子，住处发生了这么大的政治事故，岂能轻易过关？这位普通的老工人，应承下来，就烟消云散了，救了我俩的命。

我们永远感谢梁大爷！

十年之后，我的“反党小说”问题平反后，我去找过梁大爷。机关里的人说，他好久不来上班了。过个时候，听说梁大爷去世了。我专门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向他的遗体告别，以安慰这位尊敬的老人！

## 二十五 为少年同学作证

“小老虎”下楼来，只说了一句简单的话：“走，谈一段你的历史。”

我的历史？有啥谈的？在这个队伍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最不怕谈历史。从进入这个队伍那天起，就得把历史说得清清楚楚。到一个机关，填一张表。参加一次运动，谈一次历史。连童年生活，青年恋爱，都说得一清二楚。我无所谓地跟他走。

在地下提审室，坐着两个军人，穿的都是军大衣。一开口，就听出是云南口音。他们先问我中学时的学名，我答复后，他们又问：“你可认得李淑娟？”

这句话把我带回到几十年以前。

淑娟，后来她又改过几次名字。现在已不叫淑娟了。

前几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各省到北京出席会议的革命干部上天安门的代表，其中的就有她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从省里选出革命干部来北京上天安门，是绝对被信任的。既然被信任，为何又来调查？



现在是军队管着地方干部，好像地方干部都成了被管制分子，一面使用，一面审查。

我先声明：李淑娟在小学、初中都和我同学，我们是朋友，我最了解她。她品德极好、政治最纯，没什么可挑剔的。你们要问什么？

他们只问一件事：1936年冬，她怎样离开许昌？和谁同路？谁送走的？什么原因？

是的，这件事，只有我能证明了。难怪他们不惜万里跑到京城找我。我只好仔仔细细地道来：

“1936年寒假，我从上海回到许昌，马上就去看淑娟。那时她在“义务学校”教书。她的家境不好，继母虐待，经济窘迫，使她初中毕业后再不能升学，只能教书，每月薪金十五元，还要抽出五元交给继母。她的生活很苦。就是在那样的生活中，有些人还要找麻烦。县立第一小学的校长，名叫高洁亭，在教育界有些权势，找淑娟谈话，要她参加CC，如不参加，就不能再教书了。这是许昌政治恶化的一个标志。”

来人问：“在那种情况下，李淑娟怎么办？”

“她说‘只有一条路，走！’她和我商量好了，要走，离开这里，远走他乡。哪怕到外乡沿街乞讨，也不在这里受窝囊气。”

“我赞成她走。到哪里？淑娟告诉我，李君实也要走。君实是我高中一年级的男同学。他从开封回到许昌后，和淑娟在许昌组织了读书会，君实是领导人。按淑娟的话说，君实领导的比谁都好，他在那里宣传革命和抗战。县党部已经盯上了他，从邮政局检查他的书信。他订购的进步书籍，都被县党部没收了。从官府的种种恶迹看，他那时已站不住脚，只能远走高飞了。君实要到哪里？他连淑娟也不告以真情，后来才说“去太原！”到太原后如何落脚？他暂时也不交底，他的纪律性很强。”

来审的人问：“后来怎么决定的？”

“我们三个共同商量好了，还是走。不管什么情况，淑娟和君实一块走，我是放心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还商量好，我仍回上海，他们去太原，随时通消息。如果他们在太原活不下去，就到上海来。我在上海生活不下去，就到太原去，先弄个‘狡兔三窟’。后来看，完全是多余的想法，可能君实在暗笑我和淑娟。”

决定后都到我家集合，做了准备。他们三个人同路走：李君实，李淑娟，还有淑娟的一个女学生。

“那天晚上，是我送他们走的。先到车站附近找到个小旅馆，我们四个人休息坐等，夜里十二点锤，我把他们送上火车。火车开走，城门已关，我再也进不了城。只得回我们原来休息的旅馆等到天亮。城门刚开，我便独自步行回家。”

审问者“以后的消息呢？”

我说：“我到上海后，住进艺术学校，接到淑娟来信，说他们进了太原国民师范，受政治、军事训练。淑娟是学员，君实是指导员。这说明君实早已是共产党员。”

我把上述情况写下。签了我的原名和现名，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今天心情很好。是我被关押以来的第一次痛快。为我少年时的朋友作了严肃的证明。她确实洁白如玉。

这天晚上，我更失眠。几十年的往事，在脑中浮来游去，驱也驱不散。甚至引起我的苦恼和懊悔。那是1938年夏，在延安又见了淑娟之后，淑娟告诉我：君实牺牲了。

当初，我为什么不听君实的劝告，和他们一块儿走呢？我舍不得学业，什么学业哟？到哪里也学不长，学不到底。我这一生住过三个艺术学校，都没有毕业。1935年，考进开封的“河南艺术师范”，闹了一次“一二九”运动，我离开学校。1937年初又考进“上海新华

艺术专科学校”，暑假就遇上“七.七事变”，我离开上海。到延安工作四年之后，又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头一年进去，第二年就遇上“整风”、“抢救”，在政治运动里泡了三年半。哪能算毕业？真是一无所成，白费光阴。

## 二十六 千秋功罪由谁评说

除夕晚上，优待犯人，可以在自己住室内自由活动。几个女犯人都拼命唱歌。当然是唱革命歌曲，把能记起来的都唱了。那天的《人民日报》上还专门发表了一首《延安精神万岁》的歌，这首歌竟成了大家的借歌吐淤之词，喊呀！叫呀！只为吐吐闷气，整整唱了一夜。值班者也不干涉。真是放了一夜的唱歌假。

当时并不知上边有什么新精神。

春节后，又是一场大雪，犯人们被倾巢赶出，男女老少，都在院子里扫雪。宋克边扫边叫我：“来，到这边扫！”

我只得跟着她走，她扫到哪里，我也扫哪里，一直从大院子正中扫到大楼后边、墙犄角、树后边，尽是看不见人的地方。她使劲扫着，哗哗地用条帚声掩盖着说话声。悄悄告诉我：“我要出去了，已经通知，明后天我就走。他们说，我的问题是从前交代过的，不应当再专政。可能上边有点什么新精神。我走后，你要注意身体。你有话要往家里带么？家中有什么事要办么？”

老宋真好，到底是同学，想得这么周到。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祝贺她。真是没有不散的席。三十年聚一次，是在囚室里，转眼又要散了。

她要帮我带话出去，我想了想说：“不行！有话你也带不到。你和我家里的人不熟，无法进门，院子周围有‘狗’。”

就在这几天，呼呼啦啦出去了一大批人，剩下的不多了。坤娣也

走了，想起春节那天开门打饭时，老宋，坤娣往我们房里扔东西，纸烟、糖果，都是她们家里送来的。我家里不准送东西，我只给她们扔了几根蒜苗。是我在水碗里泡了几个蒜头长出的苗苗，也算是青菜吧，从木笼子一直带到女囚室，长大了，难友们分而食之。那也是一种兴趣。眼前，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

我和钱凝离开仓库，搬进原来的囚室。只剩下两个人，宽敞多了。

我已预想到，开始，只有我一个人锁进这阴暗的坑道，后来人增多了，以后又会都放出去，最后还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是中央专案管的，他们无权放我。大多数人都出去见天日了，我只能默默地祝愿他们自由，幸福！

这里的狱头给我和钱凝找活干，叫我们到院子里清理垃圾。

那时，正是封建迷信的最高潮，连报纸上的毛泽东像掉在地上，都会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我在清理垃圾时，专门捡毛泽东像。有烂报纸上印的、有金属像章，有旧画报，旧书皮……各种各样的，脚踩地埋的，脏里巴即的，全是毛泽东像，我每天抱回来一堆，往专政办公室一交说：“收下！毛主席像，都是在垃圾里捡的，请往上交吧！”

办公室里的人干瞪眼，他可没想到我给出这种难题。那些脏东西，能往哪里交？烧掉？他不敢。埋了？他害怕。交上去，太脏。可又是神圣的，伟大的，堂堂正正的毛主席像。不管他，让他们处理去。谁让他们搞封建迷信呢？

时间长了，又进一步叫我俩推车从后门出去往小胡同里送垃圾。这一下，我们俩可以从后大门出去了。我一高兴，编了首“垃圾之歌”，现在只能记得几句：“垃圾垃圾、怎样到人间来的？你前门进来，后门出去……”歌词很长，暗示：人在有用时，从前门请进来，用不着时，当垃圾踩在脚下，扔出去。还编了我认为顺口的曲调。我们俩推

着垃圾车，边走边唱，真是自得其乐，好不高兴！

在离人远的地方大声喊，谁也听不见，管不着，这是垃圾堆嘛。

送垃圾的后门距前门很远，几乎遇不见人。我和钱凝尽情的畅谈，说笑。有时还唱我自编的“昆仑”，自然是用毛泽东的诗词。我嫌别人的曲调不能抒发我的情绪，便自己配了旋律，在垃圾旁放声歌唱，我最得意的是那两句：“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反复地唱，唱起这两句，就像把我的郁闷全吐向空中。眼前的一切，给世代代留下的功罪，让后人去评说吧！

钱凝的情绪也高，让我给她写了一首《勘探队员之歌》。词，是我们俩凑的，曲，是我即兴编的，我们唱起来很带劲。

只要一倒垃圾堆，就成了我们的世界，说，笑，唱，能震塌天。偶然也有别人往后门走，听见我们唱，也不予理睬，他们也累了。一两年来，都看见我和钱凝出出进进，成了难友，如果偶然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去，就会有人问我：你那个伴儿呢？

说一千道一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两句：这“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唱这一句时，我充满激情和悲愤，唱得又高又长，似乎我能想到一百年以后……

## 二十七 为刘志丹申诉

老宋、坤娣走后，轮到我打开水了。在开水房附近，正遇上老宋。她看见我，老远就停住脚，是有意在等我。我们刚走得靠近，她便从衣袋里掏出些奶油糖、苹果，塞进我的大衣袋里，动作迅速，又装作没事人似的，真是精灵鬼。

老宋还告诉我：“碰见一个女孩子，和你的女孩是同学，她到我家玩儿，我故意说起你的情况。意思是叫她转告你的孩子。叫她们放心。”

我真谢她，但我只点点头，没说话。

我和钱凝正吃难友送来的礼物，享受着难友的友情。专案组来提人，我只得跟他上了楼。

这次我带了我写好的《上书》，是在木笼里就开始写的，两三万字之长，实际就是申诉。不是为我申诉。也不是为《刘志丹》小说申诉，而是为刘志丹本人的名誉申诉。

上次“通天政委”来时我就说过，写了个关于刘志丹本人意见书，可不可以交？他答应可以接收，我才敢带上来。内中大致谈了这些问题：

我和刘志丹没见过面。出于对革命事业和当代人物的探讨，才去接近那些史料，探索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遭受的迫害。他的存在，对有些人是个威胁。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感到像回到1935年王明“左”倾路线时代。别的暂不说，只看对刘志丹的诽谤，就很说明问题。出于义愤，我才写了这些份《上书》。

这些问题都是在“小报”和提审中听到的，如果不是阎红彦向康生诬告，不是康生向各方面的明指和暗示，那些奇谈怪论是不会出现的（当然，当时我绝不提康生的名字，以免授人以柄，使问题升级）。这些问题是：

(1)为什么凡是写《刘志丹》的作品，统统列为毒草？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老百姓唱的陕北民歌《刘志丹》也成了毒草？难道那时陕北的老百姓就反党吗？

(2)刘志丹家中不出租土地，为什么称为地主？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规定》，他们家只能算是中农，这个问题和1935年王明“左”倾路线时对他的诬陷有什么区别？

(3)关于共产党和军阀打交道，做兵运工作问题，为什么是两种对待？谢子长同样在军阀中做兵运工作，被某些人夸为荣誉。那个旅

长的职务从未到手，便到处夸耀说：“他当过旅长！”刘志丹做兵运工作，是真当过旅长，就被上述人批为：“勾结军阀，不打红旗！”为何一个问题两种逻辑？

(4)刘志丹在邠县坐过牢，是南汉辰、杜斌丞去营救出来的。现在又唆使那个“三嘉塬缴枪”的副手阎红彦出面诬陷说“他是叛徒”。这是1935年那个南方来的二十五军的保卫局副局长戴季英对他的诬陷，现在这个诬陷又被戴季英的同伙拿出来，照用不误。现在可是毛泽东时代呀，为什么和王明时代用同样的方法诬陷人？那些问题都是从前作过结论的。

(5)三嘉塬缴枪：谢子长、阎红彦暗中布下阵势，向刘志丹部队突然开枪。这本是他们的错误，反诬刘志丹不打红旗。试问：他们要归陈圭璋编旅，又要归杨虎城编团，难道是打着红旗归人收编？人家那时要你的红旗吗？他们把一个雇工出身的干部赵二娃打死，说他不该娶个寡妇，跟上军队走。而那个赵二娃，是穷得无处安家啊！相反谢子长、阎红彦二人，家中都是富人，每人都结过三次婚，而且是互相交叉。按照他们对待赵二娃的逻辑，取一个老婆就被枪毙。那么谢子长、阎红彦就应当每人枪毙三次。

1958年我在西安采访时，西安市副市长杨晓初老人告诉我：1932年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曾派阎红彦去西安找张汉民，送上谢子长的亲笔信，求张汉民向杨虎城说情，要求把“反帝同盟军”编给杨虎城。汉民去说了。杨虎城表示：要我收编，必须先缴械！汉民觉得不妥，自己刚搞起来的军队，怎能把枪缴给别人。他赶快派人去说服谢子长，千万不可这么办。

杨老叹息说：“为这件事我心里窝了多少天。我们这些干部为什么会想入非非？想当官么？那时的杨虎城可不是‘西安事变’时和后来的杨虎城，完全不同。听说那件事，是谢子长瞒着刘志丹干的，也

是瞒着省委干的。后来接着就搞‘三嘉塬缴枪’，打死打伤志丹的主要干部。那是什么意思？令人深思！”

杨老说：“那时张汉民就住在我家里，我们无话不谈，谢子长的亲笔信我也看了。我为他害羞！现在我说句心里话，那人不可交！”

1958年我采访郭洪涛时，他说了一句实话。他说，1934年谢子长对我说：“三嘉塬缴志丹的枪，是因为志丹不打红旗。”多么恶劣！你要去投靠军阀，你能打着‘红旗’去么？你成了白旗，反诬别人不打红旗。就是因为谢子长捏造“刘志丹不打红旗”的谣言，“肃反”时竟然成为刘志丹的重要罪状之一，把他当成“反革命”首领，逮捕并用了残酷的肉刑。若不是中央红军赶到陕北，刘志丹差点儿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杀害。

为这三件连起来的事，我在西安憋了几天气，连饭也吃不下。我发了誓，一定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把那些质量恶劣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教育后代人，千万要提防恶人陷害！

就是那个处处想陷害刘志丹的人，原来是陕北军阀井岳秀手下的一个连长。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的喽罗们曾为他写了传记，夸耀他镇压“硬肚”时的英雄气概：“辗转陕北二十余县，英勇善战，为全军之冠。”按历史上的说法，“硬肚”也是农民反抗官府的一种力量。按现在的政治标准，应当说他是“历史反革命”。而这个人，却是王明路线的重点保护对象。如果那个人健在，遇上目前的“清理阶级队伍”，他定会被群众清理出来，被群众关押或送进卫戍区。然后在被xx(康生)保回去。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同类。

(7)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分歧，一开始写《刘志丹》时，我就写上过。贺晋年的人看后说“千万不要被人看出谢子长和刘志丹有分歧，不要让人看出谢子长有错误。”



原来他们最怕把错误暴露出来，毫无半点光明磊落，哪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者的气味？请求有关部门审查那段历史。

(8) 和刘志丹一块儿战斗过的人，是不是都反党？据我的调查，他们是反对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为什么说他们反党？难道现在的领导人和反动派坐上了一条船？否则，为什么来的提审者大都是被我采访者的专案组？难道被我采访过一次，就成了有“反党罪行”的人？这些专案人员是为谁服务的？

(9) 1935 年中央来陕北前，陕甘有无根据地？现在有人说，那里没有根据地。可毛泽东主席说是有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说：“……我们队伍里出现了‘老套’的人们……对敌人采取的反动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

阴谋家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

(10) 1934 年敌人“围剿”陕甘地区时，把刘志丹当作祸根，挖祖坟，砸石碑，斩剿满门。那是敌人的面目。

1935 年“左”倾机会主义者逮捕了刘志丹本人，杀害了他的战友，迫害家属。那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面目。

可现在为什么又走老路？逮捕战友，迫害家属，无一不是重蹈覆辙。我脑子里反复想：眼前的敌我面目不清。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西安关押着许多老干部，不少是刘志丹的战友，是 1935 年错误肃反中被押过的。而 1935 年那些专门错杀人，错打人，打黑报告的人，依然逍遥自在。目前，究竟是谁和谁再斗争？

原稿写得很详细，有两万字左右，交上去了。若因这份“上书”我再被重打，下礼拜就该扬鞭了。我只得悉听尊便，准备着挨鞭子。

## 二十八 驳阎红彦

“通天政委”似乎下了决心，专门要攻一下我那篇批判阎红彦的文章。

看样子，他们全班人马早已到齐。专案人员的劲头都憋得挺足，个个脸上的肌肉紧绷。

“通天政委”嘴巴翘得老高，把那篇东西往我面前一推说：“你这篇东西，我们也研究过，是你的另一次反党活动，为什么要批判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写？谁让你这样写的？必须说清楚！”

我问：“反党？凡是我写的东西都反党？我可是反驳阎红彦的。如果反驳他的错误文章也能成为‘反党’，组织上是否承认他就是党，党就是他？如果他就是党，我宁愿脱离这样的党，和这个不讲理的党分道扬镳。”

谁也没想到我这样提出问题。他们有点发怔，一时应付不来。

我又说：“如果他是党，我也是党。他反对我的小说，他是反党，既然可以随便扣帽子，我也可用同样的帽子给他扣回去。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谁支持他也不行，老祖宗支持他也不行。”（我当时指的老祖宗，是指康生，包括比康生更大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前年，1967年，他已自杀。我被诬陷成这个样子，还未自杀。他倒先自杀了。为什么自杀？我把他写自杀的？谁提审过他？群众斗争过他？什么也不是。可是他自己心中鬼胎太多，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时，他的条件，比谁都好，他仍任省委书记，又兼军区政委。其它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已被群众围得天翻地覆，戴高帽子，拉上游街，坐喷气式。而他，任凭群众怎样要求，他就是不露面。紧迫之时，他就请示‘中央文革’，见不见群众？‘中央文革’当然说：‘要见一下！’他就吃安眠药自杀了。留个遗言说：‘陈伯达把我逼死了’。他去世后，陈伯达声明说：‘我和他是好朋友，我有病时，他还来看我，我也去看他，无话不谈，怎么害他呢？我不

能不让他见群众。大家都见嘛，群众说话无非是难听些……’

“看过大字报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总理也说了话。他说：阎红彦在西南，本来是反对李井泉（西南局书记）的，好嘛，你何必自杀？一自杀，成了和高岗一样的反党分子！”

在这个提审室，坐在最后的一个人说了话：“是呀，阎红彦是反党的，他不让你反党，你们俩抢着反党。”

我看那人，有些面生，不知从哪又来个专案人员。

“通天政委”突然问：“你对‘三嘉塬缴枪’怎么看法？”

一句话唤起我多少惊惕：原来他是康生的徒弟。康生又是阎红彦的同伙。他们是站在“缴枪”一边的。我便直截了当地答：“缴枪是错误的，是违背井岗山道路的。对新组合过来的队伍如何整顿？应当按毛主席的办法：‘只有加强教育一法’，决不能用枪毙，开除的办法。革命初期来投靠的人很不容易。刘志丹是这样主张的。可是谢子长不同意。便和阎红彦等密谋设圈套，突然开枪打人。刘志丹的部队没有还手，被打死两个，打伤了几个。又被宣布全部开除，解散。四百多人的军队阿！在白色恐怖下好不容易积攒，提炼出的人马，好兵好将，在‘左’倾和别有用心者的摆弄下毁于一旦。谁不痛心？他们的居心是要弄得刘志丹无一兵一卒，逼刘志丹放弃一切革命行动。他们的用心非常恶毒，手段特别恶劣，下流。谢子长竟然把刘志丹本人关押起来。难道刘志丹怕他们吗？自己的力量比对方大。可他不愿自相火拼，一切都忍了。现在他们还想闹什么？闹个他们‘正确’，杀自己人杀得有功？你们就是说到天涯海角，也是他们不对。他的老祖宗也包庇不了。这就是在陕甘边界的三嘉塬，刘志丹第一次被自己人阴谋缴枪。”

“憨厚老三”的东北话响起来：“你咋知道这么多事情？”

“我到处采访，查史料。这些事情档案中都有。你们不是知道我

访问过马锡五、赵子实吗？他们都是被开除的人。他们亲眼看见阎某打死赵连璧，看见贾生财被打得跑下塬。赵、贾两人都是刘志丹部队里的大队长。不使人伤心嘛？”

“通天政委”：“哼”，了一声说：“你好像批得满有理，难道你的意见全部正确？”

“不正确的地方你可以提出来。全部资料都在你们手里，就看你敢不敢用。”

他当然不露口风。我估计，他可能只见过阎红彦或者康生传下来的一边倒的，颠倒黑白的材料。

我还是要说：“阎红彦吹嘘的那十个县的根据地有么？在光天化日之下撒谎。东西南北几千里，他走到过么？据他文章中所说，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到四月。时间只有两个月，自己的兵力，只是个三百来人的游击队，无车无马，无重武器，连步枪的子弹也不足。粮食是随打来随吃。而对手是敌人的十七路军，加上各县民团。游击队经常被敌人的民团和正规军围着。追得游击队到处跑，打一仗挪一个窝儿。在一个地方呆不了三天，能建立起根据地么？实际上连一个村的根据地也没有。他吹牛吹得从无到有，这也算个共产党人？他企图说明一九三四年建立起来的大块根据地，是他们在一九三二年春就打下了基础。总想把别人的功劳贴在自己的脸上当招牌。”

小老虎聪明的眼睛从我身上移到“通天政委”身上，看他是否发怒。可“通天政委”却强忍着。又问道：“你说的在南梁整顿阎红彦，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你可查一九四五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阎红彦自己的发言。他说，他和师诸杰部队一块到了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他自己部队里很多人提出要开除他，枪毙他。没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人家不会那样提，众人的眼睛是杆秤，他之所以没有被枪毙，开除，

是被他的老上级、老朋友包庇了下来。包庇他的主要人物，就是和他密谋‘三嘉塬缴枪’的主要负责人。”

“通天政委”只是哑嘴，一时接应不暇。有个戴眼镜的人，站了起来：“照你的说法，人家写得战斗你都不承认？”

“不是不承认，而是他写的那些战斗都是错误的，失败的。而他呢，一反手，都写成正确的、成功的。比如：‘山河镇战斗’，是攻坚战。那是敌人有重兵防守的县城，游击队攻了一个多月都攻不下。敌人从城墙上向下用机关枪扫射，游击队只能大量伤亡，别无收获。这种‘左’倾冒险的、失败的攻坚战，难道全是胜利？我不承认他那种虚伪的颠倒黑白的写法。”

我又接着说：“还有，那个攻打三原县城和游行示威的事，效果坏得简直不能提。他把三原午字区的革命力量完全暴露给了敌人。三原县城可比山河镇大，驻有敌人一个团和一个师的直属部队，游击队只有三百人，拿着步枪，喊着去攻城。只能是把敌人引到塬上，捕杀那里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本来人家在那里经营多年，什么都有，游击队，革命政权齐全。你这个姓阎的去，只求人家帮助就是了。他却不自量力，胡打乱冲，使那块地方受到很大损害，他装糊涂，不觉醒，反而吹嘘：“他帮助了人家”。把人家创建的游击队和革命政权，算在自己身上。他说，全是他去后取得的功劳。他要靠这个功劳升官。”

这几句话我说得很重。也是正在气头上。他们呢，康生虽然是阎红彦的后台，到底也有周恩来总理说过的话：“阎红彦自杀也是反党。”虽然这话后来没有当成结论，当时就是这风气。历来如此，在这种风气之下，专案人员也不好太护着一个“反党分子”。

戴眼镜的人在小房子里走了几步。他也思索。这是“通天政委”请来帮手之一。他在挖空心思地找进攻的缺口。过了好大一阵，他突然问：

“难道你比当事人知道得还多？”

“我不敢说知道多，但是这些事件我都调查过。比如去韩城，那么点兵力，打了个大圈子，旋转十来个县。中途增加到一千多人，后来又减少，直到最后惨败。为什么？我向当事人阎红彦请教。他说：‘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我向吴岱峰请教，他说：‘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我向刘 XX 请教，他也说：‘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他们都是当事人，是红军时代的团级干部。他们的答复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为解除内心的怀疑，不得不跑到西安去查档案。在酷暑天，我在西安翻阅了一个月陕西省委历史档案（从 1932-1933）。才明白：原来省委书记杜衡有检讨，他说他命令游击队去韩城建立苏区，是犯了右倾错误。其实，他是犯了“左”倾错误，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游击队在平原打了一年并无收获，只得命令去韩城。这是省委的命令，是杜衡不得已时采取的措施。别人负不了责任，谁也扭不过省委。他们那时的省委，也是命令主义嘛。”

“通天政委”长出口气，把我盯了好大一阵子，才说：“照你的看法，阎红彦就没有干过好事？”

我说：“从 1932 年 12 月，姓阎的干的坏事比好事多。就当来个倒‘三七开’。部队的每次失败都和他有关系。不是他不能打仗，而是思想太歪。品质太恶劣。”

专门给政委打下手的眼镜，给政委倒了杯水，然后坐下，扶扶眼镜。猛然问道：“你说，谢子长和阎红彦是怎么离开部队的？是否省委书记对他们的打击？是否也是右倾机会主义？”

我答道：“不！谢子长、阎红彦的问题和刘志丹不同。刘志丹是常背‘右倾机会主义’包袱的。谢、阎二人离开部队的原因则不是。他们得到领导权后，把部队忽尔带到东，又忽尔带到西，打得只剩下一百七十人。把这一百七十人又分为六股，抛撒到很远的地方。还像

不像一支部队？再有，谢子长、阎红彦枪毙人的事干惯了。枪毙刘志丹的部下，刘志丹可忍让下去。省委后来派去的政委，触犯了他们，他们便到处喊着“枪毙政委”。他们匪性十足，他们如果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哪能随便枪毙人？因此，成立红二十六军时，杜衡就不敢留他们了，所以红二十六军中没有谢子长、阎红彦二人。”

眼镜说：“你算是把谢子长、阎红彦贬光了！”

我说：“不是我贬，是他们自己的脚印儿给他们写下的历史。谁的历史都自己写的。如果他们英明得无懈可击，文章写得实事求是。我决不会反击他，凡事自有公论嘛！他为什么无法反击我？”

眼镜说：“现在就是反击！人家对你的小说告状，就是反击！”

我冒出火来：“那是恶人先告状，怕揭他的疮疤，先来个诬告。我没有写高岗，哪来的翻案？那是转移目标，无中生有！”

说到这里，我稍停，气不打一处来。因为阎红彦的诬告，株连的人甚多。他很会钻营，找过总工会的领导人，未曾得逞。找中央办公厅，要求把《刘志丹》小说定为政治事件，又被当时的领导人挡住了。最后，他找到康生，康、阎二人一拍即合。似乎是在同一条路线上走过，是同路人。康生马上写信给中央书记处，要求把《刘志丹》小说定为政治案件。在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假报告，欺骗毛泽东主席。实际上，康生也未看过书，他却敢大胆妄为地断定为“反党小说”。当然，毛泽东主席更未看过，他也下了指示。我不能要求他在百忙中看那么长的小说，但他可不必匆忙下指示。关键的问题自然是康生不该听阎红彦信口雌黄，更不该信手拈来兴风作浪。康生是奸雄，阎红彦是帮凶。

最后我表示：“关于这个问题，我永远不会检讨！”

## 二十九 钱瑛专案

最近像上班一样，每天到楼上提审室，照样和那些人打交道。依旧读那两条语录。接受重复提审。

这天，他们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的名字一亮，我马上说：“她是我手下的败将！”

这句话，差点儿把老广西的嘴巴气歪。小眼一眯，从牙缝里挤出几句：“你总是嚣张，谁都不放在眼里，她比你大得多！”

我说：“地位和思想不相等。地位高不等于思想高！”

“通天政委”说：“现在要你交代，她是怎样审你的？怎样包庇你的？”

“她包庇我？不要看她地位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副书记。其实，水平几乎低到了零度。她‘左’得出奇。她和我不是一个观点。绝不会包庇我。”

我也纳闷，事情这么怪。后一拨的专案人员要审前一拨专案人员。这大概是康生的又一个花招，克格勃专用的手段。用他们打我们，现在又打他们。都是可怜的牺牲品。钱瑛在历史上一贯是出名的打手，是刽子手。我们挨打，挨得干净。我们清夜扪心，不欠他人债。他们则不同，各有各的债。

我想起1962年钱瑛在办这案子中的表演。有两场突出的戏。第一场，是他们三个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的“专案委员会”提审我时，钱瑛最“左”，中监委副书记伍云甫最糊涂。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较合理。

钱瑛说：“《刘志丹在桥山》谁给你出版的？你们有个地下出版社？”

我说：“你们都写回忆录。谁给你们出版的？难道你们是有了自己的地下出版社才能出版？”

钱瑛在场的第二场戏，她当然仍是第一女主角。1962年某日，



她带着一位名叫李振海的处长提审我，她主审，李做出记录。那天，她是专门替阎红彦说话的。

她说：“你写信批判阎红彦。人家对你的书也提出了几十条意见。

我说：“拿出来！摆在桌面上。我的意见是摆在桌面上的，你们也放在桌面上。摆出来，大家争论嘛！虽然你们没收了我的采访记录，可是没收不了我的脑子。一切都储存在我的脑中，阎红彦如果提出一千条意见，只要他有一条是对的，我可以投降！拿出来吧！”她始终萎萎缩缩，没有把材料拿出来。其实，她心中也无数。

她赶快转移话题：“你为什么把阎红彦写得自杀了？他是我们的高级干部，中央委员！”

“我写小说中哪个是阎红彦？他照镜子了么？找到自己了？那书里堂堂正正的人有的是，都不是他么？”

她问：“那个周光是谁？阎红彦说，那就是他自己。”

“他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周光身上包括着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参谋长郑毅，不是他。阎红彦还不够那个资格，没有那个胆量，更没那个气魄！”

她说：“阎红彦自己说的，那个周光就是他，特别是你写的那个方块头，大嘴巴，那模样，都成了你描写的对象，难道人家冤枉你了？”

我真想挖苦她一顿：难道世界上就是他长了个方块头、大嘴巴？连‘对号入座’也不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还有这样的任务？监察谁的小说写方块头，大嘴巴？真是庸俗无聊。我说：“谁说他的脸不能当模特儿？我把他当成人，才有资格放在我书中当模特儿。我又犯了什么法？”

她又说：“阎红彦告你，他告得对！别人也说过，你小说中有个人像高岗。”

“除非他在土地革命中也是杀了自己人的人。凡是杀自己人的人

都想拿高岗问题做文章。这是一个可钻的空子嘛！”然后我又说：“现在，你们都是站在阎红彦一边的，告诉你，他这状告错了。真理在我手里。你们都站在他一边也没关系。现在阎红彦成了告状英雄，我是反党分子。不过，也没关系，谁也不能一手遮天二百年。将来说话理直气壮的是我。真理在我这一边。我内心踏实。”

这就是我和她的较量。

关于钱瑛的为人，我们曾经在一个机关工作过，了解一些：

钱瑛有来头，背后有靠山。她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回到中国，到了南方某根据地，跟着人家同心协力搞“肃反”。和她在一块儿从苏联回国的同学、战友、都被她伙同夏某在苏区杀了，只剩下她一个人。从此平步青云。她踩着自已同类的脊背，喝着自已同类的人的血，爬上了高位。

一个时期，消灭陕甘、陕北干部成了热门买卖，她就抢手干上了。准确地说，是消灭曾经和刘志丹一个思想体系的人，不管他的籍贯是陕北，还是陕甘，甚至外省。她很懂得以思想划线，而不是以地域划线，思想界限是根本问题。

钱瑛到了监察部，原监察部有许多好干部，都是亲亲热热的朋友。可惜，在钱瑛主持下，竟打了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右派。她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又一次表扬，还当了中央委员。

她要独揽大权，也有人支持她揽权。她明白，人们对错误路线特别反感，自己历史上又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北京，她必须争个“正确路线的代表”，只得动员人说好话。让秘书长、部长助理在会上吹捧：“监察工作走了一个‘之’字形，从正确到邪路，直到钱部长手里，又扭过来，才走上正路。”

凡是老监察部人员都明白，是到了钱部长手里才走了邪路，越走越邪，邪到了拐不过弯的程度，只得把监察工作取消。究竟为什么撤

消？她不能自圆其说，她当然不能说“转不过弯”，“混不下去了”。而找个借口说：“公社化了，以后没有人违法乱纪了，哪还用得上监察工作？”

从这个论点可以看出，她的水平多么低。只可惜了那些监察干部。那么多好干部，让她一下甩出去了。东北几省、湖南、安徽、江西、广东、青海、宁夏、内蒙、山西……到处是我们的监察干部。

于是这位部长大姐又高升了，到了另一个部当部长，带了她的亲信，和一些不会给她提意见的干部去了。

### 三十 张秀山专案

这两天又来了两拨人。一个是张秀山专案组，一个是张策专案组。

张秀山，是个老实人。我只访问过他一次，康生他们就揪住不放。访问他的原因：在陕甘创业时，他是特委书记。那是五十三年前的事，他才二十三岁，是榆林中学毕业生。那时的榆林中学，是陕北的最高学府，西北闹革命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自这个学府。旧制中学四年制，他成绩很好。当年，李大钊要培养西北的干部，便往榆林中学派革命的传播者。那里是西北的一个重点。

张秀山什么工作都干过，开始搞武装是在兵运工作中锻炼成熟的。

张秀山在红军中经过征战，任过陕甘特委书记。那时陕甘特委是一个单独作战单位。在1933年到1935年期间，是创建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时期，既没有陕西省委领导，也没有中央或其它地方派人来领导。实际上，特委完成了一个省委完成的任务，在艰苦创业。

张秀山还任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是西北的老红军了。这个军的主力，就是一个四十二师，共五个团，另外还有几十个县的游击队。所以那个师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也可说相当于军的领导。他还是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委员，1935

年管陕西、甘肃、宁夏的根据地和地下党工作。

他是陕北人，他在陕甘工作的时间较长。在关中的三原午字区，在照金根据地，在陕甘的南梁，下寺湾，这些重点地区都做过重要工作。一般人的印象是：他有文化，有气魄，头脑清楚，在那一群干部中，他是杰出的一个。他比当时的陕甘苏维埃主席文化高，政治水平高。

从前，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在采访《刘志丹》的史料中，从档案中看到他的一些情况。最重要的是他1945年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把他的发言和别人的发言比较，除做总结者的发言外，他的发言最全面、最精练、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不夸大不缩小，实实在在的，有理有据的，把陕甘所发生的对敌斗争、路线斗争，都讲得泾渭分明，是非清楚。对那些坏人坏事，他从不因某人位高而噤声。对好人好事，从不因某人位微而不顾。比如，他讲的闫家洼会议，对那位从北平回来传达“左”倾路线的人，表示了应有的愤慨，痛斥了被称为“白衣秀士王伦”的人。在大规模“肃反”之前，这是个序幕。我也为之震惊：怎么？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在陕甘边界开辟了二十来个县的根据地，倒有了罪？又来了钦差大臣！

看了钦差大臣对他们的指手划脚的胡乱批评，更使我目瞪口呆。竟有这样的事？把在山区建立根据地诬为“梢山路线”。把打游击战争诬为“逃跑主义”，把用枪杆子打天下诬为“枪杆子万能”。刘志丹把黄龙山的土匪收编过来改造成红军，也被诬为“浓厚的土匪色彩”。

正是那些“大帽子”吸引了我，我到处去寻找答案：为什么？

刘志丹他们的灾难何其多！陕西省委被破坏之前，省委执行的“左”倾路线，命令攻城市、打平原，破坏统一战线。使红军经常处于被动和失败。1933年上半年，省委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叛变了。这当然是坏事。但从另一方面看，坏人的叛变，使革命队伍里清除了一个

恶婆婆。刘志丹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创业了。

松绑了的领导机关，可以放开手脚向南梁的陕甘边界进军。在敌人三不管的南梁地区开辟根据地。从 1933 年秋到 1934 年秋，不到一年功夫，使红二十六军由一个团发展到五个团，开辟了二十来个县的根据地。事业刚有起色，北平又派人来指手划脚指责，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刘志丹除了和他们争辩外，还得保护他们的安全，给他们安排领导权，抽兵力让他们领导。给他们钱，给他们枪，给他们人。多么难呵！为了团结，为了大局，什么都给。只有“我要革命的权利”不能给。

我曾问过张秀山：如果谢子长、阎红彦那帮人都在，陕甘根据地能不能建成？

他答：“当然建不成。头一条：他们绝不同意红军到南梁站脚。再一条：在作战方面他们能搅和得打不成仗。他们迷恋于打平原战。第三条：所有的政策都不可能执行。再有，他们的宗派势力谁也无法，只认自己那一小撮。刘志丹是很苦的。他们觉得有刘志丹这个人，对他们是个威胁，意图是想千方百计把它置于死地。”

张秀山在 1935 年陕北错误“肃反”时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向恶者求饶，不哭自己，只哭红二十六军的人。他哭二十六军来得不易，死人太多，为了这块根据地，已经牺牲得太多，自己人千万不要再杀害这些干部。像他这样的人是千锤百炼的精华。只求杀掉他自己，不要杀红二十六军的指战员。他爱自己的军队，爱得发痴发狂。他的自我牺牲精神，震动了从北平新来的“北方代表”，促使他冷静想想：他为什么不求饶，不哭自己，只要求保住红二十六军？难道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见“朱理治在高干会上的发言”）

我把这块根据地的领导干部作了比较：除刘志丹外，还有一批头脑清醒的，比如关中的黄子文，他敢于直批六届四中全会，批王明路

线；敢顶省委的“左”倾政策、路线；这都是我在档案中看到的。张秀山的头脑也很清楚，品德堪称高尚。他很有代表性。从档案看到：1935年错误“肃反”时，北平来的代表们称被捕的人中有刘、高、张。他是排在刘志丹、高岗后的第三位，可见他当时的重要性。（这个排法和后来的刘、谢、高，不是一码事。）

不但在西北，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往东北，任过东北局副书记。在东北的剿匪，歼敌，组织建设工作中也有所作为，他是功臣。高岗政治事件以后，把他定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他被戴上终身的精神锁链。

我和他当面谈话，是五十年代，正准备写《刘志丹》。我去采访时，他可不像阎红彦那么趾高气扬，住的不是北京大饭店，或者前门饭店，而是住在破烂的小招待所里。那时他的职务，只是沈阳农学院的院长。有人说，他只是农场的场长，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我不禁感慨万千，功臣下了台，丑角当高官。

我访问他时，他谈的问题不多，可讲得很清楚、正派。比如用关中的雨原战斗、马栏战斗说明刘志丹的战略战术。用红二十六南下，说明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用开辟陕甘根据地，说明刘志丹的高瞻远瞩，战略策略。他记得逼真，就像在眼前一样。连敌人哪年哪月哪日的报纸上登载了有关西北红军的什么事，顺口就说了出来。我为他的思维和记忆而惊服。

国家给干部定级时，给他定了四级。54年后这个四级干部，到了北京，到处吃闭门羹，很多人怕沾包。

到了北京，他一个人跑到新建的体育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去参观，却进不了门，因为没有带介绍信，没有带警卫、秘书相伴。通报姓名，人家佯装不知。他靠两条腿，参观首都。

到东北出差的人说，高岗案件以后他减了薪，降了级，已从高级宿舍搬进小屋，到他家去的人只能在床的夹缝中挤来挤去穿行。可是，

他对人还是那么热情，诚执，情绪仍如以往，走路健步如飞。人们佩服他在逆境下能如此振奋。他可用双腿每天步行到农场的各处察看工作。他是真正的革命者。

农垦部长王震到东北出差，还为他解决了些困难。他那时的家庭上有老母，下有小儿，孩子多而小，老母又生病。老母去世后，他自己掏钱买汽油到野外去烧尸。这就是在西北，在东北都作过巨大贡献的人。

东北来人数次审我。要我交代张秀山的“反党罪行”。我只能表示，他的“罪行”在十六年前已清算过。他已成为“反党”集团中的一员，我能有什么材料。

前年来的大学生们说他是“死老虎”。既是“死老虎”，为什么还要追打？

这拨来人，他们还是磨来磨去。我只得用两页纸打发他们走。

我东望沈阳，长叹一声：与其说你清醒，不如说你糊涂。为何不从古书中借鉴？张秀山兢兢业业、实实在在地一生。真正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的人。

### 三十一 张策专案

我每次出外“放风”，总要默默的向西张望。因为我知道刘志丹的有些战友，又被关押在西安城内，其中包括张策。消息当然是专案人员暗示的。

张策的专案组不知来过多少次了，这次又来了四五个人。其中为首的是个青年军人，满口地道的关中话，造反派头十足。一定是康生领导的专案组把我的采访记录给他们看了，并抄录下来。拿着这个资本来逼我，要我背原记录。

我访问过张策，那是在他的办公室。那时候，他是国务院的副秘

书长。他谈问题很痛快，开门见山地说：土地革命时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只有刘志丹的航船能通行。因为他的航线是对的。别人的，走不上正线，总是碰壁。他的船的航向是什么？——认定在陕甘交界的山区，才能建立起红色政权。

张策的谈话，就像他的性格，干脆！一是一，二是二。有人说他眼里揉不进一个小沙粒儿，他对恶人从不迁就。

土地革命时，他在自己的家乡——陕西高陵县当过县委书记。后来，在刘志丹老家——保安县做过领导工作。在陕甘边区的南梁做过群众工作。是个老老实实的开辟工作者。

他在红军做宣传工作时，能说服群众跟他走。我小说中写的那个宣传科长，就使用他的材料当模特。看他在战场上那种英武气概，不能不令人咂舌。司号员牺牲了，他就是司号员；担架队有伤亡，他就是担架队员；谁受伤他顶谁。那时，他是红军里的宣传科长，除本职工作外，他见啥干啥，像个钢铸铁打的，这就是他的青春时代。

以后他又在华北，在内蒙做过领导工作。在东北当过省委书记。

就因为他眼里容不下沙子，高岗问题发生后，他受牵连，被降了级。降级就降级吧，他并不在乎。

我访问过各种各样的人物，穿梭在各种人际关系之间，男女老少都会对我说真话。我知道得太多了。

还是白军占领的时候，他就以统战工作者的身份，潜入延安，安排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会面。从另一个角度促成了“双一二”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然，西北干部中也有另一种人，正在步步高升，那就是杀人者。在这个问题上，某些领导采取了联合政敌之敌的办法，打击真正的革命干部，重用投机分子。

他在北京工作期间，虽然降低了他的待遇，他仍是兢兢业业工作。



不知为什么，他又被调出了北京。又把他放在陕西省当了书记处书记兼西安市委书记。我到西安又采访过他，那次的采访，都在记录上。这次来的穿军衣的专案组，就是用那个记录的材料，指手划脚。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就被关押了。关在西安建国路七十三号。那里也是和监狱无两样。陕甘根据地的干部，1935年押在瓦窑堡坐牢，1968年在西安城坐牢，坐的都是自称是共产党人的监狱。

三十二追思想，查关系

第二天又来提审，照样读那两条语录。这里不再重复。

照例先开口的是这房中的临时皇帝——“通天政委”。

有人悄悄告诉我，看见这个以“通天政委”为首的专案组，常常把这里的情况向康生报告。信皮上写的是“曹轶欧大姐并康老”。

听听今天“通天政委”的发言，就明白了一切。他说：

“你思想形成的过程，没有讲清楚。采访中你究竟增添了什么思想？1942年高干会的精神是什么东西？你接受了多少？比如你对阎红彦的情绪，为何那么反感？三嘉塬缴枪你为什么和阎红彦持相反观点？为什么有和高岗相同的反动观点？对钱瑛，伍云甫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刘景范有些什么问题？他做了些什么？小说有无他的因素？人和人的关系，不仅是同志关系，也是阶级关系。”

照他的说法，我和刘景范也成了阶级关系。刘景范是什么阶级？我又是什么阶级？康生又是什么阶级？

我气得直皱眉。全室的专案人员都瞅着我。

“通天政委”严肃地往下说：“你写小说，难道都是被动的？实质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有原则，还要有具体事例。比如说，你是根据1942年高干精神写的。但是你不讲具体的，从中吸收了哪些思想？”

“在高岗问题上有什么罪过？到底写没写？这种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要起什么作用？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要讲出你的思想支配，

思想来源。

“炮制反党小说的具体活动中，他们都给了你什么帮助？什么思想？什么行动？做了些什么？你现在说的哪像认罪，像是说明问题。我们不需要说明性的东西。”

他还说：“对那块根据地的产生，到底是摸索出来的，还是经过毛主席思想的教育产生的？统帅他们思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时，机关专案组的三号人物，胖胖的憨厚老三插了一句：“就算那时毛主席还没到陕北，在敌人报纸上也能看到些东西，也能起指导作用。”

这个人到底老实些，他首先肯定那时毛主席还没来陕北，也没发来过指示（那时他还未占领导地位），没有电台联系。只说在“敌人报纸上看东西。”自然，这估计虽然幼稚，还可以原谅。因为都处在迷信的顶峰。如果能在敌人报纸上看到毛主席的“指示”，能在这种“指示”中得到启发，创建出一块根据地。那么，全国早会布满根据地，革命在全国也早就胜利了。中央红军何至于走二万五千里才找到一块绿洲？不能用幻想和神话作根据审案子。

“通天政委”准备得很充分，话不断地往外倒：“你的思想体系，是接受了高岗的那一套。自己总说‘写书是自己的责任’，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习仲勋开了两次座谈会的性质，在你思想上起什么作用？从三稿到四稿有什么变化？你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

“你思想里有些什么问题？对高岗怎么看法？对刘志丹怎么看法？对两条路线斗争怎么看法？对‘三嘉塬缴枪’怎么看法？对阎红彦怎么看法？陕甘边苏区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陕甘和中央是什么关系？陕甘领袖的排列等，你都应当说出看法，并且说明看法的来源。

“谈材料、看稿子的人，都起了什么作用？比如习仲勋、刘景范、

马文瑞、张秀山、马明方、王世泰、白坚都有些什么责任？”

根据他提出的问题看，可能“左”倾机会主义者真的翻了案，康生早已帮助他们了。所以，把〔西北高干会〕也否定了。虽然那次会议是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的，任弼时坐镇的。现在王明“左”倾路线又成了香饽饽。高岗成了西北的瘟疫。看来这次不死人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政治交易！

遵照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必须作交代。我也定要予以回击。我说：

“思想形成的过程源远流长，不是一时一事所能形成。采访，当然能听到些东西。人们谈话，都有自己的思想。要问谁有 1942 年西北高干会的思想？依我说，统统都有这种思想，因为那是党的决议。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他还到会场讲了话。党中央的秘书长任弼时每天都到会，不是哪个私人召开的会，也不是哪个人的一家之言，不仅仅是西北干部，全国其它地区的干部，只要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人，都有“高干会”的思想。我呢，在延安就听过传达，看过《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思想里早就有了。

“至于对阎红彦的情绪，是因为他亲手迫害过刘志丹，在“高干会”上，对他有揭发、批判。他自己也有检讨。也许有人偷偷为他翻了案。他自己也到处闹翻案。”

“通天政委”声音高起来：“高干会是高岗主持的，那是个黑会！”

我也相应地提高了声音：“如果中央不主张开，别人能开成么？难道是每天半夜里偷偷开的？没有见过报？”

“通天政委”又转了话头：“中央主张开，可没有说讨论两条路线斗争！”

我只好不客气了。我说：“请你读读《毛选》。毛主席 1935 年到陕北，1936 年就写文章谈两条路线斗争。你可知道‘七大’？就是 1945 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

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批判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现在为什么怕提两条路线斗争？”

当时我一闪念，又明白过来，从苏联回来的人都说，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王、康路线”。康生是王明的副帅，目前加上阎红彦和康生的勾结，“通天政委”在这里贯彻王明“左”倾路线，用“左”倾路线的观点来压我。这就是一个说明。

我又继续交代：“至于对钱瑛、伍云甫等人的概念。是我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了他们的言语行动所产生的。他们提审过我。我对他们采取了轻蔑的态度。”

我又说：“至于‘三嘉塬缴枪’事件，是阎红彦先提出来的。他既已提出，我就得深入研究这桩事件，就得找有关的人调查。比如马锡五、赵子实……他们都谈得很具体，连谁跑谁追都说得清清楚楚。他们都说，阎红彦是第一个打手。在这桩事件上他是有罪的。至于刘景范，他和别人一样，是挨打的，他只谈自己经历过的事。

“刘景范谈的，主要是兵运工作，再就是从保安游击队到红二团，还有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三嘉塬缴枪时，他是挨打者之一，是和马锡五一块被赶出部队的。也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向我谈这段历史的。他没有特殊的東西，没超出别人所说的范围。我查过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许多人的发言记录。阎红彦的发言也说了自己的责任。他说：‘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是老谢，我只是协从’。现在还有什么可抵赖的？”

“通天政委”对这个案子到底是钻得深一些。他问：“你在哪里看的档案？”

我说：“在中央档案馆。前个时候，中央档案馆的造反派不是来提审过我么？而且提审了多次。我的手续是齐全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档案？”

至于人和人的关系，是同志还是阶级关系？我觉得没有必要理睬这个问题。总不能把谈过刘志丹事迹的人都看成“剥削阶级”。

我告诉他们：“写小说，不是被动的。早就想写。只是时间问题。早几年，晚几年的问题。”

“通天政委”向他的帮手们望望，无人帮腔。他又说话了：“你的小说，是高干会决议的具体化、艺术化。在这一点上，你的罪恶不轻！一定要交代出你吸收了些什么东西！”

我说：“我吸收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闹革命，不能死搬教条，不能违背中国的实际规律。不能右倾，也不能‘左’倾。要按实际情况办事，要实事求是。”

这话说得有点不客气。“秀才老二”抬起头，放下笔，冒了一句：“照这么说法，高岗是正确的啰？你在高岗问题上都做了些什么？”

我马上反击，“不能这样提问题，不能把高岗和高干会混为一谈。没有高岗照样能开高干会，不能因为高岗出了问题，就把高干会也否定了，两件事相差十来年。前个时候，《人民日报》批判《红河激浪》时说：‘高干会是个黑会’，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有新的否定通知么？真的把高干会全部否定了，请想想，这对毛主席有多么大的影响？”

“至于我，在高岗问题上用不上我，我是个芝麻粒儿，最多，我只能对他的孩子表示一点同情，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小老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好不容易憋出一句话来：“你还是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

“无产阶级更讲人道主义！”小老虎吃了我的回敬，不说话了，他那黝黑的瞳孔，直望着“通天政委”。

“通天政委”也无法应战。只得迂回到别处。

我继续回答“通天政委”提出的问题：“写小说中间，习仲勋找我和出版社的人谈过两次。第一次是1960年春，他认为已形成的第

三稿，不能出版，许多问题没写清楚。习仲勋第二次谈，是我们写了个修改提纲。实际上，我在写作过程中，就把那个提纲全扔掉了，实际内容超出了提纲。

“就因为修改初稿，1960年我又到陕西采访，材料多了，就把小说分成上下卷。在上卷中增加了第三部，还修改增删了其它各部。

“对根据地的产生，西北干部是学习了《井冈山的斗争》后有所启发，但也失败过多次。到1933年夏，陕西省委被破坏，没有‘左’倾干部来干扰了，才再干起来。他们和中央没有任何关系，派去找中央的人都牺牲了，一个也没能回来。当然，这块根据地，还是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我不这么说，他们会扣我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

“通天政委”很固执。一定要我说，是有了毛泽东思想，才能产生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当时我接着说：“谁也不能超过党中央，都要执行中央的决议。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全党都要执行。有执行好的，有执行失败的。有没有执行的。统帅陕甘、陕北人思想的，最初——即1928年开始，就是‘六大决议’。那时毛主席还没有来，中央也还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

我想扭转他们的思想，我觉得他们太强调个人了。

说到激动处，总要冷上几秒钟，大家都要喘喘气儿。

我又说：“我再声明一次，首先要肯定，书是我写的，是我主动找别人采访，请教别人，不是别人找的我。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通天政委”又红了脸说：“我再三对你强调说：‘书是我写的，一切由我负责’的思想是错误的。”

我急了。马上说：“出了问题，难道我应该把全部责任推到别人身上？那是品德恶劣的人干的，我决干不出那种事。”

五、六个人都盯着我。是责备、是愤怒、又说不出更上策的东西。

我再一次声明：“我对刘志丹本人的看法，就是按照毛主席说的：‘民族英雄，群众领袖。’按照周恩来总理说的：‘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我觉得我写的很不够。没有达到上述标准。”

“通天政委”气得直瞪眼，他张张口，到底不敢驳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他们最窝火的。他们恨我用两位伟人的话压了他们。可这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无情的历史。我也明白，

“通天政委”说的也决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出自康生和阎红彦那个黑圈里的。

### 三十三 内心独白

上次所谓的“交代问题”之后，再次提审，似乎是动员了所有的专案人员，都得整装上阵。不用“通天政委”唱独角戏了。但事实上，人们早已厌战，情绪不高。还是得“通天政委”作开场白：

“总的看，有些问题还不太清楚，你谈了些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考虑。有些问题你还未谈出来。”他是在为自己圆场，有些问题他自己也回答不了。

胖乎乎“憨厚老三”，也赶快帮忙：“对整个过程，具体事实，都没有交代彻底。如西安之行和第四稿的关系，在西安的活动，接触的人，都要把事实摆出来。”

眼看他们提出的大问题已走向死胡同，“通天政委”不得不说：“应当说，这几天有进步，但有些事实还不太清楚，有些思想还认识不上去。把这两天谈的整理一下，写成书面交待。把没有说透的问题也写进去……”

我插了话：“前个时候，我不是写了个很干脆的交代么？我说写

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党。还要怎么交代、认识才行呢？”

“小老虎”又起他的尖兵作用，冒出几句：“那是气话，那是顶撞！那不是思想，你应当冷静些！”

“通天政委”又在婆婆妈妈地劝说：“要解放思想，和旧思想彻底决裂。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和高岗的思想立场作斗争，尽快站在党和人民方面来，把问题交代清楚，用实际行动争取党的宽大。”

“通天政委”有些把不住关了。把阎红彦的观点和盘托出。他毫不掩饰的说：“像习仲勋那种人，他对黄子文是什么看法？黄子文是反革命嘛！反过来透视一下，再看他是什么人？吹捧黄子文，他也是反革命！”

这是活脱脱的一个阎红彦跳出来了。阎红彦就是要把黄子文诬为“反革命”把黄氏的功劳都抢在自己身上。晋西游击队明明是黄子文搞起来，带过黄河到陕北的。阎红彦却说，这都是他自己干的。连一点羞耻都不顾了。

“通天政委”还再三强调：“你的态度比刘景范差，他比你变得快。习仲勋也有变化。都认帐的。”

可以听出他又在挑拨了。又在往刘景范、习仲勋脸上抹黑了。我认为所谓的‘认帐’就是向他们投降。估计他们不会。

他还强调我的书中没处处都提毛泽东思想，是极大的错误。他们的话没落音。我便把话接过来：“按现在的标准说，1942年以前，许多人写文章都是错误的？那时都没提毛泽东思想，更没有写‘语录’。”

“阎红彦为什么要诬告，说我的小说是‘为高岗翻案’？他的动机极为不纯。第一、他过去和高岗有矛盾。谁是谁非，那时有那时的历史情况。第二，他自认为书中把他写得自杀了。其实，自杀的是真正的参谋长郑毅，并不是他。郑毅是坐在敌人面前被乱枪射死的，因



为怕‘左’倾的政委整他。阎红彦却没有胆量去迎接乱枪。第三、书中写的那个土匪，投向革命又叛变，正是他的哥哥。第四、我写的小说和他写的‘回忆录’思想是对立的。他歌颂‘左’倾路线，我批判‘左’倾路线。现在的组织上为何全听他的？硬压着我作交代、检讨。这种作法，永远也弄不清楚。”

我想向他们敲警钟，可他们却执迷不悟。

回到女囚室，脑中沸腾翻滚，整天整夜地思考。我的脑子一时在北京，一时在西安，有时跑到陕北，有时跑回三十年代，有时回到六十年代初。我坐下站起，站起又坐下。

他们布成这种阵势，用这种方法对待我，并非好事。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把我当成俘虏、人质。这大概是康生的手段。从前有人透消息：康生说：“李建彤是个年轻人（那时我已四十二岁）她怎能知道那么多事情？给周扬写的那封信，一定是习仲勋写的。”安子文、钱瑛审刘景范时也说：“李建彤是个小女子，她怎能知道那么多事？应当说是你和习仲勋写的。”

刘景范也反驳过：“她已四十多岁，不是小女子了，她什么也懂。她看的书多，采访的人多，查的资料多。”

景范那时倒不是想为自己辩解，只是想把习仲勋摘出去。自己家里人写书，把人家牵连上，于心不忍。我也是这样想。

去年那个徐州人说：“习仲勋已经交代了。他说写死人是为了活人，他想当西北的第三继承人，才支持你写书的。”

我当下就骂出了口：“那是你们逼出来的，他是死猪不怕滚水浇了，你们逼啥他说啥。我没有听出他有那个意思，如有那个意思，就是他发了昏！”

是的，我一横心，骂了习仲勋，我还是为了保护他。

现在，“通天政委”提出，习仲勋对黄子文好，说明习自己反动。

如今一切都颠倒了。从资料看，黄子文比谢子长，阎红彦的头脑都清醒得多。我看到一个报告上说，他能拉住省委巡视员，到省委去打官司。他能顶住省委的“左”倾路线。他能搞起根据地，能组织起军队，而且能摸索出正确的路线。可惜，这样的人，却被那些不三不四流言蜚语逼得站不住脚。一个赤胆忠心为革命的人，家里牺牲了三、四口人，全部家产为革命用光，自己最后也被敌人打死。还要他怎么样？四、五十年了，中央的专案人员竟还把黄子文看成坏人。世上竟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想起这个我不曾见过的人，好像就在眼前，我想象中的一位坚毅、英雄气概的，三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军人，当地的群众领袖。我见过他的妻子，没见过他的儿女。但我从内心里和他们亲，怜惜他们——这只是从档案中，从采访中得到的感受。

习仲勋是什么人？要我把他看成敌人么？不可能，他是陕甘边的革命老干部，是刘志丹的战友，至少目前我还这么看。

至于我的书，几次稿的形成，早已说过，何必再重复。想要我写个统一的完整的交代，那就请抄旧稿吧！

他们的目的，第一，是要抓习仲勋，第二，是要抓刘景范。还要继续迫害西北的其它干部。

刘景范谈的内容，只在两点上，没有第三个内容。他没参与过的事件，他是说不出内容的。到1960年以后，倒是我和他聊天时，滔滔不绝的告诉他许多材料。许多事情是他从我这里听到的。不是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我比他们看的材料多几十倍。现在把我的思想，都误认为是他的灌输。实在太冤！真正是想当然了。

那些老干部，包括习仲勋、刘景范、张秀山……在内。各人只能说各自经历的一段。比如，习仲勋能讲地方政策。

“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这有啥奇怪？我是综合了各种人的谈话，看了各方面的档案，取之于活人言，取之于文字，包括敌人的

报纸。现在硬逼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习、刘身上，真是极不道德的逼、供、信，极愚昧的迫害狂。

写小说岂能越俎代庖？我的思想和他们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主观能动性极强的人，即令是我错了，也很难被对方马上说服。如果我确定自己是对的，任何高压势力都不能使我改变。如今就遇上了这个严峻的现实。我能当材料篓么？不！谁也别痴心妄想，我这里没有你们需要的东西！

前年，陕西省人来北京“外调”，曾向我透露，我到过的地方，专案人员都去寻踪。我访问过谁，专案人员就去找谁的麻烦。他们跟踪着我的采访足迹，多少人都被他们威逼成疾，或者伤残致命。

只举一点例子：陕北保安县金汤镇的王悦贤，是刘志丹的舅舅家，表兄是为革命牺牲的，儿子王悦贤为我去南梁带了一次路，就被定为反革命，打得致残，忍受不了屈辱，自杀了；刘志丹有个堂妹不承认刘景范是反革命，被打得遍体鳞伤；南梁的群众挨打的也不少，庆阳地区受迫害的群众有上万人，都被认为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一片白色恐怖，致死者有两千多人。总之一片白、一片哀、一片哭、一片骂……我的采访给陕北人带来了多少灾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被康生扰乱之后的作法。

他们用刘景范来诱供，枉然！也许刘景范交代了什么。我估计，人家一逼他，说那书是我受了他的影响才写出来的。他的便顺水推舟，把责任都拦在自己身上。他要代我受刑，希望减轻我的压力，能把我放回家，因为我是孩子们的母亲。

就是习仲勋，也可能拦在自己身上些，因此“通天政委”就斥责我不该把事情都拦在自己身上。

要我解放思想么？我的思想一直很解放，向来不受哪位要人或哪条“圣经”的约束。只根据我的调查和分析，确定我自己的认识。我

不认为在延安所认识到的，“关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左’倾机会主义对党的危害最大”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他们说，不和这种思想决裂，就是没有站在毛主席一边。那么，如今的毛泽东，又是站在哪一边了呢？如果我在延安的思想又被冠以“高岗的思想、观点”，那么在延安时的高岗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他和毛泽东在延安艰苦共事十多年？不是一个立场、思想、观点么？毛泽东并没有在延安时和他思想决裂。对“左倾”的认识，我当然也要坚持，你们却要我与这种坚持决裂，这种复杂的矛盾局面，到哪里找方向？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找。不能被这种大哄大喻错误的混乱现象所迷惑。

要我和组织合作么？首先得问：你们能否代表组织？代表哪个组织？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阴谋主义的？领导人曾宣布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大革命，可是我的感觉恰恰相反，你们的作法，却是一场走向修正主义的大革命。

什么是修正主义？是不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不管你是往“左”边修，还是往右边修，谁修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个人内心的独白，自己做的结论，一家之言。

### 三十四 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是黑窝吗

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好，“小老虎”拿走了。

今天，“通天政委”的真相真是全露了出来。他说：“你写的东西我们看了。不行！你会写小说，可不会写‘交代’。还是我们帮助你写吧！”

我一楞，怎么，他们要越俎代庖？我随口说道：“等你犯错误那一天，你自己也不会写检讨和交代！”

这话既直又尖锐。总有一天，他现在的荣耀会变成耻辱。

我们对高岗问题展开过争辩，他们硬说一提高就是“为了高岗翻案”。

我向他提出：“请你答复：文化大革命之前，刘少奇是干什么的？”

这震惊着全房的七、八个人，怎么答呢？要说实话，就得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可他们，不敢说实话。“通天政委”也不敢回答我这个问题。他一说实话，我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会当场给他扣个“为刘少奇翻案”。这是他们的逻辑。用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受不了。

正像提到的：为解决高岗问题，《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一样。一提“炮打司令部”，这两个对立的東西就无法解释了。他们无法对付，只好说“高岗和刘少奇都有错误！”那就是说，各打四十板，结案！谁的权大谁就“有理”。

他们替我写交代，已经几次了。到写第七次交代时，他们拿着几年前没收的，我的采访记录，和出版社整理出来的“习仲勋谈话记录”。一句一字的抠，断章取义的瞎编。比如，把习仲勋说的“高岗过去是对的。那是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这三句话，只用前边的一句话：“高岗过去是对的”。后边两句话全抹掉，这样就变了性质。这确实是明目张胆地陷害、诽谤。从那孤伶伶的一句话，就可引伸出许多政治帽子。

“通天政委”还伸述说：“看看习仲勋是什么人？他念念不忘说‘高岗过去是对的’，十足的反党头子，反革命嘴脸（我想起：毛主席也说过这种话，你怎么评说？）。习仲勋吹捧刘志丹，吹捧高岗，就是吹捧他自己。第一个牺牲了，第二个自杀了，排队也排上他了，他成了第三继承人。想当全国的领袖！”

原来他们是担心别人夺取领袖的地位。可是我说：“他有资格当领袖吗？还没听说过，这话可不能写在我的‘交代’上。你们用推断

和引申的想象去写，那可不是我的事。不能利用替我写‘交代’害人。”

我反问道：“西北的领导人能排队排上他么？”

“通天政委”说：“你说能排上谁？”

我说：“有能力有威望的人还很多。比他有能力有功劳的人大有人在，”下面的话，我再未说出口：可惜他们在四十来岁的时候，就被打倒了。

一听说还有比习仲勋有威望有能力的人，“通天政委”十分吃惊。忙问：“谁？谁？你说！”几个人都催着逼问。

我说：“当然说不准。中央掌管全国干部情况。我又不掌管，你们把西北干部排排队嘛！”

“通天政委”放肆地说：“你就是钻进去出不来，还是包庇他们。陕北是个黑窝儿，没有几个好人！”

这句话可真露了馅。他们的全部思想结晶就在这句“陕北是黑窝儿”（这代表了中央专案组意见）。这不仅是“通天政委”的思想，而且是康生等人的思想。我估计的没有错——碰上陕北人就打，更准确地说碰见在陕甘工作过的人就打，碰见和刘志丹见解相同的人就打，已经是多年了。他们要斩草锄根。那些干部、洒热血、抛头颅干一辈子，竟落下个任人宰割了下场。真使人不堪回首。

又激起了我的怒火。我反问一句：“陕北真是黑窝儿？都是坏人？这些‘坏人’创建的根据地、中央来了要不要？请你去问问中央，中央来陕北（包括陕甘、陕北）时，那里是红区还是白区？如果是红区，就是那些“反党”分子创建的。这些坏人创建的根据地，中央接受不接受？”

一阵沉默，谁也不说话，我又说：

“如果你们答不上来，去请示中央。中央不解答这个问题，就无法再谈下去。”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毛泽东主席是1935年10月长征到的陕北，他还没到达那里之前，那里已经有三十几个县的红色根据地了。也许，正是因为这块“红色根据地”，才给陕甘（包括陕北）干部带来更大的灾难。

看来，《刘志丹》一书，永远也不会让写出来的，这是一大忌。

我确实太幼稚，总觉得，世界上存在的东西都可以写出来，特别是像刘志丹这种人物。他对谁都起榜样作用，可能正是这种作用，就不能让他与人见面。虽然，在陕北时，刘志丹已经臣服了的，就是说已是毛泽东的部下，非常听从指挥，直到在战场上牺牲。他都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功劳，他一生都是默默的老黄牛。可是，别人为什么怕他？

### 三十五 什么是剽窃

连续几天都在争论，他们硬要替我写上：书中写的陕甘根据地的各种政策，都是“剽窃毛主席的思想”，企图“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越深入，他们提的问题越大，越具体。也越暴露出他们的用心，胆怯、虚弱、无知。

我表示说：“分庭抗礼”是不科学的。对中央是不利的。陕甘那么个山区，怎么能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呢，这岂不是贬低了中央苏区？

“通天政委”说：“不，他们就是要贬低中央苏区，把那块根据地写得那么好，想干什么？歪曲历史！”

我也不曾想到他们能这样提问题。也许这是他们的核心，凶相毕露了。全国解放后对西北干部所用的花招，和这个问题不无关系。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当然寸步不让：“我歪曲了哪一段历史？歪曲了哪件事？请你们查查。我写的哪件事是假的？哪件事没出处？真

正企图歪曲历史的人，反说我歪曲历史。中央能听这种人的话，不加分析，不加调查研究就处理。”

“通天政委”说：“你说，你写的哪件事是对的？”

“我写的重要的事件完全是事实！谁也拿不出材料反驳我。”

“通天政委”极为愤怒：“你写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干部政策……完全是剽窃毛主席的，把那些东西写在陕甘苏区是什么意思？”

大政治家也有大嫉妒心吗？

由于愤怒已极，对他们完全蔑视，我有些玩世不恭了。我说：“那么，你就写上吧，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俘虏政策，再加上‘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我1962年写的是1935年的事，剽窃了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策。”

这是对他们的挖苦、嘲笑，这话也引起了震惊。“合理大个儿”和“小老虎”的神情不是望着我，而是望着“通天政委”。那意思是：“看你有什么高招儿反击？”

“通天政委”在这个专案组是权威人士，他愣了好大一阵，才“哦”了一声。吞吞吐吐地说：“你能记得你写了些什么？写过‘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么？”

我说：“当然记得！”我便叙述了第三稿中那件事：我写的是红军打土豪时，老地主跑了。游击队把地主儿子拉了来。领导上发现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便命令放他回家。派人找他谈话，要送他走。那孩子表示：他小学毕业，能看报纸，也能看书。爱看红军的报，他觉得红军好，地主不好，他坚决要当红军，永远不回家了。下级请示上级，刘志丹就批准把那孩子留下了。刘志丹说什么人都可教育。只要愿意革命，我们把他留下。开始在宣传队，后来当通讯员，从未发生过差错。讲完，我问：“这是不是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中央那时有



么？‘九大’以前有么？”

“通天政委”无可奈何地说：“这一条可教育好子女政策，你不必写进交代中。”

我问：“其它的呢？都是等中央有了政策，经过万里，辗转送到陕甘来，才能解决问题？人家不会从实践中想出个办法来？‘实践出真知’这一条，存在不存在？可知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液体力学的建立，是某国洪水暴发后得出的体验。凡世界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有许多人同时努力去解决，也许这个人在美国，那个人在俄国，这个在西方，那个在东方。最后都会在实践中成功。有先有后罢了。同样，社会科学也是如此。马克思把和他同时发现问题的人称作‘同行’、战友，没有说人家是剽窃。”

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通天政委”竟然说：“你不要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我们这里不需要马列主义！我们只要解决眼前的问题。”

他真是康生的徒弟，公然抛弃了马列主义。我也可以不这么看，只把他当成不读书、不思考的愚昧盲从者，中国人中这类人不少。我对这帮人越来越看得清楚。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包括眼前那个要取得人们信任的人。

这几天，我很寂寞，钱凝也放出去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又是一个人独居囚室。空空荡荡的没人说话。我不能把自己闷死，不能生病，我要唱。在这个地道囚室中漫步，唱歌。

我唱起《囚徒之歌》，对着那半明半暗的半截窗户唱：

“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

你要监视你就监视，我决逃不出牢监。

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

挣不脱千斤锁链……”

我反复地唱，有时大声地唱，有时小声地唱。到晚上，我一个人只哼着唱，反复哼。

值班的看守并不懂得我唱的是什么，他们没听过这种味道的曲调，是苏式味道的，加上我故意吐字不清，使他们莫明其妙。我呢，只是为了吐出闷气，轻松，使周身血液不停地循环……

我需要健康，我需要胜利！

### 三十六 谁剽窃了谁？

又连续两天论战。他们重复说教。到了十一月十八日，又进入白刃战。其实，这不过是双方愤怒的积累，全都喷放了出来。

我对他们替我写的“第八次交代”厌恶透了。堕落到这般地步。哪还像真正的革命者？

“通天政委”好像很神气，替李建彤写了“交代”嘛！自然是强者中人。

他神气十足地坐在正位上，其它专案人员的眼神都围着他。活像众神捧着一尊佛爷，继续演“连续剧”。

我目不斜视地一个一个阐述我的意见。我说：

“第一，关于农民运动。从前我已说过，现在，你们照旧写上，我不得不再重复一遍。那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凡信仰马列主义的国家，都搞农民工作，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列宁就针对中国的情况说过：中国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正等待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所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有彭湃、邓仲夏等人去搞农民运动工作。继而毛泽东同志也去搞农民运动，可你们却是死抠着《毛选》上发表‘农民运动’的日子议论别人的先后。其实毛主席也不是1927年才写农民问题的文章，还要早一些。请你们翻阅一下《政治周刊》，也见识见识别人的早期的文章。”

通天政委捂着嘴直“嗯嗯”。其它几个人都仰脸望着，当然是希望他有所反驳。

可他毫无动静，只是愣在那里。我又接着说：“第二，统一战线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统一战线问题。马克思要共产党人处处赞助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从共产国际的活动中，可以查到1927年7月，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原则，是列宁指出的原则：‘共产党务须利用极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大批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坚固的、不可靠的……’难道不是指的统一战线？都是发有文件或传达过的，难道西北干部谁也不曾听到？”

他们装聋作哑，不答话。我仍继续说。

我说：“列宁在《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中说得更具体。要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最精细地，最留心地，最谨慎地，巧妙地、利用敌人中间的任何即使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中间以及各国内部，或各类资产阶级中间的任何利害冲突……”

我又正面提出：“请求中央考虑，这统一战线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法？是刘志丹剽窃了毛主席的？还是剽窃了列宁的？”

我接着说：“武装斗争：陕北人不能用么？1927年，第三国际指出：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通天政委”说：“第三国际提出来了，陕北干部也不知道。”

我说：“刘志丹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难道就听不到党内的传达？”

“通天政委”说：“他们听不到。”

1927年刘志丹已不是普通学生，也不是个游击队长。而是西北国民革命军中第四路军的党代表，已是将军，正在改造一支有名的旧部队，什么消息都能听到。何况，西安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第二个中心

(广州是第一中心)。西安住的也有苏联顾问，能不传达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吗？

“通天政委”到了无奈的程度，还是硬着头皮说：“他们就是听不到！”

我竭力压住火说：“好吧！中国的农民起义也是武装斗争，陕北有个李自成闹起义，陕北人总能知道吧！”

“通天政委”用无赖的口气，“他们那时年龄太小，不知道。”

我说：“《三国演义》、《水浒》该读过吧？北方民间都说：老不看《三国》，少不读《水浒》。是怕老年人看了《三国》计谋多。青年人看了《水浒》爱造反。”

“通天政委”横下一条心，要和我斗到底了。宁死他也不敢承认陕北人的革命知识。他说：“那些书是小说，是假的。不可靠，不能用。”

对这些无知之徒，我能说什么呢？他们也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写到战略战术时，也参照《三国》、《水浒》和《孙子兵法》。他们一概不知，不懂，不记，也就一概否定。对这些僵化愚昧之辈，能和他们讲出道理吗？我一急，就说：“旧书《三字经》上说：兵不伐，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这本小书，陕北人该读过吧？那是几岁娃娃念的书。”

“通天政委”直打嗑巴，张着嘴，瞪着眼。周围的人也张嘴望着他，希望他能马上回击我。可他没能回击，反而问：“那是什么意思？”

其实，那是我五、六岁时念过的书，如今是冲口而出。从前老师讲解的什么，我也听不懂，如今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意思去解释了。我说：“如果不用兵，国王的纲领就实现不了。不但要用兵，还得做宣传工作呢？”

“通天政委”一听，又和他的意思拧了。他说“那是娃娃书，他们不懂。”

我说：“照你这种否定一切的态度，剩下的只有‘剽窃’二字了？”  
就因为刘志丹等人领导农民运动的时间在毛泽东文章发表以前，就给我扣上了个“剽窃”的罪名。

从这时起，我真痛恨这个顽固、愚昧，死抱着‘语录’不放，抱着康生的指示不放的奴才。把他最初给我的一点好印象全扫光了，硬是指鹿为马。这些人，大概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精华。

### 三十七 我是“基督教徒”

在这个房里，发生的是拉锯战，他们和我整整集中时间交战两个多月。然后他们又回到大本营，和他们的“中央首长”研究去了。到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又突然驾到。

什么问题，使他们又花了一两个月时间，这么费时费事？原来，他们和他们的“中央首长”一块儿研究着替我写“交代”。

这次，他们带来了替我写好的“第九次交代”。

我一看，所有莫名其妙的，对人诬蔑的词句都写上了。我佩服康生他们真舍得下苦心。

既然要我签字，就得先让我过目。我提起笔，边看边改，把那些不实之词，不实之事，统统勾划去掉，剩不了多少，往桌上一放。他们几个人又轮流看来看去，咂舌摇头。“通天政委”说：

“你这是过筛子嘛！把重要的，组织上需要的东西都筛掉了，只剩下些无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无用，中央首长连看也不愿看。”

他们的“中央首长”要看的，只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就是这个“第九次交代”。

我心里冷笑道：“我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我不愿为你们的中央首长效劳。我和你们不是一码事。没有那么虔诚。”

“通天政委”说：“这是我们研究整理出来的，不能改动。你如

果是共产党员，就得听党的话，在这份交代上签字。”

呵！是共产党员还得受他们的要挟，这么扭曲人性，我豁出去了，决不能屈膝。我马上横眉冷对，索性说：“我不是共产党员！”

都惊了，似乎是同声质问：“你是什么？”

“我是基督教徒？”

他们慌了：“你怎么是基督徒？难道你原来就是基督徒？”

在这一刹那，可能有人以为我隐瞒着历史到这个队伍来的。我说：

“你们可知基督教徒是什么样子？‘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伸上。’这就是基督教徒。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着我多说，你们自己去斟酌。”

这些年来，实际上他们把共产党员的名誉都给玷污了，叫作“驯服工具”，叫干啥就干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员还得带头写大字报，冲锋去斗人，乱揭发人。有些党员，什么坏事没有干过，我怎能和他们为伍。我不能在虚构的交代上签字，我说：

“那完全是虚构，你们也在写小说，写交代能允许虚构乱编吗？”

即令是经过这样的争吵、修改，那最后的交代，仍然使人非常不满。保有他们虚构的不实之词，不实之事，无限上纲。他们决不全部接受我本人的意见，而是要我让步。弦紧易崩，眼看就要崩了。他们身后站的是谁？毛泽东主席。他们是按“语录”的精神替我写的交代，我的心上真是在流血了。

我再也不愿说话。那意思是：好吧，那是你们自己写的。自己拿去给你们的“中央首长”看吧！

为了那个“第九次交代”，我愤怒已极。回到囚室，我就高声叫，高声骂，高声笑，只有我一个人，任意放声吧！在这个大监狱里，能把人窒息死。我偏不让把我窒息死。

这时正过春节。坤娣和钱凝，都偷偷给我送桔子、苹果。钱凝塞

给我一包点心。

这是在我搬到一层楼单身独居之后，一个人过春节了。我把难友们送来的吃食，一天天排着队地吃，吃完桔子吃苹果，过几天，把水果皮也当茶叶泡水喝了。我自己觉得需要维生素，为了斗争，我要活着，需要保持健康。

原来，我一个人锁在地下室，也要用全班人马值班，他们感到太费人力。不得不把我搬到一层楼的东专业馆 104 号，和专案组新的办公室对门。那里边有两三个人办公，出来进去的可以看着我。

我呢，一个人住在一间向阳的办公室里，倒也知足。不知这房子原来是谁的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扔下不少马列主义书藉。我又有了精神寄托。

### 三十八 抛出最后稿

专案人员神出鬼没的走了好多天，好像一切都沉没了，断了线儿，我得到了短时间的安静。

不知隔了多少天，他们又大驾来临。就在他们出没的空隙间，我的“第十次交代”已亲手写出，按实际情况写的，他们当然不满意。双方不免又要争来争去，讨价还价。我和他们又互不相让。双方的弦又拉紧起来。可我终究是孤立的，无权的，是犯人，是压在底层的。

从他们替我写的几次“交代”中，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思想、意图。我该对准目标，专门写要害问题。当然是绕着弯地写。

我写了很多，把所有的问题都提到了。特别提出了我小说的第六稿（我只好把高岗的材料删掉）。我说：“那是最后稿，一丝高岗的材料也没用，想捞稻草的人也捞不到。请你们不要看废稿，批废稿是不道德的，应当以最后稿为准。那稿子是你们抄家抄走的，为了迁就某些领导人的错误理论（用了一点材料就是翻案），连红军的政治委员

也取消了。”他们应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稿子就在你们手里，如果还没有看，请你们现在看看，认真看看，看后你们会明白，整了这么多年是一场空，是个货真价实的冤假案，这笔账该怎么算？丝毫不沾高岗，能扯上翻案么？”

我心想，我不提，你们就装傻，装着没有这档子事儿，只是一味地整人。你们装傻，我就要提。

这些年，一切都从高岗问题出发，企图推翻西北高干会议的精神，找借口整人。不管你们现在承认不承认，历史就是历史，它是无情的，最后的结论由人民去做，你们管不着了。当然，这个问题只能在他们暴露无遗之时才能提出，现在差不多了。从他们替我写的几次“交代”中，完全暴露了他们的诡秘。

我把要害问题提出之后。“通天政委”发楞了。几分钟不说一句话。其它人物也目瞪口呆地莫名其妙。据我了解，除“通天政委”外，其它人确实没有看过。有一次我问“小老虎”“你看过我的最后稿么？”他说，“没有，我们什么也没看过。”

弄得专案人员完全不知内情，难道他们不觉得这是上当？

我那稿子改后是抄了同样的两份，全是用毛笔写好的。一份送给朋友保存，一份放在家中，准备他们来抄家，他们果然来抄走了。不管谁抄走，也不敢不交给中央专案委员会。正好将来我拿出自己这份稿子对证，一字不差。

我新写了一大本所谓的“交代”，基本上把“第九次交代”中所提问题全部推翻了。这就叫“第十次交代”吧！我永远存着这份底稿。

送上去之后，“通天政委”批上“基本上是反驳”几字。是的，我反驳了所有的问题。只有反驳了，我才能轻松，我才能睡得安宁。要驳，就要驳得彻底，不留一点后患，不给那些老干部们背包袱，不管对谁都一样，我要保护他们。至于我个人，豁出去了。



就在这时，我已提出下乡当农民，或者到“五七干校”落户。我已得悉，我的小女儿去了江西，两个大孩子在内蒙插队。我设想，将来和孩子们一块儿当农民去，脱离这个污泥浊水般的政治旋涡，等待看那些人的下场。

干部当够了，“皇粮”吃够了，我应该弃官为民了，自民间来，还到民间去。对这些官场生活已经厌恶透了。

### 三十九 工人出版社的朋友们

我住在一层楼，他们让我打扫后院的垃圾，打扫楼道。对门住的就是专案人员。门口每早有一堆垃圾，这当然就是我的活计。我使用铁簸箕撮回来，把垃圾里的纸屑检点一下，再往外倒。

垃圾可是宝贝，从纸屑里检出许多有用之物。比如《工人出版社》编辑们的交代、揭发之类的底稿，都是被撕碎扔进了垃圾的。我检了不少碎片，拼对起来，就能看清字迹，看出一段一段的意思。不知是否故意扔出的？

这时，我想的不是别人怎么交代、揭发，而是痛恨坏人不该诬陷我的书，把那些好人都牵连了进去。编辑何家栋、王勉思、编辑室主任杜映，管出版的周培林，总编吕宁，都是一心一意想把书出好的。而他们却受了迫害。案件一开始，康生就派人去迫害他们。

听“外调”人员透露，《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已被康生再三地点名批判。调到外地改造，再揪回来斗争。从一九六二年开始，高丽生就成为文人中的受害者，也是个文人中的硬汉子。

一九六二年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外调，说《刘志丹》小说如何反动时，高丽生就站出来说话：“我认为这是部好书，再过二十年我还要出版这部书！”

听见这话，不少人暗中为他叫好！也启发了有些人的信心。就有

人悄悄弄到一本书藏了起来。

据透露，在这个“大革命”中，高丽生遭到灭绝人性的毒打和摧残。可能已不在人间。他是最能理解这本书的人，他为这本书牺牲了自己，这种人太难得了，可惜这位英雄，这位知音，我和他从未见过面。听说他原在《光明日报》工作，后调到《工人出版社》。为一本书结束了他的生命。

总编吕宁也是被打得死去活来，刑讯时出的汗水浸湿一片一片的地板，如今不知到了哪里？他是位东北人，日本留学生，工作非常细心负责。

勉思在外地，她的情况不知道，从报纸上看，她的爱人康濯在湖南被批判，她也难免受株连，加上她也曾是我这部小说的编辑之一，绝对放不过她。

周培林，一位有经验的出版工作者，老实忠厚人。确悉，已被造反派在头部施用了电刑。在康生派人收书、毁书时，他悄悄留下两本，托人带回老家乡下，到了老家，也不敢藏在自己家，只能放在老贫农干部家里，埋藏起来，准备将来再出，为保存这本书，真像日伪时期的地下工作者。

杜映挨整，康生企图株连他的丈夫——一位长征红军，某司令部的政委。杜映这位编辑室主任是很称职的。她看问题很敏锐，她对我写《刘志丹》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如果为此再把她丈夫株连进去，我就太对不起他们了。在这里，我也惶惶不可终日地担心着他们。

责任编辑何家栋，曾为我改写过第三稿，所谓第三稿，就是小说的第一稿。前两稿都是我一手写的纪实。到第三稿改成小说，何家栋从头至尾都参加了，而且是他执笔的（以后的第四、第五、第六稿，他就未能参加了）。他是位最认真的编辑。据说，造反派专门打他的脑袋。那些失去人性的人，打他的脑袋，震坏了他的双目，使他几乎

失明。

本来，我们是提倡文责自负的。哪想到一部书被诬告，竟能把全部的出版编辑人员都牵扯进去了。

我思念那些为我受害的人，想和他们谈心。可如今，他们在哪里？可能都已被发配了，坐牢了，生病了。他们都是我在写《刘志丹》期间认识的新朋友！

朋友，朋友们！你们理解吗？

我的心，仍然和你们在一起。

我是清白的，我是无辜的！

我的意志是坚强的。

朋友们，等着吧，我一定能胜利！

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暴戾恣睢都阻挡不住真理的传播。

#### 四十 拒绝“解放”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通天政委”又露了面。这回他又变了花招。战略上又退了一步，要我写个两三百页，一千字左右的“认罪书”，在群众中宣读，表示个认罪的态度，就把我“解放”了。

而这个“认罪书”，得按照他们的规矩，要承认他们千方百计提出：“为高岗翻案”，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制造“多中心论”，把陕甘宁根据地写得再好，是要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书中还“剽窃了毛泽东思想”。

什么叫“解放”？就是由他们出面，在群众中宣布一下“李建彤交代清楚了，她现在已不是反党分子，是革命干部了。”不！我不屑要这种“解放”，宁愿当个“反党分子”。尽管我很思念孩子，想出去看看他们。我屈膝求解放，有何面目见人？我又为什么要求得“解放”，

还想当干部么？我宁愿和儿女们一块当农民，也不愿当那种可耻的“解放干部”。不能接受耻辱的“解放”。我仍是不让步，我决不能在出卖灵魂的条件下求得“解放”。

我表面答应，实际是软推。拿两张纸，写得不伦不类送上去。气得他们直皱眉头，当然是通不过。“通天政委”一说不行，我倒松了口气，便顺水推舟地说，我思想确实跟不上去，不写了。

当然，他们没捞到最后的油水，也就决不会解放我了。我倒觉得心安理得，也就是我的心灵居然解放了，松快了。

谁知，就在这件事情的三天之后，他们就作出了决定：把李建彤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改造。

这个决定，在我意料之中，但并未给我看原文，只是有人暗示我，直到1978年我到中央组织部申诉时才得到证实。中组部告诉我，他们已经把你开除党籍了。

不管他们怎么规定，我照常生活，每天单独到后大门打扫垃圾与垃圾为伍，观看栅栏门外捡垃圾人的形象，和他们聊几句闲天。这里是无人管的垃圾堆，栅栏门外有个捡烂纸的老头子说“我是商业部的家属，这几天很紧张，前一天夜间机关里的人几乎走光了。”

这时正嚷嚷着备战。

到三月份，有那么几天，把我和本机关的几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个副院长老朱头儿、老徐头儿、老吴头儿编在一个小组，集中在一起学习。我们这几个人能在一块儿，感觉完全轻松。谁也不会压谁一头，谁也不会打“小报告”，因为全是戴着帽子的“黑人”。

我们见面说话随便些，有人说，上边找他谈话，说苏联就要打进来了，动员他去江西。他老伴死也不愿离开北京，老伴还说，她不怕敌机轰炸。她横一下条心去找当权派，质问道：“要打仗了，要我们

走，造反派为何不走？难道你们不怕敌人？不受国家保护？为什么只保护我们老头子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

不知上边又下了什么命令。

这时候，人心都散了，造反派很高兴，又可捞一把了。见谁家往外搬，他们就去抢房子，好像什么敌人也与他们无关，他们要当“维持会长”似的。

有个造反派，跑到老徐头儿家说：“把你的沙发搬到我家去。”老徐头儿就得乖乖地给他送去，否则就要受皮肉之苦。另一造反派跑到个姓何的干部家说：“我出拾块钱，把你这套沙发卖给我吧！”造反派要趁机发“国难”财了，好像他们不是中国人，不怕敌人来。

这些日子，每天都听到敌人要来的消息。该走的人已被赶走或吓走了不少。我们这个机关里的人，不少去了江西。只剩下我们四个“戴黑帽子”的人，每天可以有两个小时的学习，那就是我们的“自由谈”。他们“自由”谈完都回家。只有我一个人特别，绝对不许出大门，还在管制着。

过了十来天，三个老院长都去了江西，只剩下我这么一个“反党分子”。每天关门读书，或到后院拉垃圾。

X      X      X

我默默记住这些撕裂人心的统计数字，为我这本书，全国株连约六万多人，死者逾千。究竟谁之罪？这个古今奇案从何而来？记在谁的账上？

## 第三部

### 火车上的思考

火车开动了，我坐在车厢里，沉默着。

抬眼望去，没有一个熟悉的脸。虽然约有三、四十人是和我从一个大门走出，乘的同一辆轿车。上的同一列火车，可他们都是自由人，一些是被“解放”了的人，另一些是有权人，反正都有卧铺睡，唯独我没有。坐在我对面的，是个敞着蓝色中山服的年轻人，他刚从卧铺上换下来，为的是看押我。但是我不在乎，望着窗外，任田野、树木、河水、山脉像走马灯似地从我眼前幌过，我似乎看见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我的大脑又沉浸在往事中。

几年来，他们罗致的罪状，都被我用各种方式反驳光了，没给他们留下丝毫把柄。这样一来，他们没法子向康生之流交代，所以我走到哪里，他们还会追到哪里，再次提审我。且不管他！走一步说一步吧。反正决不给他们留把柄，绝不能再给朋友们的惹祸。就是死，我也死得干干净净！

用“解放”引诱我；替我写交代；逼我写认罪书；这些又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

为了驱散心中的郁闷，我抬头向四周看去，车厢里坐满了人。这些人，也许他们本来就是自由人，也许是他们“交代”得使人满意，于是就“解放”了。不过，从表面上看不出他们的心情是否都轻松，痛快。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个车厢里，只有我是“罪人”，地位最低。因为我的头上顶了个全国有名的“反党”大案，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发明家和使用者的发明家和使用者的发明家。正像那位“通天政委”威胁我时说的：“你永远背着包袱”。可是这包袱我必须背。我不背谁背？我总不能把包袱甩给那些陕甘宁的干部们；甩给那些长征的干部们；甩给

文艺界的朋友们；不，绝不能那样做！我不能对不起大家。如今，我的心非常坦荡，就像清澈见底的溪流，奔泄不停，绝不夹带任何污泥浊水。

中午时分，车箱里的人都到餐车吃饭去了，我忍着阵阵袭来的饥饿，闭目养神，他们不叫我，我也不理他们。直等到人们都吃完饭，说说笑笑回来后，坐在我对面的看押人才问道：“你吃饭吗？”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和他“一块去吃饭。这几年的日子告诉我，每走一步，必须有人押着我。决不会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去吃饭。我便答道：“吃，跟你们一块去吃。”

跟我去吃饭的，是两个人，这是他们的规矩。只有两个以上的人，才能监督着我离开这车厢。

看管我的人中一个姓许，一个姓傅，还有个小头目叫樊再三。

樊再三和我坐个面对面，我伏在茶几上打起盹来。

有人从卧铺车厢跑到硬坐车厢叫道：“张霞家的暖水瓶碎了，烫了女孩子的脚。”许多人都跑去看，我随着人群去张望了一下。原来是一家三口，妈妈有四十七、八岁，儿子有十五、六岁，女孩还很小，她的脚烫起了大泡，哭得好伤心。我心里也乱起来：为什么要把这些孩子送到五七干校？他们可正是上学的时候啊。

我问樊再三：“他们这一家到江西落户？”

樊再三对我讲起大道理：“五七干校，是劳动改造人的地方，也是安置干部的地方，将来都要在这瑞安家落户。”

我问：“你呢？”

“我是第一个报名来这瑞安家落户的。”讲完，他向前招招手，一个女干部走过来。樊再三站起来走了，可能是为了躲避我的追问。

女干部坐在我对面，接替樊再三执行看押任务。听别人叫她郝淑琴，还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我真弄不清楚，为什么让她带着该上幼儿

园的孩子去干校劳动？郝淑琴四十多岁，人很稳当，她对我说：“你趴下睡吧，我也再睡一会儿，孩子闹得我一夜没睡好。”她把孩子打发到远处，去跟烫了脚的姑娘玩耍，自己和我趴在靠窗茶几上，悄悄对我说：“别听樊再三瞎吹，他是个两面派。数他口号叫得最高：‘要带家属到江西安家落户！’为这，还受到上级的表扬。未了，别人都带老婆孩子来江西，他却什么也不带。落个啥户呀？”

我悄声问：“他是个复转军人？”

“瞎扯！他是个俘虏兵。最会投机了。会吹，会拍，入党好几年了。这次要去当咱们的指导员。”

我趴在茶几上没有入睡，思想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时，也是坐着去上海的车，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确实有点胆怯。总怕走错了路，上错了车。从我们家乡到上海，必须换两次车，一次在郑州，一次在徐州。换车时我总跟在人群后边，不管是下地道，还是上天桥，我都不离开人群。只要听说人家和我走的是同一个方向，我就叫“大妈，大伯”，跟着他们换车觉得保险。这是在家时爹妈教的：“出门在外，要跟老年人一块儿走。”出门时带的学费，都藏在贴身衣兜里。这也是爹妈教的，说“火车上小偷儿多，千万不能把钱露在外面。”

这是我第三次坐车去上海，这次最放心。第一，时刻有两个“警卫员”寸步不离地保卫我。第二，不怕小偷儿，因为我只有18元的生活费，真的丢了也不心疼，反正她们总不能叫饿着劳动吧。这就叫“无钱一身轻”。

不觉想起从前唱过的歌《多年以前》。

我便在心里反复哼道：||5 4 3 2|3 2 1-|

多年以前多年前……

从前我是个自由人。



## 二 在上海的回忆

在上海休息一天，住在瑞金路一个招待所里。许忠问我：“大家都要逛逛上海，你去吗？”

我理解，这个问话，包括两个意思：如果我去就省事了，大家都出去，把我带着走，我也跑不了。如果我不去，那倒费事了，他们还得派人看守着我。在上海只住一天，谁不想逛呢？机会难得。我不能再拖住两个人的后腿，让人家受憋屈。我本不打算逛上海，以免触景生情，引起许多的感慨和遗憾。但是我却说：“我也去！”

我是一九三七年暑假离开上海的，现在是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三年了，再未来过。三十三年后到上海自然是变化很大。

大家都要逛南京路，我也跟了去。别人要买东西，我也没啥可买，因为我身上只有吃饭钱，只是一个月的伙食费。看热闹，我也不大想看。从内心说，我真想看看我的母校——新华艺专。还有我常去的河南同乡们最多的地方——上海美专。还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在上海落了户。这些，项目组已审查过多少次，都写进了档案中。我想，临起身时专案组一定向带队的人作过交代，到上海绝对不允许我去看这些地方，见这些人。

我想也不敢想去看看那些熟悉的地方和那些熟人，只能在街头回忆。“七七事变”时，我已经离开上海，但是对于旧地方，总还有些留恋，那里有过我青春的足迹。也许旧地方已被日本人破坏过，但废墟总有吧。我还想看看新华艺专门口的打浦桥，那是法租界和中国地区的分界线。学校门口的石子儿路，还没变吧？那时我们吃饭是包伙，包给附近的一个山东饭馆，每天由女宿舍的校役陈妈去定饭。陈妈是个浙江人，很勤快，每天早上到宿舍问每个人：“X小姐，依早吃啥？”只要跟她说一句，几十个住校女生的饭食，她都记得清清楚楚，一点不差。她不识字，全凭脑子记。我喜欢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和她建

立了友情，常聊他们家乡的事，她在乡下的家庭很苦。临离开学校时，我把全部行李都给了陈妈。我估计，我可能不会再来，那就算还债吧，这位陈妈常为我垫伙食费。那时陈妈已有四十来岁，如今该有七十多了。日本人折腾了那么多年，陈妈可能早已回到故乡，是否还在人间？

还有那位传达室的好老头儿，记得姓孙，我称呼他孙大伯，是上海本地人，工作非常认真，每天把每个人的信送到宿舍内，一点不误事，那时我只关心两封重要的信，都是从太原国民师范来的，一封是娟姐的，一封是君石的。他们要给我寄救亡的宣传材料，讲太原的抗战救亡运动。那里成了最前线，最开放的地方，群众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他们催我到那里去，把我引到另一个世界，我很感谢递信人。

打浦桥附近的法政大学，那里有我同学汤士俊的哥哥，金潭县人，我和一个同学常去玩。

我同宿舍的两位女同学都早无踪影。现在我到了上海，也不能去打听这些人的下落。

上海美专比我的母校还吸引我。那里有许多同乡，学西画的、学国画的、学音乐的，都对我特别好，像是一家兄妹。我和刘伟最谈得来，三七年暑假分手，不知下落。这次提审我，把这些人——我的社会关系，翻过来掉过去的查问，也没有他的下落。

不审我，旧事全忘了，一审这些旧事，又引起我的思念，我真想去看看他们住过的地方。但是不可能，上海美专的地址菜市路，我已找不见。目前的带队人，也决不会答应我去进行“反革命串连”。

还有我那位老同学，我更不敢去看他，因为专案组提审我时曾说，他替我伪造历史，给我拍马屁。大概项目人员来审过他，他没有说我的坏话。他可能为我挨过打，受过气。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是知根知底的。

跟随大家在街上瞎走了半天，我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回到招待所，

就碰上在火车上烫伤的小姑娘，由哥哥背着去医院治疗，妈妈跟在后边。郝淑琴悄悄对我说：“多可怜，爸爸定为地主分子，押送回福建老家劳改去了，剩下这么母子三个……”

我问：“他们姓什么，干什么的？”

老郝说：“孩子的爸爸姓赵，是位工程师。妈妈叫张霞，是老会计，和我同行。男孩子名叫赵小斌，初中学生，女孩子名叫赵小英，上小学。”

大家都在招待所食堂里吃饭，我和三四个女的住一个房。刚要躺下休息，忽听隔壁叫道：“妈妈，我要上厕所！”

我忙跑去一看，孩子的妈妈倒在床上，血压突然升高，起不来床了，孩子的哥哥又不在，小英双脚包着纱布。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背起小英就往厕所跑。孩子解完了手，我又把她背回去。张霞感激得叫起来：“这怎么行呢？你这么大年纪，还帮我背孩子。她十一岁了，这么大个子！”

我摆摆手走了。

再上火车之前，赵小英每叫一次，我跑去背她一次。除了我，别人哪敢呢？她是地主分子的“狗崽子”，我这个反党分子，当然不怕“狗崽子”。满身是泥的人，再蹭点儿土，算得了什么？

### 三 寻找小女儿

从上海起身，到江西的樟树车站下车，在樟树镇又参观了一些革命纪念地点。才坐上大卡车到我们劳动的地方——五七干校。地址在峡江县水连镇的西南角上。

到了住地，我就提出要看我的孩子。樊再三说：“你的孩子在这里么？”

看样子，他们在打官腔，不想让我看。为孩子我绞尽了脑汁，自

已被关，被押，都无所谓。老头子被关，被押，虽然揪心，可他是大人，自己知道该咋办。唯独孩子们，使人最伤脑筋，少爹没娘的，又都成了反革命家属，狗崽子。这么恶劣的环境，谁知他们怎么熬的日子？我曾想过，豁出干部不当了，公家这碗饭不吃了，孩子到那儿我到哪儿。两个大孩子插队去了。究竟在什么地方？过得如何？谁也不给我透一点信息。他们把我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掐断了。

最小的女儿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只是在三个月之前，我在机关院子里劳动，有个干部突然从二门进来，向我说了半句话：“你的小女儿走了！”我一愣，忙问：“去哪儿？”那人扭着脸直摇手，有人来了，再说就要惹祸。我的孩子的行踪，竟然对我瞒得这么严实，想把我逼疯吗？大概这又是他们想利用我想孩子的心理，逼我按他们定的框框“交代问题”。这也是一种心理战，神经战。

在押的犯人全释放了，只剩我一个人，命我从地下室搬上一楼，住在专案组的对门。他们的命令是，我在院子里可以自由行动，不许出大门。我便利用这个条件，开始调查。我去医务室看病，专门找针灸大夫小于：“请帮我打听一下孩子的下落吧！”过了两天，我又去针灸，小于悄悄说：“打听了。你的孩子和阿姨都到江西去了。有人看见过，上大卡车时，还数了行李的件数。”

我曾利用打水的机会，去找食堂的炊事员老梁师傅。托他找孩子。他说：“放心吧，我不怕，我去打听，你家的住址，不就是西四丰盛胡同二号么？我知道。你家从前做饭的刘师傅、是我的师兄，我去过你家，他们都说你家人好。”过了三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去水房找梁师傅。他说：“我去了，敲了半天门，按了很久电铃，没人开门，那房子好像已经空了。”

我这才相信，孩子真的走了。我又借打饭的机会，从排队中找到释放的难友坤娣，塞给她一张纸条，请她到我三妹单位打听孩子的去

处。一个礼拜后，在食堂里她又塞给我一张纸条，约我到厕所去。我们到了厕所，把水池的龙头拧开，流水哗哗响着，我们好说话。她说：“到了你指定的医院，挂号看病，找到你妹妹。我说我叫王秀梅，是李建彤的同学，从天津来的，想看看李建彤的孩子。”你妹妹说：“全不在了，两个大孩子到内蒙古插队去了，春节回来过，又走了。小女儿去了江西。”

这消息再确实不过了。我就要求到江西落户，既然被关押的人都走光了，把我一个人留下干什么，这正合他们的意思。

临动身前，专案组的“小老虎”告诉我：“你去江西，可以看孩子。你的小女儿已经到了江西。”这是他代表组织给我的通知。我满以为，在孩子问题上，一通百通了，谁知到这里又受到阻拦。我便去找许忠。我说：“许忠同志，这次是你带队来的，起身时项目组告诉我，到这里允许我看孩子，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许忠迟疑一下说：“我给你打听一下，孩子在哪里。”下午就通知我：“你的孩子在犁田村住，距这里五、六里路，你自己去找吧。”

我到处打听犁田村，原来是地质部“五七干校”家属们住的村子。“五一”节假日，我去找孩子。我边走边打听，到了犁田村。进村打听阿姨和小女儿的住处，终于找到了。她们住在离村不远的一间房里，门口有个高台阶。

我一进屋，阿姨和孩子都抱住我哭起来：“你怎么到了这里？”

我说：“我也是来劳动的，这样可以常来看你们了。”

我拉住孩子看看，是长高了，可是却有些不正常。一问情况，才知道，孩子平常不在这里住，节假日才回来。平常是住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人们简称叫“共大”，距这里有十多里路。学生劳动得很紧张，每天连一小时的“天天读”也没有。主要是劳动，不是学习。别家的孩子都退了出来，在机关的干校随父母劳动，编在青年班。唯

有我的孩子不允许退出来，阿姨也不敢让她退出来。“共大”把她当成了“劳改对象”，放在“尖刀班”里冲锋陷阵。所谓“尖刀班”，是最棒的小伙子，最强的劳力干的活，上山砍柴，下田担粪，扛大木头，修公路……她得跟小伙子们一块干。

我不禁一阵辛酸，她才十四、五岁，犯了什么法呀？替父母服罪劳改吗？她哪经得起这样折腾呀？她是不足月出生的，先天不足，虽然经阿姨精心照料，才健壮起来，她的身子到底还是弱些。前年冬天到“木笼子”里给我送粮票时，我看见过她，成了黑姑娘，个头儿、体形、脸型、都很标准。现在呢？由于劳动过度，营养不足，副食少，吃粮多，使她变了样儿。我再三看她，摸她的膀子。孩子究竟受了多少白眼，多少委屈，她没有说。

当晚，我可以住在这里住一夜，这也是经过批准的。和阿姨、孩子，三人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孩子平时劳动强度很大，节假日才回来一次，躺下就睡着了，我摸着她那肿胀的肩膀，偷偷流下眼泪。她是个女孩子呀！正在发育的时候，成了这个样子。再看她那高鼻梁，大眼睛，小嘴，还是原样儿，可那脸形似乎有些变了，从前人们都说这孩子聪明，漂亮，可现在遭这么大的磨难。

阿姨喃喃地向我低语，有说不完的话。突然隔壁“扑通”一声，是凳子倒了，席墙在晃动，还有细碎的脚步声。阿姨忙息了煤油灯，爬在我耳边说：“隔壁那一家，是监视我们的。她爬上凳子往这边看，贴着席墙听咱们说话，凳子倒了，她还贴着席墙偷听呢。”

阿姨和孩子住的房子，是借江西老表的，一大间隔成了两小间，两家分住。那一家，好像是地质部的一位什么科长，都是造反的积极分子。这家人一住进来，就在阿姨身上打主意：“你为什么不走？为什么还在这种人家干活？”阿姨说：“我舍不得孩子，这孩子是我带大的，她爹妈都走了，我再走，不通人情。”

阿姨的人缘好，常帮家属们和村里人做针线活，都喜欢她，这才对付着把日子熬下来。

阿姨这里存放着两个大孩子的来信，第二天早上我一封封翻看，才知道了两个大孩子的去向，生活情况。他们都在内蒙的武川县劳动，女孩子干农活，男孩子放马。我请阿姨写信告诉两个大孩子，说我到了江西。

孩子们有了下落，只剩下老头子还没音信。

下午，小女儿要回“共大”。我要回劳动的工地，正好和孩子同路走。

由犁田村到“共大”，是一条走汽车的土公路，路两旁有柳树，有水沟，沟边还生着各种野花。隔沟都是些稻田，公路上大卡车不断扬土，还夹杂着拖拉机。我和孩子边走边不停地躲着车辆。

孩子已长得比我高两寸，可到底还是有些幼稚。她问：“妈妈，咱们家到底是什么大问题？前几天，我和同学去干校，一个干部看见我们这群女孩儿挺好玩儿的，就过来问都是谁家的孩子，问到我时，我一说爸爸的名字，他扭头就走，好像见了鬼。”

我说：“不要理他们，人里边总有不懂事的，将来他们会后悔的。你要沉住气，要经受住任何打击，这是暂时的。”

孩子说：“在‘共大’学生开会，我是管写稿的，但是不能发言，得让出身好的发言。同学们都替我打抱不平。”

我说：“不用计较这些，叫你写，你就写，练好了都是自己的本事。投机取巧的人没有好结果，不学无术而已。世界上，不合理的东西，不可能永远存在……”

“前几天老师跟我们讨论教育计划，我问了问题。我说，这不是学校么？怎么我们不学习，净劳动了？大家都同意，但是学校不理。老师的脚板子跟鞋底子那么厚，老师说我们必须练出那种脚板子来。”

我估计，现在还是在“左”倾高峰中，学校是把学生当成了劳动力。把她们正当学习的年龄，都当汗水流掉了。可眼前有什么法子呢？这就叫“革命”？误人子弟呀！我只能对孩子说：“这些事你不必管，怎么办学，将来中央会说话的，咱们暂时什么也别说。”我望望孩子的脸，从前的笑容全消失了。我问“你每天吃得饱么？饿不饿？”

“我现在吃得忒多，吃饱了过一会儿，又饿了。可以不停地吃。”

我心中在流泪：我已看见阿姨对她是太好，太好，假日回来，尽量给她吃，直吃得闹肚子。可是到了学校，像舍出去的孩子一样，任人打发了。我说：“现在又是个困难时期，副食少，油少，肉少，劳动太重，容易饿。你自己要小心，不要得了病。”我从身上掏出些粮票，还有两块钱：“你买点心吃吧。听说这里的点心不好，总还有点油吧。”

到底是孩子，她说：“妈妈，我插秧可快啦，也不怕蚂蟥！”

“有蚂蟥一定要打掉，免得钻进肉里，顺着血管爬。”

我拉住孩子的手看看，手上有块伤疤，我问怎么搞的？她说是砍刀砍的。我说：“你千万要保护你的手，不要把指头搞断了。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弹钢琴的。”

孩子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不说话。好像我说的都是梦话，这个小心灵里，像是一张洁白的纸，上面划满了问号。

我一直把孩子送到“共大”门口，才返回我的劳动住地。

#### 四 “五七干校”

我们“五七干校”住的地方，是江西峡江县水边公社曙光大队。曙光大队的村子很美，我们来的当天，就看见了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各种名贵树木。特别是樟树，是这个地区的特产。村口有个小石山，倒挂着瀑布。要是在北京，这又是一景了。



村后有清澈的泉水，吃水方便，可以从石槽里把泉水打出来洗衣服。

我们来的第三天，开始劳动，天还没亮，就吃完了饭。我眼睛不好只能看见人影，看不见人脸。随着大队去插秧，在过河踩独木桥时，我掉进水里，许忠把我拉了上来，双腿都湿了，不过不要紧，我穿的是破棉鞋，准备踏泥踩水的。去插秧的地方距曙光大队大约有六七里路，叫坑西村，一望无际的水田。

我第一次看见插秧，先观察别人怎么干，然后就脱光脚下了水。先捆秧苗，看谁捆得好，捆得快，我的手也不慢。队长小傅过来看看，提起一捆秧苗摇摇：“这是你捆的？”一会儿，指导员樊再三也跑来看看，他们要检查我的质量，提提这捆，又提那捆，还数数目，好像大家都在看我。支部书记许忠说：“头一次干这种活，还可以！”

我和年轻人一块儿排着队插秧。插得最快的，是随父母来劳动的中学生。也就是我的孩子说的，从“共大”退出来的孩子们。她们插到我跟前，悄悄说：“我们都上过‘共大’，认识你的孩子拉拉。”我点点头，笑笑。孩子们多么天真、多么善良呵！

据说，这些孩子们，随父母来了近一年了，有工程师的孩子，有党政干部的孩子。别看他们“咯咯”地笑，晚上睡下也有哭的。他们来得早，又和父母在一个单位，父母挨斗的时候他们都看见了；父母脱光膀子，担石头的时候他们看见了；父母背砖头，盖房子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有个名叫“四贝贝”的姑娘，插着秧低声说：“你们拉拉不在这里倒好。我在这里，简直不敢看我爸爸，他五十多岁，干着那么重的活儿，人家还吆喝他。太残忍了。”孩子的泪水滴在稻田里。

我知道四贝贝的爸爸，他是力学专家，高级工程师，研究所所长，还是共产党员。我在北京也看见过他的大字报，还有用白粉写在地上的大标语：“打倒反动权威孙 XX！”

吃午饭时，我坐在一块木头上，有两个女孩子也坐在我身旁。四贝贝比我的孩子大两岁，很懂事，悄悄说：“我再给你添一碗饭吧，要吃饱。老年人干活，吃不饱顶不下来。天这么热，你用冷水拍拍头。”

日落才下工，回去时仍排着队走。十几岁的姑娘、小伙子，“嚓嚓”地走在前边。虽然队长小傅还叫着“一二三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他追不上孩子们。

光线暗下来，我的白内障眼已看不清路，樊再三走在我跟前，看见我的脚直往路边滑，就拉上我。他问：“你看不见路了？”

“看不见，冬天五点看不见路，夏天七点看不见路。”

这使他好恼火，只得执行他的指导员任务：收容掉队的。这里是生路，谁知往哪里摸呢？走了一阵子，我问：“还有多远？”

他说：“还远着呢。”

谁知又碰上个掉队的。叫道：“老樊，你把她交给我吧，你前后去看看，还有没有走不动的。”

樊再三轻松一大块，往前走了。

和我一块走的，是个女干部，与我的年龄差不多，身体瘦弱，但她的眼睛比我好。她和我挽起膀子走，我只跟着就是了。在山区的野村里，陌生的、黑咚咚的路上，似乎已无人烟。她自我介绍说：“我是咱们机关的幼儿园园长，名叫舒郁，是解放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

我想起了：被关押的时候，到后期，只剩下我和钱凝两个人，专政组叫我们每天倒垃圾。路过幼儿园门口，常常见一个女干部打扫卫生。也曾听人说，那是幼儿园长。当时我想，有什么必要叫幼儿园长每天打扫卫生呢？教员和阿姨们呢？我没敢问过。

舒郁趁这个没人的机会，向我诉说起身世：“我和你有同样的遭遇，老头子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四川，多年无音信。我只好等他。就

因为老头子的问题，我这次也成了革命对象。”“你老头子是干什么的？”

“他也是老师范毕业，在大学当讲师，北京解放前，我们都参加了革命活动。我们还参加了合唱团，唱解放区的歌。”

“你现在还会唱么？我们唱一个！”

我们俩真的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谁能想到两个打到社会底层的半老太婆，敢在这黑夜的山路上唱得震山响。

她的歌喉不错，是女中音。据我想，她大概十多年不唱歌了，今晚是出了奇迹。

她还说，全国解放后，她在四川工作，也在江西工作过，从前是做妇女工作的。后来，老头子一打成右派，她就到了幼儿园。我想，大概是幼儿园的孩子们沾染不上右派的反动气味吧。

走了这么一路，我们竟成了熟人。她说：“像我们这个年纪，这种身体，弄到这里能干什么？”我开玩笑说：“叫你来暖鸡蛋孵小鸡呢！”她也笑说：“连鸡蛋也暖不热了，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们俩又笑了一阵。

走得很累，可也说得痛快，到了我们住的曙光村，已经深夜。刚进门，舒郁就摔倒了。

想不到，她满身长着骨刺，颈椎、腿关节，都不方便。硬是咬着牙在走路。

我还未估计到，右派的妻子也当右派对待。有人说，全国打了四十万右派，加上配偶，岂不成了八十万。孩子呢？如果孩子也受歧视，按每家两个孩子计算，又是个八十万。一百六十万人被我们推出去了。

这一晚，我沉浸在忏悔中。反右派那年，我们机关里有个人说“社会主义带来官僚主义。”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就说：“官僚主义是旧社会产生的，不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七嘴八

舌，最后，领导上把他定成了右派。他的妻子不同意，领导上又把他妻子也定为右派。夫妻双双发到北大荒劳改去了。

现在想来，我那时太幼稚，也受了“左”的思想影响，虽然“文革”结束后是我设法把他弄回北京解决的问题，我为他写了证明，改正了，在北京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夫妇总是受了二十多年苦呵。我这一生，是挨打的角色，没有打击过别人，只有这件事，是我最为内疚的。

## 五 善意的人们

一连插了几天秧，我由人拖着走了几天黑路，他们才发现我是个半瞎子，赶快重新安排，叫我到工地去喂猪。这大概因为我是中央项目管的“犯人”，万一走夜路摔死，他们不好交代。

工地在哪里？我不知道。出门碰见地质专家黄汲清，他穿着一身旧蓝布中山装，在村里小夹道中走来走去。我先向他打招呼：“黄老，你也住在这里？”

他点点头说：“你也来啦？”

“来了。有人照顾你么？”

“我老伴也来了。否则……”

我听说过，他老伴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文革”前，作为老专家出差时，老伴把每条手帕都准备得井井有条，并告诉他放在什么地方。如今，老伴跟来给他做饭了。这是件大好事，否则，让他长期吃食堂里的大锅饭，那真能要他的老命。对于六十五六岁的老专家，叫他来五七干校干什么？每天早上出工前，带队人总要读那段语录，可是只读一半，就隔过去了。语录中那几句是：“除年老体弱者外，机关干部都要轮流下放劳动。”他们偏偏把“年老体弱除外”几字打了埋伏。这就是他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

我问黄老：“你身体好么？”他说：“血压高！”

这几天在稻田里，我看见地质科学院的老院长朱效成、副院长徐本光、吴俊如，他们都光着脚，卷起裤腿，哈着腰，在稻田里做他们不该作的劳动。带队人还对他们指指点点，没有一句温和的话。更不用说“敬老尊贤”了。

我问黄老：“你还下田么？”

他说：“我下不了田，头晕，可能去喂猪。”

“到哪里喂猪？”

“到坑西，跟矿床所在一起。”

可怜的老专家，在国外留学后，回到中国搞地质。解放了，他出于爱国留了下来，现在却要进猪圈。这么一位求之不得的老专家，从锁进地下室小黑屋，到下稻田，再进猪圈，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面对黄老的处境，我心里沉甸甸的。

我不认识工地，正巧碰上有人去工地，我就跟上走了。

所谓工地，就是正在修建房屋的一块荒山古坟高地，是一片丘陵地，照着有三棵柏树的方向走，走进一片松柏林，穿过松柏林，再越过一片稻田，就到了。

一年以前来的人，都正在搬砖递瓦，盖顶上梁，一排排的红色新房……我们的新家，就要盖好了。也许我们要在这里度过余生。

“按照上级的指定，我应去找一位名叫陈立贞的女干部。可我到工地后茫然不知所向，只好问最靠边的工房里的人：“陈立贞在哪里？”

那位年轻人有些吱唔，我忙自我介绍：“我是李建彤。”那年轻人忙说：“我知道，我知道。陈立贞在南边，你再向前走……”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陈立贞的儿子。

我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小房子，进去问：“陈立贞在吗？”

这次出来一个女的，一张热情的笑脸：“你是李……你也来了。我带你去找老陈。”原来她不是陈立贞。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里的人对我这么好。这当然都是群众，是一些命运不佳的人。

那个女的带我到个工棚里找到陈立贞。

陈立贞，这个名字我在大字报上看到过好多次，就是没见过本人。谁知她一见我，非常热情：“你来了好，和我在一块儿。这里冷时能冷进骨髓，热时使人透不过气。这几天还好，咱们一快儿干吧！”

陈立贞拉住我往另一个工棚走，那是喂小猪，做饲料的地方。到了饲料房她递给我一把刀，两人对坐在一搂粗的树根木墩前，她教我剁菜，做饲料。她可真能干，什么都干得来。我问：“你从前干过？”

她说：“我家在广东农村，凡是南方人能做的活，我都能干。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盖大礼堂动工挖土，我担土担得最多最快，人家都夸我‘小蛮子能干！’”

我再看她的脸，的确是广东人模样，有两颗金牙。脚片子瘦薄，平展展的，走路又快又稳，手也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做事很灵巧。我问：“听说你在咱们的政治部工作？”

“我原是政治部副主任。”

“他们为什么斗你呢？是不是你得罪的人太多？”

她很坦然：“我这个人，平时也有些官僚主义，评工资时，我有些不公平。举个例子：‘有个人，名叫罗云英，是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她文化不高，嘴可很能说，她很会拍马屁，特别是给我拍，拍得我很舒服，所以那年评工资时，我就给她提了一级。那时的名额是有限的，只剩一个名额，我还给了她，把她从十五级提成十四级。而这个名额，本来应给瞿克的，瞿克是工程师，工资才六十来元，给他提一级，就合理了。我给了罗云英，自己也觉得理亏，见了瞿克，我就说：对不起，这次本来应当有你的一级，名额分完了。这次让你吃了亏，下次

一定给你。’就这样，我糊弄过去了。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瞿克那一派就对我很不好。”

我觉得这个陈立贞，还真直爽，丝毫不掩盖自己的错误，我对她产生了好感。我问：“你还有什么小辫子给人抓住吗？”

她说：“当然有，一九三八年，我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师范念书时，又集体填了个表，也不知加入的是什么，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这次人家调查出来了，有人说是学生会，有人说是三青团。现在我的问题已结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她把自己打开摆在我面前。她有些错误、查清了，她已经“解放”了。她比我自由。她的儿女都在身边。我问她：“你的爱人呢？”

“离了婚，早就离了。他另找了个年轻人，梳小辫的。去他的吧！我一个人过，还自由些，和他一起时，我什么都迁就他，把他惯坏了。”

“你的生活能力比我强，连走路都比我快。你抱起小猪，那么内行，我连摸也不敢摸。”她笑说：“我是妈妈的大女儿，从小在家做惯了。我们家里也养猪、担水，和你们北方人不一样。”

她又看看我的手，哈哈笑起来：“你的手指是尖的，好像兰花指，没干过农活，这回你可干不过我。”

“我向你学习，你教我吧，南方的农村，我从未到过，我是北方城市长大的。真是‘只知吃猪肉，没见过猪跑’。”

我们两说得很投机。估计她对我的问题另有看法，否则，不会敞开心扉。不过，一有人进来，她马上就闭口，只是“啜啜啜”地剁菜。我也学着她剁菜。

有个女人进来，把小猪摸一摸，抱起看看说：“老陈，现在大猪小猪归你管了。刚买来一筐小鸭，我专管喂鸭子。”说着，拉个小凳坐下，大腿放在二腿上，抽了一支烟，从兜里摸出个松花旦，剥着吃完，拍拍腿走了。

她站起来，我才仔细看了她两眼，人长得有些怪：满脸黑点子，厚嘴唇，一笑几颗大门牙，满头粗头发，还带着点儿小卷儿。宽脚、厚手，身体壮得像条牛，乍一看，真似罗云英。

她一走，老陈的话匣子又打开了：“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办公室主任罗云英，现在她要当咱们的养猪班长。从前我领导她，现在她要领导我了。”

“她没有问题？”

“谁知她是什么人？出身也不好，要查起来有一大堆问题。对别人追查家庭成份，还追查海外关系，偏偏对她什么问题也不查。”

“她怎么‘解放’得那么快？”

“你是个书呆子，慢慢观察吧。她很会拍马屁，和什么人都打得热火。她是对上拍，对下压，还会造谣言。你可要小心着别让她在你身上使绊子，捞资本。”

罗云英又进来了，我和老陈又膨膨膨地剁起菜。

我搬进了这个养猪班的宿舍，女宿舍在工棚里，这个工棚和别的不一样，是地质人员在野外住的活动房。这是工地上唯一的房子，是用木板拼起来的，也有窗户。里边用木板搭了个大铺，并排可睡十几个人。

我真感谢陈立贞，我没有蚊帐，她把我拉进她的蚊帐里，还说：“你真傻，不知道南方有蚊子么？特别是这个工地上，是个荒草湖坡，古时是乱坟堆，夜里萤火虫到处飞，蛾子打窗户，蚊子大得像螳螂，能把人咬死。”

我想，我是傻，可谁也没有告诉我呀。再说，从北京起身前，我身不由己，不能出大门，叫我到哪里买？更何况，我也没钱买蚊帐呀！每月十八块钱，项目人员还宣布说：“这是因为你抽烟，否则，只能有十五块生活费。”就是这些钱，吃用全在里边，还能买蚊帐？我来



时，还是穿的棉鞋，到这里后，才知应当穿“解放鞋”或者雨鞋，因为这里走路多，雨水多。我刚才还托郝淑琴帮我从北京买“解放鞋”呢。

中国到底还是好人多，坏人少。今天又遇上了陈立贞，我心里稍微舒展些，心想：“群众是好的，是通情达理的。”我一到这地方，谁都知道写“反党小说”的李建彤来了，可仇视的眼光只是少数，大部分是善意的，暗暗同情的。也许因为这个案子时间太久，群众也逐渐明白了。

我刚躺下，旁边的女同志就说笑话：“你听这里的老表说顺口溜吧：‘水边水虚，蚊子大如鸡，打上三扁担，它还照样飞。’这里的蚊子比鸡还厉害，不带蚊帐的人，简直不能活。”她说着，拍拍怀里的小男孩，又摸摸背后睡的大女孩，把蚊帐拉严。我见她的男孩才两三岁，女儿也只有十来岁。我又为她难过，这么小的孩子，带来干什么？不禁问她：“你是哪里人？从哪里来？”

这两个孩子的妈妈是河北人，叫紫桂，从张家口来的。为了和孩子他爸爸调到一起，是紫桂的爸爸把她们娘仁送来的。她刚到这里，她丈夫就被打成了反革命。

同屋还住个食堂的女会计，也是从张家口来的。

## 六 养猪班长

过了不久，一片红瓦房盖起来了，一排排的，像个新建的村庄。新盖的大院，没有围墙，倒也方便，四面八方都可以走。在这里，可以眺望公路上的汽车来往，也可遥望几里地外的“共大”。我打猪草，可以跑遍大片坟堆查看各种草药。也可以穿过公路，到对面山上，为猪找能吃的各种鲜草。

在这一带，我是自由的。这里有许多机关干校，如卫生部的、气

象局的、地质部的、中央办公厅的等等。山多，荒多，人烟少是这里的特点。

茫茫的山野中任我走，到中午定要背回一筐猪草。在这段时间，我每天如此。上午背个筐，穿着“解放鞋”，高卷裤腿，穿件半旧咖啡色短袖衫，可任意趟草窝，淌汗水。有时遇上放牛的，也都是熟人。这天碰上力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见面搭讪几句：“打猪草来啦？”

“你会放牛？”

我常遇上的这个牛馆，是高级工程师。每天穿件蓝色旧工作服，牵着条牛满山转。据说，他也是和黄老一样，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老知识分子。

新房盖好后，大家都忙着搬家，要各就各位了。

这里都是营编制，机关里的每个小单位编为一个连，我们是最末一个连，第七连。我们这个连的人都是原来在院部工作过的，包括副院长（院长由地质部副部长兼任）、党委书记、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还有各处、科室人员，平均年龄最高，最老的六十六岁，最小的十四岁。如果包括家属在内，最小的只五岁。

连部的领导人，住在原来“鸭棚”的隔壁，是幢简易平房。其它的男男女女，都搬进新盖的第一排平房。女宿舍就在第一排的左右两边。

我和陈立贞住同房。这房里住了六个人：除我和陈立贞外，还有张霞和她十一岁的女儿赵小英，电话员杨玉华，此外还有一个，那就是罗云英。

罗云英是我们养猪班的班长。又是这个宿舍的室长。她搬进时，派头可不小，连长、指导员，都来给她帮忙，不算行李，光吃的，就有多少种：挂面、红糖、冰糖、水果糖、蜂蜜、苹果、梨子、花生、核桃、芝麻……酱肉，罐头……都是一篮一包的，把床底下、床头上，

塞得满满当当。

早晨起来，她就坐在院子里吃。木炭火上坐着洋瓷小盆，大米粥里煮着牛奶，馒头上夹着酱肉，一连吃了四个，再吃上两个咸鸭蛋，把一盆稀饭、牛奶喝光，拍拍屁股站起来，叫道：“杨玉华，和我抬糠去！”

杨玉华的眼皮一耷拉，一声不吭地跟她走了。

她俩一走，张霞开了腔：“老陈，你都看见了，早上罗云英吃的啥？杨玉华只吃了一个馒头，一碗粥，怎么能抬得过她呢？杨玉华是病人，家里很困难。罗云英每月拿一百三十多块钱，杨玉华每月四十多块钱，当然吃不过她，怎么能干得过她呢？”

老陈说：“杨玉华有病谁都知道，月经病害了多少年，经常流血不止，罗云英当然知道小杨不能干重活。唉！这种事，咱们现在又不好说……”

早饭后我们都上班走了，中午回来，见杨玉华坐下擦眼泪。罗云英叫道：“杨玉华，快去吃饭，下午咱们下河捞水浮莲。要不，猪就断食了。”

晚上我们下班回来，杨玉华坐在院子里发呆。我望着这可怜的女人，很是同情，她为啥受这种折磨呀？

晚上坐在院里乘凉时，老陈偷偷递给我一瓶防蚊油，我抹了一点，就坐在杨玉华近旁。我问她：“你发什么呆？吃饭嘛！不吃明天怎么干活？”

杨玉华说：“我的胃不好，吃不下。”

“今天干活累了？”

“干也是白干，人家向上汇报，都是她一人干的，没我的份儿。”

“她不是和你一块去的么？”

“人家是当指挥去了。糠，全凭我和刘义抬的。一袋糠七八十斤，

我哪有那么大力气？捞水浮莲，人家不下水，全凭我和刘义下去捞。刘义是壮男人，当然不在乎。可我……月经病又犯了，流血不止……”

“听说这里有中医，你去看看中医，吃些中药吧。”

“我已经买了中药，没时间熬。再说，这么折腾，吃药也不管事。”

正说着，下了一阵暴雨，我们又钻进房里让蚊子咬。刚躺下，罗云英“通通”地回来了。只见她忙着点灯生火，煮了一碗芝麻冰糖水，端上就走。老陈叫住她问：“天这么黑，外面又下着雨，你到哪里去？”

罗云英说：“老樊淋了雨，我怕他感冒，送一碗热汤去。”

罗云英刚出门，老陈起身，坐在我床头，对着我的耳朵说：“看见了吧！这种芝麻冰糖水，从前是给我喝的，现在要给樊再三喝了。”

我也对着她的耳朵说：“你喝了人家的芝麻冰糖水，给人家提了一级。现在樊再三又该给她提级了。”

老陈说：“小心！她住在这个房里，咱们说句什么话，她都去汇报，等着瞧吧，有咱们受的气。”

满屋人都在黑夜里唉声叹气：“真倒霉！”

不要看这个约十六平方米的房间，也是个社会缩影。

## 七 阿姨挨整

我和连部办了交涉，争得了轮休日，该我轮休的那天，正遇上礼拜日，我兴冲冲地跑去看孩子。

我刚要进门，阿姨站在黑呼呼的房门口，冲着我大声喊起来：“你不要再来了，孩子是我的，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事情有点突然，把我惹火了。我也大声说：“我来看孩子，是经过上级批准。如果我的孩子不在这里，我可以不来。”

惹得孩子哭起来，阿姨也哭，我也掉了泪。

怎么回事呢？其中必有缘故。我想了片刻，又大声说：“今天我

不走了，这是最后一次，谁有意见，到上级那里告我去！”

平静下来，我才进屋。原来今天阿姨要给孩子包饺子吃，我既到了，就三个人包吧。赶快吃罢我就走。阿姨和孩子送我出了村，阿姨哭着说：“上次你来后，他们好整我呀！开了家属大会，批判我，说我和你划不清界限，你来了还给你做饭吃。还有人提出：‘谁让李建彤来的？要查后台！’她们还指着骂我：‘你是个什么贫农？要真是贫农，就不会跟她们家的人在一块儿。应当再查查你的成分！……’现在我去买菜，都有人跟着。我现在也成了斗争对象，监视对象。”

我火了：“这是谁捣的鬼？”

“是隔壁那家汇报的，他们住在这里是有任务的。”

“原来人家给你们派了特务，真卑鄙！不知是谁干的？”

我想了想说：“你告诉她们，叫他们找我的机关调查。我从北京起身时，项目组就批准了，到江西后我可以看孩子。他们如果有意见，告到北京去！等北京回了话，叫他们通知我。不要在家属中制造混乱。”

我把阿姨和孩子都打发回去后，一个人又向前走去。我的脑子很乱，主要是心疼孩子和阿姨。原以为，我来了对她们会好些，孩子能见上妈妈，总是个温暖和安慰，没想到到给她们惹下大祸。

索拉这孩子从小学四年级，就碰上“文化大革命”，没能好好读书了。到念初中的时候，刚上一年，又遇上北京疏散人口，被赶到山里劳动。妈妈到了跟前，却又不让见面。

这次我来看孩子，本来还有个打算：我从北京带了本“提审记录”，就是项目人员提审我时，我自己做的记录。临来时他们要我交出来，我只交了一本，还留了个复制本，本来在我贴身内衣里装着，现在劳动，汗水太多，只得放在枕头里，可我宿舍里住着罗云英这种人，怕她偷翻我的东西，我便带出来，想放在阿姨这里。现在偏遇上这个情况，这里是不能放了。她这里的特务很猖狂，可这本东西，对我非常

重要，它是康生之流倒行逆施的纪录。我将来要用它揭露、审判他们，若没了这个本子我就空口无凭了。这个凭证是铁证，因为还有同样的一本放在项目档案里，到时两本一对证，不就真相大白了。

我沿着路查看，看看有没有可以埋藏东西的地方，路两旁全是稻田。况且，这里经常下雨，决不能埋在潮湿的地方。走着走着，我猛然记起，前些日子有人给我捎了句话，说外甥女随丈夫到了附近的新干县，在化工厂工作。我一想，这外甥女儿还是可靠的，她是景范亲妹妹的女儿。1960年我去延安采访时，把她带出来学习中医，在西安结婚。现在随丈夫到化工厂医务室当医生，托她办事，万无一失。

我连忙向东走。到水边镇搭上长途汽车，到新干县找到化工厂，打听到外甥女儿，时间已晚，也没敢多说，只简单地说了个情况，把缝好的小布包交给她，说：“谁也不许看，请保存好，到时候我来取。”

急忙赶回峡江县，可是已经赶不上长途车了。回去有40多里路，我就徒步走，像竞走一样往回赶。

我边走边看，我把路旁的每个村、每块稻田都观察了。这里的田埋太窄，上粪，出粮食，只能用人力担，不能用大车运，大腹便便的孕妇也挑着担子在运粮。

## 八 养猪遭陷害

这里的“五七战士”，每到逢年过节，都要集合在一起听报告。由于我不是“五七战士”，只是个劳改对象。所以，我就成了猪圈里的长期值班人。不过，也没什么难的，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别人不愿干的我也去干。

每天沿着独木桥，到泉水塘挑几担水，打一筐猪草，剁几筐菜，搅拌在一起，便能做几十斤糖化饲料。再从猪圈内挖出几筐猪粪，然后一边喂猪，一边看医书，为病猪治病。平常，这是三个人干的活，

到了节假日，我一个人也得干。

猪圈还需要扩大，修短墙，需要大家去搬砖。我白天做的活多，没时间搬砖，到了晚上，等猪睡了，我再去干。我的眼睛不好，得用手电，我在胳肢窝里夹个手电照路、用双手去抱砖，来回走几趟，晚上干几个钟头，能顶有些人一天搬的数量。有一天晚上，我正搬砖，樊再三来了：“哟，你一个人晚上来干活呀？小心，这里有狼。”

“狼不敢来，我有手电。”

我心想，干什么事我也得压倒你们！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不要误会了，这不是有意表现积极，更不是向你们讨好。

总之，不管是我一人值班，还是和人一块值班，我都把全部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起早贪黑地干，全当没有他们这些人。既来之，则安之。把这点时间和精力全用上，才不愧来这里走一遭，见世面嘛！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每次养猪班开分工会，谁都愿意和我这个“反党分子”一块值班。连那个聪明能干，身强力壮的李正，也提出要和我一块值班。

有个礼拜天，我和李正一块值班。他还没到位，我就把水都担好了，饲料也做好了。他来一看，满脸乐滋滋地说：“好！今天这样吧，猪圈里的活，你全包了。我干另一件事，给猪圈做个地板，免得进来两脚泥。”

我当然同意，自从到猪圈工作后，我从未脱过雨鞋。不管天冷天热，雨天晴天，总是两脚泥水，两脚猪粪，我计算了一下，自从来江西后，一共穿烂了四双雨鞋，全是从阿姨处拿来的孩子穿过的鞋。特别是我穿上儿子的鞋，简直像两支小船，晃晃荡荡地走不成路，不得不在里面套上一双布鞋。

李正用小车推来些木料，搭个架子，拉起大锯。我见他穿着绿色军裤，顺便问道：“你从哪个部队来的？”

他笑笑，答道：“我是俘虏兵。解放战争时过来的，当过营级干部。”

他又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在地下室写过一首打油诗，是批评领导上不给专政对象吃饺子的事？”

“我写过，被他们收去交给了中央项目组，上边又派人来审了我。”

他笑了：“哼！审你归审你，实际上是他们做得不对，你的诗拿到革委会后，李主任（军代表，革委会主任）发了脾气。他说：‘过个春节，你们都吃饺子，不给地下室关押的人吃，叫李建彤写诗骂出去，好听吗？’”

这倒是个新情况，我还以为，他们只提审我，而对这些人毫无触动呢。

值了一天班，李正高高兴兴做成了地板，往猪圈里一放，大受表扬，都说他值班值得有成绩，做了件大好事。

谁和我一块值班，谁能沾到这个便宜。除了陈立贞，朱效成几位老人外，都尝过这个甜头。罗云英提出：凡是她休息时，就派我去替她值班。因为她是正班长，不和大伙一块值班，只管两三头小猪，单独一个小猪圈。

于是，每个礼拜我替她值一次班，成了固定的工作安排。这家伙可真猾，她在一个礼拜之内，根本不打扫猪圈，单等我去替她打扫。有一次，我作了个记录，这一天，我出了十五筐粪，抱出十来捆湿草。这说明，她每天只给猪一点食吃，其它什么也没干。这是个典型的两面派，表面看就数她积极，实际上她在糊弄工作，那两头小猪，就是日夜吃睡在粪里，哪有不生病的？可是她，却装得好漂亮，到哪个圈都抱起小猪，往怀里一搂，就跑到连部去了：“看！我们的小猪多好，我特别爱他们！”



樊再三就表扬她，说：“看人家老罗，把猪当儿子看呢，这就说明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有多么高！”

罗云英以为，叫我去当垫背的，她的事情不会暴露，因为我是“专政对象”，谅我也不敢说出去，说了也没人听。可是她也不傻，发现我回来后在做记录，便问：“你做什么？”我说“计算时间。”其实我是在积累素材。

有一天，我正在大猪圈值班，低头剁菜，樊再三来找我，进圈就问：“这两天谁在值班？”我说：“我！我每天都在。”

“谁做的饲料？”

“我，都是我做的。”

他伸出手给我看看说：“猪食槽里为什么有玻璃？”

我一看，是一块枣核大的三角形玻璃。我想起了：我去担水回来时，罗云英进来过，匆匆忙忙就走了。我说：“这是老罗给你送的吧？是在这个猪食槽里捡的？咱们看看槽里还有没有？”

我拿起木棍搅来搅去，一面是要给老樊看，一面是怕罗云英给我栽脏，往食槽里放玻璃碴。搅了好大一阵，也没找到。

樊再三说：“老罗说，她是从猪嘴里抠出来的，猪吃了玻璃碴就会死的。”

呵！我明白了，她们要制造一桩反革命破坏案。我心里一沉，便说：“你看看，我这猪圈扫得多么干净，做饲料的地方，连一根草也没有，哪来的玻璃？”

我又指指远处说：“那边房子有一块玻璃被风吹得碰坏了，窗下掉有玻璃碴。距这里有半里远。咱们把猪赶去试试，看猪吞不吞玻璃碴？”

樊再三往那边赶猪，猪甩着尾巴只管吃食，就是不走。樊再三无法，看看我，再看看他手上的玻璃。我说：“把你手上的玻璃放下，

看猪吃不吃？”

他放在地上，踢了踢小猪，小猪扭头走了。我说：“瞧，猪也很聪明，这种东西它是不吃的。食槽里如有不能下肚的菜，它都拱出槽外，别说是玻璃，连木头它也不吃。老罗咋能从猪嘴里抠出玻璃碴呢？是她给猪塞进嘴里的，还是别人塞进去的？这可是个案子，请你好好调查清楚吧！”

樊再三站了一阵子，红着脸走了。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罗云英真坏，还想制造假案，但却弄巧成拙。不过，她一定不会罢休，还不知要耍什么花招呢！

我暗想，对这种人，我决不轻饶，不要看我背着个“反党分子”的包袱。对付这种人，也决不手软！

## 九 中央项目组追来了

又遇上我的轮休日。我不由自主地跑到犁田村。

自那次和阿姨谈好不再去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可我还是想去，有孩子吸引着，我能不去么。

上次回来，我找过连部负责人许忠。提出在犁田家属中发生的事，为什么要制造家属斗家属的空气？希望他能向上级反映、解决。也不知解决了没有？我只管往那边走，走到村口，我又停下了，害怕又惹得孩子哭一场。我在村口呆呆地站了半小时，向村里望了又望，考虑再三，终于咬了咬牙，又向前走去，一直走到水边圩。唉，索性看看集市算了。

集上还真热闹，有小饭馆、杂货店、综合修理部、邮政局、卫生院、长途汽车站。还有许多农民带来的商品：小猪、鸡、鸭、芝麻、鸡蛋、青菜、芋头……很多很多，特别是鸡蛋。卖东西的大都是妇女，还有卖香油的。我问老太太：“你们这里很少种芝麻，香油不多，为

什么拿出来卖呀？”老太太说：“莫得办法，要用钱呵！”

“鸡蛋呢？你们自己也不吃？”

“不吃，舍不得！”

这里的农民很辛苦，劳动重，收入少。据说，有些生产队的工分值每天只有两三角钱。我只买了一斤黑芝麻，就回去了。

从水边埭走到我们的工地，有八里多路。我嫌浪费时间，一边走路一边看书。走着走着，到家时已经中午。迎面碰上副班长李玄子，他绷着脸说：“你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休息，赶集去了。”

“以后不许你离开工地！”

“我这点自由是经上级批准的，怎么又要收回去？发生了什么事？”

“中央来了人，到处找你，找不着。你赶快去，他们在第三排房子等你。”

我估计他们还会来找我，到底是来了，大概是向康生交不了差。我那些所谓的“交代”，在我来说，基本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说，不合康生的要求。而且最后一次，基本上是反驳。康生是决不会善罢罢休的。当初，康生、阎红彦之流，都是在这个案子上立下汗马之功的，如果定不了案，就无法向中央写报告，无法处理那些被捕抓起来的人。

果然，还是“通天政委”带着两个人来了。其中有个女的，山东口音。

“通天政委”向我打招呼：“在这里怎么样？”

“我这个人，到哪里都一样，过得很好！”

“现在中午了，吃罢饭咱们再谈吧！”

“我说呢，今天的空气特别紧张，原来是你们来了。刚才我们副

班长宣布，不准我再离开工地。既然你们来了，就先给我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我到底能不能离开工地？有没有轮休日？能不能看孩子？这些问题，在别人身上，也许都不是问题，但在我身上，却成了大问题，请你们决定一下，向这里交代清楚。你们代表中央，虽然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也可顶一千句吧！”

“通天政委”满脸通红，说道：“你对我们的态度总是这样，话中总是带刺。实话对你说，大概是因为我们来了，一时找不到你，他们急了。”

“急了也不能随口出政策呀！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对我就不讲政策了？”

在北京我和他打了两年交道，他是个康生意志的坚决执行者。

我们的副班长李玄子，倒是个好人，是个正派的复转军人，就是胆子小了一些，随口说出那句话。我是利用这件事向“通天政委”提出一种警告。

下午开始谈，还是和在北京一样，要写出符合他们要求的交代。还是那些问题，习仲勋、刘景范在“反党小说”中起些什么作用？

我们又展开了拉锯战。他们说，我解释、反驳，或者我写，他们改。他们写我抹掉。弄来弄去还是那些问题，讨价还价，又写了个能打发他们走的东西。

我提出个核心问题：“这本书的要害，不就是高岗问题么？我的最后稿中没有高岗的材料，这又算什么问题呢？岂不成了假案子？再重复一遍：你们去查查《毛选》，在一九六四年以前的《毛选》上还写着高岗。一九六四年以后，才把高岗抹掉了。一九六二年提审我时，我就说过按《毛选》办事，《毛选》上有谁，我就用谁的材料，《毛选》改了，我也改。这有什么错呢？”

“通天政委”说：“你老是这样绕着圈子缠。我们不说《毛选》，

单说你的书。”

“那就没有标准了，每个国家办事，都有个标准，我们国家以往办事，都以《毛选》作标准，现在怎么能把这个标准丢开呢？”

“谁说不按《毛选》作标准？现在是解决你的问题。”

“解决我的问题就不要标准了？”

接着我又说：“我再说个情况，从前我不好说，现在索性摊出来吧！五十年代，在南方，可能是在南宁，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主席讲话说‘高岗过去还是对的，延安时我还是听他的多。’我听过传达。这都是我用了高岗那些材料的根据。”

山东女将插了话：“如果真有这个讲话，那又另当别论，我们回去查查看。”

他们什么材料也没看过，什么也不记得。怎么能审这么大的案子呢？看问题连个标准也没看，底是浪费时间。

我又提个老问题：“关汉卿写《窦娥冤》，权臣命他修改，他坚决不改，就被流放了，如果他照权臣的意见改了，不是就不会流放了吗？我是早已改了的，小说的最初稿和最后稿不一样，这案子也该改判了吧？”

女将又插了嘴：“因为你从前是共产党员，应当改！”那么，我现在不是共产党员，就可以不必改了？

“这么说，你们是看过我的最后稿子了。我改了之后，反而不是共产党员了？假如我坚持不改呢？”

这是什么逻辑？说我把高岗的材料改掉，我就是共产党员。但是，目前呢？我已把高岗的材料抹掉七年了，你们还在审我，反而偷偷开除了我的党籍。他们究竟企图达到什么目的？

女将还说：“你的书，为什么不可以改成革命小说？”

其实，我写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小说，他们硬说是“反党小说”。

我只得顺水推舟，我说：“现在把稿子拿来，我改给你们看。咱们商量着改，不出三天，就能改完！”

女将又缩了回去。“通天政委”装聋作哑。他们的目的根本不在小说，而是他们借口整的那些人。

就这么着，拉踞拉了三天，把我写的东西又拿走了。估计他们还是交不了差。因为，按他们的要求，那“交代”并不理想。回去后，还得再来。国家的钱，就是这么花掉的。

他们走后的另一个礼拜天，我的副班长又通知我：“还是允许你轮休日外出。允许你看孩子。”

他们走后，我又去看孩子，走在路上，我心里念叨说：“孩子、孩子，你可知道，妈妈来看你的权力，也是经过斗争才得到的。真是好难哟！”

## 十 遭雷击

几个月了，我都是和朱效成一块值班。他当过我们地科院的院长，在地下囚室锁着的时候，他的职位最高。

老朱已经六十七、八岁，往七十岁上奔的人了。还和我们一样，担水、出粪、喂猪、打草，什么都干。谁无恻隐之心？

按资历说，老朱是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现在是行政八级干部。可现在他活得如此可怜。

老朱是山西五台山人，他长得还真像鲁智深那么健壮。他有个优点，能吃能睡。一坐下开会，他就睡着了，饭量比我大两倍，所以，他老伴总是给他寄来很多粮票。他也有钱买，他的新单位已经把他“解放”了。给他发了全部工资。

他的新单位在西安，他是“文化大革命”之前调到陕西工作的，“文革”中又把他揪回来斗。他的问题不在西安的新单位，新单位没

有人揪他，因此，那里先解冻了他的工资。

老朱是个好老头儿。谁有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他从不出卖人。谁有难处，他就帮助谁。可是这里有一部分人，总要反对他，把他当成“走资派”来整治。罗云英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她像使唤奴隶一样，随便把老朱吼来吼去。而老朱却不在乎，站起就去干。谁让碰上这个小人得志的年代呢！

老朱对我特别照顾，凡遇上别人对我无理批判，他会后便安慰说：“不要理他们，也不要放在心上，有些人什么也不懂，跟他们说不清。”

他自己心里也放得开，一九六七年正对他揪斗，管制时，他瞅空就找工人们下象棋。工人们也乐意和他下棋，都觉得他是个好老头儿。

我和老朱相处两、三年了，知根知底，我们在工作中配合得很好。有一阵子，猪圈分成两大摊，一部分人分到南边新盖的大圈工作，我们俩只管这个中等圈。我剁菜做饲料，他提水、扫圈、喂猪。

有两个三、四十斤的小猪病了。我们给病猪开了小灶，做了细饲料。把病猪吆呵到饲料棚里受优待，亲眼看着它们吃。我还给猪做了大蒜炒马齿苋的药汤。老朱闻着味儿说：“真香，人也可以吃了。”我说：“是呀，我从书上看到的，这两种东西可以治结核病，是补养品。对人也有好处。”

“噢！难怪你在附近种了马齿苋，原来是要给猪治病。”

“这块工地上就找不到马齿苋，我跑到曙光村掐了一些，回来栽上，都活了。很快发展成一大片。这里的老百姓管它叫‘大叶死不了’。”

天阴下来，一时风雨交加，我和老朱出去看了马齿苋，又进了饲料棚。老朱坐在小板凳上，我坐在木柴堆上，面前放个大洋铁盆，盆里盛着细饲料大米稀饭煮青菜。两个受优待的小猪，在我们面前钻来钻去，然后摇着尾巴，伸着头，各霸一方，“嚓嚓嚓嚓”地吞起来。

看它们吃得好香，老朱说：“好了！照这么吃法，很快就能壮起来！”

“人怕出名猪怕壮，猪一壮起来，就糟了。我真舍不得它们。”  
眼看着，雨下大了。

老朱哈哈笑着：“人家都说咱们连的老人太爱猪。咱们圈里生下头一个小花猪，长大临宰杀时，有的同志还难过哩。军代表说，第七连的老年人太重感情，把小花猪当成了人。”

“说实话‘小花’被宰的那天，我没有到食堂买肉吃。我吃不下……”

我俩正说笑话，忽听“卡嚓”一声，天上一闪，我和老朱忽然同时向两个方向倒下。在一刹那间，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是死了？还是晕了？我全无知觉。

忽听老朱叫道：“猪怎么啦？”

我一睁眼，才觉得我已倒在木柴上，忙站起来。老朱也是刚从地上爬起来。我一看两条小猪伸腿躺着，好像是死了。我吓坏了，又出了事故，怎么交代？我忙叫：“老朱，快去报告，小猪死了。”

老朱站起先往圈里跑，一查看，靠棚子圈里也死了两头猪。

雨稍停，老朱跑到连部，跑到校部，报告说：“死了四头猪。”

一时间，来了不少人，七嘴八舌议论开了：“雷击了？”

他们查看棚顶，上面有块铁板。棚里放有铁盆，都是传电的，是引起雷击的东西。再看我和老朱的脚：“噢！你们穿的胶鞋，绝缘的，如不是这胶鞋，你们俩也完了。”

一时，这新闻传遍了工地：“老朱和李建彤差点儿被雷击死！”

我这才醒悟过来，我是捡了一条命。倘若如此丧命，我会死不瞑目的。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没有人能代替我。我内心真有点后怕，不是惜命，是可惜我的心愿还没完成，是可惜许多同志还没能翻案，他们还在受难。我的命运，是和几万条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我，



谁也说不清楚。

老朱那时还住在曙光村，早来晚归。

第二天照常上班，老朱一进饲料棚，便对我说：“昨天下午没被雷击死，晚上回去还开了个对我的批判会。”

我有些不平：“为什么？要是在从前，你这么大年纪，挨了雷击，还不知怎么慰问你呢。如今还要挨斗，连点人性也不通！”

老朱说：“要想斗谁，啥时候也能斗，啥理由也能找。他们把我买的东​​西拿出来，开个展览会。无非是些炼乳、点心，水果之类的东西。说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这里摆阔气，摆老革命架子。”

这么大年纪，每天干活很累。吃点炼乳、点心，水果之类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他是用工资买来的，又不是贪污的。比一比么，罗云英才四十九岁，壮得像头牛，每天还要吃十种补品，谁又去检查过她？给她开过展览会？批判过她？她是什么人？老朱可是个老革命，就是因为不会给现在的领导逢迎拍马。他们俩待遇就不一样。

自从我们被雷击之后，关于雷击的事，就传得多了：距这里几里路的某某干校，也被雷击死条牛。大树下雷击死一个农民……有人说，这块地区，本来就是雷击区，是血丝虫病区，还有麻疯病。

有人背后骂道：“就是那些军代表，坚决执行上边的命令，急着找地方，把这些人打发出北京。随便找块荒地，就安营扎寨。人家已经反映过，这里是雷击区、麻疯区。他们还是要在​​这里建立干校。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把自己家属搬来？”

对这些事，我半句不议论。可是麻疯病，我倒见过一个。在水边街有个修雨鞋的老头子，瞎着一支眼。我上个月去修雨鞋，他还在，以后再​​去，就不见了。街上的人说，他的麻疯病严重，送到医院去了。

血丝虫病，也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那位连长，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傅，刚来时，是个精干小伙子。到天热，他穿着短裤，他的

腿就逐渐粗起来，而且越粗走路越慢。据说是大腿根儿的淋巴肿了起来。

听说卫生部已派人来，到处检查血丝虫，我们都被半夜叫起来抽过耳血。

我心事重重：这么多女孩子怎么办？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大群呀！

## 十一 患疟疾病

雷击没有死，我又打起了摆子。这是在雷击的几天之后。

有一天，我在“鸭棚”院里参加连部召开的全体人员大会，是布置任务，要求提高劳动效率。

八、九月间的江西，天气正热。大家都是穿的短裤短袖，有的甚至光着脊梁，还不住地擦汗，都往凉快地方坐。可是我坐着坐着，冷得发起抖来。忙把小竹椅搬到日光曝晒处，可还是冷。陈立贞走过来问：“你为啥晒太阳？”

我说：“冷！”

“是不是发烧哟？”

“不知道！”

陈立贞忙去找指导员樊再三，批准我去医务所看病。

医务所，就设在工地第二排房的西侧。韩大夫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大夫，他一诊断，便确定是疟疾，马上开了药，开了休假条。

护士李青也很认真，她把药取出，向我解说如何吃法，并说这次吃好后，过个时候还得吃，以免再犯。

我拿了药，回宿舍吃了，便盖着被子躺下。人们都说疟疾是蚊子传染的。

病倒之后，自己在枕头上听心脏蹦蹦地跳声。心脏很弱，全身不舒服，可我神志是清醒的。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大夫和护士们。韩大夫，

是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在这个机关工作二十来年了，医道很高。从我被关押起，就是他给我看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严肃地贯彻着医务人员的人道主义精神，给我这个“反党分子”看病，也一视同仁，从未歧视过。他给我用的药，都是好的。他希望我能快好，他能意识到，病对我是多么大的威胁。

护士李青，也是个难得的好人。她原籍张家口，说的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中等个儿，头发向一边偏梳着，使她的鸭蛋脸更显得年轻、秀气。正因为她纯净，无更多的私心杂念，才能大胆地为我设想。她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心脏不好，心律不齐，劳动时注意些。重活不要用左手干，要减轻左边的负担。”一进入夏天，她怕我干活多，会使血压升高。就开始给我吃“脑立清”，吃过两瓶之后，又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好。”她说：“那就留给你吃吧。”

自从吃过“脑立清”之后，我的血压一直正常，80~120，因此劳动得很妥当。韩大夫和护士李青，都和我素不相识，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想着想着，我胡涂了。高烧到四十度，顶不住了。也不知是睡了过去，还是晕了过去，什么也不清楚了。忽觉有人揭开蚊帐推我，睁眼一看，是张霞，她给我端来一碗大米稀饭，关心地说：“少喝几口吧，不吃饭，抗不过病。”我只得侧身，喝了几口，又让她拿走了。

我昏睡着，副班长李玄子在门口叫道：“李建彤，你打摆子了？你好好治病休息吧！连部批准了，你的工作暂由别人代替。连部还批准你吃病号饭。”

我明白，这是支部书记许忠批准的。前几天，我在“鸭棚”西头做糖化饲料，“鸭棚”东头说的话我全部听见了。“鸭棚”这个称呼，来源于当初在里边养过鸭子。后来鸭子全死了，就用半截墙隔成两个屋，一头做糖化饲料间，一头是连部办公室。领导人就住在里边，说

起话来，像在一个房里一样，听得清清楚楚。

我曾听见党小组长宣布过：凡是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共产党员，都要按时向小组或支部做汇报。

我听说过连长小傅的汇报。小傅说：“听罗云英反映，李建彤劳动不积极，有点消极怠工。”

让着是支部书记许忠发表的议论：“你们对老年人的劳动怎么看法？应当公正。她也是上五十的人了。她一个人，每天做几十斤糖化饲料，都说她做得最好，干净，有香味儿。她还喂猪，哪个年轻人能顶上她那么踏实？她患着严重的失眠症，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你们看看她的脸，黄得像死人一样。可她白天照样干活，我们应当全面看问题……”

我真感谢许忠，他这么正派。能这样客观地分析情况。看来他是能够顶住干校里的歪风邪气的。他是河北省人，约四十多岁，是部队上下来的转业干部。他什么活都会干，砌墙、垒灶，干得又好又快。说话时，从来不大声嚷嚷。

难中见人心。病倒几天，真亏了大家的照顾。杨玉华每天给我送开水，陈立贞为我带饭，她借带饭的机会，把她为孩子们做的鸡汤，也偷偷给我送进蚊帐里。

过了几天，病已大好。李青又大声嚷嚷着来了：“罗云英、李玄子，我给你们有病号听诊来了！”

她的声音能传出去一里多地。她这一招，别人拿她没办法。只要穿上白大褂，拿上听诊器，她有权去看任何人。况且，当时有个习惯，老护士有处方权，她可以代医生开药，开假条。

李青揭开我的蚊帐，摸摸脉，又听听心脏，量量血压。大声叫道：“罗云英，李建彤的心律不齐，可不敢多动。多养几天吧，这玩意儿一累就犯。”

她顺手开了个条子：“心律不齐，待查，休息三天。”给我放在枕边，又取药去了。

我心想，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心眼。她既向罗云英嚷了出来，罗就在这个房中，却不把病假条递给她，而是塞在我枕边。这是叫我直接交给李玄子，李玄子老实，他会交给连部，她怕罗云英捣什么鬼。罗云英的坏，是全干校出了名的。

李青刚走，十一岁的女孩儿赵小英到了我枕边，悄悄塞进一个橘子：“李阿姨，吃吧！”

我在这里有几个称呼：批判，审问时，直呼“李建彤！”；一般不敢接近的人叫“老太太”，“老太婆”；没有人时，有人亲切地叫“老李”。

“李阿姨！”这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才敢叫出口。今天小英叫出来，使我心中很是激动，看见那娇嫩的小脸，心里实在疼爱。这么好的孩子，弄到这里干什么呀？难道他们没有念书的权利么？我叫住她说：“小英，过几天我好了，教你唱歌吧。那天，你在院子里和三宝、四贝一块儿唱，我听见了。你的嗓子最好。”

孩子趴在我床上哭起来。我也滴下泪珠。

我实在爱这孩子。形象这么好，嗓音这么好，处境却这么坏。根据我的判断，这孩子可以学音乐、舞蹈或戏剧。可惜她妈妈不是搞这类工作的，是一位老会计。我还可以教，因为我常出去打猪草，在山野里唱歌，嗓子尚未坏。我估计，晚上乘凉时可以教教她。但是，罗云英不会让我这样干。

## 十二 何长工

病好后，我上正常班。干校派我们养猪班去参观地质部“五七干校”的猪圈。

我们走了二里多路，在一个村子里参观了地质部干校的猪圈。他们的圈大猪多。然后又参观饲料间，这饲料间又高又大，我们的简直无法比。我站在饲料间的窗前发了呆。

我从窗户看着眼前的剁菜人：赤裸着上身，只穿条蓝布裤叉。瘦得皮包着骨、像是个骷髅。在那人面前，地上平放着一个单人床大小的木板，木板上有许多水浮莲（猪草）和烂白菜之类的东西。那人双膝跪在地上，双手握两把菜刀。弯着腰，低下头，双手舞动菜刀，背后的肩甲骨不停地抽动着，“砰砰砰”剁个不停。随着他的头一点一点，板上的菜一堆一堆地变碎。

剁了一阵，他站起来，把碎菜搓进筐里，放在一边，又跪下继续剁。

当他站起来放菜时，我仔细观察了他的侧面。心里猛地一颤：那不是地质部的党组书记何长工么？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从前，他是位高大的胖子，现在竟变成了骷髅。他吃不饱么？他生了病么？生了病为什么不休息？吃不饱咋能干活？

遭孽呀！要知道，他可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而且还是个瘸子。

1967年我被关在北京地质学院第十二楼。有一天，造反派学生通知我：“今天不许你出楼门，院子里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许动。”我当然不动，只是站在房内的窗前向外望。

下午两三点钟，敲锣和吆喝的人群由远而近。我伏窗遥望。当人群走近我所在的窗下时，看见有人在前边打着红旗，后边队伍里的第一个人，提个铜锣自己敲一下，叫一声。“我叫XXX，我是三反分子！”第二个人也是敲一下锣，叫一声：“我叫何长工，我是反革命分子！”第三人也敲着锣叫道：“我是地质部的副部长邹家尤，我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

队伍两边是押送的学生，后边跟的也是押送人群。队伍到了十二楼门口，审判台就在那里。只听人声大叫：

“把 XXX 押上来！”

“把何长工押上来！……”

“把邹家尤押上来！……”

然后就是数不清的声音在吼叫，不时还有人用手推搡或拳打脚踢。

自从被点名之后，何长工就成了地质系统的重点斗争对象。各派群众都拉着他到各处去斗争，今天在东城，明天到西城，今天在北京斗，明天拉到通县斗。近七十岁的人了，风里、雨里、日晒、雨淋，他都得去挨斗。一些坏人专门去踢他那条带伤的腿。那条伤腿，是敌人的枪弹打伤的，是革命的印记。无论如何，他是红军的将军，为什么这样对待他？

眼前，我看着骷髅似的何长工老人，内心何等酸楚！我不能叫他，不能上前和他说点什么。在北京，人家曾怀疑过他支持我写“反党小说”。其实，那都是“欲加之罪。”

我默默地，对着他的脊背祝愿他：千万不要在这里病倒！你是一位正派的老人，国家和群众都需要你，希望你能健康。

这里有什么好猪我也不愿看了。人瘦成这个样子，猪再肥又有什么用？

我气冲冲地往回走。眼前晃动着瘦弱的脊背，跪下弯腰、双手挥刀，点着头在剁菜。可怜的老人，你在为谁卖命？

陈立贞走在我旁边。她试探着问：“你看见没有？那个跪着的是何长工！”

“我没看见！”

陈立贞真是个好心人，她悄声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瘦？”

“不知道。”

“他吃不饱呀，劳动量这么重，人家都有补助粮，就是不给他补助。活重，饭食差，他肚子饿。有一天，他在伙房捡了一块锅巴，正在井边吃着，有个红人看见了，劈脸问道：为什么吃锅巴？他说：我吃不饱，肚子饿。那人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你还有资格吃？’把锅巴连碗都打掉，落进水井里……”

呵！我才明白，原来何长工是饿瘦的，饿得这么惨，瘦得这么吓人。唉！当初，他参加革命，又到国外勤工俭学，回国又参加红军，在井冈山和敌人进行战斗，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人民要翻身，有饭吃。闹了四五十年，他却成了个只穿一条裤叉，饿着肚子干活的人，一个连锅巴也不许吃的人。这是谁在支使？他们为啥要虐待老红军？为啥虐待红军中的老将军？

何长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他家中无土地，城市无房子。他只是个拿国家工资的行政五级干部。孩子多，还有其它亲属，全家一二十口人，靠他的工资生活，每月勉强够吃。炊事员说：每天菜一上桌，孩子们一抢而光。老头子来了，只能吃白饭。文革后，他住的房子，又被国家经委一位副主任强占去了。人家有后台，没有被打倒，可以到处挑选着占房，占过何长工的永祥里，又占马文瑞的刘海胡同。被打倒的“走资派”们，已经没有固定的窝儿。这怎么能叫“走资派”呢？

那么，“走资派”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纲领呢？谁也没有看见。抄家、夺权，都没有搜出什么“纲领”来。这算什么走资派？

我的思想，从何长工身上，转向我的老伴儿：他在北京坐了牢倒好，否则，也得到这个地方来，和何长工同样受折磨。他有肝炎，有十二指肠溃疡，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不定会死在这里。太惨了！四十年前，哪想到四十年后的这个下场！

猪呀！猪呀！你们是被上边保护着的。还有个中央文件：关于养



猪的决定。说你们的用处大。可这些老红军，老将军、老知识分子，是没有人保护的呀！死了也不算什么。如今猪命胜过人命！

过几天，地质部猪圈里又传来何长工的消息：老头子病了，尿血，危险！送进了医院。

为何长工的事，我心中异常不安，胸前像压块石头。也许有人说他曾有过什么失误，可谁没有过失误？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据我的观察他是个正派人，实心实意的人。

1962年我被阎红彦诬告，毛泽东主席说我写“反党小说”。那阵子闪电雷鸣的，乌云压顶，谁还敢为我说一句话？可何长工竟然敢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李建彤说，她没有写高岗。”别人就攻击他：“李建彤是‘抗大’的学生，你是他的大队长，你就包庇她！”

何长工确实找我谈过话，是在西城永祥里他的家里，他说：“中央要我找你谈话，说你的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主席还说了话的。你得有个检讨才行。”

我说：“我没有写高岗，更谈不上翻案。”

晚上，我老伴儿回来告诉我：何长工对他说：“虽然事情发生了、现在也没得办法。你是职业革命者，你的一生都属于这个队伍。放心，地质部不会落井下石。还有李建彤，她也是把一生交给了革命。放心，就在地质部养着她。哪里也不要……”

老人的话，使人那么踏实，觉得虽然前门有强盗，后院儿却还不会起火。

在我这一生中，我将永远记住何长工老人。在紧要关头，他不用“左”倾吓唬人，他不搬弄教条充“好人”，也不讨好哪位大人物，这种品德实在难得。但这也恰恰是他倒霉的原因。

### 十三 小女儿回京了

到底等来了这一天，阿姨找我来了。

她先到连部，说明要找李建彤。经过连部批准，才到猪圈找我。这是她被逼出来的办事经验。

我撂下猪食，跟她走到大路上。她告诉我有人给她透了消息，凡是北京来的中学生，都可回北京复学。

我有点不相信，问她：“可当真？看见谁家的孩子走了？”

她擦着泪说：“已经走了好多，就是不通知咱们。听说中央有文件说：原在北京念书的中学生，可以回去上学。父母有错误是父母的事，不能让孩子替父母劳动赎罪。”

“这个通知还满英明的！该是睁开眼，醒一醒的时候了。”

我们俩在土路上走着，都在苦思着。阿姨托着有病的身体，像要被风刮倒似的，双脚烂得没有一块好肉。她没到过南方，不服水土，蚊子一咬，就变成水泡儿，流水，化浓，溃烂。从脚到腿上，用什么药也治不好。她是再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也应该赶快回去。依我想，最好她和孩子一块儿走。

阿姨想问题比我精细，周到。她说：“我先跑到校部直接问他们，就说我听到了通知，要求也让我们孩子回北京。看他们是啥态度。我先不回去，免得影响孩子走。先把孩子弄走再说。”

她说的也是，如果阿姨也要求走，他们会节外生枝，会借口说，影响了这个，影响了那个。单纯说孩子的事，可以减少麻烦。

我是主张孩子回去的。虽然我几年不见孩子，想她想得发疯，到这里见到她，真不想离开。虽然见面很少，也总算能见面，可我还是主张她走。

我和阿姨反复研究过多少次，我们俩决定，由她出面去办，只办孩子一个人的。只要让孩子走，她可以牺牲，暂时不走。孩子如能走，连东西也可以不带，只带孩子急需的用品，以后用得着的，再给她寄。

免得带东西多了，引起有些人的眼红，瞎怀疑，在背后使坏。

自从我俩决定之后，阿姨就去疏通一个个的关节。也不知过了多少关口，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才把事情办成。一直到把孩子送走，她都没敢来告诉我。我也没敢去看他们，怕坏人唆使家属中的人给她出难题。她是普通群众，好办，一沾上我这个“反党分子”就复杂了。

果然，阿姨去办交涉时，他们来了个变相拒绝。一个校领导居然说：“按政策规定，你的孩子当然可以回去。但是，第一、你们自己找学校。第二、你们自己找住处。公家概不负责。”

这些条件，阿姨全部答应了。

怕他们刁难，事先我已写信给北京的三妹，叫孩子暂住她家。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阿姨心中有数，学校好办。孩子已给她的老师写了信，老师回信说，欢迎她回去。只有房子是个难题，公家不给房子，她三姨家太挤了，五、六口人，住一间半房，怎么挤呢？公家既然要拿房子卡人，三姨家再挤，也只得去挤。这也是无路可走了。

一个月后，孩子走了，阿姨才来找我。她说：“她走了。我把她送到樟树站上了火车，还有个伴儿。”

孩子走后，阿姨高兴了几天。不多日子，她就病倒了。我去看她，她拿出孩子的来信。孩子说，三姨对她好，她和三姨睡一个床，和妈妈、阿姨一样亲。由于她挤进那个家庭，把两个表兄都挤走了。

是呀，孩子需要温暖，她在三姨身上又找到了温暖。真难为她三姨了。

困难见人心。我三妹是个普通护士，经济上比较紧张，可她现在却成了我的大后方。前几年，我的两个大孩子也在她家住过。现在，最小的又去了。不但房子挤，经济上她也承担不起呀！这些人总得吃

饭吧，她还不知欠了多少债呢。

有什么法子呢？只有这一条路了。

患难之中见人心。一位老阿姨——淑敏大姐，一个三妹，真给我帮了大忙。她们处处为我和孩子打算。在这样混乱的社会中，和别人比，我算是幸运的。

#### 十四 书的乐趣与悲哀

阿姨住的犁田村，屋门前有棵老樟树，树根有两搂粗，已经有些倾斜，根部还有个窟窿，那是个白蚂蚁窝。这里的白蚂蚁的能量比老鼠还大，什么地方都能钻。它从树根下顺着地缝，钻进每个房屋。和阿姨住处相连的三户，家中都有了白蚂蚁，而且很凶。据说，这房子的原主人，就是嫌白蚂蚁多才搬走的。

阿姨怕白蚂蚁把书咬坏，让我一包包地往我的住处倒腾。其实，书也没有多少了。都是抄家剩下的。记得有十本《鲁迅全集》、《史记》全套、《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几本古文选。另外，还有一部儿子的连环画《三国演义》。是全套，用布盒装着。

搬书是保不了秘的，这里的人都看见了。对于我来说，有书看，就忘却了一切烦恼，拥有书，就像拥有了一切。我有时看《鲁迅全集》，有时看《史记》，有时研读《列宁主义问题》，并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加以对照。总之，除了上班，睡觉之外，我都在看书。有人感慨地说：“她的眼哪能不坏，走路看书怎么行？”

不久，陈立贞也憋得心痒痒，向我要书看，她不但要借《鲁迅全集》，还要借《联共（布）党史》。我故意开玩笑地问：“你的书呢？”

她说：“都卖了！”

我笑道：“还是个政治部副主任呢，怎么把政治书全卖了？”

“不卖不行呵！人家说书太重，不给我托运，不卖也得丢。八角钱一斤，全当废纸卖了。”

这事我早知道。卖书高潮时，我正关在木笼里，全听到了。政工干部卖政治书，业务干部卖业务书，遍地皆是。好像敌人预定要给北京城扔一颗原子弹一样。有些贵重书，被一些人混水摸鱼地拿走了。

我这几本书，如不是阿姨念过几天书，是个有心人，哪能存下来。最后一次抄家，是怎么抄的，抄成个啥样子，我全然不知。还剩了些什么，我根本无从过问。那时只想，只要人活着，就是万幸！

我看书，老陈也看书，不久，猪圈里就有人通过老陈向我借书，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看书，当然是好事。我们把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全用上了。

有的孩子要借《三国演义》连环画，我就连盒子全交给了孩子的妈妈。孩子也是精神饥渴，就让他们看去吧！谁知我们隔壁房里的人，都被《三国》吸引住了，每天都看到半夜。有位男战士，名叫肖木，是连部里的政治干事。也是每晚必到的《三国》迷，像疯了一样，跟小孩儿抢着看。待到他把书看完了，开全体会时，他叫起了“革命口号”，提出了些“革命问题”。他说：“李建彤在这里宣传黄色书，什么《三国》、《鲁迅全集》，到处传看。影响我们的革命情绪。这些书，必须马上禁止！”

罗云英立即帮腔：“有些人没有立场，不但借李建彤的书，还请她讲《三国》。这明明是在影响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她讲曹操杀人？”

指导员樊再三也说：“看这些书，影响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是五七干校，是要改造思想，看那些书有啥用？只能后退，不能前进！我提议，咱们这里除《毛选》外，什么也不要看了。”他企图把这里变成文化沙漠。

这一阵风，把大家吹傻了。我轻轻敲了两句：“谁敢说《鲁迅全

集》、《三国演义》是黄色书？你们读过《毛选》吗？毛主席的文章中常提到这些书。”

肖木想不到，我这个“反党分子”敢顶撞他，并把他准备再次发的言也堵了回去。不过，他并不服输，到校部告我去了。

有人悄悄骂道：“两面派！看书时，他最积极，现在他又出来告状！”

我打听肖木是什么人？有个病人好心劝我：“你别理他。他是机关前几年招进来的临时工，只念过初中，还没毕业，狗屁不懂，就知道造反。他说他的成分好，是贫农，就要求当造反派小头头。在我们机关里，抄谁的家都有他。”

我问：“他抄过你的家吗？”

那位病号说：“当然抄过。不但抄，还逼着我家老头子，天天去替他老婆扫鸡窝，清垃圾，就差没给他老婆倒尿盆了。他还对我家老头说：‘不要看你是外国留学生，当过我们的副院长。是他妈的什么十级干部。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你什么也不是，只能听我指挥，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我明白了，这就是肖木，文化革命的怪胎。

进入旧历腊月，“五七战士”要回家探亲，每人一个月，轮流回北京。一个月过得很快。过罢春节，有人陆续回来了。我不是“五七战士”，是专政对象，所以没有探亲假。这一阶段，我一个人要干两人的活。因为人走了，猪可没有走。

沈克带回来好消息。他故意在连部门口叫道：“肖木，对你说个新闻：北京正卖好书，你可知都是些啥书？”

肖木说：“我管他是些啥书？”

沈克说：“你不是要抓黄色书么？你去抓吧，北京正印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聊

斋》。这都是中央批准的，说这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我们回来，该你回去探亲了，快回北京去抓黄色书吧！”

沈克是有意说给大家听的，特别是说给肖木和我听的。我听后心里高兴，肖木之流听后有点泄气，再不敢胡说了。

## 十五 我的两个樟木箱

不知经过多少斗争，才允许阿姨回北京。理由嘛，第一、她有病。第二、她不是这个系统的干部，也不算家属，只是一个保姆，有什么理由把她留在江西。所以，院部的掌权者也只得放她走。

阿姨又来找我连部。她说：“我要回北京，李建彤的东西没人管，你们派人去给她运来吧！”

她挺理直气壮，樊再三也把她没办法。她是位阿姨，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况且，她说的话有道理，使人无法驳回。可樊再三把这事交给了肖木，而肖木这个东西却自言自语说：“给反党分子运东西，只能派叛徒、特务去！”

他径直去找老吴。这个老头子，也六十五岁了，脸黄得像蜡打的，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我怎能叫他替我拉箱子呢？按阿姨说的，先把两个大樟木箱子拉过来。其余的交给老表保管。那两个樟木箱子，是老式的。又宽又大，是我们刚进北京时买的，装着全家人的衣服。

我说：“肖木同志，不行，你派个病人去怎么行呢？”

肖木气焰很高：“什么人帮什么人，年轻力壮的，都是五七战士，谁干这个？”

正说着，老吴头儿已经推辆平板车走过来，用东北口音搭了腔：“算啦，我去，我去！”

犁田距我们有六里路，去时是空车，又是下坡路，两人边走边说，不觉远就到了。回来是装了两个大箱子，光那箱子本身的木头就够重

的。老吴头儿推着，我在前边用绳子拉着。一路爬坡，真要把老头子累死。我说：“咱们休息吧，休息够了再走。反正就是这一下午了。”

我真怜惜这老头儿。在关押期间，听说他被整得自杀过，喝了什么毒药，送医院抢救过来了。他原是老牌的东北大学毕业生，在东北军中办过报纸，还是个地下党员。全国解放后，就在地质系统工作，当过地质科学院的副院长。造反的人，硬说他是从东北军中出来的特务。一九七〇年元月，关押的人都放出后，只剩下三个老头子和我。这三个老头子就是：走资派朱效成，里通外国的徐本光，特务分子吴俊如。都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再加上我这个反党分子，算是一个小组。每天上午在一块学习，学习什么？只有学《毛选》，其实，《毛选》读过多少遍，有些地方都背熟了。剩下的时间，就说闲话。

他们都很关心我的老伴儿，常问这问那，表示对我家的同情。我们成了难友，互相都很关心。那时已有了战备疏散的命令，许多人都要离开北京。他们三人准备走，说军代表已下了命令，叫他们马上动身去江西的“五七”干校。那时别人的问题不大，只有徐本光的困难多。他说：“我老婆不走，疯劲儿又上来了。军代表派人去动员她。她说：你怎么不走？我们走了，你们等着抢房子住呀？”谁说她疯，这不挺明白的吗？

那时，凡是轰人走的人都有些仗势。最后，也不知怎么弄的，他们三家都走了。走得比我早了五个月。

我们本来很熟，那时我五十岁，和他们比较，我是年轻的晚辈。

如今，我们俩拉一阵车，坐在路边休息一阵儿。我问：“老吴，你累坏了吧？”他擦着汗说：“这个肖木，真他妈王八蛋！他今天是想整我。不过，给你拉箱子，我乐意来。咱们一同走路，还可以唠唠嗑。”

虽然已是一九七一年的初春，还是冷透骨髓的时候，我们穿着棉



衣，累得满头大汗。我在江西经过几次害病，已瘦得不成样子，只剩下六、七十斤了。穿的棉袄是儿子小学四年级时穿的旧袄。而老吴，是个胖体形，由于心脏病，他有些浮肿。走路不像老徐头那么利索，更不像老朱头那么有力。他的心脏使他走路一步一挪，脚也抬不高，只能在地上蹭着走。我的腿有关节炎。我们俩就在这条路上往前慢慢蹭吧。

走路慢倒也好，能多说话，我知道他的全家都搬来了。他也是个要落户的对象。前几天，他爱人被派到猪圈检烂菜，检了一阵就晕倒了。爱人比他年轻，还不到五十，已经有了严重的心脏病。我问老吴：“你家的人口多么？生活得怎么样？”

“怎么说呢？我犯了错误，生孩子太多，一共九个。”

“噢！这么多孩子，你怎么安排生活？钱够用么？现在发你多少生活费？”

“我是行政十级，爱人是十五级，全部发下是三百元。连保姆，大小十二口。每人合二十多元。前年就扣了工资，开始，每人发十二元生活费，现在发十五元。我们有个病孩子，先天的傻子，如今十八岁了，还要人喂饭，送大小便。从前我们都上班，请个保姆看她，现在没有保姆，我们下班伺候她，我们家的困难大呀！”

我明白了，原来每天下午孩子们逗的那个痴呆儿，就是老吴家的傻姑娘。想起傻姑娘的情景，真是可怜，把这种人弄到干校来能干什么？为什么不把她妈妈留下，在北京照顾她呢？

看来，老吴头不但在政治上有压力，家庭压力也不小。

老吴头也问我的情况：“你们那位部长呢？有消息吗？”

我告诉老吴：“自从他被捕那天起，就再无消息。这个年头，只要能活着，就算是捡了一条命。装作傻子，才能平静。”

老吴头说：“那可是个好人，你们这个案子我想不通。”他一转口

又问：“你读的文史多，你说说，古代有这种事么？”

我直接了当地说：“有，中国古代有，外国也有。司马迁写《史记》受过刑。虽然里边包括‘李陵之祸’，但他揭了汉高祖的老底儿，也是够胆大的了。古今一样，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谁的权大，谁就有理，这和党所宣传的实事求是风马牛不相及。咱们本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可咱们也发生了……”

再多的话，我没敢说下去。

我和老吴走走歇歇，一步步捱回去，已经天黑。陈立贞命她儿子帮我把箱子抬到房中，归置好，老吴头才回家休息。

按理说，老吴头第二天该休息了。没想到肖木又给他派了差使，叫他担猪粪。这么大个圈，四、五十头猪，他一个病老头子，一天能担完么？这真是要老命了。大家都悄悄说：“老吴，每次少担点儿。有半桶就行了！”不平则鸣，这是大家的意见。

箱子是运来了。打开一看，多了一件心事。发现那尊毛主席石膏像还在里边。那个像，是五十年代师大附中的学生要我给他们讲革命故事，讲完后，他们集体送我一尊毛泽东像，这是孩子们的心意，我一直精心保存着。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完了，可他老人家还在我家坐着。一九六九年阿姨和孩子往江西搬，也把他请来了。到江西后，阿姨可为了难，怎么放都觉得不合适，总怕万一碰着磕着他老人家，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就会大祸临头。只有锁在樟木箱子里最安全。她们走后，又留给了我。叫我怎么办？真有些为难。

有一天，我用个大提包，又提回犁田村，找到阿姨的老熟人。我抱着石膏像对这位贫农成分的村干部说：“这个主席像，送给你们吧那老头摆摆手说：“我们不好收哟，对不起，请你裸存吧！”

看样子，老表们也怕放不好，会惹事生非。

没法子，我又提回来，想了一天一夜，最后终于想出一个绝招。

第二天上午，我恭恭敬敬捧着石膏像跑到五七干校的校部，对革委会主任说：“我把毛主席像送给校部吧，放在我那里不合适。”

这是毛主席像，他们不敢不收。我的困难才解决了。

## 十六 又出了个“五一六”反动组织

今天又是我一个人值班，剁菜、做饲料、喂猪，由我一个人包了。其它人都开会去了。

已经习惯了，凡是听重要报告，开大会，都没有我的份儿。我也想得通，听不听有啥关系？如是好事，迟早我会知道。若是坏事，不听免得心烦，扰乱思想。从一九六二年秋开始，我就生活在“另册”之中。

这种思想延续了十来年，习惯后，觉得自己是另一个天地的人，颇有自得其乐之感。我喂罢了猪，背上筐去打猪草。一路上没碰见一个人，真感到这里的空寂和安静。是个天高山远，野物乱跑的地方。

这地方春天来得早，现在已是青草满地，绿树满山了。为啥不见放牛的工程师？也许他升了级，可以去听报告了。我已碰见过他无数次，他总是赶着牛，老远就笑着向我打招呼。好像他放牛放得很心安理得。我们老见面，打招呼，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从陈立贞那里才知道他叫吴磊伯，是地质力学所的副所长，是地质力学专家，李四光的学生。他一九三六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战前的老干部。一九三八年他从北大毕业时，正是北大南迁在长沙，党叫他进入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他在那里做研究员，做党的地下工作。

现在反而用这个理由来整他，说他北大毕业后，在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当过研究员，是投靠了国民党。所以他现在在这里放牛。

今天，我在山上正觉得天地茫茫不见人踪，突然听得有人叫：“你好！”我一回头，正是吴磊伯工程师来了。他仍是足踏那双破旧的“解放鞋”，身穿粘着泥的蓝布工人服，裤腿卷到膝盖上，手里拿着铁铲，身上还背个粪筐。前边走着两头牛，牛拉一泡粪，他捡一泡，颇为悠闲自得。

我背着猪草往回走，路过食堂门外，听见喇叭哇哇叫。透过窗户传出巨大的响声：“打倒王大宾！打倒‘五·一六’份子王大宾！”“你说，你说，你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怎么反对党中央的？”“把王大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只听见里面哇哇地叫，好像有人山人海，震动四周嗡嗡直响。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热闹，最激烈的斗争会了。虽然我没有进入会场。我也能猜想到，里面放的是录音，是在北京开批斗大会的录音。

我是身居闹市中，却似世外人。这个时期的政治变化，我一无所知。我的耳朵是被堵塞了的。可是，我听到过王大宾这个名字，猜测情况有变化。

一九六七年，我被揪到北京地质学院时，在大院子宣传栏中看见过王大宾的照片，他那时正红，是新上任的“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司令，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齐名，都坐上了北京市革委会的交椅。而今，又怎么成了“五·一六”？成了反革命？这些新贵上台不久，怎么又被打翻在地了？

我不敢问，也不想知道。由这些人们去斗吧。

就在这天，这个工地上，也有几个出名人物被叫走了。据说地质部“五七干校”和地科院的“五七干校”都正在清理“五·一六”。有些造反派中的红人，现在进了学习班，都在某个村子被看管着，不许

他们自由行动，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五·一六”是什么？我根本不懂。在这一片荒山里，有那么多“干校”，都在抓“五·一六”。名堂太多，事情太复杂，是非不清。我暗想，从前都说紧跟这个紧跟那个，我看，跟着谁也没有好下场，还是跟着真理走吧！认理不认人。这是我的主意。

## 十七 张舫其人

有一天，群众组织的头头张舫，突然跑到猪圈来检查工作。他首先检查的就是我。

进入饲料间，见我正做糖化饲料，他绷着脸问道：“你做饲料的比例是多少？多少糠拌多少水，多少菜？做好后每筐是多少斤？”

我也绷着脸回答：“一桶水四十斤，拌五十斤糠，一百斤菜。拌好的饲料，每筐可装六十斤。每天我做一千二百斤。”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着，干活时若不十分留心，就会给他们留下把柄，作为他们继续整我的借口。我看见过他们斗争王 XX，就是因为上山砍木头，扛的木头小了，斗得很惨。对于我，他们当然更不会客气。

张舫不说话了，满满装了一筐糖化饲料，挂在吊秤上秤了秤，然后点点头，就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这人真奸，要小心提防！

我记起夏天割稻子，张舫以连部党组织委员的身份来地头监督，他还查看每个人的脚，看谁是穿鞋的，谁是光脚的。大概因为这里的老表都是光脚下田。来改造的人，必须要学老表的样子。他查到一个名叫王金全的处长，便吼道：“王金全，你为啥穿着鞋？你看别人都穿鞋么？就是改不了你那旧官僚架子！”

王金全吓得忙说：“我脱，我脱！”赶忙把鞋甩在田坡上。张舫一

扭脸，又看见我，他又吼道：“李建彤，为什么不光脚？”

我把鞋一脱，伸给他看：“我有脚垫，光脚走不成路。”他不言语了，我又把鞋穿上。

张舫弯腰割起稻子来，割一会儿，又站起望望远处，大声喊道：“张霞，你为啥拉下那么远？不要磨洋工！”

张霞忙直起腰说：“我头晕，今天血压高。”张舫说：“血压高，你不早说？别人有比你年龄大的，有比你年龄小的，就你病多。快去医务室看病。”

张霞把镰刀交给肖木，整整衣服，就要走。刚走出几步，又返回来说道：“老张同志，请你给我开点中药吧！”

“现在没工夫，晚上回去再说。”

他还是个医生呀？他到底是学什么的？晚上回来，我又悄悄问陈立贞：“张舫是学什么的？”

老陈说：“他呀，你看他既是行政人员，又是个工程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学的是采矿。”

“他多大年纪？哪里人？”

“四十多岁，东北人。”

“呵！难怪他把‘人’叫‘银’呢！为什么有人叫他看病？前几天还有人找他正骨，今天又有人找他开药。我还以为他是学医的呢？”

“自学的，他业余时间学了不少东西。对了，你也可以找他看病。”

我可以找他看病？想起他那付样子，我就发怵。在他那张长方脸上，老皱着眉头，嘴巴翘着，显得很凶。我是各派组织都要打倒的人，恐怕他不会给我看病。以我的身份，他也不敢看。可是我又想，正是因为他凶，我偏要请他看，瞧他如何对待我这个“反党”老太太？也借此考验他的政策水平。

那天，张舫检查罢我的饲料之后，我碰上了郝淑琴，猛然想起，

张舫常和郝淑琴开玩笑，让郝淑琴的孩子叫他“干爸爸”，他们之间定是很熟了。我就去问：“老郝，你和张舫熟不熟？请他给我看看病吧！”

老郝悄声说：“等中午吃饭时我和他说说。我们是老乡，他爱人和我是同学。”

晚饭后，我去鸭棚找张舫看病。连部有不少人，我当着众人说：“老张同志，请你给我看看病吧。我失眠严重。整夜整夜的不能入睡，闹得心脏也坏了。”

张舫沉默着，可能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我会突然找上门，更想不到我能提出看病的要求。他也许在矛盾中，看？还是不看？他沉着脸，像审犯人一样审视着我。我也审视着他。长时间的互相审视。他终于先说话了：“你经医院检查过没有？”

“到哪里检查？”我将了他一军。

他说：“我先给你诊诊脉。”

当着众人，他就坐下给我诊脉，按了半天，直皱眉头。我看他的表情，心里直嘀咕。因为前次在医务室看病时，李青就说：“看你那脸色，像黄表纸。心脏弱得不能再弱。”张舫这次能诊断出什么病来呢？他按了好一会儿才说道：“你们宿舍住的人，我都给看过病。你的心脏最弱，老罗心脏最强。这样吧，我给你先开几付药，吃后就到南昌医院检查一下。”到南昌医院去检查？这主意若不是张舫提出，我连想都不敢想。以我这个身份，哪能允许到南昌去？不过，从这个问题看，张舫还真不是坏人。他凶相是假的，其实是很善良的人。

他马上给我开了药方。我一看，全是滋补用的贵重药。我拿到水边圩去抓药。凡是贵重药，那里全没有。回来我又找张舫，张舫说：“明天有车去南昌，请司机到南昌代买。”

我只得先把药方交给司机，可我身上没那么多钱，张舫很聪明，

一点就明白，他看我犹豫，便说：“都交给我吧，我去找韩大夫。”

原来是这样，只要医务室韩大夫签字盖章，就可先借钱买药，回来报销。目前张舫他们有这个权，大夫也信得过他。这个权利这么用法，倒还不错。

我吃了张舫开的药，果然睡得很好，起码睡了四个小时。再请他看，他还开药，这样三番两次之后，人就熟了，我便提出：“你能不能在药方里加点治眼的药？我的眼越来越坏，白天两米远看不清人，晚上走路要人拉着。每次到地质部干校看一次电影，都是陈立贞拉着我走，否则，我就会掉进井里。”

他轻声说：“我早知道。你的眼，必须到南昌去检查，你自己去请假吧。我先给许忠打个招呼。”

我很感谢他，我又想起了杨玉华。我说：“老张同志，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多解除一些人的痛苦。给杨玉华治治病吧，她的病可不轻。”

“我明白，一定给她治！”

现在的人，表面都很凶，深入了解，已和两年前不一样了，心里有了更多的想法。有的是真凶，有的是假凶。

## 十八 两次去南昌

要去南昌可不容易，不但要经过连部批准，还得经过校部批准才行。

我思索踌躇了好久，才决定去找许忠，依我看，也只有他，才能帮我办成此事。果然，我一说，他就痛快地答应了，而且跑到校部开了介绍信。校部这次可是慎重了再慎重的，这也难怪，我这么个重要犯人，要是出了问题他们怎么向上边交代？所以，他们特意从别的连抽调了一名女干部陪我同去，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监视我，表面的理由是：“马立娟也要去南昌看病，同路去吧！”



这个马立娟，大概是个技术员，三十多岁，自称是有妇科病，要去南昌医院检查。我们走到水边圩，搭上长途汽车，直达南昌后，住进一个小招待所。

这是一个炎热的夜晚，招待所里又黑又闷，蚊帐外边有蚊子，蚊帐里边有臭虫，我连忙吃下安眠药，希望能睡几小时，以备第二天尽早起床去看病。

这小马有些不可理解，她明明是带着任务来的，可这天一早，她却要和我分开走。她很自然地对我说：“老李，我真是来看病。我要到妇科医院挂号。你到省立医院附属医院去挂号吧，现在咱们分开走。看完病再见面吧。”

我只得一个人边问边走，七点钟就赶到医院门口排队挂号。在等待的时候，还在医院门口买了些早点吃。当时我觉得南昌的供应挺不错，早上医院门口有各种小吃。在那个年代实在难得。

这天，医院给我放大了瞳孔，检查的结果还是白内障，双目晶体混浊。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只有一个办法，手术！”我问：“什么时候能做手术？”他说：“全黑了。也就是全瞎了以后才能做！”

我很失望地离开医院。转过一条街，见一个门上挂着牌子：“按摩医院”。正好，我的腰疼了好久了，顺便进去按摩一下。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除挂号人之外，所有的医生、护士，全是盲人。是位女盲人给我治疗。她摸着盲文，叫着我的名字，问了病情，让我躺在床上，她就动手按摩，按摩得很有章法，很细心。

按摩医院出来，天还早，不到中午。我利用这点时间在南昌市漫游，穿胡同走。我想看看南昌的小街道，小铺面。这里和中国别的大城市一样，除了高楼大厦，也还有不少旧式小房，集中在城的一隅。房主人照样往街上泼污水。

走到“八一”广场，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的地方。我

绕着广场走了一周，然后到“八一纪念馆”门口站定，仰望高大的屋顶，瞻仰广场中的纪念碑。我在石阶上坐下休息，很想参观纪念馆，又没敢进去，因为我没有带介绍信。我想，如果我要求进去，看门人肯定要问我的姓名和单位，我说什么呢？还是算了吧。

只得坐在台阶上看来往行人。我正看得出神，小马也来到纪念馆。她看见我就忙说：“你吃过蛇肉么？我刚吃过，你也去吃一碗吧，真像鸡肉。”

到江西后，在乡村走路常遇见蛇。为怕蛇咬，走路都拿根棍，也有出生在南方的人不怕蛇，专门打蛇吃肉，我从来不尝。这天听小马一说，我也真想开开眼界了。

按照她指的方向走去，到一个拐街的小饭馆，要了一碗蛇肉，是带汤的，我喝了一口，真鲜！难怪南方人那么爱吃，这是我第一次吃蛇肉。

吃完蛇肉，按小马指的方向，又去南昌市中医院卦了号。有位老中医，坐在竹子靠椅上，旁边有个徒弟服侍，老中医诊完脉，问了病情，就开药方。老中医口述，徒弟抄录。写完后，再请老中医过目，签字。我看那处方上的名字，但认不清，也不好意思问。

在南昌买了药，住了一夜，就赶早往回返。

是的，南昌该有些熟人吧，原来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的副主任潘震亚、秘书长李士璋，都是江西人，他们早已调回江西工作了。按他们的资历和地位，都应该是省级干部。我们很熟，真想去看看他们，可我这个身份，又不好去打听。谁知他们被整成了什么样子。江西的政治情况并不好。我现在去看他们，肯定对他们不利。算了吧，谁也别看了。

从南昌回到我们的工地后，我就每天下班熬药，目的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先治失眠，其次是眼病。否则，长期下去，怕要神经失常了。

把十付药吃完后，又请张舫照方子开了几付，连续吃过二十付药后，张舫说：“你应该再去南昌看一次！”

一个月后，我又要求去南昌。这次，校部的人又说：“别的连有个女干部，也要去南昌，可以和你同路。”

还是那一套，我全明白。别人去南昌看病都不需要伴儿，可是我去就必须给我找个伴儿。

但是这次同去的女干部也很好。看起来，大部分群众的眼都逐渐亮了，不屑于干这种事。女干部名叫陈竹君，是上海人，温存和气，始终面带笑容。一到南昌，她也是宣布说：“咱们谁也别管谁，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晚上再见面。”

呵！对我的限制更宽了。我这次去“工农兵医院”又作了检查。这是个专门眼科医院。检查的结果，大夫说，我的眼有多种疾病。眼底不好，将来不一定能做手术。希望尽量用药物治疗。

我拿着检查结果，又跑到市立中医院，还是找那位老大夫。老大夫看见我，就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峡江县，五七干校。”他说：“你是老干部吧？”我说：“是的。”他说：“最近中央有新精神，对你们这些老干部都要放宽了。等着吧，会越来越好的。”

我心里直打鼓：老中医怎么知道我是老干部？老人家好细心，他很关心政治，关心着每一个微小的变化。也可能是江西的“五七干校”太多，来南昌看病的人太多，都满身带着“五七干校”的气味。使老大夫越来越明白了。

我拿好中药，找到个山东饭馆，吃了顿小笼包子和挂面。很久没吃过北方饭了，可真过瘾。然后我又去逛商场、书店，买了两本新书，赶紧往住处跑。

谁知小陈笑迷迷地在等候我。她说：“我已买好了电影票，今晚我请你看电影。”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居然将我当做老朋友对待了，多少年来，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是这样。可我和她素不相识，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呢？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被人当做朋友来对待，我答应同去，还开玩笑说：“难道人家叫你来是请我看电影的么？”她只是笑，不说话。

看完电影后，回到旅馆，躺在蚊帐中，我们又聊天。她说：“我父亲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公私合营后，他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公公是位老干部，留苏回来的。我们家也满复杂的。”“这次受到冲击没有？”

“只差没被关起来。我的孩子本来在上海姥姥家养着，运动一来，我爱人就催我把孩子接回来，免得将来孩子说不清楚。人家会说他是跟着姥姥，吃资本家的饭长大的。”

我轻轻笑着：“咱们从前的政策不是这样，现在变了。你父亲还是人民代表么？”

“还是，他再来开会，我也不敢去看他了。”

我又问：“你的公公婆婆都健在么？”

“都在，他们对我满好。我和我爱人在大学是同学，我们要好，双方家长都同意。”

从此，我和小陈成了熟人，回到劳动工地后，见面总要聊几句。由于她的关系，她的爱人和我也熟了。遇事总有个照顾。

我感到，人人都在变，总有一天会由渐变到突变，至于突变到什么程度，我却说不清楚。

## 十九 捡西瓜皮

我两次去南昌，把罗云英气坏了。她跑到连部撩闲话：“能对李建彤这么宽么？她的问题是什么矛盾？”

没想到被张舫顶了回去：“什么矛盾？什么矛盾也得看病！咱们有政策，对俘虏兵还给看病呢。”看来，张舫对罗五英也有看法。

许忠也说：“有病还是得看，万一病倒了，不好向中央交待。她是中央项目组管的人。”罗云英又跑去叫樊再三：“现在正是吃西瓜的时候，那么多西瓜皮不去捡来喂猪，还等啥饲料？快派人去捡西瓜皮吧！”

这话提醒了樊再三，于是大声吼叫：“李建彤，快去捡西瓜皮！”

他们可算出了一口恶气，凭他们的身份，对我这个劳改犯，当然可以大声吼来吼去。在这里该捡西瓜皮的，也就只我一个人了。

我背个筐就走。故意大声叫着：“捡西瓜皮喽！”

先跑到六连，爬上土台子，就叫：“捡西瓜皮喽！”

有人看着我发笑，悄悄议论：“咱们的领导来捡西瓜皮了。”有人说：“写小说的手，也会捡西瓜皮！”

这个连的指导员是个老干部，见我来了，特别热心。大声叫：“谁有西瓜皮，赶快送出来！”

这一叫还真起作用，各房里都端出不少西瓜皮来。不用我跑路，都给我倒进筐里，他们是在照顾我。

我刚背了一筐回去，他们又送来一筐，还叫着：“老太太，送西瓜皮来了。”

樊再三眨巴着小眼睛，小声说：“真他妈的怪，她捡西瓜皮也能捡出热闹来。”我又去别的连，同样叫道：“捡西瓜皮喽！”别的连也以同样的情绪对待我。后来我就用平板车去推了冒尖儿的一车。有个女研究员，姓张，看见我推西瓜皮，跑来给我帮忙。我不让，自己赶快推上走。女研究员跑前几步，把我推开说：“老太婆，你还能抢过我！”她抓起车，推起跑了。她才三十几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

我心中又是一阵激动，这些女技术员、女工程师、女教授、女研

究员，对我都这么好，这真是奇迹。仔细一想，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善良和明辨是非的本性。她们代表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罗云英又信在眼里，恨在心里。似乎在自言自语：“时间一长，什么界限都模糊了。看看她们对李建彤，为什么那么亲？比对我们还亲。”

我只装没听见，反正校部正用大卡车拉西瓜，要拉一个月，我就每天下午去捡一次瓜皮，而且故意一路走一路吆喝着。

## 二十 在农家做客

阿姨走后，我又去犁田村，查看剩余的东西。

那些乱七八糟的箱箱柜柜，已和另一家的东西锁在一间空房里。要开门，必须找到另一家人，那家人很狡诈。开门一看，凡是属于我的东西，早已被翻得乱七八糟，真使人生气，但又不好说。我捡了两双破雨鞋，两个破铝锅，扔进网兜儿，关上门走了。

顺便去看看阿姨的老熟人。我有个老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总想多看看农民的生活，农民在中国，是人口的大多数，只有农民，能代表人民的生活水平。至于干部，工资有高有低，不能代表一般。

我见了女主人，问了声好，她就拉住我不让走，非要留我在她家吃饭。盛情难却，我只得先坐下。

这家农民是中等户，房子是较高的瓦房。前后开小窗，右边是卧室，前头用木板隔出一个方形空地，放张小圆桌，靠前窗是泥砖垒的做饭灶。拉起风箱，烧上木柴做饭。这个山区木材多，引火用的全是柏树枝，一点就着。

主人老两口子，实在热情，女的做饭，她老公和我攀谈。我真想告诉他们，我的身份不是普通人，我是反党分子。那老头儿见我支支吾吾，他便说：“莫怕，我们是好人，你们也是好人。”

我说：“老表，你不了解情况，我可不是好人。”老头儿说：“我们全知道，听说有人捣你们的鬼，你老公还在北京押着……现在押着的，都是好人。”

奇怪，这是谁告诉他们的呢？这村住的全是地质部的家属，谁能这么大胆，敢把话这样往外传呢？

老头儿见我不大说话，他就大胆说起来：“许多事，都是那个老婆搞坏了，我们农民清楚。我们农民靠种田吃饭，不怕他别的什么！”

那个老婆？大概指的是江青，看来农民也不把她放在眼里了。

看老头儿的样子，对好多事都有看法。有位名人曾说过：“国家的官员，谁好谁坏，农民最清楚。”中国人有句古话：“要知朝中事，去问乡下人。”可真是乡下人最清楚，乡下人是以他们切身体会去判断事物的，不听那些空洞的宣传。

女主人把饭做好了。是一碗腊猪肉烧白菜，一碗青菜汤。还从木桶里盛出热腾腾的大米饭，我真有些不好意思。老头儿用筷子指着说：“吃！这东西是自己家做的，在集镇上难买。”

他指的是腊猪肉。这我明白，虽然这里粮食不缺，猪肉，特别是腊肉，还是缺的。我们工地养的猪，常闹病，也常死，凡是死了的猪，我们都埋得极深，总怕老表挖去吃了，得传染病。可是，不管埋在哪里，老表总能找得到。有一天上午，老表又来挖死猪。我叫道：“老表，那猪可吃不得，吃了会得病的。”

老表说：“不怕，我们放上葱、姜、蒜，烧烂了，照样好吃！”

可见真是馋极了。否则，咋能扒死猪肉吃呢？这里的农民真苦，家家户户没鞋穿。凡是工地上扔的破鞋烂袜子，都被老表捡走了。这里的老表，冬天只穿两条单裤，上身穿件棉袄，太冷时候，把灶里烧的炭屑，装进瓷瓦做的手炉里，抱在怀里取暖，这里天气虽然比北方暖和，冬天也达到零下八度，而且是阴冷，潮湿。

人民太好，穷也不说穷，忍受着。这次热心地招待我，那碗腊猪肉，是平时舍不得吃，招待贵客的，是他们的心。我这个反党分子，却成了贵客。我内心不安。

女主人给我捡了一兜子“芋头”。她说：“拿回去煮了吃。”我忙劝阻道：“大嫂，不行！我不能收。留着你们自己吃吧。”

“我们有的是，自己种的，自留地种的。你们北京来的人吃不到。”我再推辞，她要生气了：“你不拿，我给你送去！”

“可不敢！”我心里一颤，多么危险。她要真给我送去，不知谁要告她的状呢，和反党分子勾结，全家要遭殃。我忙说：“我带走。”

她又说：“到冬天，你再来吃年糕，我们家做的年糕好吃，用炭火烤了就能吃。”我说：“一定来吃！”

说话间，她儿媳妇回来了。女主人指着说：“这是新媳妇！”我笑着和她打招呼。她是个健壮美丽的姑娘。

我问：“娶媳妇请客没有？”

“请了！还要送东西给娘家。”

老头儿也说了话：“这里的规矩，要送几次礼给娘家。都是有日子的。”

我心想，这家并不富，礼还是要送，要花些钱。我似乎应当给送点钱才合乎人情，可我一摸口袋，只剩下两块钱。太少，拿不出手。

我只得怀着歉意告辞。刚走到村口，就下起大雨。我小跑起来，只听后边叫道：“老李，老李”

我回头一看，是女主人拿着塑料雨衣追来。我边摆手边跑。她一路追着，喊着。我终于被她追上，她给我披上雨衣说：“雨淋了要生病的！”我只得遵命穿上。

我在雨中奔走，心里热乎乎的，也乱糟糟的。我们的农民，真像是母亲。



## 二十一 副统帅的悲剧

一夜之间，我们工地大院儿里变了样。那红砖墙上的语录：“四个第一”没有了，“四个伟大”也没有了，黑字上涂了红漆。我望着发呆。这不是副统帅的语录么？为什么涂掉？

我怀着好奇心，在大院子里走了一圈，所到之处，林彪的语录全部涂掉了。我回宿舍，房中只有张霞躺着休息。我问：“老张，外边的那些语录为什么要涂掉呢？”她悄悄说：“你现在不要问，他们不让告诉你。过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了。”真有意思，都成了知情人，只瞒过我一个人。

我默默地观察，不管到哪里，人们都在喊喊喳喳。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民日报》上公布：今年十月国庆节，不在天安门前游行，各机关自己搞庆祝活动。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头一次。从一九四九年，每年都要在北京的天安门前组织群众游行，国家领导人要检阅海、陆、空军，鸣放礼炮，晚上放烟火，还组织年轻人到天安门广场跳集体舞。“文革”开始以来，虽然在内容和形势上有了很大变化，但每年也都搞得轰轰烈烈的，今年怎么能悄悄过去呢？

我猜疑起来：准是哪个领导人去世了，又不让大家知道。每年庆祝国庆节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排的位置都有一定之规。哪些人的位置稍有变动，人们就很敏感。

就在那一两天内，管图书杂志的人说：十月份的《红旗》杂志不来了。这倒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人们猜测，中央内部肯定出了什么事。又过了几天，工地的红墙上出现了“大批判专栏”。是批判林彪的。哦！原来是副统帅出了问题，原来他是一贯反对毛泽东的！他还“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劳动改造”，污蔑办“五七干校”……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政治反差，让人们怎样去理解呢？

又过了几天，杨玉华在猪圈里告诉我：“我们听了传达文件，有人揭发了很多和林彪有关系的人。开了一大堆名单，里边还你家老头子的名字……”

我突然觉得内心发冷，甚至生出了一丝怜悯。揭发人真可怜，出这风头干什么？景范没在东北工作过，林彪到北京后，他们根本没见过面。景范是个倔脾气，轻易不愿和权贵们来往。

有一天，陈立贞塞给我一张“参考消息”（按规定，不许我看参考消息）。我躺在蚊帐中，展开一看，上边登着林彪和叶群在外蒙的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的消息。我这才明白，他们是在出逃时摔死的，可他们为什么放着现成的接班人不当了，非要叛国不可？最后还摔死在外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觉得中央内部的斗争真是够复杂的，而且很尖锐。

又开始学习新题目，批判“先验论”，全工地都在学习。我们养猪班也学习，也让我去听。那内容是批判某某人的，只是谈理论。

个人在学习中的表现。有些人是就文件说文件，有些人说些模棱两可的废话，有些人看别人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有些人则根本不说话。这样的学习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因为谁也说不出实际问题来，当然也不敢说。

我为国家担心，怎么就选不好个接班人呢？从前说，刘少奇是接班人。后来说不行，是“叛徒、内奸、工贼”。后来又选个林彪，现在成了野心家，阴谋家。将来又选谁呢？

思绪纷乱，从宿舍往猪圈走，沿着草地漫步，一步一步踏着小草走。我自己仿佛就是这小草，被人踏着，踩着，但我还是我，小草还是小草。

## 二十二 群众批判会

对我进行批判，是他们的任务，也是家常便饭。有罗云英带头，谁敢不听。这是第四次批判会。

矣羸圈里，有个值班人住的房子，里边铺两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还有几个小方凳。这天，罗云英吼叫着开会。凡是我能参加的会，几乎都是对我的批判。我已熟悉他们的作派，听惯了他们的调门儿。

我想起以前几次的批判会闹剧。

记得去年八月，对我开过一次批判会。那时正是夏天的双抢（抢种、抢收）季节。在四十度的高温下进行抢种、抢收，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考验。上边叫我写“思想汇报”，我已写过几年“思想汇报”，老套子了。

我便写了“双抢”中改造世界观。这本是些应景文章，不写这些再写什么？就这个题目，便引起一场批判。罗云英瞪着眼，翘着嘴说：“在‘双抢’中能改造世界观么？你改造什么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么？这么轻松？你应当改造反党的世界观！不这样写，就是翻案！”

“反党，又是哪个阶级的世界观？”我平静地问了一声。她答不上来。

这些人的水平如此之低，怎么能共事？对他们能说些什么？

我也有个对付的办法，写信给中央项目组，要求修改他们的讲话，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改成“反党世界观”。写明这是这里的新决定，新发明。这种信，当然是通过组织转上去的。

今年三月，这里要评比“四好连队”。别人是参加评比，对我是开展批判。又是罗云英带头，她要在鸡蛋里挑骨头。她说：“你为啥不到晚九点钟就上了床？”

奇怪！监狱里也没有规定，犯人不到九点钟不能上床。这里名之曰“五七干校”，也是八小时工作制。我早上五点起床，先到猪圈。

值夜班的人还未起床，值班室在南面，为了不惊动他们，我只好从北面窗户跳进去，悄悄生上火，把猪食煮好。七点后回去吃早饭，八点又上班，剁菜。十二点回去吃午饭，下午还要打猪草等，晚上五点吃晚饭。至此，我已工作十个小时。有时晚上还加班，要干十二个小时。晚上九点以前，已经精疲力尽，为什么不能上床休息？如果说我是“劳改犯”，在法律上并未公布判决。即令是“劳改犯”，干十多个小时也可以了。为何不让我休息？我真想骂她两句，但又不想跟这种人争吵，只在心里骂道：“真是狗仗人势，岂有此理！”

罗云英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雨鞋那么烂，为什么不买一双新的？”

我说：“我穷，没有钱！”

她说：“不能说‘穷’字。说穷。就是攻击社会主义！”

对这些人能说什么呢？明明是你们冻结了我的工资，又不让我说‘穷’字。

过几个月，又开了一次批判会，这次更是离奇。有人来外调材料，我赶快写完交出。没想到罗云英竟说：“你为什么写这么快？难怪你反党哩！就是因为你写东西快，你有反党的本钱！”

我不理她，她又跺着脚说：“你走路为什么那么慢？猪跑了都赶不上！”

我明明有关节炎，又是个半瞎子，这谁都知道。

这是第四次坐进小屋，批判我的“思想汇报”，这次我写的内容是要求解决我的问题。副班长李玄子不说话。小杨说肚子痛。壮劳力刘万宾是个农村小知识分子，说话看风向，看人的眼色。陈立贞的身份不好发言。老留学生徐本光小心谨慎。朱效成品德高，总是替我担着心。于恺是老北京大学毕业生，对批判人不经意。

就这么一群人，坐下反反复复地研究我的“思想汇报”，还得说

罗云英立场坚定，她说：“你要求解决问题？这辈子别想！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矛盾？”

明知我的问题不属这里解决，这里的最高领导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的材料根本不在这里。之所以那样写，是想敲一敲他们，让他们表演一下。

目前，我只想逗一逗罗云英，大家好看个热闹。我说：“中央说过，交代了就能解决问题。”

她说：“你这种矛盾，交代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毛主席说坦白从宽，你又不让从宽，这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她真火了：“谁说我和毛主席唱对台戏？你有啥资格给我扣帽子？”

“毛主席没有说过，剥夺李建彤的发言权！”

我接着说：“有的人是真听毛主席的话，按政策办事。有的人是阳奉阴违，有的人是歪曲……这都属于破坏……”

罗云英满脸通红，几乎哭出来，眼看就要发作，于恺出来打圆场，把话岔开：“对毛主席的话，我老婆理解得最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老婆说：‘咱们得多做几条被子，可能要全家分散了。孩子们要去插队，我们俩可能下乡，一个人去一个地方！’我老婆真好，真聪明！”

李玄子是个老实疙瘩，见于恺说老婆，他也说：“谁的老婆也能看出这个门道，家家户户有准备。我老婆是个家庭妇女，也能说出这种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把人都教育聪明了。”

扯得离题远了，罗云英宣布：“散会！”

对于我，什么“坦白从宽”？开个玩笑而已。

### 二十三 我的反驳与申诉

和这些靠投机取巧吃饭的人为伍，实在烦人。

简直是逼人太甚，看来申诉书是不得不写了。我必须把“通天政委”说的话在这里公布。在这里，“通天政委”唱的是红脸，有些人唱的是白脸，索性撕下他们的脸皮吧！

我写下来，叫你们上下都看看。

“通天政委”和我打过无数次交道，可是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这些隐姓埋名的家伙们，将来也是跑不了的。我就写上了“中央项目组老周同志”，只要能转到中央，他们自然会知道应该给谁。

我只能利用晚饭后休息的时间，趴在小床上写。我一连写了两份，第二份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写完的。大意如下：

头一条，是要求解决问题。我虽然知道，现在决不会解决，可我还是要求赶快解决我的问题。为写一本书，已经审了十多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我写书时还是青年，戴上“反党”帽子已是中年，现在已进入老年。大家都自称是马列主义者，而这种无限期地消磨人的岁月的作法，总不能算英明，算是合理吧。我的历史是清白的，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难道就容不得我写的那本书？要把我的生命拖尽？

你们不是再三说过嘛：“你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这么一本书。交待清楚了，就能解决问题。”至于什么叫“清楚”，就没有标准了。

去年你们来，我不是交代清楚了么？我是按事实交待清楚了。从表面看，你们认可了。不认可，你们不会带走。既然如此，为什么二十个月没有消息？这里的基层，在批判我时已经透露：“交代了问题也不行。反党分子是敌我矛盾。不会再恢复党籍。”

真是这样么？我不相信。“通天政委”是代表中央的，能耍两面派么？他怎么言行不一，说的一套，施行的又另是一套呢？

这里的人，已开始分配工作。有的到外省，有的回北京。你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还要把我最后留下么？在北京，你们这样作过，地下

室关押的人全放完。最后，只剩下我孤身一个。现在又要这样？这里无权解决我的问题，全靠中央，也就是靠你们这些搞项目的人了。希望你们说话算话。

第二条：再一次核实中央项目提出的问题。我是再次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后才写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思想，是从马、恩、列、斯那里继承来的，也有发展。这是说明，我没有剽窃毛泽东思想，若要非说我剽窃，那我剽窃的只是马列主义。因为我用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而没有说明这是从马列主义那里学来的，只说了毛泽东思想。

我讲了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运用问题。对我的案子，不能用主观臆断：第一、第二稿全是真人真事。第三稿才改为小说的。中央已再三审了《工人出版社》的人，难道谁会瞎骗吗？他们不会瞎编。是否调查人员瞎编了案情？

小说中没有写高岗。怎能成了为高岗翻案？我的最后稿，在你们手中，你们为什么不仔细看看，还是看了不敢承认，不敢露口风？那里边连高岗的一点材料也未用。虽然，这种写法算不得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有人要抓的那根稻草却没有了。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一环环地核实。

至于“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的罪名，那是有人要挑拨中央根据地和其它根据地的关系。中央岂能上当？

第三条：我要求修改小说。随你们来的那位女同志曾问我：“你的书为什么不能改成革命小说。”我也曾答道：“能，现在把它拿出来，我马上就改。不就是去掉一个人物么？我早已改过了。”

我还是强调：我现在准备改书（其实早已改好）手头无稿子，希望你们给我这个条件。

我曾对你们说：“关汉卿不改窦娥冤，他宁愿被流放。而我呢，是早已主动地把高岗的材料改掉了（向反历史唯物主义者投降了），难道还不行？为什么抓住不放？你们那个女同志说：“因为你从前是共产党员！”

既然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又承认我是改了书稿，为什么又装做不知道呢？我现在又为什么不是共产党员了呢？

我还曾说：用高岗材料，我也有根据，五十年代，中央的南宁会议文件上记载着毛主席说的话：“高岗过去是对的，在延安时我还是听他的话多。”她答道：“如果真有这个文件，真是这样说过，你的问题可另当别论。”

申诉书写得很长，两份总有一两万字。当然还是要写得婉转些，当时时髦的词句也得用上一点。管他们能不能代表党，都得说“我听党的话”。明明是申辩，是证明我无罪。还得加上“我有错误”。明知他们从上到下不可靠，把问题越搞越糊涂，可我还得说：“我相信你们！”明明说清楚我没有用高岗的材料，还得补上说：“从前用过高岗的材料，即令是在一个人物身上用了五分之一的材料，也是犯了罪。”

不这样写，就会莫名其妙地招来引火烧身之祸，问题还要升级。不过，那套“流行话”，“套话”都是批判会上，报纸上，提审中，他们都用惯了的陈词烂调。我只用来说自己，不牵连别人。甚至还要把康生之流泼在“彭、高、习”、“习、马、刘”身上的污水，再冲刷一次。至于我自己，再戴十顶帽子，不也就是一个脑袋！我可以硬着头皮申诉，推翻一切！

申诉书交给我们连的党支部，请他们一级一级往上转。一直转到北京的中央项目第一办公室。

这里的领导有胆量给我转么？我写好后犹豫过，最后还是决定：管他们有无胆量，我只管送上去，也对他们来一次考验。



过了几天，那个女数据员史涛悄悄告诉我：“校部有个领导人晁非说‘李建彤正在闹翻案！’”

我一听就火了：翻案？根本就定不了案，谁也定不了。没确凿证据！我默默骂晁非：“什么东西，你自己刚‘解放’就这么‘左’，还是个高级干部，水平太低。你挨打我看见过，劳改我也看见过，我还以为你是个正派人呢，原来也是个不够格的革命干部。你现在是向军代表邀功吧？”

晁非的话，固然是个警钟，但这个锤敲得不够响，他们还不敢公开批判我。“通天政委”说过，我的材料不在这里，因此“项目”也不在这里。我也明白，以往罗云英他们的小打小闹，只是想借机往上爬。现在校部的人放空气，也只是为了自己。怕上边追查到他们头上，说他们支持我翻案，给我转过“翻案书”。

另一种气象是：张舫给我看病时说：“病好了还可以改书嘛！”张舫说时向外看了看，说明这是他内心的想法。可能他已看过我的“申诉书”，他是认道理的，不跟着瞎起哄。

就在这几天，有些人就要回北京。因为中央有通知：凡是工程技术人员，都可以先回北京。前个时候，江西找到个大盐矿。报纸上、广播里闹得轰轰烈烈。有人说，周总理要技术干部回去搞建设。

党政干部呢？暂放在后边，个别的也可先回去。那就是“干净”的，和领导关系好的，有某一派保着的。首先是“罗云英”这一类人，已经嚷嚷着她要走了。

有一天，我从猪圈里回来，还未上坡，正遇上罗云英要下坡。她笑嘻嘻地说：“我要走了。回北京再见！”她伸出了手，似是要和我和解。我只点点头，将手往后一背，她红着脸又笑笑说：“你对我有意见！”

我冷笑一声，扭头走了。

## 二十四 孩子来信

我是多么思念孩子，两个大孩子的下落又断了。据说，已不在内蒙的武川县。到了哪里？谁也不告诉我。他们怕我和孩子通信，连累了孩子们。

我只得写信给江苏的弟弟，托他从侧面打听消息，但他很久没有回信，也许是他也失去了自由。我又写第二封信，借我有病的名义，催他给我回信。我说：“我在江西生病了，急需用钱，望速寄来一些。”因为在战争年代，弟弟是和我一块参加革命的，他总是惦着我，若长久失掉联系，他就会登报找我。我需要什么他就从远处寄来。可是这次，虽非战争年代，我们却长期断绝音信。一九六六年，他的孩子到北京“串连”，知道他们一些消息。之后，我们又失去联系达六年之久。一九六九年，江苏扬州来人提审我，要我讲弟弟的情况，他十几岁参加革命，绝无任何历史问题，难道我的案子能株连到他？他没有看过我的书，和我这个案子毫无关系。六年无消息，这次又无回音，不正常，大概他真的失去了自由。

我又写信去河南许昌的老家，和一个亲戚取得联系。要他帮我打听孩子们的下落。因我们三十多年只见过一面，他不会受株连。还算好，他居然回了信，告诉我，他已打听到两个孩子的下落，他们到了西安。他要我放心，又不让我给孩子写信。真难呵！

小女儿来信了，说她们仍住在三姨家，公家不给她们房子住。

幸亏她还有个三姨，否则，只得倒卧在马路上当乞丐了。一切重担都落在三妹身上了。我真不忍心，但也无办法，只能暗暗着急！

几个月后又接到一封信，是阿姨写来的，说地质部终于分给她们一间小房，在复兴门外真武庙七栋一门八号，是在四层楼上。我左思右想，真武庙究竟在哪里？记不起来了。

阿姨信中还有小女儿的信，说她们搬了家，单位只给了一张床，

故意让孩子和阿姨分开。孩子说阿姨就是家里人，不能分开。所以需要给阿姨买床，又没有钱，要我设法寄些去。是呀，家里任何家具也没有了。这又是个难题，虽然我的生活费增加了，但每月也只有三十元。怎么办？只好勒肚子借债吧！我向老朱头儿借了三十元，加上我的节余，给孩子寄四十元。并写信说，以后再寄。我打算继续勒肚子，再借些债。

阿姨来信说：她们住在四层楼很干燥，在江西怕受潮的东西可寄回来。

她十分了解，江西的潮湿无法形容。从北京运去的任何家俱都变了形。三合板，五合板都潮湿得像纸一样，一页一页地飞掉。皮衣、呢衣得随时翻晒，否则就会烂掉。

我连忙把我和景范的皮大衣、皮裤子，偷偷寄走。寄大衣也不那么容易，我悄悄把皮衣从箱内取出来，打成三个小包，借每个休假日去水边圩邮局寄出一个。每个包裹要五块邮费，现在对于我可真不是个小数目。不过，细想起来也值得。这些没有抄走的皮衣皮裤，若在这里烂掉，将来再去买，需几百元。寄回去，只需十几元。虽然目前有些为难，咬咬牙就过去了。为什么要悄悄寄呢？是怕有人发现，怀疑我想回北京，又骂我不该寄“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景东范的东西。

最大的问题，是我发现信封上的字迹不像阿姨和小女儿写的。那字像是儿子写的，又像是他爸爸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男孩子回到了北京？他们见到了爸爸？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又翻来复去看那信封，突然发现，信皮是翻用的旧信封。里边有“周总理亲收”的字样。

我着急了：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是不是给周总理写信了？千万不能呀，此时写信给他，他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个案子是通天的大案，是在康生策划下，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决定的，谁也说不上话，帮

不上忙。如果孩子们写信给周总理，岂不是给他出难题？他的处境也不好，一九六七年，听说江青等人鼓动“造反派”到街上贴周总理的大字报。

我马上写信给小女儿。我说：“我发现你用的信封中有中央领导人的名字。你是否给他们写了信？千万不能这样做，不许你给任何领导人添麻烦。咱们家的事情，只有用时间去考验，最终会解决的。中国人是伟大的，好人多，坏人少，要相信党，相信国家，要乐观，千万不可乱写信。”

这封信，我没敢在“五七干校”内发，自己到水边圩发了挂号信。

信一寄出，我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一路唱着往猪圈里跑。

我坐下剁菜，又唱起《抗大校歌》、《国际歌》、《游击队之歌》。我大声唱，别人也跟着哼哼。

## 二十五中 国还是好人多

这里的春天来得早，满山的奇花异草，特别是杜鹃花，有火红的，有雪白的，有金黄的。在紧张的劳动中，只要到房门外四处望望，就像到了百花山、植物园，使人的疲劳和忧虑消减了不少。

我喜欢这里的杜鹃花，像喜欢延安的野百合花一样。当然，在这里没有在延安自由。那时，一下课就可跑到山上去采花，摘酸枣。现在，我是“犯人”，除了打猪草，哪能随便便满山跑。

一天中午，我从猪圈下班，一路走一路向西眺望远山的花。看得不大清，只觉得雾蒙蒙的一片，像彩虹，像云彩。走进宿舍，喝上口早晨留下的凉稀饭，觉得凉得沁人，好不舒服。郝淑琴家的“小三子”跑了进来。双手捧着一束火红的杜鹃花，叫道：“阿姨，给你花！”

我把小三子搂在怀里，吻了她的脸，把她和花都抱了起来。

小三子，是个小小的姑娘，只有五岁，瞪着又圆又黑的眼睛，梳

两条细小辫子，穿着天蓝色的连衣裙。她聪明、活泼，就是没有幼儿园可进，只能跟这些似战士，又似劳改犯的人们挤在一起。小三子把花举到我脸上。叫道：“阿姨，这是我哥哥采的花。奶奶叫我给你送一把。”

我一手抱着小三子，坐下来，伏在“备战箱”的盖子上，用铅笔画起来。我想把这一束杜鹃花画下来，留个纪念，可怎么也画不成。人老了，一切都忘了，手也不准了，一切都生疏起来。那花瓣画得不圆不尖的，似荷花，又似桃花，有时又似野百合。我想在苦难中恢复青富发难了

“小三子，吃饭来！”

是奶奶在叫她。小三子答应着，从我身上跳下去就往外跑。谁知奶奶已到我门口，这是郝淑琴的妈妈，应当是小三子的姥姥，他们叫惯了奶奶。

这位七十多岁的白发老母，也被赶到了五七干校，终日伺候着女儿和外孙。她还经常悄悄送碗挂面给我吃：“吃吧，什么也别想，吃饱了不想家。”今天，她又端来一碗饺子。我说：“老妈妈，这是干什么？”

她摆摆手，小声说：“昨晚小三子爸爸从广东来探亲，我托司机‘四贝贝’买了块肉，全家吃顿饺子。你身体不好，也尝尝吧！”说完，放下就走。

这碗饺子，容不得多想，先用手帕盖上再说，万一有人进来就会惹麻烦。我们那位风流打字员，满院乱串，又像兼职的情报员，难免不去上报，给郝淑琴家惹祸。

刚入夏，饺子放一会儿也没关系，等晚上分给小英兄妹两人吃，叫孩子们解解馋吧。可怜的孩子，一年也吃不上一两顿饺子。不是过年过节，谁若去张罗着做饺子，还得挨一顿批判。

就在这天晚饭后，老奶奶在院子里用木盆洗衣服。我们住在同一排房，只隔两三个门。我走过问她：“老妈妈，你为什么流泪，是不是淑琴又病了？”

老妈妈用衣袖擦擦泪，操着东北口音对我说：“也不知她得的这是啥病？每月都流血不止。前几天，她怕我去洗衣服，自己去洗了几件衣服，又躺下了。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个好大夫。去南昌一次好不容易……我的淑琴好苦呵！自打中学毕业，就出去干事，养家糊口。我没有儿子，全靠的是她……”

我也替老人难过。隐约听说过，淑琴的病不轻。听人说，女人绝经后再来月经，怕是“倒开花”了。所谓的“倒开花”，是旧社会老百姓的说法，现在的医生叫做“子宫癌”。如果淑琴患上这个病，留下孩子和老人怎么办呵！丈夫在外省工作，一年才能来一次，这一家人，将来怎么办？唉！为什么叫这些老的、小的、病的，都到“干校”来？他们都需要跟着干部短受劳动改造么？

老妈妈既勤劳又善良，洗罢衣服，见我在向日葵旁坐着，她又到我跟前说：“她姨姨，我知道你的处境，你每天失眠，对身体可不好，听说你药里需要何首乌？我这里还有一些，给你配药用吧！”

她从衣袋里取出个纸包，塞在我手里，我正要推辞，她按住我的手说：“都在困难中，你不要见外，我们老家有这种药。我年轻时害过一场大病，头发全秃了。大夫叫我吃何首乌，我每天熬着喝一碗，头发慢慢又生出来了。你吃吧，它是补气安神的。”

老妈妈走后，我内心很激动，也很难过，她家有这么重的病人，却还想着我。中国的老百姓是多么善良！谁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在北京，甚至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大字报、小字报、大批判、小批判，搞了多少年，老少皆知，可他们竟然不怕受牵连！

不能总是白吃人家的东西。第二天，我跑到小卖部，看有什么好

吃的，给老人家买一点，略表心意。一站在窗口，我愣了，里边站的是打过我的那位造反派。变了，我刚来这里时，小卖部是位年轻女干部当主任，外号叫“莲子”，是位化验员。我并不认得她，可她认得我。她一见我，就笑容可掬的说：“老太太，买条毛巾吧，这里需要毛巾，一天到晚擦汗。毛巾本是要布票的，你是特殊情况，我照顾你，不要布票。”我买了两条毛巾。她又说：“以后要买什么，就找我。我什么都可以给你留着。”那时我想，这个年轻人，满胆大的。以后她确实给过我许多方便。

如今，小卖部换了人。换成了一个曾经整过我的男人。这人是个派性很强的小头目，山东大汉。一九六七年参加过我的项目，关押过我。他主持开过我和景范的批斗大会。批斗时，他的语言十分恶劣：“你小说中写的那个人物XXX，那么年轻，漂亮，对人热情，他和你是什么关系？”简直是对作者的侮辱。在斗争中，他还把我推来操去，不像个正经人。对这个人，我厌恶透了。今天碰上他，我觉得很晦气，转身就走，什么也不想买了。

不料，那人开了口：“老太太，您别走！想买什么？我给您挑好的。”

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居然也会说人话？我只得说：“我不买了，忘记带钱。对不起！”

他说：“没关系，我可以赊给你。你的工资虽然冻结了，都在银行里存着。将来都会退给你的……”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说这么多话？难道他过去那种“左”劲儿，疯劲儿，全是假的？或者有彻底悔改之意？

他又说话了：“老太太，今天有新来的牛肉干，你买些吃吧。年纪大了，工作累，要吃得好些才能保持健康！”

他竟关心起我来。我也不好再绷着什么也不买。只得买了一斤白

糖，一斤红糖，送给了小三子的奶奶。

回去我向陈立贞打听，那山东大汉是什么人？原来他是地质学院毕业的老技术员，并不是大老粗。五年以前，他对我是那样刻骨仇恨，如今又变得这样。“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我的问题还是原样，他竟变得这样彻底，令我吃惊。中国还是有希望，好人越来越多了！

## 二十六 女儿们来了

罗云英走了。张霞一家走了。陈立贞住进了医院。这房里只剩下杨玉华、史涛和我。我感到很久没有过的清静。每到礼拜六晚上，她俩就催我教她们唱《国际歌》。大家说说笑笑，再也不担心特务了。

那个猪馆出身的工程师沈克，更是无所顾及，送来个一百度的大灯泡。说是给瞎子送个‘亮’来。从此，晚上我可以躺在蚊帐里看书了。

两个女儿要来看我，这真让我喜出望外。他们怎么会允许孩子来看我呢？本来，我是没有探亲假的，孩子一来，岂不等于叫孩子来探亲？

我心里一高兴，由不得见人就说：“我的女儿要来了！”

在院子里打扑克的人们，都问：“你去接么？”

我说：“谁知她们什么时候到？我也无法去接。”

这院子像从天降下了喜事：“李建彤的孩子要来探亲了！大家注意点儿，不管孩子从哪条路来，咱们都招呼着点，免得找不到。”

这“五七干校”，有两个出口处。那群红房子围成的工地。从后边的发电机工棚绕过去，顺着泉水的流向，是朝东的一条大路，那是去水边好的公路。由北向南而下，一条大路出去，也可到公路上，那是向“共大”走的公路。一般人，从这条路来的居多。

不过我想，两个孩子不至于走错路。因为小女儿是从“共大”走



的。最大的困难，是怕她们从樟树下火车后，买不到长途汽车票，或者到水边圩下长途车后，碰不上可搭乘的顺路车。一般说，这是要费点事的。这里的知青都是拦住司机求情，有的司机很好，带上一段路。有的司机坚决不带。

这几天，我一下班，就在院子里转悠，向东北望望，再向南望望，可真尝到望儿心切的滋味儿。

叫得最响的是隔壁住的三个女司机。她们曾和小女儿在“共大”同过学。后来回到这个工地劳动，又学了司机，没有回北京复学。她们前天还跑到我房里悄悄说：“老李，你不要着急。我们碰上拉拉，就帮你把她拉回来。”

一天晚上，电灯刚亮，外边有个数学家叫起来：“李建彤，你的孩子来了！”我忙跑出去，见我的两个孩子——大女儿米拉和小女儿索拉，提着包包，风尘仆仆地从南边大路走了过来。

这里的人真是互相体贴，我的孩子一来，杨玉华和史涛就搬了出去。她们说：“你们娘仁好好说说话吧！”

我没给孩子们准备什么吃的，只在小卖部买了些粗点心，那点心里有一半是棒子面。倒是孩子给我带了些吃的，是他们沿途买的瓜果、点心之类的。我们娘仨会起餐来。

边吃边聊，我问起家中的情况，谁批准让她们来江西的？她们俩抢着叙说。

索拉说：“今年春天，北京有好多干部子女到国务院送信，都是要找爸爸妈妈，打听他们的爸爸妈妈究竟关在哪儿了？要求探监。大都是写给周总理的。我也给总理写了封信，送到国务院办事处。我大概写的是：我是刘景范，李建彤的女儿，我们希望看望被关押多年的爸爸，我妈妈李建彤，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眼睛患白内障，已快失明，身体极其虚弱，需要治疗，请批准她回北京治病。”

“没想到这两个要求，总理都批了，批转给了中央项目组。项目组也通知了地质部的军代表。（军代表还是王乐天？）他压了很久才通知我们。办公厅的林叔叔来给阿姨透个信儿，我赶快打电报给哥哥姐姐，让他们赶回来，我们买了些东西等着，地质部来了通知，问我们几个人去看？我们把所有的亲属都登记上了，让他们随时来看。这次，只有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去。”

我问：“你们哪有钱买东西呢？”

米拉说：“取我爸爸的冻结工资。地质部的专案组写个条子，就可到政协取钱。我爸的工资关系还在全国政协，我们要了二百块钱，包括我和都都的来回路费。”

一九六二年案件发生后，景范是一九六三年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的，实际是因我的“小说”之祸受审查。西北省以上的干部被送进去了许多，有大批西北干部都是以“反党分子”名义送进去的，结业后大部降级降职分到外省的基层，或者在群众团体应个虚名，实际是“靠边站”。到一九六五年秋结业，中组部把刘景范分配到政协，名义上是个普通委员，在那里拿工资。其实景范本人全不在乎，土地革命时期，这种事也曾经经历过。

我问孩子：“你们看见了爸爸吗？他在哪里？”

“关在秦城监狱。是穿军衣的项目人员带我们去的。说话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坐着，有十几个人，弄得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说。”

“你爸爸什么样子？”

“很胖，但胖得不正常。像是浮肿了。”

米拉说：“我爸爸老看我们，好像不认得了。他看见索拉长得太高，就问：‘是不是有什么病？’我们告诉他没有病。爸爸问：‘你妈妈在哪里？’我们告诉他，你在江西。爸爸把全家人都问遍了。我们把每个人都说了几句，他好像放了心。”

索拉说：“我们给爸爸买了些好烟，他不抽，说监狱里不让抽烟，戒了。”

米拉说：“我们给爸爸买了些吃的，点心、水果，监狱不让留。大概是怕我们买的东西有毒。”

“时间很短，就叫我们出来了！”

虽然听说景范在监狱，我也松了口气，起码他还活着。而且他也知道了家人的情况。要不，能把人闷死。这个年头，活着就不容易。我问：

“都都为什么不来？”

索拉说：“哥哥急着回西安，力贞姐好不容易在三原县给他找了个工厂，要进去上班。”

我问米拉：“你呢？有工作么？”

孩子摇摇头说：“还没有。我们插队的地方，开始有招工的单位，我们政审不合格。那时大妈在陕西省三原县，我就写信给大妈，同意我们把户口转去。我和都都就转去了。可是没有工作，只能住在大妈和力贞姐姐家。现在都都刚有了着落，我还没有，我暂时在三原城关小学代课。”

是呀！孩子们真倒霉，出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家庭，一辈子算是完了。米拉尤其可惜，她是师大女附中的优秀生，保送到二附中文科班的。作文写得不错，政治头脑也清楚，是个埋头苦干的孩子。可现在呢？……我看着她脸，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从前，阿姨们都说她是难得的美姑娘，现在她瘦得像个十几岁的孩子，大概只有五、六十斤。

这天晚上，我们三人共睡一张单人床。床边加了凳子、箱子，娘仨挤在一块儿好说话嘛。蚊帐不听话，无论如何罩不住三口人，这边拉住，那边又张开。只好多点蚊香吧。熏得满屋子冒白烟。

我睡在中间，摸摸这个孩子，摸摸那个孩子。可我们不管说起什么，都没有哭。我告诉孩子们：“不许哭，什么时候也不能哭！要顶得住，熬得过。这种时间不会长，咱们家没做亏心事，没有犯法，没有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姓刘家的孩子不能流眼泪！”米拉笑着说：“妈妈，有的事挺逗的，有的人心真好。这次我们要看爸爸，要来看你，想借点路费。我跑到政协财务科。那个会计老头看看我说：‘孩子，你这么瘦，有病么？’我说：‘没啥大病，看着弱。’他说：‘你是不是需要钱？要多少？’我说：‘五十块！’他说：‘你要得太少了，至少要二百。你需要住院治疗，你病成这个样子，还不说？你不好说，我们替你说。’他拿起电话就找地质部项目组。他说：‘刘景范的孩子在我们这里，病很重。你们应当给她找医院治疗。你们要负责任！’那边的电话说：‘你给她些钱，让她自己找医院治吧。’政协给了我二百块钱。我们买了给爸爸带的东西，剩下的做了路费。看到政协那位老会计对付军代表的样子，太有意思了。”

我从内心感谢政协财务科的人。他们有最起码的人道主义，也有政策水平。

索拉又说起地质部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她说：“妈妈，军代表造反派占了咱们家以前住的房子，但我为了头上有片瓦找了他们上百次，学校也替我说情，他们就是不理，每次我去，管事的那个人看着我冷笑：‘你们还想过从前的特权生活呀，住得舒舒服服的。现在没有了！去投亲靠友吧！’要不是三姨收留我，当然我只能睡马路了。多亏我又找到政协，政协总务科有个管房子的张国福叔叔，他说：‘我求这里的军代表给地质部的军代表打个电话。’那军代表还真打了电话，打到地质部的秘书处。林叔叔听说是政协为我要房子，赶快拨到军代表办公室。从前，军代表听说是为我要房子，就不接电话。这次是军代表对军代表讲话，才讲通了。给了我那间在真武庙的房子，九平方

米，他们还想轰阿姨走，我说阿姨就是我家的人，现在我和阿姨都住在那儿。”

从这件事，我又觉得军代表和军代表也不尽相同，有的好些，有的坏些，还有的根本不通人性。地质部的军代表就属后一种。政协的军代表就高出一头，至少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娘仁说了大半夜。我思想又产生了顾虑，怕孩子在这里受刺激。因为这里的军代表也不太通人性。我问孩子：“你们走时，地质部怎么说的？带没带介绍信？”

米拉说：“我们带着介绍信，是项目组写的。说我们两个来看妈妈，是组织上批准的。叫他们不要歧视我们。”

我说：“那就好。明天你们俩拿着信到校部去，交给他们。”

## 二十七 孩子们的苦与乐

孩子们把介绍信交给校部，校部也开恩，通知养猪班，给了我一天假，让我和孩子团聚团聚。可是索拉又骂起了人。她说：“妈妈，你们这儿真有操性人，我们从校部回来时，碰上个大胖女的，东北口音，好像是做政治工作的。她冲我叫：‘喂！孩子，你爸爸判了几年刑？’我说：‘我爸爸没判刑。我刚看完爸爸，又来看妈妈。’她几乎跳起来：‘你还能看爸爸呀？谁批准你去的？’我说：‘周总理！我给周总理写了信，他就批准我去看爸爸了！’她把眼一瞪：‘哦？你还敢写信给周总理？’我说：‘写了，他也批了。’那女人马上转脸笑起来：‘这孩子真有本事，还敢给周总理写信呢！’变脸变得真快。真他妈的势力眼！”

正说着，女司机三宝宝、四贝贝、小丽丽，都跑了进来：“呵！我们知道她是谁，那个半老婆子名叫廖胖子，当年她还是一派组织的打手呢。”

孩子们什么也不吝，四贝贝大声大气地骂起来：“文化大革命中，那王八孙子可坏啦，把我家不知抄了多少次。我父母不知去向，吓得我跑到姨家，姨家也是大门紧闭。我姨父也是高级工程师，听说被打得全身连一块好肉也没有了。我又跑到舅家，舅舅也是高级工程师，被造反派拉走不见了。我只得在街上流浪，每天回家找一双旧皮鞋，拿到街上卖破烂。卖一次，我能吃两天。直到把我家里的破烂卖完，爸爸妈妈还没有消息。我就成了野孩子，什么话全能骂出口。”

四贝贝嘎嘎笑了一阵子又说：“阿姨，我们和拉拉都是患难朋友。在‘共大’时，我们住一个屋子，闹翻了天！”

小丽丽说：“拉拉，你不在这里还好，要是在这里，也受不了那些气。去年还贴了我爸爸妈妈的大字报，硬说他们是叛徒、特务什么的，还说他们通敌。通什么敌人呀？我爸爸是从老区当八路军出来的，我妈是个学生。他们一造谣，把我妈造怕了。现在我妈和我爸分居了，谁也不敢到谁房里去。只有我在中间给他们送吃的，喝的。我妈买块瓜，也叫我给爸爸送去。我爸买根油条，又叫我给妈送去。老俩口真是可怜！”

三宝宝说：“我爸爸挨着打，还总是叫我学习理论，学习马列主义。可我学了几年，觉得全和我们家的事对不上号。和咱们‘五七’干校的事也对不上号，越学越糊涂。现在，干一天活，拿起书我就打瞌睡……”

四贝贝说：“拉拉，什么也别理他们，咱们明天出去玩玩。我明天出车，把你们姐妹俩拉上，到峡江县城兜兜风，然后到新干县转一转，兜它一圈儿风再回来。我现在有的是钱，是我爸爸临走时留给我的，叫我补身体的。”

几个姑娘叽叽嘎嘎笑一阵，又坐不住了，扯上索拉去拉手风琴。她们要去唱，去跳。她们如今是什么也不信，只信她们自己的亲身体

会。也不知她们是从哪里借来的手风琴，跑到女司机宿舍闹去了。

第二天我去猪圈上班，路上碰见“合理大个儿”。他笑着说：“你的孩子手风琴拉得不错，不愧是你的孩子！”

又是一件怪事，这个“合理大个儿”是我的项目人员，他搞过三年项目，“合理”二字是他的口头禅，因此我叫他“合理大个儿”。去年他也来到这里，我们经常碰面，从来没打过招呼。今天听小女儿说，那个大个子和他们玩得很好，一点不像搞专案的。一切都怪了，也许是人们都在思考，都在变，先从群众中变。

两个女儿在这里住了几天，米拉急于动身回西安，希望能尽快找到个工作。

索拉不走，她说：“妈妈，我是来接你的，听林叔叔说，地质部已经通知‘五七’干校，要你回北京治病。这里拖着不办，我就在这里等着。什么时候有了眉目，咱们一块儿回北京。反正现在我已初中毕业，咱家这样，又没有上高中的资格。我就在这里等你吧。”为孩子升学和工作的事，我心里又是个疙瘩。

我请了假，和索拉一同去送米拉上火车。

米拉走后，我和索拉在樟树镇住了一夜。在个小旅馆里，蚊子和臭虫几乎把我俩咬死，真是又臭又脏。我和索拉天没亮就起来了，去赶了个集。买点花生，就搭船到新干县。

我们头一回坐船游赣江。饱尝了南方的水景。赣江的水面又宽又静。在水面上深深呼吸着潮湿的空气，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到新赣县下船，找了个冷食店，吃了些冷饮，孩子才算没有中暑。

回到五七干校，我和索拉两人住一个房，够宽敞的，但还是睡一张床，孩子要和我说话。她有多少话要对我说呵！孩子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说她们学校，老师们对她好。在“拉练”时，几个中学组织在一起，就抽出她来办小报，她还会刻蜡板，随写随刻，办事很快。

同学们排着大队行走，允许她骑自行车，她也常推着她那辆蓝色的车上山。有一次，竟从山坡上滚了下来。

说到她和阿姨住的真武庙，街道积极分子如何对她们监视……派出所怎么随时抽查户口。总之，把她们当反革命家属对待。

孩子未来江西之前，我早已向校部提出过要回北京治病。校方的答复是：“你的病历我们看过，同意你回去，正在请示北京，等北京有了回信，你就可以走。

孩子说：“通知早已下来两个月了，他们就是不放你走。”

有一天，风流打字员彦凤婷梳着高角头来了：“哟！你有这么好的女儿呀，真是好福气。依我看呀，你也该走了。这么大岁数，眼又不好。你每次出去看电影，都是陈立贞拉着你走。错走一步，你就可能滑进井里。前天还听人说，你到校部走了一趟，回来天就黑了。走路看不见路，一会儿走上坡，一会又走下坡，就是走不上正道，是有人把你拉了回来。”我有些嘲弄地说：“你倒消息灵通，是什么人把我拉回来的？”

四贝贝听见彦凤婷在这房里说话，她就在外边叫：“拉拉，狗拱了你家的白薯锅，快出来撵狗！”

工地自己种的白薯收获后，谁都可以买，正好索拉不爱吃饭，专爱吃白薯，我就买了五十斤，每天用阿姨留下的破锅煮一锅。可是今天，我还真没有煮白薯，四贝贝是用轰狗的语言轰彦凤婷的。还真灵，四贝贝一叫，那女人站起就走了。她走后，四贝贝进了门，大声嚷嚷起来：

“这彦凤婷不是个东西！这几天正造谣呢，一会儿说，我和她儿子正谈恋爱。一会儿又说我的思想不好，专爱和拉拉玩，我政治思想有问题，和你们家划不清界限。她说‘反党分子家的孩子，就那么香么？整天鳔在一块儿，又唱又闹的。’彦凤婷是个特务！去她妈的蛋，



甬理她！”

我不好搭腔。小女儿问：“贝贝，你到底是不是有了男朋友？”

贝贝比拉拉大两岁，那张嘴可厉害。她爸爸是高级工程师，研究所所长，已经回北京了。这里只剩下她和妈妈。所以，她说起话来理直气壮。她说：“这里有几个技术员喜欢我，可我不喜欢他们，都比我大十来岁。谁去找个叔叔，大爷呀。”

三宝宝站在门口接上茬儿：“彦凤婷的儿子不是比你大两岁吗？那位风流娘们直往咱们宿舍跑，还请你吃饭，硬要把她儿子给你家当女婿。”

“我X他妈，她是看上了我们家的钱。想在这里捡便宜，看她那操作性！”

我连忙叫道：“贝贝，你疯啦？”

“我早就恨她了。她到处窜，今天跑连部，明天跑校部，专打小报告。鬼鬼崇崇的，到处拉关系，想攀个大人物，把她儿子送去学技术。她儿子快二十了，是个小流氓，下乡插队，吃不了苦又偷偷跑回来。初中毕业根本没有初中的程度，整天钻到我们车队吹他妈漂亮，说他妈年轻时有上百个人追。这像儿子说的话么？他可不是随妈来劳动的，他是走后门来躲避插队的。”

突然，李玄子来叫：“李建彤，今天下午庆祝国庆，你带孩子去参加会吧！”

呵！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去年，因为北京不搞国庆活动，惹出多少猜疑。林彪事件一公布，便平静了。今年仍不去天安门游行，但谁也不再去想它了。好像又成了习惯。

干校的庆祝会在食堂里召开，人们全都到了，就连我也来了。军代表讲了几句庆祝话，就开始文艺节目。有独唱，有合唱。这是头次

举行这种活动，沉闷已久的青年人兴致极高，老徐头儿也站起来叫道：“这个孩子会拉手风琴，请她上去表演一个！”

老徐头儿指的我的小女儿，她被大家的掌声鼓上了台，有人递过一架手风琴，她拉了一支《牧马之歌》，有个女干部站了起来喊：“我愿和刘索拉合作。她拉什么，我唱什么！”我一看，是位女翻译，名叫刘蓉蓉，三十几岁，以前没打过交道。

青年人是相通的，她们真的合作起来。唱了几支歌，掌声不断。于是，各连都邀他们去唱，穷乡僻壤缺乏文化生活，人都饿荒了。于是她俩成了旱天的甘霖，背着手风琴，到处去唱歌。

我在揣猜：刘蓉蓉为何这么胆大？拉着我的孩子到处跑，难道她不怕人家说她立场不稳，界限不清？这也是个特殊现象。难道群众不买那些大人物的账了？不怕扣政治帽子了？

## 二十八 我摔伤了

国庆后，要组织去井冈山参观，每人可去一次，自己若不去，家属孩子可以代替。机会难得，我让小女儿去了。谁知这次去的家属孩子最多，干校开了两辆大卡车，是老司机开的。一个礼拜走个来回，大家像迎接远征人归来一样，迎接自己的亲人。

下车后，索拉说：“妈妈，我很好！上山时，有个像‘登山运动员’模样的人和我就伴儿。刮起大风，那个人借给我一件风衣。”

索拉还说了个意外的插曲：她们到了井冈山，碰上地质学院的军代表，姓孔的。孔代表正陪外宾来参观。看见五七干校来了一批孩子，他张扬着要和孩子们一块合影。孩子们并不喜欢他，都是别别扭扭地勉强应付。小女儿说：“我才不和他合影呢，谁给他脸上贴金？他们拉我，我挣脱手走开了。”

是呀，这些年，把孩子的心伤了，见穿军衣的就反感，把小时候

“热爱解放军叔叔”的感情全部赶跑了。

这个姓孔的，在北京时，他摆的架子满大，常常背着手，在院子里乱转，像个监工。他在部队是个团级干部，到地方当上军代表，好像官升三级，简直成了地科院的“太上皇”。

去井冈山回来后，休息几天，索拉张罗着要给我担水。从后泉池担回小屋，她摔了一跤后，就病了，发烧，尿血。我慌了手脚，带她到水边镇医院化验，诊断是急性肾盂肾炎。我只得催她快回北京。

我到校部去催问：“我到底能不能和小女儿一块走？”他们说：“上边还没来电报，你不能走。”我说：“那就让孩子先走吧，她已经病了。还得借些路费给她。”

还算好，又从我的“冻结工资”中借出二百元，给孩子上路用。

就在这几天，刘蓉蓉也要走，她先回上海，要和索拉同路走，这样她们还可以同到杭州、上海玩玩。然后再把索拉送上回北京的火车。

有了这个伙伴，我放心了。我很感谢她。

在这乱世中确有这样一种人，她们只讲友情并不在乎政治上受牵连，也许刘蓉蓉就是这样的人。我从前不认得她。现在，她竟然在院子里大声嚷嚷着：“我和李建彤的女儿一块儿走！”

这次是贝贝开的汽车，我随女儿、刘蓉蓉到了樟树，送她们上了火车。车开走后，我只得怅然而返。索拉的离开，给予我的失落感，比我预料的要强烈得多。

据我所知，中央同意我回北京，已经四个月了，这里的军代表还是压着不让我走。史涛告诉我：“老李，你不要急，他们不会放你走。校部的晁非说：‘李建彤正闹翻案，叫她走了影响不好。’军代表老张说：‘李建彤的案子最大，她是劳改对象，放她走了，这干校还办不办？都得闹着要走了！’”

原来是这样，怕我走了稳不住军心，那我只得等着。不过，我还

是常去催，我跑到校部去问过晁非。他说：“还是得等上边的通知。我们已经去了几封信，北京都没有回信。”

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明知道通知早就到了，可他们还在撒谎，真是无耻！

说话就到了十二月。他们已经声明过几十次，上面没有通知，不能放我走。

那天，有汽车到新干县，我要去买中药。这次是在车库上车。司机让我绕到前边坐。我低头一看，有块木板，就一脚踏了上去。糟了！谁知那是汽车井，下面是一米多深的洋灰池，我跌了进去，刚好摔着腰部，不能动了。几个小伙子把我架了上来。

那个姓张的军代表正好碰见，他有点心慌。连忙叫道：“叫李建彤坐在前边，派个护士跟着去，一定要拍个片子。”护士陪我到了新干县的医院，拍了片子，买了药，然后回来。

我的腰可真痛，从胸部到腰，简直疼得钻心。刚躺在床上，史涛跑来说：“张代表让我通知你，明天回北京。”

我问：“什么时候通知的？”

史涛说：“你们去新干县的车刚开出去。”

我说：“今天上午他还说上边没有通知，两个钟头之后他就接到了通知啦？”

史涛说：“你走后大家都在议论，幸亏你是摔了腰，如果是摔了脑袋，可要脑震荡了。那可是个大事故。那是个水泥井呀，你又是个半瞎子。”

听她一说，我也有些后怕，我在这个工地上，几乎死过三次了。

史涛替我打来了午饭。吃罢饭我到门口洗碗时，那位张代表又来了：“李建彤，你快准备，明天就回北京。”

我只“嗯”了一声。心想，大概你害怕了。上边叫我走，你压了

我半年，如今看见我摔成这个样子，你又怕将来不好向上边交代，一个劲儿地催我走。

这次史涛可真帮了大忙。她说：“既然叫你走，你就快走吧！明天有车去樟树，气象局有两个干部搭咱们的车，你和他们同行，他们还可以照顾你。至于东西，你就别管了。一切都由我收拾，你走后我替你托运。我现在是车队的指导员，一切都好办。你快走吧！以免夜长梦多。”

第二天，我只提了个装日用品的手提包，就离开了这块三年来流血流汗的土地。

## 二十九 总算回到了北京

回去还是从樟树上车，经杭州转上海，再回北京。这次是我一个人，可我已经成了残废，想看看旧人旧事，已是力不从心。在上海换车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我不打算住旅馆，叫了辆三轮车，拉我到老同学颜世庚家。

几十年不见，他与从前判若两人。生活的折磨，使他老了，消沉了。

我们是孩提之交，他在他的小鸽子楼里接待了我。父女俩都很热情，可什么也没敢多说，只能泛泛地说说。他在南京路上看见过我的大字报，只这句话，已经足矣。看来，他们已明白了一切，什么也别说了。

他让女儿给我做了顿面条。吃罢，就送我上火车，现在不是叙旧话别的时候，何况也没有时间了。车票是下午的，只有一顿饭工夫，能说些什么呢？我明白，他为了我的事，也受了不少牵连，可这时也不好多说，谁知以后是什么样呢？他搀扶着我，默默地把我送进车厢。

我的腰疼极了。在车上，自己不能去买饭，也不能去厕所，只能

忍着刺骨的疼痛，坐在硬梆梆的座椅上。多亏车上那些陌生的青年帮助我。这一节车，也成了我的温暖之家。年轻人问我：

“老同志，您从哪里来？”

“从江西五七干校。”

“您有多大年纪了？”

“五十多岁了。”

“您患的什么病？”

“把腰摔坏了。”

年青人不解地问道：“五十多岁还上五七干校？毛主席不是指示过么，年老病弱的人可以不去劳动么？”

我心想，这些年轻人太天真幼稚，他们哪里知道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年轻人又问：“您的伤这么重，为啥不座卧铺？”

我说什么呢？只能说：“我舍不得花钱。”

这些年轻人，也许当过“红卫兵”，现在都是插队的“知识青年”。看样子，他们现在是回家探亲。

天黑下来，窗外一片漆黑，我只能趴在小桌上打瞌睡，哪能睡得着？心里总有许多事在默默想。趴着，只是图个安静罢了。

第二天晚上到了北京。车一停，年轻人把我架下车。阿姨和索拉就到了面前，她们接到了我从上海打来的电报。索拉说：“还有李宁阿姨也来了！”

我的老友李宁，正向我走来。她常偷偷到我家替我照看孩子。

这年夏天，孩子已初中毕业了，不能上学，也不让工作。孩子三岁学钢琴，阿姨想让她继续学音乐，又苦于无门求教，钢琴也被没收了，什么关系都断了。我写信叫她们找李宁，并告诉她们找的方法。果然，她们找到了。李宁是作曲家，可以给女儿补习功课，让她到自

己家里练钢琴。李宁还常跑来看孩子。今天也是碰巧，她又来看孩子，听说我要回来，她也不避嫌，就跑来接我。

阿姨到底是细心，雇了辆出租汽车，把我们运到复兴门外的真武庙。那四层楼可真难上，她们三个人把我架了上去。

房了刚布置好的新房子，我很感慨。这个单元有四间房，阿姨和小女儿住的最小的一间，不到十平米。听说我要回来，地质部又给了一间，约十五平米。另外还有两间，是锁着的，还不知谁来住呢？

我的房间里铺了张大床。这天晚上，我和李宁就在这里休息。我们在延安时，就住过一孔窑，睡过一盘炕。事隔三十多年，我们又可同床私语了。

李宁已四十五六岁了，还是那么单纯。除了钻研她的音符之外，很少看其它的书。对许多事情都有疑问，但又找不到答案。这次和我住在一起，又问这问那的。我们关了灯悄悄说话，有些话还是不让小孩子听到为好。

我问她：“今天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

她说：“我现在也在五七干校，在北京郊区。我回来是看心脏病，大夫给我开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上假条就来了

可真难为她了，她是位最忠厚的人，谁在危难中，她就帮助谁，自己也是一身病。

她贴近我的耳朵问：“你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呀？我的‘那一位’（刘迅）也被抓进去了。”

“他为什么事被抓去的？”

“因为和天津艺术界的关系，说他参加过什么‘黑会’，还攻击过‘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真纳闷，他们究竟要搞什么名堂呀？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她的话中有一系列的问题。我说：“谁代表无产阶级，还得经过

验证，不能自封。专门打老干部的人，用各种手段残害自己战友的人，能称得起无产阶级么？借用‘无产阶级’的名义，去干坏事，是卑鄙无耻之徒。咱们不能信那一套。”

她说：“我也这么想，就是不敢说。”

我问李宁：“咱们的老朋友你都见过谁？”

她说：“因为那个‘名演员’瞎咬，很多朋友都被一个案子捆住，谁也说不清了。我也就不看他们了。”

“她咬些什么？”

“也就是议论过那个人（指江青），说得多了，就说出祸来了。”我说：“咱们那位老大哥（朱丹），爱交际，谁都是他的朋友。难免鱼龙混杂。”李宁说：“他从前把那位名演员当朋友，什么都聊。运动一来，她就乱咬，咬了一大堆，也成了个“反党集团”，把天津的朋友也裹了进去了。她没有骨气，也很幼稚……”

### 三十 把群众训练成特务

我回来的第二天，阿姨就对我说：“自从搬到这里之后，街道和派出所常来查户口。可能是往这里搬时，有人对这里交代过，说咱们家有问题，他们就把咱家当“反革命”家属对待。咱们对门儿，住了一家工人，女的是家庭妇女，是‘红五类’积极分子。只要有人敲咱家的门，她就跑出来看。如果让我们碰上，她就说：“我听错了，以为敲我的门呢。”

“还有二层楼一位干部家属，是街道干部，专管这个楼门的。凡楼下上来的人，她们就派孩子跟着。看是否到了咱们家，有多大年纪，穿的啥衣服，梳的啥样头发，是男是女，都要汇报。”

“还有个街道主任，一个腐老太太。更是‘左’得邪性，连我搬进来时都要盘查。因为这里的户主写的是孩子，街道硬要把我撵走。



我说，我跟孩子到江西，又跟回来。从小把她带大的，我不能离开她。那老太太说：‘当阿姨不是正当职业，应当解雇！’孩子和她吵起来：‘我阿姨不是雇工，我没有给她工钱，不知道什么叫解雇，你到地质部打听打听，看我有钱雇人吗？阿姨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她不能走！’”

真是难得的好阿姨。自从我们“冻结”工资之后，再没给她发过工资，她坚持不走，要对孩子负责到底。生活费不够时，她就拿出自己的积蓄贴补。

阿姨接着说：有一次，我儿子都回来了。三姨家的表弟，王姨家的小弟，都来看他，派出所马上来查户口，问两位客人从哪来的。他俩都说是北京本地人、而且讲明自己的住址。派出所的人说：“小伙子中间闹事的多，你们不要乱跑！”小弟说：“从前我们住一个院子，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什么叫乱跑？”

阿姨说：还有一次，派出所的户籍警，在对门工人家属那里嘀咕了半天，又跑到咱们家，问来问去，又问孩子的爸爸在哪里？我说：“你去问地质部！”户籍警说：“听说他是八级干部？”阿姨说：“不对，你说低了。他是五级干部！”那户籍警张着嘴走了。

阿姨说：“咱们家来的人，都要报户口，马上就得报。”

我临去江西前，要求带户口走。专案组的“小老虎”说：“别人都没带户口，你的也不带。”因此，我的户口还在北京。

我说：“我回来了，你赶快报户口吧，我的户口不是在家吗？”

“已经报了。可能还得来查户口。”

果不其然，刚睡到半夜，有人把门敲的“咚咚”响，感觉像土匪抢劫一样，实在难听。阿姨赶快起来开门，横着进来了三个大汉，板着脸问道：“你们家来了什么人？我们要查户口！”

阿姨拿出户口本。我也从床上坐了起来，问道：“你们要查我吗？”

我刚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的，名叫李建彤。你们看户口本吧！”

他们翻了一阵说：“你是中央监察部的？”

“对，我是监察人员，专门监察坏人坏事的。”

他们“咂咂”几分钟，悄悄地走了。

我心里好笑：一个“中央监察部”，就把他们吓跑了。这些人也真愚蠢。其实，监察部早已撤销。只因当初派出所的疏忽，没有及时把我的工作单位改成“中国地质科学院”，后来就忘了。目前的警察也太没常识，听见“监察”二字，就跑了。从那以后，他们再没来查过户口。

最麻烦的是孩子。索拉工作，她的一群小朋友，都是“黑干子弟”，都没有工作。从小学到初中的小朋友们都来找她玩。有四个女孩子是同龄人，又是同学，她们都穿蓝布制服，留着长头发，走起路来一字排开，四个人说说笑笑，上楼下楼“通通通通”的，引起积极分子们担心害怕。二层楼的街道干部又来找阿姨：“你们孩子的朋友们为什么都穿蓝布制服？都留长发？”

阿姨的脑子很灵。她知道，蓝布制服都是赵小燕她妈留下的。小燕的妈是十三级干部，某机关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他爸爸也被管制，两个哥哥插队，只剩下小燕一个人。她便把妈妈的衣服都拿出来给小朋友们分着穿。这本是件使人心酸的事，积极分子却在那里说三道四的。这四个孩子，除我的女儿和小燕外，一个是爸爸在坐牢，妈妈在医院当护士。再一个是家中无大事，小事却不断。反正都是不许上高中的。

那时凡是家中有“问题”的孩子，都不许上高中。功课再好也不行。最吃香的是“红五类”的孩子。

以上这些，都是最使阿姨伤心的，又不能全说出口。面对街道干部，只得说：“现在不是讲艰苦朴素么？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捡

的妈妈破烂。那长头发，是老师叫留的，他们都是学校宣传队的演员。”

凭阿姨那个脑子，三说两说就把街道干部说转了向。

又过了若干天，晚上，孩子在我的床上睡熟之后，阿姨把我叫到小房里，她要和我谈心。

我们是该谈谈了。几年来，没有机会谈。可是出我意料之外，她谈的不是家庭锁事，而是国家大事，她怕我在江西被封锁着，什么也不知道。她说的大意是这样：

北京的人们，都在反对那个女人。骂得很难听，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在悄悄地骂，说事情都坏在她的身上。阿姨问我：“你说说，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老干部？”

阿姨把我问愣了。这时候，怎么说都不合适。我只得说：“她倒也是老干部，是共产党我虽然知道她的一些情况，但也不能说。她的材料都在康生手里，康生不说，谁也不好说。我也怕从我嘴里说错了，会更影响阿姨的情绪。”

阿姨说：“有一次，孩子骂：‘谁是坏蛋，我知道。’我连忙捂住她的嘴：‘不许乱骂，你要惹祸了！’”

阿姨担心的有道理，她怕孩子们惹祸。

我知道了孩子们的情绪，也无法向孩子解说。只有严格禁止孩子议论“国家大事”。只许读马列主义，不许随口乱说。真怕他们惹祸。

### 三十一 中央项目组找上门

不愧是中央项目组，消息真是灵通，我刚到北京几天，他们就找上门来。

这次来的还是两个军人。一个是那位我已熟悉的胶东大个子，几年前就和我打过交道。另一个是中等个头的方块胖子，河北省口音，

自称姓王。这天来还是审问马文瑞的情况,想要从我嘴里索取口供。过去几年我写的材料,他们都不满意,没有达到给马文瑞定罪的目的。

很明显,他们虽然把马文瑞已定成“习、马、刘”反党集团,证据却不足,如果只凭我写的小说,那么,每次口供中我都写上:“马文瑞说,写小说不能用高岗的材料。”只这一句话,就打破了他们的意图,定不成“为高岗翻案”的罪名。

这次,他们仍然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左说右说的,轮番说服我,要写出使他们满意的材料。或者叫做“交代”。照老一套,又写到了这个地方,我又写道:“马文瑞说,不能用高岗的材料。”

他们冒了火:“不行,这句话不能写。”

我放下笔,盯了他们片刻。我说:“这句话我写过无数次,你们拒绝过无数次。这哪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难道也是毛泽东思想?人家马文瑞确实是这样说的嘛!”

胶东大汉开了腔:“审查了你几年,你就是不觉悟。按照马文瑞的思想,他决不会这样说。我们要的材料中不能有这句话!”

我说:“我的觉悟再提高,也不能提高到伪造的程度。每次,你们都是两个以上的人来提审,这次还是两个人。话说到明处,将来出了问题,你们俩负责。”

姓王的亮了像:“中央要求的不是这些,而是真正的东西。”

“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东西,如不是真东西,我不会每次都这样写!”

胶东人说:“不行,我们就是不允许你写这种东西!”

看样子,他们是顽固到底了。可能是康生逼着他们来完成任务。想不到,穿军装的人竟然成了康生的帮凶!

我思想一转,马上换了一张纸,又写到那个地方,我没写那句话,而是用钢笔点了个蓝色的圆点儿。这说明,有蓝点儿的地方,就是他

们逼我去掉那句话的地方。将来空口无凭，以蓝点儿为证。他们都是些脑满肠肥的武夫，根本不去注意，自以为得计地收进了皮包。

我那个蓝点儿，就是以后控诉他们的证据。我会要求有关部门去寻找纸上那个“蓝点儿”，那就是中央项目组有意陷害马文瑞的证据（七年之后、我的小说得到平反。我向中央组织部控告了这件事。他们查出那个“蓝点儿”。把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郑平山撤职了。他当时是我们的项目组长。）

就在这天，那个姓王的军人，在我的破书柜上瞧来瞧去。抽出这本书看看，抽出那本书看看。好像我家的书还没有抄净似的。他连字典都要翻翻。我心想，我的家你们已抄了几十次，在这个新分给的斗室中，在刚从机关借来的旧柜子里，你们又能找出什么东西呢？他果然找出了东西。从孩子们的书中抽出一本旧的“新华字典”。封皮上写的有“刘米拉”三个字。他问：“刘米拉是谁？是哪国人？”

真让我又好气又好笑，搞了几年专案，连我家的人名都未弄清。白吃了这碗专案饭！

我冷讽热嘲地说：“刘米拉是我的大女儿，她不是外国人，不要以为我还里通外国我正式告诉你们，我从前是搞音乐工作的，所以我的孩子们都是用音符取名 36、11、56。我的大女儿叫米拉，儿子叫都都，小女儿叫索拉。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不信，你们可以到地质部去问问。”

他们似乎有点窘，也许还在怀疑，说不定还以为发现了新问题。于是赶快夹着皮包走了。

刚回来几天，就遇上这么些不愉快的事。看样子，他们决不会放过我。我还没有治病呢，赶快到医院检查治疗，准备对付再来的逆境。

阿姨叫来出租汽车，把我送到“人民医院”。内科、外科都检查了，最后确认是胸部和腰部的肌肉撕裂。

大夫问了情况，知道我是在“五七干校”摔坏的，深表同情。他说：“这种撕裂是很痛苦的，要卧床休息。把人弄成这个样子。唉！叫人怎么说幌？这么大年纪，还受这个罪！”

这可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了。到了一九七二年底，人们似乎清醒了些。医生也敢公开对病人说几句同情的话，表示安慰。

大夫开了很多药，连吃带涂，加上热敷。

我回来后，躺在床上，请阿姨每天早、午、晚三次敷药，加速治疗，以迎接新的斗争。

就在我卧床治疗的时候，又有不速之客敲门，说是来看房子。地质部告诉她们说，这个单元还有两间空房，她们要搬进来。阿姨带她们看了房，又问了尊姓大名。

送走之后，我又和阿姨商量；这可能又是派人来监视我们。如果住进陌生人，咱们连话也不能说了。你赶快找人了解一下情况。

阿姨办事可真得力，她把老林找了来。这人是可信的，他是地质部老人了。我请他说服管房子的人，不要把陌生人搬进来。要来，来个老实可靠的。在一个单元里住两家，同一个厨房，同一个厕所，天天擦肩碰面，这边说话那边听，将来难免生事。他答应了。

几年来，这是我和老林第一次见面。我又向他打探景范的情况。我问：“一九六八年他被捕，到底是骂了谁？造反派宣传说，他骂了党中央，毛主席。我就不相信。”

老林说：“他骂的是康生。不过，上边不让向外说。”

我明白了，骂了康生他们不让说，用毛泽东顶替。

老林又讲了些传说：“项目人员说，他在监狱里不老实，顽固、抵抗。项目人员说他这是‘流氓行为’。”

我一听就生了气，决不许别人如此诬蔑景范！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世上最老实、最坦率的人。我冷冷一笑：“哼，流氓！中国的流氓

多得很，真正的政治流氓是谁？将来大家自有评定！”

我太气愤了，实在难以平静。从这天起，我又彻底失眠了。

## 三十二 我们的新邻居

已经听说要往这里搬人，也不知是什么人。这天，一大早就往单元搬动西。到下午，新邻居来了。听阿姨说，有的是抬着上楼的，有的是搀着上楼的。一个年轻妇女突然跑到我房里。叫道：

“阿姨！我们搬来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问：“你好，你们是谁家，几口人？”

“我们姓于，我是儿媳妇。我爸爸、妈妈、奶奶，都来啦。我爸爸是一九三〇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你们能谈得来。”

“你们从哪里搬来？”

“从五七干校，我爸爸快七十了。妈妈比他大四岁，奶奶九十五岁了……”

“他们三个都下了五七干校！”

“可不，要我爸爸去，就得把我妈妈、奶奶都带去。用担架抬上抬下的。九十多岁的人，连自己都顾不住了，到干校尽受罪。”

我心里想，这不是造孽是什么？九十多岁的老奶奶，还要用担架抬上去五七干校。这是他儿子四十多年的革命为她老人家挣来的。

于家的儿媳妇，是位中学教员。三十几岁，挺秀气，一口东北话，口才流利，也很坦率。第一次见面，就把话往外倒。也许她事先了解过我们的处境。她说：

“我们也是全家都受害呀。我丈夫在总后，被邱会作关在牢里，全身打得没有一块好肉。我爸爸是从苏联回来的。在苏联挨整，回中国又挨整……”

已经很明白，他家和我家同病相怜。儿媳妇并不住在这里，晚饭

后就走了。两家人不熟，心却已经熟了。

我仍在病床上，没有去看新来的邻居。过了两天，老于的夫人来到了我房中。我很抱歉，说：“于大嫂，我打算过两天去看你的。你这么大学年，还来看我。”

于大嫂很实诚，一开口就叫：“大妹子，我也听说你家的事了。好好养吧，身子骨要紧。你的脸色不好，要吃好些，想开些。咳！我们老于呀，也是苦命，一辈子没享福，现在还得待候我和老人……”说着就咳嗽起来。看她病得不轻。

于大嫂脸面黄瘦，高大个子，是吃过苦的人。她叙述着自己的生平：“当初，我们家境不好，老于的妈妈要给他找个大个子儿媳妇，好劳动。我比他大四岁，把我娶过去，生下两男一女，老于就走了。他一去苏联就是二十多年。我们家好苦呵！没有劳力，没有进项。我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婆婆挖苦菜，靠吃苦菜度日月。我的大儿子，长到十来岁，睡下就起不来，因为肚子饿呀。女儿更苦，在荒年中饿死了。我婆婆到七十岁时还挖苦菜，她不容易呀！这一家有老的、小的，都在苦难中等待着去革命的老于。”

于嫂子接着说：“我也忘记是五几年了，老于从苏联回来，我们家才团聚。刚过了十来年好日子，又来个什么“大革命”，又把老于当成斗争对象。我们到“五七干校”，也不能劳动。我们这几口人，就数老于年轻、也快七十了。他每天去劳动，下班回来再给我和我婆婆做饭。我七十四、五岁，我有病，婆婆也九十多了。要是论润年润月的，都一百岁了。还能做啥？可苦了老于了。”

从此以后，于嫂子常过来看看我。我病好之后，也常去看看她。套间里住着九十几岁的老母亲。我进去看时，她已不大认识人了。但是她还很能吃饭，生活也能自理。

老于真是革命队伍里的大好人。既不嫌病老之妻，更舍不得苦难



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总想买些好肉，炖烂之后，给妈妈吃。在饭桌上，老于尽量往妈妈面前捡肉。

有一次我问于嫂子：“老妈妈吃那么多肉行么？”

于嫂子说：“不怕的，她年轻时吃肉太少，尽吃些苦菜。现在要给她补一补。”

这家人虽然搬来了，并不太安定。他们的户口还未转回来。当初，大概是不准备让他们回来了，三位老人的户口都转到了江西。现在要求机关帮他们转回来，机关说要老于自己再跑一趟江西，实在是不近人情。老于只得先向老母请假，说明他要再去江西的原因。老母在儿子身上最上心，她哭了，怕儿子去了回不来。

老于临走那天，我们都到门口送行，最让人心酸的是那位老母亲。她拖着瘦弱衰老的身体，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扶着墙，慢慢地走出来，走到门外，再往前移，移到楼梯口，望着儿子下楼，眼泪汪汪地停在那里……

我真受不了。近百岁的老母亲，你年轻时，因儿子要去革命，你帮儿媳养育着孙儿们，受了一辈子苦。近年你又随儿子去江西山区，经受东北人不能忍受的炎暑。现在你又默默地望着儿子远去……。中国的妇女，多么坚强的妇女！中国的母亲，多么伟大的母亲！

自从老于走后，听于嫂子说，老妈妈过几天就问：“他还没回来？”可见她日夜挂念着她那近七十岁的儿子。

十几天后，老于终于回来了。老母亲喜的坐起来为儿子缝补褥子。儿媳妇说：“我说妈呀，你不用动手了。我也能干。”

老母亲说：“这不是他的么？我亲手缝。你也有病，少动弹吧！”

三位老人真是相依为命。

我去和老于聊天。老于说说江西，又说说他在苏联的经历。他在苏联的某杂志社当编辑。见过王明、康生，参加过他们主持批判李立

三的会议。他也和李立三共过事。那时，王明和康生管着中国人，只要有一句话不合他们的意，就会遭逮捕、流放。他在工厂劳改过，也被流放过，做过小工。这是那个时代的事，那是王明、康生排除异己，助纣为虐的时代。五十年代，中国政府把他们要了回来，总算得到了祖国的保护，过了几年安定日子后，又来个“文化大革命”，于是他又成了“里通外国”的叛徒特务。现在，他可有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走到街上，碰见闹事的，躲得远远的。碰见外国人，躲得更远。

这就是他的一生，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的一生。

老于家的母子之情，引起我对儿女的思念。我和大女儿，又半年多不见面了，和儿子有五年没见面了。于是我写信叫他们回来探亲，在北京过春节。

### 三十三 治病与探监

听说从一九七二年起，很多家属都可以探监了。那是因为有人向毛泽东告了状，说监狱对“犯人”实行法西斯专政。

我是被定为“习、马、刘反党集团”的干将，不许探监。而习、马的爱人和孩子都已去探过监。因为他们本人无事，只是家属而已。

从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我和景范被分别关押之后，五年多了，再未见过面，也不能通消息。一九七二年之后，孩子能探监了，我便写信把两个大孩子叫回来。说我想见他们，想让他们去看看爸爸。

信寄出之后，我病了。这次得的是新病，诊断为“植物神经紊乱”。我时常晕倒，晕倒后便不醒人事。平时既不能抬头，也不能低头，还不能看书看报，就连洗头都得仰脸躺着，让孩子给洗。睡觉只能仰脸向上，或者向右侧转一下。如果向左侧一转，就觉得天旋地转。但是，我并不糊涂。只要醒着，就能自理一切事物。

米拉都都终于回来了。我顾不上问孩子在外面的一切遭遇，只让

他们赶快去探监。

索拉把给周总理的信送到中南海西门，说她姐姐、哥哥回来了，要求看爸爸。

三天之后，又是那个胶东人和姓王的军人来了。他们说：“你们要求看刘景范，可以准备好，后天到宽街交通部对面等我们，我们用车送你们去。”

项目人员总是神出鬼没的，没人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

既然是我回来了，就要给景范买足了东西，向机关的项目组又借了些“冻结工资”，给景范买了一套新棉衣，新衬衣，衬裤，袜子。还买了些吃的：点心、麦乳精、苹果之类。另做了一罐陕北人吃的“干揽肉馅”，能够拌饭吃，都带去。我要他知道，我已回到北京，让他放心。

孩子们探监，这是第二次了，恰好就要过春节。去探监的头一天，两个军人又来了。要检查探监时带的东西。他们说，袜子不能带尼龙的，只能带棉线的。

孩子们探监回来，告诉我：爸爸牙疼，满口牙都活动了。咬不动东西，只能吃酱豆腐。他的毛巾全烂了，下次去带两条毛巾。一双布鞋，他的脚疼，一九六八年家里给他送的棉衣，只穿了几个月，就被没收了。后来向他们要，他们说，都交了公。另外，“干揽肉馅”又带回来了。监狱里有个女人，专门检查食品的，说这种东西不能留。苹果也带回来了，爸爸的牙咬不动。监狱里不准用刀子削。

我没敢在孩子面前说什么。心想：全部牙都活动了，这明明是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现在有什么办法？他的牙，原来是全家最好的，整整齐齐的一口白牙。坐了几年牢，说不定得全部拔掉。不知把人整成什么样子了？

几天后，我偶然翻开小女儿的日记，又开始为孩子担心，她脑子里装了很多东西，又要写出来，岂不是惹祸？晚上，我悄悄对她说：“你现在不要记‘日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天津的南开大学就批判‘乔莎日记’那也是个干部子弟，日记上写了对一些事不满的话，人家就说她反动，批判了不知多少天。你千万不要再写了。写出的统统烧掉！”

在这期间，两个大孩子陪我去看过病。三妹也为我费尽了力，总不见好。在北京认识的中医，我又不好去找，怕给人家增加政治负担。我只得写信给南昌中医院的陈茂梧老中医。把病历寄给他，说明我曾两次到他那里看过病，现在又生了新病，求他开个方子。他真好，给我寄来了药方，我托人拿去配好，吃了几天，就逐渐见效。这种药我一直吃了半年，就完全好了，我又能看书报了。心情有点舒展。

说话就到了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开始焦急了。这半年来，景范的消息全无。有人说，他换了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托老于打听。他也听说景范换过几个监狱，有人在秦城监狱还碰见过他。这是不是可能，很难说。

有人说，把他转到了“政法干校”。我和阿姨就到政法干校周围散步，边走边侦察。走了几周，只看见些大楼，看不见一个人。

我心里不安，外地没有亲属来，就没有借口去探监。只小女儿一人去，我又不放心。只好托地质部的项目人员去送东西吧。

地质部的项目人员，虽然都提审过我，但也因此熟悉起来。如今主事的，是那位“憨厚老三”。这人是工人出身，不太猖狂，言语也不多。我们买了衬衣、衬裤、毛巾、布鞋，又找了旧的短袖汗衫、夏布旧裤。买些水果罐头、麦乳精之类。阿姨去找“憨厚老三”，请他给景范送去。

这次憨厚老三告诉阿姨：“夏布衣裤不能带，水果罐头更不能带。

监狱里禁止有玻璃，铁皮之类的东西进去，防止犯人自杀。”

听阿姨回来一说，我明白了，就说：“能送进什么就算什么吧，请他拿个刘景范的收条回来。”

“憨厚老三”果然送去了，也拿回了景范亲笔写的收条。我这才放了心。他还活着，仍在原地方。他也会知道，我仍在北京。

刚把景范的事放下，又听到了马明方的消息。知情人说：康生、江青把迫害干部的机构分成三个办公室，名曰：中央第一办公室，是专审党政干部的。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属于“一办”。中央第二办公室，是专审军队干部的。中央第三办公室，是专审叛徒、特务的。明方就是属于第三办公室管，这个办公室设在公安部。明方曾关押在“政法干校”。虽然是学校，却跟监狱是一个样。只是因为监狱都装满了，有一部分就关押在“政法干校”或“交通干校”。我们这个混乱时期，到处关押的是人。北京城内有监狱，东郊、西郊、南郊、北郊都有监狱。除此之外，有些学校也变成了监狱。许多机关、厂矿都有自己的小监狱。秦城监狱，那是从前关押高级战犯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了关押国家干部的地方。

我和阿姨又一次去政法干校周围转悠。不是为了看景范，而是想碰运气，看是否能得到马明方的消息。听人传说：他有病，神经受了刺激。他每天叫着：“我没有问题！我不是叛徒！”

这些消息都是钻心刺骨的。当年我采访过他，他的项目组也不止一次地提审过我。他是东北局的第二书记。他的问题中，有一部分是受我的牵连。有一部分是康生、毛远新之流伪造的，说新疆狱中出来的人都是叛徒，明方被诬蔑为叛徒首领。

我的书，株连的人太多，这使我的心像被撕成了碎片。我很想见明方，告诉他，我的书中没有高岗（虽然这样作并不正确，也不客观），让他放下这个包袱。我在那条河周围走来走去，却始终不曾找见他。

后来又听说：明方住了医院，属于监外就医，仍被人看管着。在医院里也是“犯人”。他不知被惨害成了什么样子？

再过些时候，听说明方死了，他是含冤而去了。我的心碎了，又失眠了。

明方的笑脸，总在我眼前过来过去。我和他见面虽不多。但他那诚恳坦率的态度，使我深感他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的。他把一切他能记得的有关刘志丹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对那些坏人坏事，他也毫不隐瞒。使我对那些“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狰狞面目和给革命造成的危害了如指掌。他给我留下的是无价之宝，使我能把那些坏人坏事都揭示给世人，使他们在史册中永无藏身之地。

我永远记住马明方这位良师益友。永远感谢他！

#### 三十四 继母探监

一九七三年听到个好消息，说周恩来总理在对延安的干部讲话中说：刘志丹同志是好的。是英雄人物。

周总理说：一九三六年东征抗日时，我和刘志丹走的是同路，一路走，群众都围着他。有的从几十里以外跑来看他，瞎子也要摸摸他，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那些情景，要是写成小说，就是真正的典型素材……

于是，到处传抄那份讲话。周总理不但再一次肯定了刘志丹，也提到一九三五年搞错误肃反事件的人和事，还点名批判那些杀人放火者。

我又放下一个包袱。自从一九六二年我的小说被打成“反党小说”之后。康生领导的项目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央项目组，就借机鞭尸，甚至重新审查刘志丹本人。康生之流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千方百计地妄图否定刘志丹。这些，在提审时表现得很露骨的。

听说，西安曾发生这样的事，在“文化大革命”热潮中，有人冲昏了头脑，以为王明“左”倾路线又要统治中国，便配合康生的旨意，想要捣毁“志丹陵”，取消“志丹县”。那位支持造反派的省委书记，已经找刘志丹的亲属谈话，要他们表示态度。家属说什么呢？只能说：“请中央决定”。

还有人趁机贴刘志丹的大字报，有人偷偷给刘志丹编造了十大罪状。周总理讲话后，贴大字报的人跑到刘志丹夫人面前“恭喜”。有人问：“你不是给刘志丹贴了大字报吗？”他说：“没有，我咋能那样作呢？”这人事后竟然去哭志丹陵。边哭边说：“你要不死多好呀，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真是两面派！

“文化大革命”对历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都视为‘自己人’，没有被点名，更没有受到冲击，顶多是机关里的群众把他们闹一闹，便又被保护起来。他们还可以在全国串连起来翻从前的“左”倾案。他们在西安约了一位老搭档，分配给他写“刘志丹十大罪状”。那位受命干黑活的人，在干部会上被人质问道：“请你把十条罪状拿出来吧！”他说：“上边有人要，我凑不起来！”

大批老干部恸哭流涕：“老刘又一次翻了身。要不，我们大家都成了反革命。跟随他打了多少年仗，被内部的坏人一回又一回地打击。要不是总理说话，所有跟随老刘工作的人，全都会含冤致死……”

周总理的讲话，给了我精神支持。

一本小说，株连了几万人，可算是国际性的创造发明。虽然我很痛心，但它说明了很多问题。

周总理的讲话，总算是严冬的一股暖流。人们的脸色，也逐渐有了些血色。景范的继母，由西安到了北京。我虽然身体不好，也热情地迎接了她老人家。我们躺在一张床上拉家常话，她很关心景范，问来问去。我请继母去看景范，送点东西，透点家中的消息。

那时我只要见到亲属，都想请他去看景范。可惜有些亲属还不敢去探望，怕沾上边，被审查。

继母很仁义，答应去探监。

我们把东西买好，又写信送去中南海西门。三天之后，“憨厚老三”来了。他说：“中央项目组要求调查他继母和刘景范的关系。她几时嫁到刘家的？她来时刘景范几岁了？”总之，扯的事很多。查了几个回合，才同意继母去探监。

又来了两个军人，还是上次那两个人。

他们走后，我对继母说：“去探监的路很远，和他们坐在一辆车上，可以说几句话。问他们：刘景范犯的哪一条法？你们能给我说清楚么？要是没有犯法，就应当把他放出来。”

继母不识字，只是答应着。她头脑是清楚的，我对她多说了几遍，让她能记住。

那天，还是索拉陪奶奶去的。中央项目组一点也不照顾老太太，明明看见老太太是小脚，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让她换乘几次公共汽车，再到交通部门口搭他们的车。似乎把车开到家门口来接一接老太太和小姑娘，就触犯了“无产阶级”的尊严。

索拉一手挽着奶奶，一手提着东西去探监。回来时，下了大雨，戴领章帽徽的军人，硬是把老太太和孩子甩在交通部门口，让孩子和奶奶在大雨泥泞中跋涉。

祖孙俩进门时，全身都湿透了，两双脚全是泥。我帮老太太脱掉衣服，安顿在床上躺下，阿姨熬了姜糖水，让奶奶和孩子都喝，又连忙冒雨跑到街上给老太太买小脚鞋袜。

我躺下问继母：“景范怎么样？”

继母说：“我摸摸他的脸，他的腿，都是肿的，揣揣肚子，也是胀的，怕是生了什么病。”



我问：“你在车上给项目人员问了那些话没有？”

继母说：“我问了，没用！那些人都像些泥塑的菩萨，不顶用。是些砸不烂的石头疙瘩！”这就是一位陕北的家庭妇女，一位善良的老母亲对中央项目人员的看法。

### 三十五 刘嫂子探监

听妈妈说，景范有病，我的心又紧缩起来。“植物神经紊乱”刚见好，心脏又极度衰弱，毫无力气，只能躺着，真盼有人再去看景范一次。

我正坐卧不安，刘志丹的夫人——景范的嫂子（西北老干部都称呼她为刘嫂子）到了北京。嫂子是来开“人大”会议的，她一到就来看我。我们同床共枕，说了一夜话。我又请嫂子去探监，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索拉又照样写信，送到中南海。照老规矩，三天后，来了两个军人。一个是胶东人，一个是河北省口音，自称叫李庚民。他们还是老样子，要孩子陪着大妈到交通部门口上车。土地革命时期，他们就把姓刘家的人都当成了“反革命”家属。那是一九三五年，刘志丹和刘景范兄弟俩被“左”倾机会主义者逮捕后，嫂子就当过“反革命”家属。四十年后，她为了弟弟的冤狱，又当了第二次“反革命”家属。

嫂子这次探监，看得更细心了。回来后对我说：“这人是病了，肚子都是胀的，脚下像踩着棉花。再不赶快弄出来就要出事了。”说着，嫂子哭了起来。

我说：“嫂子，用你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吧，要求把他放出来。”

嫂子说：“给毛主席写信，顺便把江青也挂上一笔，要不，她会给咱们捣乱的。”我不愿提江青，嫂子说：“你不懂策略，挂上一笔，问候一句怕啥？咱们是为救咱们的人嘛！”

我照嫂子的意见写了。大意是：刘景范已坐了七年牢，现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要求把人放出来检查身体，治疗疾病。还得加上：他有错误，出狱后也可检讨改正。

这信用挂号寄出后，嫂子怕不顶用，不放心。

这几天嫂子在北京，又去看了一些刚被解放的老同志，他们都支持她去找总理。张策同志对嫂子说：“不管咋样，先把咱的人弄出来要紧。”都是兄弟之情。

嫂子跑去看邓颖超大姐，请求总理说话，放出刘景范。那时总理已病在医院，邓大姐接见了嫂子，问了我们全家的情况。

嫂子回来说：“邓大姐细心着哩，把你的每个孩子都问到了。大姐虽然也有难处，她还是答应请总理过问这件事。”

嫂子悄悄对我说：“看样子，邓大姐好像也受着监视。她说话时总有几个人在跟前。”

我真感谢嫂子。感谢邓大姐和周总理。同时我内心也难过，总理有病，大姐有难处，咱们还去给他们添麻烦，于心何忍？

果不其然，嫂子的信，周总理的过问，都起了作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李庚民和胶东人来了。他们把我的全家人：嫂子和我、小女儿，都叫到一块儿，就在我住的房子里，向我们宣布了毛泽东主席对刘景范案的批示：“宣布释放，免于追究”。而且把复印件拿给我们看了。

我们全家都很激动，真心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感谢毛主席！”

李庚民当场说：“自从接到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就到处跑着为你们找房子。虽然还没找到合适的，明天就把刘景范接回来，你们在家等着。明天上午九点，我们来车接你们。”我问：

“这次让我去么？”

他考虑了一下，才说：“你也可以去。”

由于这一批示，我也可以探监了。分别了七年，我们没见过一面，没通过消息。

这天晚上，我们和阿姨四人，集中在一个房子里睡觉。谁也睡不着，话也说个不停。

我又是喜悦，又是难过，心情很是复杂。那阵狂喜过去之后，我渐渐冷静下来，心中想道：这‘免于追究’是何意思？是不是说，问题还是有的，只是因为上级宽大为怀，不予‘追究’罢了。让你感恩戴德，永生不忘。可是，这能算是清楚了吗？刘景范就因为妻子写了一本小说，坐了七年牢房，释放时总该说个明白，怎能只这“免于追究”四个字？

### 三十六 刘景范出狱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上九点，李庚民他们按时来了。我和嫂子，索拉全去了。车先把我们拉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已要了两间房子，让我们先住下。我们一看，这两个房子，共有八个床位，大孩子们回来也够住了。

等到下午，胶东人和李庚民又来了。见到我，走在前面的胶东人先伸出一支手，意思是今天可以和我握手了。既然“免于追究”，大概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可是我却不愿领情，把手缩了回来，并放在了背后，心想：我还没有把你看成朋友。现在的问题并不算彻底解决。后边跟着的是地质部项目人员“憨厚老三”。他和我握手时，我伸出了手。因为他不是决策人，也比较讲理些。他还为我们家帮了不少忙。我和他紧紧地握了手，以表示谢意。

李庚民说：“这里的房子不合适，没有大房间。现在又找到另一个地方，走吧，都到那里去！”

两辆小车同行，又把我们运到万寿路西街七号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在第二栋的第一层，给了一个大房间，两个小房间。

把房子安顿好，才坐车去秦城监狱接景范。

到大门口，我抬头望去，大门的上方有四个大字：“秦城监狱”。进了监狱大门后，拐来拐去，拐进一个小房子，像是个接待室。我们进去不久，景范由人陪着出来了。我们彼此看了看，没有说话。

李庚民又向刘景范宣布了一次毛泽东的批示，给景范看了复印件。李庚民还说：“审查干部，是党的权利，事出有因嘛，希望你们要正确对待……”

我没说话，内心已起了反感。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走。两辆汽车开着，把我们送到了万寿路招待所。

我们一住下，他们就走了。这里是中组部的招待所，晚上要登记。还必须说清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要住多少天？

我说什么呢？只得对值班人员说：“从监狱里来，不知到哪里去。要住多久，更不知道。房费，谁找的房子，由谁来付。我们都是刚放出来的犯人，无钱可出。”

把值班人给说愣了。

### 三十七 招待所中遇故人

我们住在招待所二栋一层进门左手的第一个房间。有一间很大，约有三四十平方米，客厅兼卧室，里面有三张床，我和景范住在这里。对面有一个小单间，是给嫂子住的。楼上看一个单间，是给小女儿和阿姨住的。

景范出狱的消息传出后，亲戚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结果是沙发上，地毯上，到处睡的都是人，可真成了大家庭。要招待这么多亲属吃喝，送礼品，打发路费。怎么办？只有去借“冻结工资”，因为我们的工

资都还没有照发。两个大孩子没有凑上这个热闹，她（他）们是春节前才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赶来的。

这消息传得真快，在北京的熟人，老乡，接连不断地来看。开始几天，感到的只是兴奋，劫后余生的兴奋。过了几天，景范就有些疲倦了，他的身体不好，有些浮重。我们跑回真武庙那个四层楼上去躲着休息一天，做点什么想吃的东西。谁知这里也躲不住，有些朋友追了来，真是无比的热情，又是喜悦又是激动，说个没完。我见人总要说几句抱歉话：“为我的书，叫你们受罪了！”

他们都回答说：“这不能怨你，人家就是要借这件事打咱们嘛！”

他们说的是真话。这么大的声势，这么大的轰动，我没有说一句能“打倒人”的话，没有给任何人栽赃，没有让康生指挥的项目组捞到什么稻草。我内心是干净的，因此我不但脸是笑的，心也是乐的。

有人告诉我们，毛泽东对景范的批示是二十个字：“此案审查已久，不宜再拖。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而他们只传达了：“宣布释放，免于追究”八个字，他们贪污了毛泽东的十二个字。为什么这样？显然那些字是批评了项目人员，甚至是批评了康生等人，嫌把案子拖得太长久，整整拖了十二年，最终还是一笔糊涂帐。依我想，如何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恐怕是与康生、曹轶欧、郑平年商量过的，否则李庚民他们也没这么大的胆子。

问题并不算完，只是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可以参加各种学习会了。但那紧箍仍在头上，他们仍可随时念动紧箍咒语，使我们翻不过身来。

在招待所，大家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开头几天，人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瞅我。然后是喊喊喳喳：“这就是 xxx……”，大家对我很客气。认识的人，也很亲热。心情正像浩劫之后遇见亲人一样。我有个二妹，专门从贵州跑来看我。在真武庙一进门抱住我就恸哭一场。不过，我

没有哭，也不打算哭，只是在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盘算着将来如何讨回这笔帐。

有一天下午，我和家人从街上散步回来，一进门，看见个高个子，穿一身浅灰衣服，在院子里散步。他直来直去，旁若无人，好像不准备和任何人打招呼，从侧面看，很像周扬。我没敢认。因为从一九六二年后，我再未见过他。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哪里挨斗了，又在哪儿做过肺部手术，还在哪儿关押过。在大动乱期间，批周扬的文章数也数不完，甚至有人说他是“叛徒”。就在那个时候，姚文元写的《评周扬的两面派》，其中还点了我的小说，说周扬接见过我这个“反党分子”，还看过我的小说，这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因此，我经常关心着他的下落，想见见他。可是他到底在哪里呢？又不好打听，因为报纸上还在批判他。

在食堂吃饭的人很多，有的是打回去吃，有的坐在食堂吃。记得清楚的有：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宁夏省委书记杨静仁、副书记马玉槐、杨一木。原陕西省委书记舒同、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原交通部长曾生、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卓雄、西南局副书记程子华、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老文化部副部长冯乃超、山东政协主席霍维德、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原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齐齐哈尔市委书记薛蓝斌、青海省省长孙作宾，副省长马万里、原青海省委书记高峰等。他们有的是从外省来北京治病，有的是来申诉，有的是待分配，有的则是刚从囚禁中放出来，还无家可归。

这些人，都是职业革命者，把自己一生投入了这个行列。他们没有为自己留后路，没有私人家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更提不上有什么私有财产。所有的只是一腔热血，一个信仰，靠这些支持着他们的躯体，支持着他们向前走的勇气。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这场动

乱中都有部血泪史。

听孩子们说：宁夏省的小学课本上还写着杨静仁和马玉槐是赫鲁晓夫在中国宁夏的代理人。真是笑话，要打倒谁，谁就是赫鲁晓夫。

我本不知道杨静仁在这里。在楼道里遇见了马玉槐，他向我打招呼，我问他是谁？他说：“马玉槐，是宁夏的‘大洋马’么！”他是回民，被打得很惨。从他嘴里我知道了杨静仁在这里，但未见到，那是延安时的熟人。一九四七年，我们一块在陕北的绥德县下过乡、多少年了，再未见面。经过这场灾难，还是想见见这位熟人。我在食堂里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他，我上前自我介绍：“我是李建彤，你是杨静仁同志吧？”我伸出手和他相握。他苦笑着说：“你还敢认我？”

“怎不敢认呢？景范也在这里，你们见见面吧！”我拉他到我们吃饭的桌字上。景范见了他，很热情。看样子，杨静仁家的灾难也不小，他显得很拘谨，话很少，好像重压仍在身上。

自那以后，我就到他房里看他的夫人和孩子。他的孩子也到我房里找我的小女儿玩。孩子们都受过很多委屈，摔打，波折。但是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了。想起啥说啥。

甘肃省委书记汪锋的遭遇，简直不能提了。他在大乱开始，便是被毛泽东点了名的四个“三反分子”之一，和何长工并驾齐驱，到处拉着游斗，几乎把他斗得脱下一层皮来。而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被红二十五军当“反革命”从陕南拉到陕北关押的。那次他是为营救张汉民，怕这位地下工作的旅长被红二十五军杀掉，带着上海共产党的介绍信，去见二十五军的领导人。但是张汉民还是被红二十五军杀害了，汪锋自己也被当成是张汉民的“反革命同伙”，被他们拉到陕北。他早年就投身于革命，在红军、白军中都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可现在，他在这个招待所里，又受到不公正待遇，服务员可以随便对他开批判会。如果他吃了水果没扫地，便是服务员的一种借口。须知，

这个招待所，是受“四人帮”控制的。

我们彼此都到对方房里坐坐，叙叙旧，看看他的夫人和孩子。说起甘肃，他感叹不已：有的老干部经不起考验，成了软骨头，遇事就去向坏头目汇报。弄得老战友也不敢多来往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提倡串连。那时，我们的问题尚未在群众中公布。我的孩子也参加串连。我告诉孩子如去西北，不能到甘肃参加斗争汪锋的大会。如去上海，不能去参加斗争陈丕显的大会。总之，不可参加斗争任何人，只是游逛一圈。什么地方的“革命”也不要参加。

在食堂吃饭的人，都指指点点地说蒋南翔是硬骨头，始终坚持着他的教育方针。他表示：不让我办教育就不办。若让我办，还是坚持我的做法。愿斗就斗，愿关就关，我不在乎。我和景范特地上楼去看他。房中只有他一个人。问起孩子，他说孩子有时也来看看。问起夫人，他们已经分道扬镳了。我们也听说，他们的处境不同，精神境界各异，这样的夫妻，离了也罢。

### 三十八 招待所里的怪事

凡是受我株连的人，我时刻注意着找到他们，想见上一面。我心地坦然，没有出卖他们，更没有说过不应说的话，我愿意登门去宽慰他们。

前个时候，我们去看过一位老红军。我是把他当作受株连者，到医院看他。我们很热情，可他却只是回避，使我莫明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当阎红彦诬告我时，他也是参予者之一。他心中有鬼，不好正面对话了。当我知道底细后，就再也不去看他了。

我还是惦着周杨和宋任穷两位老同志，随时在注意寻找他们的下落。



在食堂里，可以碰到很多人，就是碰不到周扬。他在哪儿吃饭呢？我找了几天。有一个下午，我去打开水。在锅炉房里碰见位白发苍苍的夫人。走近看，很清秀，像是周扬的夫人。我冒叫了一声：“苏灵扬同志！”

她仰脸望着我问：“你是谁？”

我们还是在延安时见过面，进城以后从未见过，一晃就是三十年了。如今我被整得人老神衰，她当然不会认得了。我答道：“我是李建彤呀！”

“哦！你也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忙问：“周扬同志也在这里？”

“在！在一号楼二层西头面北的最后一个房间。”

第二天下午，我便跑去敲门，出来的正是周扬老师。隔了十四年，他也不大认得我了。他问：“你是谁？”

我说：“我是李建彤，来看看你。”

进房子坐下，我先问他的身体怎么样，并说：“为我的事，也把你害苦了！”

他说：“还可以！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么？景范呢？”

“他也在这里，我们是去年十二月底来的。从监狱刚出来。”

今天我来，是想给他卸掉一个包袱，使他轻松一点。因为我脑子里老是想着一九六二年我写给他的那两封信。一封是批评阎红彦的为人，一封是批判阎红彦的文章的。这两封信，曾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印发过，周扬老师交出信的出发点是想说明：你们批评李建彤的小说。李建彤对阎红彦的文章还有意见呢，大家看吧！而康生他们却把这两封信当作我“反党”的另一个罪行印发的。为此事，周扬也挨了批，他们把那两封信作为小说的附件整了十几年。而对那两封信，我从来没有检讨过。始终坚持我是对的，阎红彦是错的。但事隔十四年，周

杨本人并不知道。我不能不告诉他。我说：

“一九六二年我写给你的那两封信，就是批评阎红彦的那两封信，我没有错，无论他们如何整我，我始终没有检讨过。如果说“反党”，是他反党，不是我反党。十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个态度。希望你也不要再惦着这件事了。虽然案子还未全部澄清，但决不会使水倒流。因为我是对的……”

“呵！原来如此。”周扬老师很意外，为此事，不知他做了多少次检讨。

头一次，也就说了这么多，我赶快告辞。周扬老师把我送到楼梯口，我回头对他说：“如果你的身体能走动，到食堂吃饭吧，我们都在那里，可以吃热饭。”

从周杨老师那里出来。我就去看宋任穷老人，他住在后边小楼里。当然，我去也是慰问。因为在这场大动荡中，他也受了我的株连。沈阳的大街上写着大标语：“打倒宋任穷！宋任穷支持李建彤为高岗翻案！”还有些东北的小报，我也看见过，上边造尽了谣言。我对东北来的项目人员提出过质问：“谁给你们提供的材料？你们造谣！”

宋任穷已被整得驼了背。我问他：“是否被人打坏了？”

他很开朗，笑着说：“没有打坏，你看，我的膀子还很灵活。”他动了动膀子。

我向他述说了东北项目人员几次来北京提审我的情况，逼着我揭发他，都被我顶了回去。我质问他们，他们又答不上来。“你是原二十八军的政委，和二十六军毫无关系。怎么能扯上高岗呢？”

他笑着说：“要扯么，用什么方法也可以扯上！”

他的夫人钟岳玲大姐招待我喝了茶，吃了水果，又说笑了一阵。宋老说：“明天我看景范去。他比我吃的苦大。”

在这个院子里，虽然有这么多熟人，除了吃饭、散步能碰上，互

相打个招呼，互相来往的并不多。这里并不太平，大家的问题都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都有意回避。

听小服务员悄悄说：中央组织部常派人来了解情况。有些人，还负有向他们汇报的任务。我才明白，这里也有特务。康生选拔郭玉峰了当组织部长，还有个副部长郑平年，也是康生的亲信，郑还当过我们的项目组长。他们派人到处为康生搞情报。

“批邓”的运动又来了，郭玉峰的人通知宁夏，要把杨静仁接回去，说他是邓小平叫来谈工作的，不能留在北京。来人还查了传达室的会客单存根，要杨静仁交代和这些客人都谈了些什么？听说杨静仁回宁夏后，“四人帮”的人还在找茬儿，说他是“走资派还在走”。

我的小女儿，很有音乐天赋，因为家遭冤狱，影响深造，她当了中学音乐老师。我回来后，又借钱给她买了架新钢琴，每天下班回来弹一阵琴。为这钢琴，引来了许多孩子。说是孩子，其实都有二十岁左右，还有近三十岁的。都是这里住的老干部的子女。也都是因家长遭迫害而受影响，弄得他们得不到工作或学习的机会。他们在我房子里，听着琴，就唱起来。突然，门外有人骂街：“这还像个招待所吗？连他妈的钢琴也搬进来了。我们这里从来没人弹过这玩艺，谁要是想弹，就他妈的出去，不能在这儿住！”

我出去一看，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一付凶像，还带有几分醉意，大大咧咧的，就好像这招待所是他们家开的大车店。我说：“我的孩子是音乐教员，她的工作需要弹钢琴，如果谁不让在这里住，去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我们可以另换地方……”

女服务员小李忙把我拉了回来，低声说：“您甭理他，他原来是这儿的一个勤杂工，没什么文化，文化革命来了，这个痞子当上了造反派的小头头，变得又混又横，跟他讲不清道理，以后再说吧……”

这些在大动荡中摔打出来的孩子是什么也不在乎的。有个姓曾的

女孩子，大声叫起来：“拉拉，弹！管他那一套，谁不愿听，让她把耳朵堵上！”

这里有一群青年，宋家的、叶家的、曾家的、任家的等一些老同志的孩子们，他们不怕造反派，不怕“四人帮”，一生气就骂人。

### 三十九 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这场“文化大革命”，闹得我很疲倦，脑子也被闹坏了。刚被关押时，一天有多少拨儿来提审，我都不在乎，可以对答如流，也可以随时反击，使那些想捞些稻草的人钻不了一点空子。自从到江西害了几次病，回来后又患植物神经紊乱，脑子就坏了。过去的事情，一点儿也记不起来，我真有些发怵。要写东西的人，脑子怎么能失去记忆呢？

一个熟人，把我带到了一位姓张（张协和）的老中医家里。这中医确实不错，从前我也认识，只是不太熟，这次我特地上门求他治病。

一听我这个臭名，他就记起了，对我很热情。我坦率相告：“我的脑子坏了，将所有的东西统统忘得一干二净，怎么办？我现在是一片空白，几乎把自己也要忘掉。”

大夫给我诊了脉说：“吃鸡蛋，每天吃一个或两个，不用多，怎样吃法都行。”

我问：“不是说鸡蛋的胆固醇高么？”

“不要信那一套。现在的新数据说，把蛋黄儿和蛋白一块吃，还是降胆固醇的呢。”我很信任他，回招待所立即照办，每天坚持吃两个鸡蛋。真的逐渐生效了。

过了几天，张大夫来看我，给我带来个礼品，是老战友朱丹托他带的。他们是老同学，同乡，常有来往。礼品是一枚珍贵的图章。是朱丹亲手在一块名贵的玉石上篆刻了“建彤”二字，侧面又刻上一行

小字“一九七五年国庆前夕为建彤治印以作纪念请予晒存盖此名字深有纪念意义也。”下边署名“老丹时年六十。”

这是友人的深情厚谊。

我看后暗想：这个胆大的老朱。“四人帮”还在猖獗，他就敢这样作。我的问题尚未解决，我仍然是“反党小说”的作者。老朱真不怕死啊！真的像他从前说的：“不怕！我把一切都看透了！”

我决心去探望他，约上张医生一同乘公共汽车去。老朱住在广渠门的垂杨柳文化部宿舍，我住在西郊万寿路，老张住在西城二里沟东口，三人住了三个方向。我和老张约好同行，一路上换了几次汽车，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到老朱家。

这两位山东大汉一见面笑得哈哈响。

我们是劫后相逢，都说了些“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也只是寥寥数语，无暇细说。只想对他说些别的话。我觉老朱对人太诚、太赤，简直就是“老儿童”。只要给他三分友情，他就对你无话不说，因此他经常吃些亏。这次我想敲打他几下，叫他警惕些。

因为他太实诚，为我看过《刘志丹》小说的一、二、三稿。最后一次，他在每页上都作了眉批。他说，他要像“脂砚斋评石头记”那样认真，永远留存。那本书送还我后，我当然很珍惜。但当我被提审、抄家时，我再也无法保存，又舍不得焚毁，只得托给老朋友刘迅，并安顿说：“请你保存吧，或者交老朱自己保存，千万不要毁掉，将来我还是要用的……”

当一九七二年我回到北京，向刘迅的家人询问过老朱。老朱当时处境也很恶劣，他正被人咬住不放，牵进了另一个案子。他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笔迹了，只得忍心割爱，亲眼看着让刘迅焚掉，虽然都很痛心。后来，刘迅也发生了别的事，说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逮捕了。

这些不愉快的事，我全不提，只告诉他：“一九六二年项目委员会提审我时，没收了我的全部采访记录和笔记本，在本子上看见过你的名字，追问时，我只说：“朱丹看过，但他提不出意见，因为他不了解西北的历史。只在文字上提些意见，例如：不要用五四语言。”

老朱笑了。他说：“是的，为《刘志丹》小说，是斗过我几次。但他们没有一点材料。我就料到是你把了关……”

我又把话岔开，谈谈对这几年来怪现象的看法。我先问：“你看这局面长得了吗？”

他说：“长不了，要能长，中国必亡！”

我又说：“今天把我的看法全告诉你吧。我翻阅了一些书，对照了一下，中国现行的什么主义也不是，只是高压加弄权。实质上，他们的作法和马克思主义实是相抵触的。凡是马克思批判过的东西，他们全干了。马克思表扬的东西，他们却不干。他们是利己主义，只拿马克思主义哄人，把我们这些人也骗了。看看江青她们操纵的《文化部》、《人民日报》，尽弄去些小瘪三，惹出多少笑话！再有，现在根本没有法制，是一个将军一个令，中国人该倒霉。目前，中国是最乱的国家，愚昧之国。”

彼此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绝对一致。我该起身了，临走时我说：“就算我没有来，什么话也没说”。又是心照不宣。

我和老张同路往回走，半路上分手，各回各家。虽然很累，却也兴奋。朋友们都很勇敢，老张不怕引火烧身，老朱也不怕惹祸。都很仗义，有此足矣！

回到招待所，又遇见当年地下室中的难友钱凝来看我。一见她，还是那样，清瘦清瘦。我一想，这客房里不能说话，怕有窃听装置，便约她出去散步。一直向后院的苹果园走去。这院子最优越的地方就是有个苹果园，可以去散步，可以和朋友说知心话。

钱凝这次来是告别的，她要去美国。她要求了几年，都不让她去探亲，因为她戴着“右派”帽子。现在她弟弟来接她了，弟弟是“美中友协”的成员之一，在美国算左派人物。这次是随体育队来的，各方面已经协商好，要接姐姐走，她们夫妇同走。她问我：“你看我带不带孩子？”

“你的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十岁，最小的不到七岁，如果有人管，当然可以不带。你的打算呢？”

她说：“实话你说吧，咱们在地下室一同关押出来后，我就随某研究所到了陕西蓝田县，在那里我更受气。他们把我的孩子当狗对待，不让吃饭，打着让孩子吃屎，说是特务的孩子……”

听完这话，我心里又冒起火来，这是人干的事吗？于是我说：“带走吧，让孩子逃个活命！在这里不当人看待了。全家都走吧！什么时候局势好了再回来。”

她沉默着。

我说：“咱们这里肯定会好转的。你在外边会干出个名堂来。你的脑子好，有条件，会四国外语。可以为中美友好交流做很多事。等你有了大名气，再回来吧。”

她点点头说：“我全明白，比如像 XXX 博士，从美国回来一趟，多少大人物接见呵！登报、宴会、照像。可是有许多大学教授都有反映：他回来的晚是贵宾，我们回来早几年的都成了‘反动权威’，咱们认幌子，不认真人！大战犯的子弟比我们吃香。”

什么都明白，就什么别说了。

钱凝又问我：“你的小说呢？我可以帮你的忙。只要我出去，就可以帮你出版。”

我说：“你就不要管我的事了。‘小说’的事，由我自己办。肉既然在锅里，就在一个锅里先炖着吧。我已经忍耐了十几年，还可以再

忍耐下去。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强，当然反抗力也最强。”

我又补充一句：“还是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出去后不要骂咱们的国家。也不要提你认得我。”

#### 四十 劫后余生的人们

我又病了，发高烧到 39~40 度。打针吃药，拖了一个多月，才逐渐好转。

一次我出去打针，在院子里碰见原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篱，他拄着拐，双腿弯曲，一步一蹭地向前挪，我和他打了招呼。他是位早年献身革命的老同志，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现在也是刚从共产党的狱中放出来，身体搞坏了，成了半残废。康生唆使南开大学的“八一八”造反兵团去抓“叛徒”，把许多老干部都打成了“叛徒”。这些人曾受尽敌人的酷刑，现在又被诬蔑为“叛徒”。

我问到他的孩子，他说：“小妹在工厂里做工。”她说的小妹，在实验二小和我的小女儿索拉是同班同学。如今也有十七、八岁了，也是不让上高中的倒霉孩子。

说着话，远远走来的是杨一木，宁夏自治区的书记，人称“二杨”（大杨是杨静仁），他是来看景范的。在这次“文革”中，他是第二次来北京。第一次，是康生命令他来的。住在西苑饭店，要解决宁夏的“青铜峡事件”。所谓的“青铜峡事件”，就是宁夏的两派：一派是造反派，康生支持的。一派是保守派，康生反对的。双方打起来。康生下令，命兰州军区的政委，调遣驻守固原的一个团兵力支持造反派，打保守派。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康生支持开枪开炮，打死保守派一百多人，在田里种地的农民也被打死不少。造成了血案。

血案一形成，康生又借机找岔儿，说是扬一木指挥的。为什么？因为他把杨静仁、马玉槐搞得不知去向，只剩杨一木一个人了，这位



“二杨”只能硬着头皮搞生产，否则大家都没有饭吃。就是这个搞生产的人，又被造反派拉到各县去游斗，最后又拉到北京。康生一见，原来认识，是老对头了。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康生大张旗鼓搞“抢救运动”，逼出了许多“特务”。之后，有人向中央提出了意见。上边不得不下令“甄别”。康生又当了甄别委员会的主任。老杨是西北局参加“甄别”的委员，曾为了一个案子的甄别，得罪了康生。

这次，定要老杨承认他是“青铜峡事件”的指使者，在西苑饭店关了他二十一天，每天有人监视着，逼他写材料交代“青铜峡事件”。到了第二十八天，老杨索性写道：“青铜峡事件，杨一木一字不知。”

又把老杨弄到宁夏批斗，有人拿着赶大车的长鞭，照他脸上抽：“打死这个杨静仁！”有人拦住说：“他不是杨静仁。”造反派连人也未弄清就乱打。斗得老杨患了心脏病。万般无奈，向人悄悄借了一千块钱，搭上火车去上海治病，然后又转到北京。住在这个招待所里，还是治病。

院子里又来了一群女将，是来看望朋友的。她们当中，有贾拓夫的夫人白茜。贾拓夫被诬为“习、贾、刘”反党集团，被害致死，留下孤儿寡母，令人痛心。白茜见景范身上穿的新棉袄，便感慨地说：“到底还是有个家好嘛，李井泉就没有这样的衣服穿。他没有了老伴。”我看见过大字报，李景泉的老伴被江青派的人逼得自杀了。又拆散了一家人。

同白茜一块来的还有白烈菲，是烈士的后代，是原农业部副部长朱敏的夫人。朱敏也是刚从狱中放出来，双腿不能走路，烈菲只得尽心照顾。两位白大姐还带了一位“囚犯”的妻子——陶明霞。明霞是从南京来探监的，她丈夫原是江苏省委书记陈光。被打成“五·一六”头子，拉到北京押了起来。据说：江苏省打了四十多万“五·一六”

分子，都曾被关押过，陈光被押到北京，算是最重的了。明霞说：她到监狱探了陈光，他的身体坏了，手是颤抖的。明霞也是个病人，得了乳腺癌，刚刚作过手术。

马明方的夫人马淑良也带着小女儿搬来了，要给明方办后事。明方死得那样莫名其妙，是冤死的，也是气死的。可怜他的女儿小芳，成了疯子，二十多岁了，还像个幼儿，只知道爸爸是马明方，其它什么也不清楚。淑良说：“这孩子神经本不太好，“文革”中在东北斗明方，孩子哭着说：“我爸爸不是叛徒，不要斗嘛。”造反派就打她，越打越疯了。现在怎么治也不行了！”

好可怜的一对母女。

这里还住了几个寡妇，青海省的，甘肃省的，都是西北地区省一级领导干部的妻子。

#### 四十一 刘景范的狱中生活

很自然，我要问景范在狱中的情况。

我先问的是，他为什么从卫戍区到了监狱？给了人家什么借口，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简要的说了几句：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下午，他被送进卫戍区之后，又换过些地方，穿军衣的中央项目人员，带着地质部的项目人员，常去审问他，还用野蛮的办法，拳打脚踢。要他承认小说是他写的，他是反革命。他不承认，就把他打翻在地，在甌上泼了凉水，拉着他的双脚，在地上转圈儿，直磨得他满身是泥，衬衣和肉都磨的稀烂，才算罢休。

听到这些，我好像看见希特勒的党卫军在审反法西斯战士，好像他进了德军集中营。还有一种刑法叫“坐飞机”，两个人架着膀子向上搬，有的还用两个大汉在前面踩着脊背，再用两人拉起他的两条膀子用力掀，只掀得膀子要脱臼，疼得他满身流汗，还不放手。两支膀

子疼了半年才恢复。还有人戴上铁手铐打他，完全是有意谋害。刑罚用尽，目的就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写书人，是反革命。

他说：“书不是我写的，我不是反革命。”

穿军衣的人说：“康老说你是反革命，你还敢不承认？”

景范一气便说：“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所有的项目人员都叫起来：“你敢骂康老？他为啥是反革命？你敢说出内容？”

景范说：“康生，自从苏联回来，就没干过一什好事，在延安，他搞抢救运动，诬陷了很多好人。在晋绥土改，打死了许多人，还伤害了一些民主人士。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到处点名，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特务，伤害的尽是好人。破坏了我们政策。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武装项目人员说：“你敢写出来！”

“我敢！”说着，他就把他说过的话写了出来。

我不禁暗叫：“好一个陕北人中硬汉！”

他们收走景范写的东西之后，第二天又来提审，宣布：“刘景范是现行反革命，马上正式逮捕！”便戴上了手铐。

听了景范的叙述，我才明白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把我押到机关大院，看见的逮捕景范大标语的原因。据说，那种大标语曾贴遍了全北京城。

关于景范的被捕，他们曾编了许多谎言：什么“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骂了毛主席！”从此以后，景范换过很多监狱，每次换监狱都用黑布蒙上眼睛，装在吉普车里，让他不知去的是什么地方。

他戴黑眼罩，也不是第一次了。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时，给被捕者戴上黑高筒帽子，怕百姓认出他们是谁。景范也戴过那种帽子，现在又是用黑布蒙眼。

景范住过的地方，有的地方好些，吃饭还可以，有的地方坏些，

连窝头都吃不饱，狱卒还经常打骂。最可恶的是，有个地方派了武装战士背着枪，每天二十四小时站在床前，有个战士患肺结核，不断地吐痰，把痰吐在他的铺盖上，吐在开水桶里，使他不能喝水。还有个麻子脸狱卒，打人很凶，像仇人一样对待“犯人”。他怀疑是敌人的后代当了狱卒。否则，谁都知道这些人都是老干部受冤，怎么下得了手？

提起饭，就更难说了。他有十二指肠溃疡，吃了苞谷面就胃疼。他硬是饿了五天没吃饭，居然把胃饿得不疼了。以后吃起窝窝头，一个还不够吃，他要求再给一个，狱卒就打他，说他这是搞“策反”。

这监狱和一九三五年景范在瓦窑堡坐的监狱差不多。那时，想多吃一口饭，就要挨刀背打。现在，想多吃一口饭，要挨拳打脚踢。在监狱时间长了，他得了“幻听幻觉”病，每天看见墙上放电影，内容全是他熟悉的，有他的老家，有延安，还有他的老战友，亲人。

我一听，他是在幻觉中说话，思维不周全，他总是自己跟自己说话。有一次，要提审他，狱卒押着他往提审室走。耳边就有话音：“什么也不要说，这都是坏人……”

不管是放风，还是独自坐着，都有人跟他说话。他也在答话，但是又不见人。有一次狱卒问他：“你说什么？”他说：“你看，墙上那个人，在跟我说话。”

狱卒说：“胡说！明明什么也没有，你偏说有人。”便把他打了一顿。

他们放风，是一个个地放，在露天席墙棚里，一个出去了，另一个再进去，谁也碰不上谁。除提审人，送饭人，守门人，再也看不到人。他看着窗格的影子数时间（手表被没收了）。他喂蚂蚁，养蜘蛛，每天剩点饭渣养着它们，这是他的伴侣。他们可以共同消磨时光…

听他的述说，我估计，他的神经受了莫大的刺激，已到了神经错乱的边沿。

听他说话的嗓音也变了。变得像另一个人，我问他口音为什么会变？他说：“后来允许我看报，我就读报。不读报，我会变成哑巴，多少年没人给我说话了。我读的什么口音，自己不知道。开始，狱卒以为我和谁说话。打开门一看，我在读报。还把我骂了一顿。”

我又问他：“有人说，你往门外递钱，又挨了一顿打，还骂你是流氓行为，要收买狱卒。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那是我想家中的人。老觉得你们都和我关在一个监狱。听见隔壁有人哭，以为是你在那里，听见门外有人叫，觉得是米拉。有一天，她在门外叫道：‘爸爸，爸爸，我的肚子好疼啊。’我说：‘你赶快看病去！’她说：‘我没有钱！’我摸摸衣袋里，你给我塞的那张存款单，是二百元。我掏出从门缝塞出去。狱卒把门一开，就骂起来：‘你干么往外塞钱？想收买我们吗？’我说：‘我听见我的孩子在外面叫我，说她肚子疼。’狱卒骂道：‘谁是你的孩子？简直是流氓！把我们当成你的孩子！’

这就是“流氓”二字的来源。

我听后几乎哭出来：“孩子根本没有进监狱。他们都在内蒙插队、六八年九月就走了。小女儿去了江西，谁也不在北京了。只有你一个人在北京。你听到全是幻听……”

他还是问我：“你是不是关在我隔壁？”

我说：“我被锁在地质科学院地下室。曾想托项目组转东西给你，想使你知道我的下落，免得你有精神负担。他们不答应转东西，害得你得了幻听幻觉症……”

我又问：“到后来，你为什么说书是你主持写的？难道我写书还要别人主持？你瞎说什么？叫他们好审我，两边口供不一样，他们不放过我，总觉得我的态度特别坏。”

他说：“后来，我仔细想，咱们有孩子，没有你，孩子咋办。我

要求他们把你放了，所以我说：一切责任都是我的，与她无关。全揽在我自己身上了。”

我说：“我估计你是这样想的，太离奇，被我顶了回去。因为，关于书的事，你和仲勋、文瑞同志都说不清楚，你们基本上没看过我的稿子。究竟书中有多少变化，我写了些什么，你们都蒙在鼓里。你们才真正是受冤枉呢！只有我能说清楚。当然，他们很主观，不听真话。”

他还说：“在监狱里听到过陆定一的说话声，也听到过利瓦伊汉的说话声。”他熟悉他们的声音。还听到有女人哭，有人挨打。还有人逃跑，又被抓回来，毒打……砸脚镣。

我问：“秦城的伙食怎么样？我打听过，各说不一。”

他说：“有时好，有时坏，比如过年，菜里有黄花，木耳，可是他们不给好好做，连洗也不洗，把柴、草都做了进去，弄得人吃不下，把公家的钱都浪费了。”

他说监狱里也有好人：“我的满口牙都坏了，都疼，活动了。有个牙科大夫来检查，是个女大夫。她说：现在条件不好，拔牙的效果不会好，也不好镶，我教你做牙保健吧。她教了我，我照样每天做，果然疼得轻多了。至今，我都再想看见那位大夫。不知她姓什么。”

我看，景范已经变形，脸胖得不正常。是否他们给吃了什么药？另外两位“犯人”家属也这么说，他们的老头子出狱时，都是胖得不象样儿，脸是双下巴，回来一阵子，生活正常，就复原了。都怀疑狱中给犯人吃了什么发胖的药，故意弄成那个样子。可是，谁也无法去调查。

又想起一件事：在江西时，有人对我说，某人揭发，说陕北许多干部和林彪有关系。我也顺便问景范：“林彪事件发生后，项目人员是否审过你？”

他说：“中央项目组来人提审过，问我知不知道些什么？我说：中央在陕北时，中央的人，军队的人，都和陕北人有关系。到北京后，我没见过林彪。他们找不到什么根据，也就算了。”

监狱生活，使景范变了样子，变了声音，变了性格。所庆幸的，就是还没傻，还没有疯，这也应该喊“万岁！”了。

就在这几天，我们心里怀念着许多受株连的朋友。劳动部长马文瑞，已经出狱了。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还没消息。他受我的株连最重。我内心深感歉意和不安。嫂子去看望他们的亲属。住了几天，回来时，带回一封信，要给朱德总同志送去，求他说说话。

我和嫂子一块去送信。沿着万寿路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

听说，朱老总的处境也不好。我的问题尚未解决，到谁家都不合适。更不愿意去给老人们找麻烦，我对嫂子说：“我在门口等候，你一个人进去吧。”

嫂子进去不久就出来了。她说：“见到了康大姐，也见了朱老总。他们答应帮助转信。找机会为仲勋说说话。”

真感谢老一代的中央领导人。到底是感情不同，他们都通情达理，虽然他们扭转不了乾坤，可他们很顾大局。

## 四十二 遭劫难的根据地乡亲们

大概是因为一九七五年的国庆节，景范参加了一次国宴，名字见了报，外地的熟人纷纷来看望他，人更多了，特别是陕北人的子孙后代，来诉苦，喊冤的几乎天天都有。

有一天，来了个陕北人，是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进门先叫一声“爷爷”，就哭起来。景范问了他的姓名，家住何处？他说是保安县人，他要为陕北人告状。据他说，现在的陕甘老区，所有的基层干部，基本群众，都打成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或者“习仲

勋、马文瑞、刘景范反党集团”的“黑爪牙”，挨打，关押，逼死的人不少。据调查，有上万人。群众思念刘志丹，可是不敢公开哭老刘，只能偷偷地哭。因为只要沾上“刘家”的边儿，就成了“黑爪牙”或“反革命”，因为从中央派来的项目人员要找刘家的茬儿。

保安县的金汤镇，刘志丹的表侄，王兆吉烈士的儿子王悦贤，被打后，又被逼死了。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了。堂妹被打得遍体鳞伤。真像一九三四年反动派到那里“围剿”一样，把姓刘的亲戚都整遍了。老根据地南梁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也都深受其害，陕甘边界的人民，如同遇上了反动派的又一次“围剿”。

有人说：“不知是李建彤利用小说反党，还是有人利用小说残害老区人民？”

最坑人的是“学大寨”，害苦了老百姓。有逼得上吊的，有修水库砸死的，有日夜连轴转累死的。

省委书记还到处邀功，张扬着去开庆祝会，逼着群众清扫街道，修整大路边上的庄稼，蒙混人眼。再请客大吃大喝一顿，回到省上便登报，邀功。哪管人民的死活。

百姓形容他们的生活：从前的粮食，是大囤大囤的。现在的粮食，是小罐小罐的，连讨饭的自由也没有了。干部怕露馅儿，谁要去讨饭，得先经过干部检查，摸摸你家的罐子，实在没有一把粮食了，才批准你去讨饭。

群众形容那些新上任的干部说：“牵上羊来扛着枪，看你活像个反动党。”

干部扛着枪到群众家里，看见羊就牵走，自然要被骂成反动党。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事。这是新形势下的新生事物。

从前，大家都在延安时，外边的穷人往陕北跑，因为那里有吃的，能安家。现在，陕北人四处逃难。东部的，逃到山西；西部的，逃到



宁夏；南部的，逃到西安后，再逃往河南或甘肃。

当时，谁到了延安，也不敢下饭馆。因为讨饭人太多，把你围上后，都伸出黑乎乎的脏手，使你既心寒又恶心，再好的饭也吃不进去了。

自从推倒反动政权后，陕北人哪里过过这种日子？不用提丰衣足食大生产的年代，就是在解放战争中，兵荒马乱的，群众还藏了很多粮食，自己的人马一到，群众就挖出来供应自己人。

抗日战争时，就这么个小地区，能养活十来万军队干部和学生。供应是丰富的，战士和学生最低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粮食，每月一斤油，一斤盐，二斤肉，每人每天一斤青菜。这是延安时期的供应，全国解放二十五年了。全国各省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油，赶不上那个特殊的山区。另外，那时机关还有自己生产的物品，吃多少油、肉、菜，不计在内。至于群众自己，那就没有数了。群众家里的油是一缸一缸的，猪是一圈圈的。全国解放后应当更好，那里的人民负担减轻了。谁知又来了这么多的运动，一阵子“大跃进”、一阵子“大革命”，陕甘、陕北人民又掉进了苦难的深渊，怎不使人痛心？

在政治上，中央重用了康生那伙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宣布，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陕西是批判《刘志丹》小说。他们先把“彭、高、习反党集团”定死。在西北五省清除“彭、高、习”的“势力”，肃清“流毒”、“影响”。

单拿陕西来说，到处设监狱，西安的建国路监狱，就是专门关押老干部的。特别是将那些在一九三五年陕北错误“肃反”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又重新逮捕起来。他们唱出的调子是：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是对的，因为你们都是“反革命”。一九四二年西北高干会清理路线问题是错误的，因为你们是“右倾”、“右派”。他们公然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精神唱起了反调。

在那种形势下，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一共有几万干部受《刘志丹》小说的株连。

西北还设立了“习仲勋项目”，放到陕西，怕走漏风声，又转移到青海，由省委书记专门管，整了几箱材料。都叫做“绝密”文件。为整习仲勋，不知放出了多少暗探和盯哨的。

北京的“西安饭庄”饭庄王经理，还有“湖南饭庄”的经理，都说是习仲勋的地下交通员，被逮捕，被抄家。干部、群众、家属涉及何止几万人。

### 四十三 周总理逝世

这几天，周扬夫妇已到食堂来吃饭，我们两家坐在一张桌上。一连几天，我们都在谈过去，回忆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的那段生活。我告诉周扬，这次“文化大革命”，又审查历史，查我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在哪里，遇见什么事？要我写出证明人。我写的主要证明人，就是他，他那时是鲁艺的校长。

周扬也在回想过去，可能有不少人找他做证明人。他这时很冷静，对过去那些事，有了新的看法和认识，我说某某人如何主观，如何官僚主义，他也同意。既然都沟通了，我便觉得，“抢救运动”那笔旧帐，算是结了。

招待所每天喇叭广播新闻。这几天刚听完广播，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要请他出来主持工作。大家欢呼了一阵子。没多久，又听传达，上边又提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击邓小平。

中央发下三个文件。叫做“三株大毒草”。全是邓小平写的。叫大家批判。其中有《论总纲》。中央组织部，每礼拜派专人来招待所主持学习会。凡是住所干部，都得学习，表态。我的关系不在这里，每礼拜到我的机关学习一次。

那几天，我心烦意乱。只得跑到周扬老师那里，和苏灵扬他们一块聊天。我告诉他们两位：“我学习不下去。发下个《论总纲》，前边先批了一大堆。一看前言批语，就反胃。”

周扬到底是老师。他说：“你再耐心看看，后边有原文，很尖锐。”我再回到自己房中，使自己静下来。仔细读了《论总纲》的原文，养心提神。邓小平批“上海帮”批得好尖锐。简直就是针锋相对，毫不留情。那是代表人民的声音。看了使人扬眉吐气。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和他站在一起，连年轻人都说：“我们的邓大人！”

这时的中国人被压抑，一触即发。

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那天，吃过早饭后，我回到房里，突然，广播里传来了哀乐，播音员沉痛地宣布：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人们听到周恩来的名字，便流出泪来。

我家的阿姨哭着说：“天塌了、天塌了！”

我的小女儿也在房里开始大骂时下。阿姨赶快又捂上她的嘴：“不敢！这是啥地方？要惹祸的！”

人们的精神已失常态。有个朋友跑来说：“你们房里换了电话？”

“没有。只是有人进来修理了一下。”

“不对，你还是查看一下，是否有人给你安了那个？”她指指耳朵，意指窃听器：“不然，别的机关怎么传说你们换了电话呢？”说完，她就走了。

没有人通知，没有人组织，一夜之间，全招待所的人都戴上了黑纱、白花……每一双眼睛都有些红肿，里面闪烁着悲痛与仇恨的光芒。

这时，前后院的青年人，（都是住在这里的干部子女们），聚在一块往街上跑，他们到哪里？家长们不知道，索性也不管了。院子里的人说：街上单位、商店的门脸上全挂着黑纱。还有黑纱做的绣球。商店里把黑布做成黑箍，别上别针，进去人就卖给，要多少给多少。没

有人通知，自动的……

商店里的白毛线都卖光了。他们都截成扎小辫子的头绳，姑娘们去了就卖给，要多少给多少，自动地，没有人发指示。

书店，照像馆在卖周总理的像片，谁赶得快就能买到。没有人组织，连夜印好的。

纸店里的白纸卖光了。都在做白花，做花圈。

我们家里这几个人都跑了出去，分头奔走，什么都买了回来。而且买得很多。院子里，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戴上了黑箍、白花。每家的墙上都挂起了周恩来总理的照片，照片上挂着黑纱。

人心好齐啊！为什么？那是痛心，那是愤怒。

上边有通知：不许戴黑纱，戴白花，门口不许挂黑布。可是没有人听。

新来的客人带来外地的消息：“人们都疯了，警察拦也拦不住。开往北京的火车头上戴了黑纱，北京不许列车进站，可列车和旅客偏要进站，打起来了！北京人都向着列车。”

“各省的群众都在集会。悼念周总理！声讨阴谋家！到处是痛苦、发疯的人群，到处是快要爆炸的地雷。中国人要是急了可真不好惹。”

我走到街上看看，人山人海的，到处是黑纱、白花。也能看到一些穿着蓝色涤卡中山装的便衣，在人群中蹿来蹿去，鬼鬼祟祟的，互相传递着眼色。他们是在监视群众。

群众的眼睛却不揉沙子，挂起了周恩来的遗像，并自发地保护着，像是在捍卫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他们郑重地宣称：“谁敢动一动周总理的像，我们就把他宰了！”这就是人心，这就是民心，这就是一九七六年时的中国心。

#### 四十四 悼念周恩来

在食堂吃饭时，苏灵扬轻轻告诉我：“天安门的群众追悼会，比国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得热闹得多。人的一生，如能参加一次这样的追悼会，就什么也不用参加了！”

看来，她已经去过了。我回房和阿姨一商量，两个人悄悄走了，搭上 338 路公共汽车，到西单下车，直往天安门走。哪能走得动？马路上、人行便道上，全拥的是人。年轻力壮的都是小跑步往前挤，还有的是抬着花圈嚷嚷着走。老太太、小孩子，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来了，都随着人流往天安门流去。我们挤了一身汗，才挤到天安门。

在那里，人们都自动排队，我们随着队伍慢慢前进。一步一步走上了英雄纪念碑。人们是那样悲伤与肃穆。

我站在纪念碑上，虔诚地对周总理像三鞠躬。又随着人群绕着纪念碑走。抬头看花圈，真可称得上空前绝后：有几丈高的，有铁管做的，有绸缎花的，一个挨一个，一层高一层，几百、几千、几万，数也数不清，看也看不尽。

这里又是诗的海洋，完全是自发的，吐露的都是人民心里的话。就连那些小学生，都在老师的带领下，在纪念碑前宣誓，小拳头捏着，眼泪流着，一声声呼唤着他们的周爷爷。

无论是演讲，还是诗词，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将矛头直指“四人帮”，已经提出了“王、张、江、姚一小撮”的说法。愤怒的群众已经拔出了剑，准备战斗！

天安门广场，大树小树，矮松草坪，无处不是白花，真是满天皆白，神州戴孝，那一小撮掌权者，能阻止得了吗？不！谁也不能！

我怀着空前的激动，回到万寿路。小女儿也刚回来。她比我的收获还大，已经在天安门拍了许多照片，抄了许多诗。回来后，她还将有诗谱成悼念周总理的挽歌，拿给朋友们唱去了。

空气越来越紧张了。夜里，天安门的花圈被偷了，被抢走了，被

没收了。群众又送去更多的花圈。更漂亮的花圈。双方开始对着干了！

我到人民大学去看一位老朋友，听说头一天晚上，清华大学把一个学生叫走了。要他化妆成工人到天安门。我心里一惊，马上跑回家，告诉孩子：“你已经去过天安门，再不要去了。清华大学要派特务学生到天安门盯梢。你们去了要吃亏的。”孩子把我的话传出去，一个传一个，大家都注意了。

总理出灵那天，“四人帮”以中央的名义下了死命令：各机关自己内部悼念，谁也不许出大门。就在那天，万寿路七号二栋楼二层的会议室里，上级（中组部）派的人来召开会议，要求大家就在这个小会议室里纪念纪念，缅怀缅怀，诉说心里的哀思就行了，谁也不许出去上街！

话是说了，会也开了。可谁又能安下心来呢？我们向主持会议的人要求：“叫我们出去看看吧！总理的灵车就要过来了！”

主持会议的是位老太太，她很动感情地向大家说：“同志们，我和大家是一样的心情，谁不愿出去送送呢？但是上边有命令，我也不好办……”

原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再也按捺不住，把脸猛然扭了过去，背对会议桌，看来他要罢会了，只差还没有站起来。大家的心都在跳动，只要有一个人站起，大家就会一轰而散。

我突然站起走了。刚出门，就听见会议室的凳子叮咚响，我跑进厕所，等人都走光了，又跑回去，问守门的服务员：“人呢？我刚去了一趟厕所，怎么就走光了呢？”

服务员说：“谁也管不住嘛。”

我也出了大门。走到大街上一看，两边站满了人。前边全是军人，因为这一带军事机关多，军人都穿着棉军衣，膀子上戴着黑纱，胸前挂着白花。后边是机关干部和工、农、商等各种群众。

一望无际的长安街，塞满了人，中间只留一条行车道。大家都向东望着远远的行车道。我的个子矮，到哪里都望不见，挤又挤不到前边，只得在人群后边乱转。

虽然我看不见，可是心里却很宽慰：我总算看见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正在觉醒。尤其是军队中的许多干部战士和院校学生，他们也挣脱了枷锁，跑到了街上，而且是带头在那里排队，迎灵、送灵。不愧是人民的军队，不愧是千锤百炼的军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和人民站在了一起。他们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放心了。

那些群众，不都是从机关、厂矿里偷跑出来的么？中央的这道命令也没有把他们管住。我心里想：已经管不住了。群众又一次起来革命了，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真正的革命！事隔几个月，就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时又爆发了伟大的天安门事件。那一天，有多少人失踪了，天安门广场的血几天几夜也洗不净。

江青、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上指挥着，公安机关的汽车在广场乱窜。北京市革委的头头在广场下命令打人，捕人。

事件过后，紧接着又展开了大搜捕，大追查，万寿路七号也成了追查的重点对象。他们盘问谁那天去了天安门广场？谁手里有天安门的照片？谁抄了天安门的“反动诗”？统统得坦白交代，如不交代，查出来就严加惩办！

我心里真是有点不踏实了。我们住的是招待所，自己锁不住门，什么也不能藏。我把孩子洗出的照片，作的悼歌，统统转移出去。从照像机里掏出未冲洗的胶卷，将上面珍贵的资料曝光毁掉。真有点当年地下党的感觉。

我们机关里也在追查。在学习会上追查谁听到过谣言？有人反问：“什么谣言？我们没听过，请组长讲讲。”他当然不敢讲。还有人更滑稽。他说：“我听到过很重要的谣言，说‘邓小平人才难得’。”大

家憋不住笑起来，又赶快收住。那句话可是毛主席讲的。

在最紧张的那几天，住在招待所里的那些年轻人又忙起来。忙的什么？我不清楚，只觉得奇怪：宋任穷家的大儿子，儿媳妇，都往我家跑。在我家房门口站站，小女儿就跟着出去了。那小两口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人，找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谈什么？这样的事已经好多次了。出于好奇我悄悄问小女儿。开始她不说，等事情过去了，她才说。他们在办一件大事，宋家儿子写了篇“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的文章，想说明，那事件不像《人民日报》讲的那样，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他们几个人还都签了名。

小女儿有个好条件，她是中学的音乐教师，人际关系好，和刻蜡板、管油印的女孩子都很要好。拿到她的学校印好后，再取回分给大院里的青年们。都往外地寄，把真相揭给天下人皆知。而且请外地的朋友再复印，寄给另一些朋友看。

我知道以后，真是有点后怕。孩子们在背着我们闹革命了。

有个亲戚，在北京当交警，他到我家来辞行。他说：“我辞职回老家了。在天安门事件时，叫我们带棍棒去天安门打学生，我请了病假，躲过去了。下一次，还不知再闹什么事呢，我不能落个镇压群众的刽子手名声。还是回家种地为好！”

有个工厂的女书记，到招待所来看朋友，她说：“那阵子，叫我们出工人民兵，拿着铁棒去天安门执勤。我对工人们说：叫你们去，你们就去，可是决不能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只能打那些打人的人，看见谁打学生你们就打谁。”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人，都去慰问在天安门执行任务受伤的英雄，《人民日报》上登了照片，那些“英雄”头上还绷着纱布。

那些无辜挨打的学生，有些失踪了，死了，坐牢了，家长都不敢



打听。

打倒“四人帮”后，追查天安门广场事件中镇压群众的责任时，有人竟恬不知耻地说：“没有打人”。

## 四十五 四人帮倒台了

原青海省委副书记高峰，也是一九六二年受我案的株连，被扣以“彭、高、习反党集团”干将的罪名，撤职后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又转到东北工作。如今他得了癌症，住在北京301医院。他们夫妇全是陕北人，住在这个招待所里。高峰的夫人名叫张耀生，平常从医院回来，总是悲悲戚戚的，觉得丈夫的病太受罪，并为丈夫的生命担忧。这一天午饭后，张耀生进来了，她没有哭，含笑而又神秘地叫了一声：“老李，我给你说个话。那四个人抓起来了。”

话来得太突然，一下子把我弄懵了：“哪四个人？怎么回事？”

“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呀，都被抓起来了。我今天去医院看老高时，大夫悄悄对我说的，他说：医院里住的军队高级干部，凡是能动的，昨天晚上都出院了，说是出去听传达报告。现在还在保密，不让随便说。”

其实，这样的消息如何能保得了密？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回房中，景范已躺下午休，我把他叫起来，兴奋地小声说：“好消息！好消息！那四个人被抓起来了。张耀生从医院带回来的消息。”

等景范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他也不睡了，坐起来就和我聊。他总怕不确实，我把张耀生的话，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他便兴冲冲地下床串门去了。

怕打扰大家的午休，我强忍着坐到两点以后，就往前院跑，成了义务宣传员。跑到周扬家里，推门进去就说：“江青、张春桥他们被抓起来了！”

他不信，觉得这变化太大、太快了。我又转述了张耀生的原话。周扬的隔壁，就是东北来的薛兰斌的住房，我进去伸出四个指头说：“都抓住了！”

薛蓝斌脑子很灵，他兴奋地说：“这么快？好了！好了！这就好了！”

其实，这院子里早有传说，因为听到消息的人都要传。半夜听到的，半夜就去敲朋友的门。我们的消息比最早的晚了半天。事后小女儿说：“我早知道了，后院的大孩子们早就告诉我了。”她说的“大孩子”，就是平常找她玩的那些孩子们。

几天之后，机关才开始传达。全北京市开庆祝会，组织到天安门游行，从五七干校回来的人，几乎都去了。连上年纪的朱效成、吴俊如、徐本光、陈立贞，都在游行队伍里。

我们从西城的百万庄出发，一直排着队往天安门走。因为队伍太多，怕拥挤，我们的队伍的路线是绕景山前街过去。老吴头儿到底是心脏病严重，走到阜外大街，他就走不动了。只得脱离队伍慢慢走。

我随着队伍貌，心情特别激动，像学生时代参加“一二·九”游行。口号刚一停，我就催着呼口号。到了天安门，又绕个大圈儿，再回到西单，才算散队，各回各家。那一天，都为游行队伍让路，连公共汽车也不开了。我很得意地走回万寿路，虽然腿走疼了，可是心里实在是高兴，一种无法形容的高兴，有点儿像一九四九年进城时的心情。

一时间，北京成了欢乐的城，不眠的城，人们都在聚合庆贺，街上还跳起了舞，扭起了秧歌。

菜场卖活螃蟹，四只一份，都是“三公一母”，用绳子串在了一起。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迎合了当时大家急于出气泄愤的心情，使那年的螃蟹卖得特别快，竟然一度脱销。

天安门新扎了席墙，上边贴了大字报，画了“四人帮”的漫画。树上吊着四个纸人，在清冷的秋风中瑟瑟发抖。甬问，准保也是四人帮。

万寿路七号住的人都互相看望，道喜！毫无疑问，这是大家的大喜事。

不久，中央派人来了解情况。原来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人也换了，准备为这里住的干部安排工作。

到一九七七年，许多人就陆续离开这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或者搬进新房安家。

我们在万寿路住了两年半，也该“再见”了。政协管房子的干部问我：“你们还回不回丰盛胡同二号住？如果回，我们就把房子要回来。”

为此，我又跑到丰盛胡同看了一次房子。也因为孩子们在那里住了十年，那里留下了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和怀念。但我去了一看，却大失所望。那所房子，有三进院子，有十几间房子，我们全家离开后，曾被军代表住过，造反派头头也住过。军代表走后，又让给一位长征干部，他们已办了接交手续，住上了。这都没什么，公家房子，谁住都一样。但是那房子、院子都变了模样。原来景范亲手种的大蜜桃树，每年可结一二百斤，又软又甜，被他们连根拔了。四棵海棠树，有一棵嫁接了梨，一棵嫁接了苹果。都是景范亲手嫁接的，已经结了果。还有两架葡萄，是景范亲手种的。现在连根都没了。高大的枣树也被锯了。总之，这里到处充满着破坏，房屋呈现出败落后的斑斑驳驳，院子成了光秃秃的。现在这个院子，已成了一个荒芜破败的大杂院儿。看过以后，我只得说：“这房子我们不要了，还不如住在这些小楼房里方便，免得‘运动’一来，造反派就闹，就得停暖气，再搬家。算了算了，就在这个‘复辟楼’里养老了。”

## 四十六 冤案彻底得昭雪

关于我的案子，我也在反复地想，只凭两年半前那几个字的批示，并不算解决。也只是由“敌我矛盾”转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我还是背着这个包袱——“反党小说”的作者。

我需要平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牵连到几万人的问题，几万户家属和孩子的问题。

“四人帮”打倒后，中央组织部换了新部长，是胡耀邦。许多人的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我该怎么办？我去争求几位老同志的意见，问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我的问题能不能申诉？”他说：“你的问题没人敢受理，因为是中央定的。”

我去问周扬老师：“我要申诉，你说行不行？”

他说：“中央定的案，主席说了话的，你只能藏书，不能出书了。”

我去看习仲勋的夫人，安慰她说：“放心，我会申诉的，将来一平反，仲勋他们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谁知这句话把她吓坏了。她说：“建彤，你可不敢申诉。我那老头子刚放出来，你一申诉，他又得坐牢！”这事真把她吓糊涂了。

过几天，周扬老师的夫人苏灵扬师母又打电话给我。她说：“周扬同志很关心你，叫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申诉。那是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主席说了话的。”我答道：“谢谢你和周杨同志。不过，我从不信神仙和皇帝，只靠自己救自己。”

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这些老同志，党性实在太强，他们宁肯自己受委屈，也不让申诉。可别人还说他们“反党”，他们“有野心”，实在太冤枉了。他们忠诚到了愚忠的程度，还是得不到信任。我为他们不平，委屈，可怜，他们忠诚过度了。

我只相信实事求是，只相信真理，只信《国际歌》上的唱的，“不信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

一九七七年过春节，中组部李步新副部长来看景范，他顺便问我：“好么？”我说：“我背着大冤案，怎么能好呢？”

李部长说：“你有意见可以写申诉，我替你带上去。”

我写了个便函，是给胡耀邦部长的，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中组部果然受理了。可是，在习仲勋那里发生了障碍。他从外地来北京开会，中组部的副部长李步新，部长助理毛铎，都去看过他。回来向我说了这样的话：“仲勋同志不同意给你平反，他认为平反了，对毛主席不好。”

我真为他惋惜、这么愚忠！我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不能听大干部的，要听我这个小人物的。只有我能说清楚情况。他虽然为此事挨过打，他说不清。”

过几天，习仲勋同志亲自跑到我家来说服我。他说：“你还是不要提这个问题吧！这案子是中央定的。”

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问题。如果只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背黑锅就背一辈子算了。这案子牵连了几万干部，几万个家庭在受迫害。为了那几万人，我必须申诉，再挨打也要申诉。我没有写高岗，是他们的诬陷。”

习仲勋才明白过来，他说：“啊，原来是这样。那么，我到中央替你说说话吧！”

“不用，你不要去替我说话，也不要阻拦。你到广东上任去吧。这事我自己会办。”

就在那几天，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平打电话给我。她说：“耀邦同志本来今天找你谈的。可他今天又要开会。要先和你谈谈。”

我去找贾素平，她是位女干部，年龄不大，却很老练。见了她，我就无所顾及地往外说，一个钟头之内，就把全部案子谈完了。

她说：“别的女干部来申诉，都是哭着来的，你怎么没有哭呢？”

我说：“哭什么，没有必要哭！”她笑起来：“对，我赞成这样。整我时，我也没哭过。”

从此以后，我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写给她。她看过一些材料，心中有了数。她说：“只需一本书了！”

我说：“书，我还得找找。”

她说：“陈野苹部长说，如果你找不到书，这里给你找一本。不是发过‘供批判用’的书稿么？”

我说：“不用，所有在外边传阅的书稿，都不是我的最后稿。是康生印的草稿，是废稿。说实话，我的最后稿在地下埋着。”

她说：“地下埋着的也可以拿来！”

她很通情达理。她也明白，从古到今，凡受过“文字狱”之害的作者，都会埋藏书稿，有的是亲属代为埋藏，这并非罕事。“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开始抄家，我就把一部书送给朋友，埋了起来。

贾素平局长很慎重。她拿到书之后，又提出请文化部的专家们先提出个意见。书稿转给文化部党组之后，时间拖得较长。听说是这样的：党组织把书稿给了文化艺术研究院的苏一平副院长。苏一平很为难，因为他的档案中还写着我这个案子，他是受株连者之一。为避嫌疑，他只得回避这个工作。

文化部又把书转给贺敬之，冯牧两位领导。他们组织政策研究室的人，集体阅读后写出意见，认为政治上没有问题。文化部党组同意后转给中组部。

当时我想，这案子是中央定的，中央的人不说话，会给耀邦部长造成困难。我决定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信，先告康生，又怕被人中间卡住。正在考虑，恰遇谢老（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大姐来我家。给她看了“小报”上康生对《刘志丹》小说案的讲话。她说：“这是证据，先告他！”

定国大姐又带我去找董老（董必武）的夫人贺连芝大姐，谈了这个问题。贺连芝非常热心，她说：“好妹妹，见了你，就是见了亲人。董老常说，要不是陕北那块根据地，我们还不知往哪里走呢？陕北干部是我们的亲人。凡是陕北干部的事，一定要认真办。”

我非常感动，心里热呼呼的，三十多年没听过这种话了，终于由贺连芝大姐说了出来。

我把事情的原委向她说后，又把写的东西念给她听，她又提了点修改意见，我照她说的改好后，就交给了她。

三天之后，中央组织部宣教局通知我：邓小平副主席的批示下来了。要我到宣教局谈话。

原来中组部新成立了个宣教局。我的案子由干审局转到了宣教局。

就在这期间，耀邦部长签发了一个新华社的“情况反映”。标题是《现代文字狱》。专门讲的《刘志丹》小说案。

宣教局重新仔细研究了的书稿，写出正式平反报告。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又征求一九六二年项目人员的意见（康生之流除外），应当平反。并说：请转告李建彤同志，向她道歉！

有的说：“这本书本不应该打成反党小说。同意平反。”

有的说：“为一本书，打倒那么多人，是不对的。”

有的还补充了些平反的材料，说明原来立案就荒唐。还把康生、阎红彦的活动也加进去。

为征求意见，文件周转了几个月，到一九七九年八月，才送中央批准。即中共中央 1979 年的 53 号文件。

此案整整经历了十七年之久。

53 号文件批驳了康生，“四人帮”时期对《刘志丹》小说的诬陷。也说了阎红彦如何到处活动，如何勾结康生诬告。

文件认为：

《刘志丹》是一部很好的革命文化作品。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写作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秘密反党集团”。在写作过程中所接触的人，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不是什么“反党”的关系。

文件认为：也不存在“剽窃毛泽东思想”问题。康生强加给这部小说的罪名，制造了理论上的、思想上的混乱。

文件认为：康生曾布置：不仅清查小说《刘志丹》，而且要查西北地区的党校，革命博物馆的党史宣传。意即不准宣传陕甘地区的革命历史。“此风一起，给写革命斗争史的小说，回忆录，进行历史研究设下了禁区。”

文件还认为：小说中的罗炎，并不是高岗。《刘志丹》是一部小说，不是党史，应该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隐式的方法硬把小说人物同真人等同起来。这种索隐式的批判方法，应当废除。

文件认为：应当实事求是的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一切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割断历史——因此，小说中即使采用了高岗在陕北时期的某些素材，也不应定为“高岗翻案！”小说《刘志丹》案件，纯属康生制造的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发展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当彻底昭雪平反。

文件发下时，一九七九年八月，距案件发生的时间——一九六二年九月。已有十七年之久。文件发到全国各地，传达到县团级。我所在的机关，在全体人员中宣读了。大家都说：“把人凭白整了这么多年，把我们也骗了这么多年！”

有人见了我就说：“想不到还能平反。”

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中组部给《红旗》写了篇文章。文化部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中央文件提出，要支持我把《刘志丹》写



完。因此，平反后我没接受任何工作，关系在原单位，我坚持写作。一九七九年八月发下平反文件，一九八〇年夏天重新开始写作。一九八三年已写完第二卷，第三卷，并回头修改了第一卷。共一百多万字。

我并不是想当什么作家，只是要完成我的历史任务。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机关给我的任务，而是我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报答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吃的十二年小米饭。我敬仰刘志丹这样的革命英雄人物，他在中国的那个历史阶段，1921——1938年，有代表性。他活得既痛快，也痛苦。

《刘志丹》一、二、三卷出版后，又遭到“左”倾社会主义者的围攻，诬告。他们结成团伙，千方百计不让写出来他们的过去——打人、杀人、捕人、活埋人、强奸妇女……种种见不得人的罪行。实际上他们应该是刑事犯罪分子。可目前他们却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伪装得像“正人君子”。他们官官相护，上下串通。现任官员中意志薄弱者畏惧痞子群，为保乌纱，便投机妥协。官僚者是顺口答应，不按法律、政策办事。便把我的小说又压制了下来。

一九八五年四月七日写完初草

一九八八年三月又整理成稿